

目 录

王若飞.....	陈志凌	贺 扬	(1)
安子文.....	宋荐戈	李茂盛	赵 晶 (85)
李之龙.....		吴德才	(131)
陈佑魁.....	曹木清	吕芳文	(157)
朱少连.....		陶宗侃	(175)
刘愿庵.....		王 斌	(194)
柴水香.....	冯 明	王文达	(220)
江 浩.....	李腾俊	姜廷玉	董振修 (234)
刘 英.....	黄书孟	张继昌	(261)
钱 兴.....	卢 权	褚倩红	(292)
	田炳坤	陈欣德	
秦鸿钧.....	翟作君	王蕙炎	(326)
肖 明.....		胡 华	(337)
雷经天.....		王林涛	(346)

附录

刘澜涛同志来信.....	(3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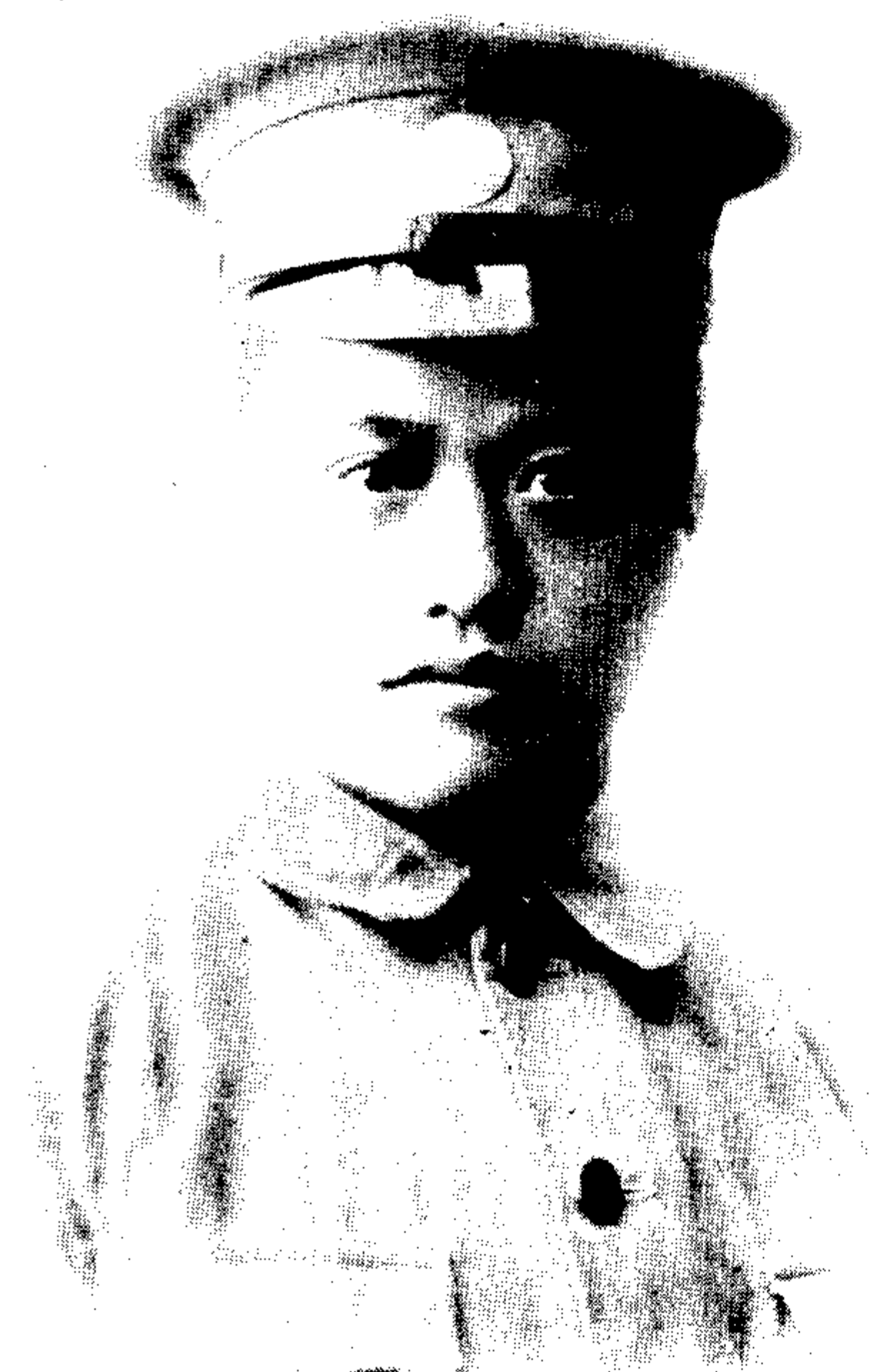
王 若 飞



安 子 文



陈佑魁



李之龙



朱 少 连



刘 愿 庵



柴 水 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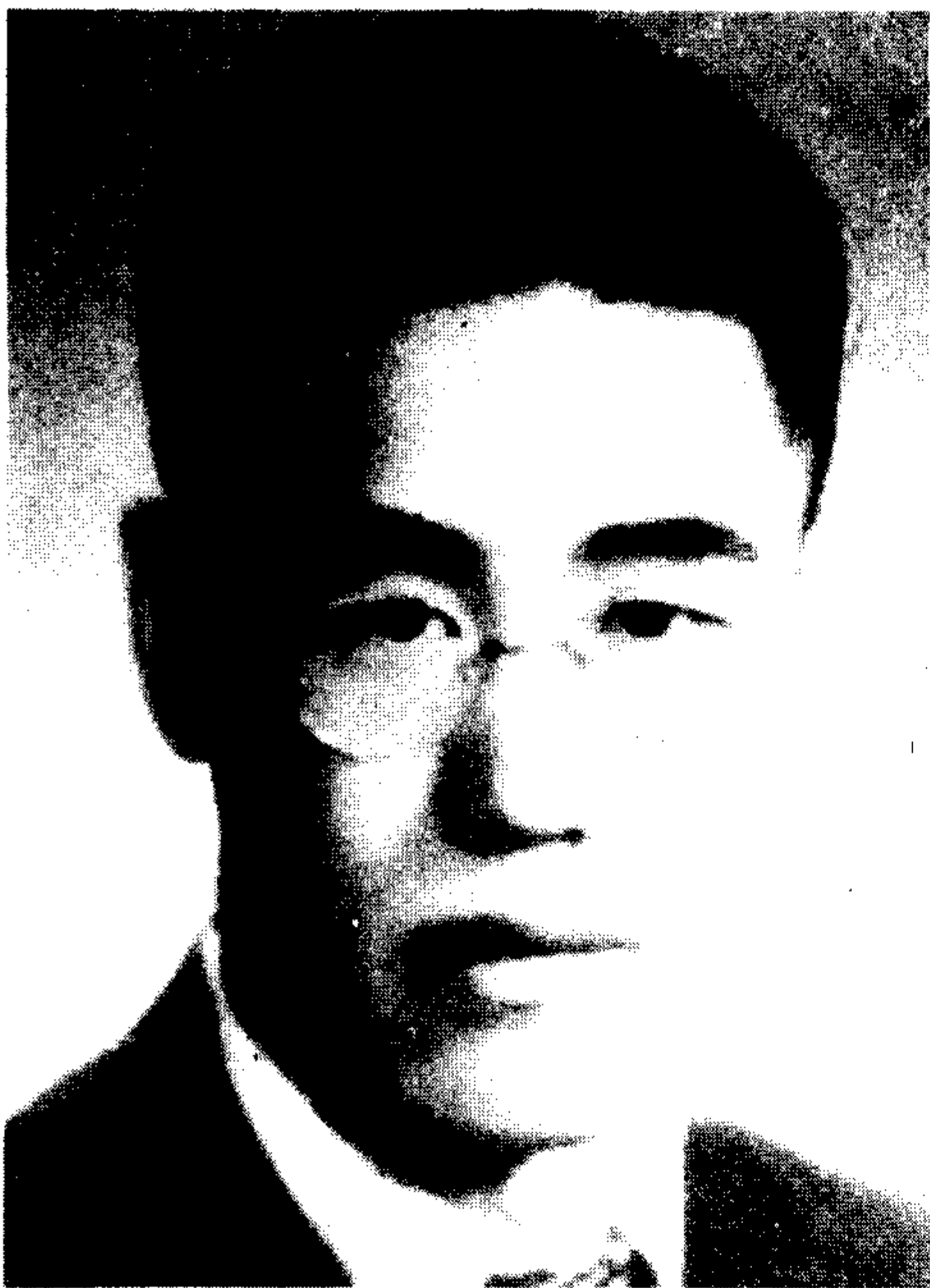
江 浩



刘 英



钱 兴



秦 鸿 钩



肖 明



雷 经 天

王 若 飞

陈志凌 贺 扬

王若飞是我们党的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锻炼的卓越的政治家。他经历和参加过辛亥革命、讨袁运动、五四运动；留学日本、法国和苏联；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诸时期，以及重庆谈判斗争中，担任过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在敌人监狱里，经受了各种严峻考验，同反动派作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他由重庆飞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途中飞机失事遇难牺牲。

达德学校的优等生

王若飞，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一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县城北街的一个地主家庭，原名荫生，又名大伦，别号继仁，后来曾用若飞^①、雷音、度、若、飞、黄敬斋等名。

王若飞祖辈时，家势兴旺，当地人号称“北城王”，又称

①取名若飞说法有二：1. 王若飞8岁从安顺来到贵阳舅父家时，外婆见他瘦弱、拙笨，心里一阵酸楚，因望他早日强健起来，叫黄齐生为他取个吉祥、上进的名字“若飞”。2. 辛亥革命前夕，他读了《木兰辞》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之句，非常赞赏，对同学说：迟钝是我的缺点，我要敏捷、迅速地奔赴事机，遂改名“若飞”、“度”，借以自勉。

为“诗礼之家”。王若飞五岁前，聪明伶俐，深得九十多岁的曾祖父宠爱。曾祖父死，家事衰落，庶祖母成为家庭的实际主事人。王若飞父亲王孝源（王仲其）^①，由于做匹头生意失败，以及好赌钱、嗜鸦片等因，被庶祖母赶出家门，流落街头，不几年，潦倒而死。王若飞与母亲黄固贞（黄干之的妹妹、黄齐生的姐姐）、妹妹王若芬，虽未被赶出家门，但受尽了虐待与折磨。黄固贞常年累月在磨坊推磨和下厨烧饭；若飞和若芬几乎天天遭到庶祖母和叔伯的责骂和毒打。有一次，若飞给叔叔送去一碗面条，碗没有端稳，面汤洒到地上，被叔叔罚跪；若飞不肯跪，就被叔叔一把掌击倒在地，右耳被打聋了。此种逆境，对王若飞身心发育影响很大。他满头生癞疮，身体瘦弱，目光呆滞，行动笨拙。

王若飞母子的困难情况，引起他舅父家的关注。一九〇四年二月，若飞八岁时^②，黄齐生来到安顺，商量将王若飞接到贵阳读书的事。开始，遭到王家拒绝。后黄齐生又到王家，告以将来萌生成人，亦王家之荣，我只是尽母舅之责。经再三陈情，才准带走。一年之后，王若飞的母亲和妹妹也到了贵阳黄齐生处。

王若飞到贵阳后，被送进达德学校预备班学习。达德学校的前身是“算学馆”、“达德书社”。黄干之是它的创建人，黄齐生也在该校任教。王若飞初入预备班时，智力迟钝，读三字经中“马牛羊、鸡犬豕”句，十数遍不能背诵，“状似白痴”，只会念“大牛”、“小羊”这类简单词，期末考试不及

①安顺地区党史资料第8期，1983年10月。

②《王若飞自传》称：七岁时被齐生舅父接到贵阳。黄齐生《王若飞行述》称：若飞“八岁不识字，余往携至贵阳小学。”

格，“留级者再”。在黄齐生精心关照下，一年之后，王若飞身体逐渐强壮，学业进步很快，在第二年的预备班学习结业时，成为优等生，升入初小一年级。读到初小二年级，智力得到很大发展，聪颖过人，成绩优异，被评为“最优等生”，连跳两级进入高小。此时的王若飞与初到贵阳时判若两人。

本来达德学校规定学制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王若飞一共只上五年就毕业了。黄齐生十分称赞王若飞的进步，曾在一首回忆往事的五言诗中写道：“……十岁心花放。行止坐卧间，书卷手不让。日记或千言，使我惊奇创。十二躋高等，胆粗气益壮。”^①

黄干之、黄齐生都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主张社会变革。王若飞受两位舅父进步思想的熏陶，并且从舅父那里读了一些如《民报》、《新民丛报》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进步书刊，眼界大为开阔。他在担任低年级“学长”^②，给低年级上课时，总是宣讲进步书刊上的好文章，或选一些好文章的章节念给学生听。有一天，校园里突然出现了一张“禁书布告”。王若飞一看，所禁的书目，都是黄齐生推荐的好书和好文章，他立即提笔在“禁书布告”上画了两个大“×”，并向看“布告”的师生大声说：“各种类的书都要读，这类的书读的越多越好。”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举义旗。十一月四日，贵州宣告独立，驱逐了清政府官吏，成立军政府，许多过去受政府监视迫害的分子，都成了军政府的要人。黄干之当了军政府的实

①《王若飞青少年时期在贵州》，载《贵州青年》1978年第7期。

②当时达德学校规定：每学期从高年级抽品学兼优的学生辅导低年级或代老师上课，这样的高年级学生被称作“学长”。

业部长，黄齐生受任为贵州军政府外出联络的代表。就在军政府成立的那天早晨，王若飞来到学校，高兴地喊着：我们贵州光复了，再也不受清政府的压迫了！一会儿，他们平常最敬慕的地理课老师傅中藩来到学生中间，握住自己的发辫宣告，今天大家都可以剪去这条尾巴了。话毕，当场剪掉了自己的发辫。此时，一位同学又找来一把剪刀，王若飞接过来，说：我们今天是革命，首先要“革”头发的“命”。他学着傅先生的样子，也将发辫剪去。接着，全班三十几个同学，都将发辫剪掉了。

这一天，达德学校高年级学生，整队到军政府门前等待分配任务。不久，一军官出来传达命令：新军陆军小学堂、普通学校学生每人发给步枪一枝，子弹五十发，分守省城各要地、仓库。王若飞和同班同学们一起，担任西城门的稽查工作。当时天色已晚，谣传甚多，忽传西路有土匪要来攻城，大家有些紧张！王若飞却镇静地说：“怕什么？我们手中有枪有弹，实弹射击，正是我们的难得好机会。”他们在西大门坚守了三个昼夜。

辛亥革命的余波，冲击了贵州省地主豪绅统治的旧秩序，反动阶级的代表戴戡、刘温世、任可清等勾结云南军阀唐继尧，于一九一二年一月进兵贵阳，扑灭了光复贵州的军事政治力量。就在这一年底，王若飞从达德学校毕业了。

一九一二年初，王若飞到贵阳崇学书局当店员。这个书局是蔡衡武经营的一所进步书社。他们经常从北京上海等地购回进步书刊，深受进步人士的欢迎。王若飞在店里热情地为读者介绍进步书刊，同时利用一切闲暇时间，手不释卷地阅读新书新报，抽空练习写作，因而文思大进。

两年后，黄干之任铜仁矿务局长，王若飞随同去矿务局任文牍员。一九一五年秋，袁世凯筹备称帝，王若飞回到贵阳参

加起草达德学校声讨袁世凯的檄文，并走上街头，发表反袁演说。达德学校校长聂守微领头，黄齐生、凌秋鹗列次，通电响应孙中山讨袁号召，并派王若飞前往铜仁联络驻军彭公武部起义讨袁。不久，云南贵州组织讨袁护国军，黄齐生奉贵州新政府之命，外出上海等地联络，又令王若飞携巨款取道湖南到上海会合。当时袁世凯已命令他的第二路军总司令马继增率部三万余人，从湘西进攻贵州东部，严令盘查贵州出省人员。王若飞走到湘西辰溪县被袁军扣留，“多次遇险，几至断送生命”，终因他机智勇敢，回答问话神态自若，经过一个多月，查不出什么破绽，始获释脱险，赶赴上海。后随黄齐生遍游沿海南北各省许多城镇，了解各地风俗人情，开展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宣传活动。

一九一六年冬，王若飞取道四川回贵阳，第二年春，在达德学校任小学教师兼文牍员。这时，王若飞全神贯注地看书备课，时间安排得很紧，平时宽袍大袖，有时头发蓬乱，同事中有人讥笑他不修边幅，而黄齐生却称赞说：“若飞精神，真与常人不同，他的确能超脱于日常衣履之外。”^①

一九一七年冬，黔中道尹王伯群招考官费留日学生，王若飞考中。黄齐生亦因受贵州当局排挤，无法继续工作下去，决定赴日留学。甥舅二人相偕，于残冬腊月间匆匆离开了贵阳。

留 学 日、法、苏

一九一八年春，王若飞等八名贵州官费留日生和二十名私

^①转引自贺梓侨：《少年时代的王若飞同志》。

费生，在黄齐生率领下，离开上海抵日本东京。经过交涉，王若飞入明治大学。这所大学无教师给中国学生授课。他们名为明治大学学生，实际上完全是过着自修生的学习生活。看什么书，研究何种问题，学校无人过问。此时正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日本有许多刊物发表介绍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章。王若飞借着学校提供的住宿和报刊图书条件，努力学习日语，用主要精力搜集有关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材料，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发生的原因、革命的经验、革命后的政治经济形势，并初步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很向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极大兴趣。

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是袁世凯卖国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国耻日。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这一天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从而引起了王若飞等中国留日学生的愤慨。为了表示他们的抗议，黄齐生等就在当天离开日本回国，随后王若飞亦回国。王若飞留日的学习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王若飞回到上海，在昆山一所破祠堂里找到黄齐生，并同住在那里。当时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已发展到全国，王若飞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他热心地参加了上海学生、工人、市民联合举行的反帝大示威，散发传单，并在街头发表演讲。五四运动后，黄齐生组织了贵州教育实业参观团，王若飞也是成员之一。他随黄齐生到了当时所谓的“模范县”南通和“模范省”山西，考察了几个月，十月上旬回到上海。时值李石曾、吴稚晖与吴玉章等提倡赴法勤工俭学，响应者甚众。王若飞与黄齐生商量，决定到法国去。经过多方设法，他筹集到路费一百元，又从蔡衡武处借到三百元，于十月十六日乘美隆洋行租用的英商货船离开了上海。

这次去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共四十八人^①。船起航后的当天晚上，学生们自己组织了两个法文学习组（已学组和未学组）。王若飞在达德学校学过法文，因而参加了已学组。每天早八至九时，晚五至六时，由上海震旦学校毕业的陈复燃授课，王若飞坚持听课，从不间断。海上航行三十多天，途经新加坡、哥伦布、苏伊士等港口，十一月二十四日抵马赛下船。二十五日，王若飞等乘火车至巴黎，住在留法学生招待所。

十二月二日，王若飞等离开巴黎，到方登普鲁加伦公学补习法文。学习三个月，法语程度有很大提高，能用法语会话，看法文书籍。三月二十七日，学校放春假，王若飞因钱用完，就结束了学习，暂时住在学校，等待华法教育会代为找工作。大战后的法国，工业元气大伤，许多工厂未能复工，大批退伍军人和失业者急待安排，中国人很难找到合适工作。直到四月十四日，巴黎华法教育会派人来，告知圣夏门钢铁厂招收学徒二十五人，令即刻前往。王若飞等遂于四月十五日动身，十六日抵达圣夏门钢铁厂。

刚到圣夏门，王若飞举目一望，只见黄尘满地，黑烟四起，天色昏暗，河水污浊，街道不繁华，房屋多败陋，往来行人，尽是些衣履褴褛的劳动者，精神很不愉快。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觉得这黄黑的烟云也是大块文章，粗野的劳动者，才是人类过正当生活的人，又是文明的制造者^②。认识提高后，他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新的劳动生活中去。

初进工厂头一天，首先碰到的是选择工种问题。同去的二

① 《旅欧周刊》第4号报道为“五十三人”，1919年12月6日。

② 《圣夏门勤工日记》，原载《少年世界》第1卷第11期（1920年11月1日）。

十五人大多数没有做过工，只有一个人做过几个月的制模工，于是大家都选择制模铸工。可是，又听人介绍制模工作很苦，初学时只能做搬石筑土等笨活；即使能制模时，还要亲自倒铁水，稍有疏忽，铁水落在身上，轻则烧坏衣服，重则皮肉尽烂。这时，大伙都后悔不该填写制模工。当天下午，在正式表格填写个人履历和志愿工种时，早上签名学制模的人，多数改报锉工，只有王若飞等六人坚持未改。工头分配王若飞协助名叫惹尔维的法国工人，制造大齿轮模型。王若飞很卖气力，帮他撮了大堆土，又帮他筑模。筑完一周，已汗流全身。他一直坚持筑完才放下。

王若飞不怕脏不怕苦。当时天气开始炎热，厂址干燥，大风刮过，满面沙土，为汗水所粘凝，偶一拂拭，其状怪丑可笑，鼻孔常为灰沙室塞，呼吸迫促，他只好时时仰面嘘气以自苏；口苦渴了，他就吸一口冷水以清喉噪。下工时，仿如初出监狱囚犯，觉天地异色，形容憔悴。

有的同学惯于养尊处优，做了几天工，手上伤痕累累。王若飞认为这不过是皮肤之伤，等磨下茧皮就不怕痛了。纳河舍化工厂劳动较苦，到该厂做工的二三十名中国学生，因受不了苦，多数人跑回巴黎，只有一名叫邓武的学生，坚持做工无怨言，积蓄了数百法朗，还清了欠帐。王若飞赞扬说：这才是我们的榜样。吾辈立志来法勤工俭学时，即已决心和困难奋斗，今日所学，并不甚苦，纵有点苦，也应努力将它打破，象这种畏难而退，而且还要怨恨以为是受了倡导人的哄骗的，真是把勤工俭学四字玷污了①。

① 《圣夏门勤工日记》。

王若飞在谈到他对劳动的认识时说：劳动是“自己对人类应尽的一种义务”，“是愉快的事业”。如果“对于劳动而生痛苦观念，是很可耻的事”。现在的劳动虽然是“替别人做事，拿劳力卖钱”，但可以达到下列目的：“一、养成劳动习惯；二、把性磨定，把身练劲；三、达求学之一种方法；四、实地考察法国劳动真象。”①

王若飞经过几天自觉地刻苦地劳动，找到了劳动生活的规律，便适时地将每日工读时间表制订出来：“早五时起床，五时到六时半读书，六时半后吃咖啡入厂，七时至十一时半做工，十一时半至十二时半午餐，十二时半至一时读书，下午一时入厂，一时半至五时做工，五时至六时晚餐，六时至九时读书，九时半睡眠”。共计每日做工八小时，读书五小时，睡眠七小时。王若飞说：“就我的经验，学校补习与工厂补习不过是三与二之比”。其实认真研究学问，每天读书时间并不多，果能做到心不外驰，读一点钟可比别人读三点四点钟，一天读五点钟已经是很多很多的了。”②

在勤工俭学期间：王若飞很重视社会调查。一九二〇年“五一”节，法国工人照例罢工，华法教育会通告：罢工时会出现无知工人侮辱外国人的事，劝同学在这一天以不外出为好。王若飞认为，要研究法国社会运动，这正是个大好时机。其他同学没有人肯去工厂观察罢工真象，王若飞独自一人奋勇前往。他走近工厂，看见工厂门口站的人很多，武装警察持枪守门，还有工人进进出出。他也跟着进去。只见车间里机器仍在转动，工作照常进行，做工的人只减少三分之一。他一打

①②《圣夏门勤工日记》。

听，才知道大多数工人不知为什么要罢工，参加者多是些年富力强、加入工会的人；至于年老的技术工人和生活困难的工人则参加的很少。法国工人运动这一状况很有代表性。王若飞说：“通过这件事，引起我无限新的研究趣味”^①。

王若飞还调查了法国工人工资制度。他发现工人正项工资不高，奖励费很多。学徒工三年以上日工资只有七法朗，但奖励费有时超过正项工资一、二倍。工厂规定发薪的办法是，按工人技能的优劣来定，技能高的工人，每天工资不得超过三十法朗；普通工人只有二十法朗左右。奖励费是根据工人勤惰和成绩来定。惹维尔正项工资只有十七法朗，然而他干了十三天活，竟得了四百法朗，奖励费与正项工资几乎相等。王若飞很赞成这种奖励办法，他认为“这种奖励费是很可以鼓励工人勤奋作工的”^①。

王若飞到法国做工不久，接到蔡衡武先生汇来七千六百余法朗钱，是给他和另外几个贵州同学的。王若飞说：我们现在工厂做工，每月所得，足敷用度，实无需用此款之必要，放在手边，反容易随便花掉了。他听说伦敦的师友，境况很是窘迫，建议并商量决定将这笔款转汇去接济他们。不几日，伦敦师友复信，说他们现在也在做工，不受这笔款，要王若飞等留作将来入学的学费。有人建议他们立即拿这笔款入学读书。王若飞说：我们已进天然的社会学校了，若是抱取几本讲义，在课堂上听几点钟课，才算为学，那在中国和日本就学不是很好，何必远来法国？我不是反对进学校，而“是说吾人当求活学活知”不可“专读死书”。

^① 《圣夏门勤工日记》。

王若飞等认为这笔钱应当用在要紧处，不能分给个人乱花掉。最后决定资助熊路清、蔡清宽二人去美国求学。熊蔡二人开始推辞不接受，王若飞等再三说明：这不只是帮助你们去美国，更主要地是希望你们在美国替我们建立一个勤工俭学的基地，以后我们也有许多人赴美求学的。这样，对方才接受下来。

一九二〇年五月，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在蒙达尼集中了十几名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开会，研究“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和道路问题，广泛地探讨了人生观、宇宙观、个人理想以及人类未来等方面大家关心的问题。这次会在留法学生中影响较大。会后不久，王若飞离开了圣夏门，也去蒙达尼的胶鞋厂做工。在那里，他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清理、批判了自己战前信仰过的俾斯麦主义和战后信仰过的威尔逊主义。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正确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给被压迫阶级和民族指明了斗争方向。从此，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①。

一九二〇年八月，工学互助社（后称工学世界社）成立，社员中在改造中国问题上存在两种主张，一种是无政府主义的，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为了统一认识，十月，在蒙达尼召开了三天社员代表会。会上，蔡和森做了《怎样救中国》的报告，批判了各种错误的“救国”论调。王若飞参加了会议并坚决支持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主张。他向到会代表详尽阐述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①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载《五四运动回忆录》第92页。

据当时与会者回忆：王若飞讲话时以流水一般的口才，动人的神彩，吸引了所有的听众，会场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所震动。尽管当时那两种对立的主张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但蔡、王的演说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工学世界社成立后，参加者竟达三四百人之多，在留法学生中影响很大。当时在工学世界社内，对勤工俭学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分歧意见：一种人认为，勤工俭学是“主义”，可以终身行之，既可行之于法国，亦可行之于全世界；一种人认为，勤工俭学是手段，通过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勤工俭学可以学到革命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革命本领，以备将来回国参加斗争。王若飞坚决赞同后一种意见。他明确地指出：勤工俭学是谋生手段，是穷苦学生大众学习革命理论和科学技术采取的临时措施。他还说：在勤工中不忘学习，边工边学，挣得一部分工钱后，再去集中时间学习，钱用完了再去做工^①。

为了革命斗争，王若飞抽空奔走各地，遍访联络各地有志之士。一天，他和舅父黄齐生由蔡和森陪同来到郭春涛住室，蔡说：他们是专来求友的，他们都是爱国志士，愤恨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横暴，特走访各地志士，谋求共同救国的方法。他们四人在一起开诚相见，毫无拘束地探讨了求学、救国和建立革命团体等问题。此后，王若飞和黄齐生还流寓比利时、德国的许多城市，找不到工做，经常饿肚子，过着颠沛流离的困难生活。在那里他们访问了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了解了社会，联络了友情，扩大了眼界。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爆发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求

^① 《圣夏门勤工日记》。

学运动，亦称二·二八运动。二月初，巴黎附近地区有数百名勤工俭学学生等候做工，经济无着，每日依靠领取五法朗救济费生活。为了解决这部分人的生活重担，徐特立，王若飞去找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吴稚晖。两方商谈无结果，学生又去找中国驻法公使陈篆，陈篆拍电报给北洋军阀政府。回电：现国库支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唯有将其遣送回国。后华法教育会根据此令，通告学生，断绝给他们的经济援助，诬蔑学生，无兴趣也无能力做工，并要强迫他们回国。

这批无工做的学生，将上述情况转告工学世界社，要求支援。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尼的社员，开会讨论了他们的要求，表示同情他们的处境，决定发起一次求学运动。二月二十七日，工学世界社在巴黎的一家兼营咖啡的旅馆里，同这批同学代表开了会。王若飞、蔡和森、李维汉等出席，一致通过了争“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口号，要求发给学生每人每月四百法朗，以四年为限。代表会上有人提出如上述目的达不到，就发动学生采取请愿行动，迫使政府承认。王若飞还有黄齐生，徐特立不赞成采取请愿的形式解决问题，他们说：不准直接入里昂大学，就争取做工，并提出“甘做苦工，不希官费”的口号。但当四百多学生在二月二十八日向公使馆请愿的时候，为了表示留法学生的统一行动，王若飞却积极参加进来。他指挥女生队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提醒大家在大队冲进公使馆后，可能会有人被扣留；如果是那样，我们要顽强地坚持斗争。果然，请愿队伍到达公使馆，向警予、蔡畅等女生队冲进去了，突然一大批法国警察冲过来，男生队被驱散了，许多人茫然不知所措。王若飞很镇定地对大家说，不要怕，不要慌张，斗争要坚韧不拔，坚决勇敢，长期坚持下去。随后，他回到蒙达

尼，向那里的同学传达了请愿斗争的经过，发动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开展大规模的支援行动。二·二八斗争，虽没有实现原定目标，但迫使公使馆同意延长三个月每人五法郎的救济费，华法教育会答应为失业学生联系工作。

六月，北洋军阀政府派专使吴鼎昌到法国，以出卖国家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建筑权等为担保条件，向法国借款五亿法郎，名为救灾，实为购买军火打内战。工学世界社学生得悉这一情况，当即开会讨论对策。王若飞参加了会议。他极力主张组织留法同学和华工开展阻止借款斗争。在工学世界社的号召下，不几天，陆续集中在巴黎的留法学生达四百余人。他们强烈要求公使馆公开借款目的，表明态度，同时派出学生代表向法政府提出抗议，阻止贷款，并动员华工支援学生的行动。各界侨胞在学生鼓动下，纷纷集会，开展各种抗议活动。驻法公使馆一面威胁学生，扬言要对学生采取行动；一面又引诱收买一部分学生，破坏学生团结，拆散学生联合阵线。有的学生受了骗，开始动摇。王若飞看到这一严重形势，便暗中离开巴黎，潜往学生集中点，宣传斗争的决心，劝各地学生发电报支援。一时发电到巴黎声援者很多，马上稳定了学生情绪，示威学生一致表示坚持斗争到底。

七月底到八月上旬，赵世炎、蔡和森、王若飞等，在巴黎召集勤工俭学学生开了两次拒款大会，王若飞着重报告中国公使馆暗中勾结法国政府破坏拒款斗争的经过。参加大会的学生，情绪激昂，当他们打听到中法两国政府准备签字的消息，立即群起包围公使馆，痛打了公使馆秘书王恩曾。法国政府怕事态扩大，只得答应学生的要求，取消提案，暂缓贷款，吴鼎昌逃回北京，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中国自勤工俭学运动开展以来，近千名学生到达法国，他们中有许多人做工不得，入学无钱。中国驻法公使馆为了缓和留法学生的不满情绪，曾以勤工俭学学生的名义向欧洲各国募捐筹款。法政府答应北洋军阀政府，以中国“庚子赔款”在里昂建立大学，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的就学问题。但里昂大学建成后，却不招收勤工俭学学生。王若飞、李维汉等代表勤工俭学学生到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要求他们履行诺言。但几次交涉，都被拒绝了。九月十七日，在巴黎召开留法学生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开放里昂大学为唯一目标的决定，要求允许勤工俭学学生无条件入学，否则就进占校舍。他们还组织了领导核心，王若飞是领导成员之一。九月二十四日，吴稚晖从国内招收的一百二十名学生到达马赛，二十五日入里昂大学。留法学生组织了一百六十人的“先遣队”，分途赶到里昂。“先遣队”进入里昂大学后，公使馆勾引的法国警察把学生囚禁在作为里昂大学校舍的旧兵营里。赵世炎、蔡和森等在兵营里领导“先遣队”的斗争；王若飞在校外，领导开展营救学生的活动。他多次去公使馆和教育会，交涉释放学生的条件，严词驳斥他们诬蔑学生的谰言。他跑遍了巴黎附近的城镇，发动留法同学和华工开展支援活动，营救被拘捕的学生，组织募捐，解决困难学生吃饭问题。不几天，“先遣队”一百〇四人被法政府武装押送回国（赵世炎已设法离开兵营），进驻里昂大学校舍的斗争遭到失败。

一九二二年初，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酝酿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六月，在巴黎召开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选出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李维汉为委员。不久，王若飞加入“少共”，并被补选为少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少共”

总部设在巴黎意大利路哥德伏化大街十七号一个旅馆里。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肖子璋(肖三)都住这个旅馆里,他们白天到附近一家云母石厂做工。每天工作九小时,挣得九个法郎,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晚上在一起编印《少年》杂志,阅读马列著作,或撰写向华工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

八月,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九、十月,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肖子璋经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这便加强了法共与“少共”的联系。不久,廖焕星到法国带去中共中央通知,同意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肖子璋由法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

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加强了对华工运动的领导,专门建立华工运动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王若飞经常利用假日到巴黎附近的华工区,进行家访,了解华工的家世、经济状况,启发华工的阶级觉悟,帮他们建立华工俱乐部、华工夜校和各种补习学校,组织他们补习文化知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还和赵世炎一起指导华工改组了华工总会,通过了经他们审查同意的章程,使华工总工会成为共产党教育团结华工的阶级组织。改组会议开会时,无政府主义者也派人参加,企图夺取对华工的领导权,但失败了。经过赵、王等人的工作,在华工中培养了许多优秀干部,并吸收了一批优秀华工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

一九二三年一月,“少共”接到少年共产国际代表复信,建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将原来的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根据少年共产国际代表的信,“少共”于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巴黎郊区召开了会议。赵世炎主持了大会,王若飞等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和领导工

作。大会选出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旅欧共青团支部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等因事先接到调往莫斯科学习的通知，未参加支部委员会。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等人，由巴黎动身经柏林、立陶宛赴莫斯科。周恩来陪送他们至柏林，并为他们办好各种手续。

三月底，王若飞等到达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住在靠近普希金广场的特维尔斯卡亚街五十三号东大宿舍。四月十八日，中共旅莫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支部书记罗亦农介绍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同大家见面。应大会的要求，赵世炎报告了中共旅欧支部在欧洲活动情况，以及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运动进展情况；王若飞作了补充发言。不久，旅莫支部又召开党员大会，讨论通过了由王若飞、陈延年等介绍的刚从法国来的袁庆云、王凌汉入党。

王若飞在东大听课认真，精力充沛，每天学习在十二小时以上。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党的建设、共产主义ABC、国际时事、苏联革命经验等课，研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原著，阅读了《国际通讯》、《共产国际》、《经济与政治》等刊物，还经常到东大和共产国际东方部阅览室阅读英、法等国报刊杂志。

王若飞很注意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每学完一种理论后，他总是与中国实际联系起来思考，探讨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在小组讨论会上，他能大胆地谈出自己的见解，并征求赵世炎、陈延年、肖三等学友的意见。他们有时补充王若飞的意见，有时提出不同的看法，讨论热烈，相得益彰，从而提高了理论水平，增强了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肖三在回忆同

王若飞一起在东大学习时说：“他（王若飞）对中国问题钻研得深，力求融会贯通”。通过学习，“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对国家民族忠心不二，以及分析事理之细，记忆之清……使我终生难忘”^①。

一九二四年六、七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参加了大会，并在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就中国民族革命问题发表了声明^②。王若飞、赵世炎等东大学生参加旁听，还拜会了李大钊。

任豫陕区党委书记

一九二五年三月下旬，王若飞离开莫斯科回国。途经伊尔库茨克时，他给留莫斯科的同学写信，提出了一个国内军事斗争的提纲。四月二日抵达海参崴，他又给莫斯科同学写信，分析了回国后要做的工作很多，如“坚固地发展工人运动”，“扩大国民革命之宣传”，“组织农民”，制定“一个系统严密的军事计划”等。但“更重要的一事，就是党的组织的整顿及党员的教育工作”。他引证斯大林的话说：“德国革命，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然而屡次厥起不能成功者，就因缺少一个有列宁主义理论所锻炼的坚固的多数党作斗争的指导。”“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亦是早已成熟，”然而也“缺少一个有力的党，立刻能把这革命系统的实现起来”。他全面地分析了党组

①肖三：《回忆王若飞同志》见《四八烈士》，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②见1924年7月11日《真理报》。

织和党员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认为“现实有在党内做一番普遍教育工作的必要，在组织上更要严加整顿。”^①

途中，王若飞重读了加米涅夫批判托洛茨基的文章，感到很受教育，提出要警惕犯托洛茨基的错误。他说：“托洛茨基伟大的才情和在十月革命中所表现的功绩，是我们所不能忘的”，但他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有很大错误。托洛茨基由于“虚荣心”、“小资产阶级英雄观念，首领观念”作祟，“文饰过去的错误”，给无产阶级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王若飞说：“我坦白地承认，我有蹈袭托洛茨基错误之可能”，因为同志们“只见到我对于革命的认识比较明瞭，对于工作十分努力，对于团体十分忠实，我的错误仿佛隐微难找”。这是很危险的。我今天提出来，“盼望同志们以后十分的监督我，批评我，在团体的严重监督指导之下，使我能够充分表现出我的所长，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②

四月上旬，王若飞到达上海立即到党中央看望陈独秀，接受了中央分配的临时工作任务。四月二十六日，他在《向导》上发表了《今年五一的苏联》一文，介绍苏联取得的伟大成就：“苏联经济的恢复，政治的巩固，生产力的提高，工人生活的进步，是很明显的。他指出苏联的成就表明了全世界工人得到解放应走的道路。

四月底，王若飞去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会后在张国焘召开的党团会议上，王若飞批评张国焘领导上的错误，与张国焘通宵争辩。

五月中旬王若飞回到上海，参加了正在迅速发展的上海工

^{①②}王若飞给莫斯科同志的信，未刊稿，藏中央档案馆。

人运动。五月二十四日，他在《向导》上载文：《在枪杀工人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上海市民之恫吓》，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工人的罪行。他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各种重要会议，参与制订领导五卅大罢工的策略。五卅惨案后，王若飞去北京，后来以北方区委巡视员的名义到河南检查工作，并根据中央指示，留在河南筹建豫陕区党委。他先到开封，后到郑州，六月七日郑州市召开群众大会，王若飞以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分参加大会并发表了演说。

初到河南，王若飞根据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指示，首先帮助国民二军办好军校。他以学兵营为基础，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作榜样，请苏联顾问讲课，对学员既进行严格军事训练，又重视政治教育；同时在学兵营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学员经过短期学习，掌握了一定的军事技能，然后充实到国民二军作基层干部。继学兵营后，他又建立了模范营，招收部队青年军人和知识青年。我党派进一些党员到模范营作基层领导，直接抓学员的训练和教育。这是我党帮助开办的又一所军事学校。在这两所学校里，学生们接受了革命理论教育，有较高的革命觉悟，愿为消灭反动派出力，成为国民二军的骨干力量。我们党还从军校里挑选了一批优秀学员，送到苏联学习军事^①。由于国民二军首领岳维峻对我党存有戒心，多方刁难我党在军校的工作。王若飞遂根据党的安排，改做党的工作，任豫陕区党委书记。

中共豫陕区委成立后不久，李大钊曾秘密地来到郑州，同王若飞等区委委员就豫陕区委的工作交换了意见。他分析了国民

^①师哲谈话记录（1979年5月）。

二军军长、河南督办胡景翼死后的河南、陕西形势，商定了工作重点，强调了对岳维峻的团结、帮助。以王若飞为书记的豫陕区委，根据李大钊的指示，确定了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同时兼顾军事、农运、青年、妇女等方面的工作方针。

一九二五年八月，在京汉、陇海铁路工会的办公室，王若飞主持召开了有张昆弟、王荷波、李振瀛、马文彦等六人参加的会议，研究成立河南省总工会筹备会，确定由张昆弟、李振瀛、马文彦具体负责筹备工作^①。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各基层工会相继建立，并涌现出一批工会骨干分子。王若飞认为成立省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遂委托张昆弟召开区委会议^②，决定立即成立省工会。会议确定张昆弟负责总工会全面工作，马文彦任委员兼秘书，工会委员还有李振瀛，京汉铁路的刘文松、曾玉龙、罗海臣，陇海铁路的王福顺，洛阳的马炳良，道清、焦作的余立亚，安阳的杨解人，信阳的刘少猷等。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至二十一日，在郑州召开了河南省总工会成立大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后的第一次全路代表扩大会议^③。

在以王若飞为书记的豫陕区委的领导下，河南青年运动有很大发展。七月八日，成立了共青团开封地委。八月初，河南省学生联合会在开封成立，全省四十八个县、市派出了九十名代表参加大会。

王若飞很重视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指示共青团组织利

① 《马文彦回忆豫陕区委》，载1983年3月《中共河南党史资料》第1辑。

② 马文彦回忆：王若飞未参加会议，会后向他作了汇报，会议所作决定他都同意。

③ 《中州评论》第4期，1925年9月。

用假期开办学习班，并派党的领导干部给他们讲课。共青团开封地委即利用暑假举办了留法同学讲习会，组织青年学习革命理论。王若飞给他们讲了“帝国主义与唯物史观”。共青团开封地委除加强对早先成立的青年学社的领导外，又相继批准成立青年社、青年评论社等十多个进步青年组织，出版进步刊物，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文章。八月六日，青年学社出版的《雷火》第八期上，刊载了李大钊的《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和王若飞的《单独对英问题》。中共豫陕区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也刊登了大量教育青年、指导青年运动的文章。如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第一期发表了《我们在河南青年界中的工作》，重点强调了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意义，反对“八种错误”理论，提倡“十种教育”，为河南青年思想教育指明了方向。

一九二五年十月，李大钊指示豫陕区委：要巩固后方，必须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王若飞根据指示精神召开了豫陕区委会议，专门讨论研究了农民运动问题^①。会后，区委派出了一大批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发动组织农民群众。河南农民从此开始组织起来。十一月十四日，郑州人和区的尚庄、南岗和永康区的中刘庄、东西五里堡农民五百余人，在中刘庄召开了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京汉铁路总工会代表李振瀛，中国国民党郑州市党部代表黄平万相继发表演说，宣传农会的重要作用^②。会后发表了《郑州区农会成立宣言》，提出了“我们要捣碎奴隶的铁链”的口号^③。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李大钊写的

①访问马文彦记录（1980年8月）。

②1925年11月19日《新中州报》。

③1925年11月20日《新中州报》。

《土地与农民》一文中，引用了河南荥阳周汤村、王庄、鹿村、水磨村、贾峪镇，密县柳沟村、赵庄，汲县塔岗村的调查材料，列举了户数、土地、人口情况，富农、中农、小自耕农、佃农占有土地和租税情况，地主与佃户收交租和雇工工银情况^①。可见当时河南农民运动发动得是很广泛和深入的。

王若飞曾多次向李大钊提出派人到河南帮助领导妇女运动。北方区委先派来李瑞香作妇女工作，后又派来李培之。李培之到郑州不久，同王若飞结了婚^②，后调辉卫（今汲县）工作。九月，她离开郑州转上海赴莫斯科学习。

十月十五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讨奉。从此，爆发了全面反奉战争。十一月十二日，王若飞以“若”的笔名在《中州评论》上发表《反奉战争的性质》的重要论文，明确指出：这次反奉战争的性质，从表面看去，“固然是两派军阀抢地盘的争斗”，但“实是全国民众争自由的战争。全国民众要得到解放，必先打倒他第一个最有力的仇敌”。“民众在反奉运动中，应该站“主体地位”，“去领导这个战争”。全国民众参与这次战争的目的应该是“从争取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一直达到召集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建立革命统一的民主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③

十一月初，国民军开始出击奉军。十五日，国民二军分兵

①《李大钊选集》第350页。

②马文彦回忆：王若飞住址附近，火车站下边那条大街上有一对法国夫妇，开的法国饭馆，若飞常到这里吃西餐喝酒，用法语讲话。他们夫妇对王若飞招待十分热情，王、李结婚时，还在此包了一桌西餐待客。

③《中州评论》第7期第49页。

两路进攻山东奉鲁军。随后，国民一军、二军、三军各一部围攻直隶奉军。经半个月的激战，奉军溃败，国民军占领了保定、天津及山东部分地区。

十二月十二日，《中州评论》发表了王若飞的《胜利的国民军将怎样做》一文指出：“现在有两条路可供国民军选择：一条就是努力走上国民革命的道路，实现革命民众的政权；一条就是走上军阀的道上，只知争夺权力地盘”。胜利的国民军，应该深记孙中山先生这个教导：实现“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要求国民军“当不只在言词上，而要在实际政治设施上”，“从速召集真正人民职业团体的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产生国民政府”。“充分给予人民一切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之自由。”并警告国民军：“凡是违反民众利益之军阀，未有不遭失败者，张作霖之前车不远，愿国民军慎之。”^①

王若飞在文章中提出的主张，代表了豫陕区委的正确方针，也反映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愿望。但国民军没有接受王若飞的劝告，在攻下天津以后，国民军一、二、三军争当直隶军务督办，矛盾激化。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缓和矛盾，提出自己下台，使国民军失去统一指挥，错过了有利战机。奉系、直系军阀却利用了这个时间，进一步勾结起来，在帝国主义大力支持下，形成了对国民军的大包围，形势对国民军非常不利。

一九二六年一月，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岳维峻兵败山东，退守河南。二月，吴佩孚部进攻河南，国民二军全线溃败，退出河南，河南重归直系军阀统治^②。王若飞预计到形势有可能

①《中州评论》第9期第67页。

②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7册第241页。

向坏的方向发展，事先布置了豫陕区委的撤退工作，派马文彦到焦作具体安排从焦作煤矿疏散我党领导成员。京汉、陇海路工会机关、省总工会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豫陕区委经常出头露面的领导人都分批经焦作调离河南，过黄河北上。王若飞奉命去上海，调任党中央秘书长。他在离开河南前夕，又召开了豫陕区委留下来工作的人员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党的骨干力量派往农村，组织农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要求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后，城市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只能隐蔽进行，各种群众团体办公机关主动撤退。

奋战在黄浦江畔

一九二六年二月中旬，王若飞离开河南到北京，向北方区委和李大钊汇报豫陕区党委工作中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参加了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三月下旬去上海，就任中共中央第一任秘书长职。当时中央机构极不健全，中央组织部无人领导，甚至连专职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许多组织方面的工作也都集中到王若飞领导的秘书处。王若飞很忙，他除参加会议，协助陈独秀起草中央文件外，还处理了大量的中央日常工作。各地到中央去的人，都要先找王若飞联系。因此，他有时一天要接待几批来访者。

三、四月，国民军在北方遭受严重挫折，奉直军阀在日、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妄图联合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广东国民政府也在积极准备北伐。根据这种形势，王若飞在《向导》上连续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阴谋与民众之反抗》、《方本仁的失败》、《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国民军失

败后帝国主义者向中国进攻的新战略》等文。这些文章分析了国民军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揭露了日、英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破坏国民军的种种罪行，着重指出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共同目标是“反赤”。他们“反赤”的战争计划是：奉军主力对付国民军，消灭北方的“赤”；吴佩孚则向南发展，先逐江西的方本仁，再除湖南的唐生智，最后扫灭广东国民政府。王若飞认为，我们应从速巩固民众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以抵抗这个反动势力的进攻。他号召“全国的商人、农民、工人、学生、士兵们，都应联合起来，拥护广州的国民政府，维护北方民众的自由权利，为民众的自由和民族的解放而战！”王若飞还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是帝国主义“最可怕的敌人”，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它具有“革命的不妥协精神，足为国民运动的领袖”。他同时认为，“中国革命，若没有农民起来参加，不会成功”，所以发展农民运动，是我党当前最重要的工作。王若飞在文章中很强调统一战线的作用。他说：“我们胜利与否，就在我们能否应用这一联合战线策略。”他正确指出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右派“理论的依据”。认为国民党右派的“潜伏活动”，“是革命前进的一个危险”。但是在如何反对国民党右派问题上，他提出“搜罗反动派阴谋，促蒋觉悟”的策略，以“避免一切可以引起冲突之误会”^①，显然是错误的。这是由于他当时受了陈独秀妥协退让思想影响的结果。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在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工农群众的有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打到

^① 《最近政治局面与本党各方面的概况》（1926年4月16日）。

了武昌城下。上海工人阶级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鼓舞下，先后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王若飞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他总结了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南市区深入基层支部工作。起义时，他任南市区的总指挥^①。起义胜利后，陈独秀指定他暂时代理南市区委书记^②。

一九二七年四月，王若飞随中央机关离开上海至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党内外斗争非常激烈，党员和干部思想混乱。王若飞“对当时客观的严重形势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内分歧意见及不团结现象感到非常苦闷。”^③会后，王若飞被派去江浙区委工作。六月，中央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和浙江省委。王若飞先后担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职。

七月二日晚，夏之栩找到王若飞，告诉他赵世炎被捕的消息。赵世炎是王若飞多年的战友和学友，听到这一不幸消息，他非常痛心，当即向夏之栩表示，党将用一切办法去营救。接着，在王若飞主持下，开始了紧张的营救工作。他采取用钱买通监房的办法，并指示夏之栩找杨虎的小老婆，表示只要放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后因赵世炎的身分暴露，公开营救无用，王若飞便决定武装抢劫法场。这个行动，由当时江苏省委负责武装保卫的苏幼农领导指挥。王若飞和苏幼农一起商定了武装劫法场的具体办法。后来，由于中央指示准备用公事提赴南京的办法在中途营救，武装劫法场的计划便中止了。结果，

①访问董理文记录（1979年10月）。

②1927年2月23日成立，由中央和浙江区委8人组成，负责指挥上海武装起义。

③《王若飞自传》。

中央计划也未实现。

不久，中央又指定王若飞主持营救陈乔年的工作。他通过内线收买警备司令部有关人员，同意付巨款由亚东图书馆出面保释。王若飞将此办法报告陈独秀，陈独秀认为不行，怕将来敌人发现保释的是陈乔年，还会把他杀掉的。王若飞没管这些，仍然按计划营救。那些天，他一直守在亚东图书馆，等候伪警备司令部的电话，可是敌人一再拖延，结果是警备司令部既收了钱，又不放人，最后还是杀害了陈乔年^①。

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王若飞开始认识到陈独秀犯的严重错误^②。“八七”会议后，王若飞根据党中央发动秋收暴动的有关指示，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研究了江苏省的情况，提出了在宜兴、无锡、江阴、常熟四县组织暴动的计划。省委对宜兴、无锡的政治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这两县工农群众经过大革命的锻炼，农民协会比较广泛，党的工作有基础，特别是在无锡的东北乡农民觉悟较高，便于深入开展工作，兼以这两个县濒临太湖，地处沪杭宁铁路的中段，是水陆交通的要地，对全国影响较大。于是便确定这两县为暴动的重点。

十月间，王若飞来到宜兴，召见了县委负责人万益，传达了省委发动暴动的计划，研究了宜兴组织暴动的具体措施。万益又召集宜兴中山中学校长史乃康、教师史乃勋，中山女中校长汤维周等共产党员开会，决定组织学生下乡，广泛向农民进行

① 《陈乔年死难前后》，《上海文史资料》1980年第3辑。

② 《王若飞自传》。

反苛捐杂税的宣传，提出二五减租，号召农民起来暴动。据《申报》十一月十一日报道：“事前数日，共产党即向农民宣传，以减轻田租为唯一前提（如每亩每年本收租一石，请愿后减收五斗），并云现在南京国民政府将加收田亩捐，每亩二元。农民闻之，惊喜交集，惊者为将增加亩捐，喜者为有共产党领导，可以请愿减轻亩捐及田租税，所言皆属农民直接之利益，故皆乐从。”^①

王若飞从宜兴回到省委机关，派人找回省委派往无锡的农运特派员杭果人。王若飞向杭果人说：“湖南、湖北、江西数省农民运动，发展迅猛，声势浩大，有的已经举行暴动，有的正在酝酿暴动。我省委决定宜兴十一月初暴动，接着无锡暴动，时间不得超过一周，以便拖住无锡驻军”^②。王若飞讲完话后，杭果人汇报了无锡农民运动情况，分析发动暴动的条件和存在的困难。王若飞鼓励杭果人“好好工作，只要有决心有信心，困难一定可以克服，暴动就会成功。”^③杭果人根据省委指示，暂留上海，起草关于无锡暴动的具体计划。

杭果人回无锡后，分别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了省委指示，成立无锡县农民革命军和军政委员会，杭果人受命为暴动总指挥，徐彬如为副总指挥。省委还派省委委员夏霖去无锡，加强组织暴动的准备工作。暴动前，省委开办了暴动训练班，培训农运积极分子，王若飞给学员讲政治课。他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兽行，说明我们必须暴动的原因。

^①1927年11月11日《申报》第9版。

^{②③}朱昱鹏：《王若飞与无锡暴动》，《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2期。

参加训练班的人听后情绪都很高昂^①。

十一月初，王若飞从上海来到无锡，检查暴动前的准备工作。杭果人汇报说：现在群众已动起来，战斗情绪很高，农民武装编制就绪，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等省委发布暴动的命令了。王若飞听后高兴地站起来说：很好。“八七”会议后，全国很多地方爆发了武装暴动，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反动派，我们无锡也跟上了这个大好形势。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使其暴动成功。暴动时间可以定在十一月九日^②！之后，王若飞和夏霖一起，在无锡县城堵家弄一号县委秘密机关，同县委委员乔沁泉、高文华、孙任先等开会，研究暴动开始时城内的策应工作。王若飞首先阐述了“小暴动汇成大暴动”的意义，指出城区工作应以策应暴动、牵制反动武装为主要任务，使敌人急于自保，不敢派兵下乡破坏暴动。乔沁泉、高文华提出将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先是组织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城里制造紧张气氛：暴动的当晚，派人破坏电缆造成停电，在空汽油筒里燃放鞭炮，以威胁敌人。王若飞对这些都表示同意，并指示要动员党员深入第一线，宣传暴动意义。当天晚上，王若飞回到上海。

十一月九日晚上，无锡东北乡的二万余农民佩带红布领巾，手持锄头，铁棍、大刀、鸟枪等武器，举行了暴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击溃了安镇商团的顽抗，占领安镇、查家桥、东湖塘等十三个村镇，大街小巷贴满“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传单和布告。《申报》以《无锡共产党煽惑农民暴动》的醒目标题报道：“前日晚间，有共产党

①②访问徐彬如谈话记录 1981 年 4 月。

徒，煽惑农民八、九百人，在东乡暴动”，并高呼“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电杆被锯断，电话线亦被剪断……。

十一月十日，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了大批军警开往北乡地区，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暴动遭到了失败。就在暴动第二天，王若飞身着长袍，头戴礼帽，装扮成教书先生，前来检查暴动发动后进展情况。他先到无锡东亭，在地下交通员带领下，步行二十里，到了荡口中山初级中学，找到该校教师、共产党员陈枕白，要他帮助找暴动指挥部和杭果人、严朴等暴动领导人。陈枕白说：农民暴动后，反动当局已派兵镇压，指挥部已向严家桥方向转移，现在处境困难，不易找到他们。王若飞听后很忧郁地对陈枕白说：“宜兴、无锡、江阴、常熟四县原计划立冬左右暴动。宜兴已于十一月一日举行暴动，打开了县城，收缴商团枪械，捉拿绅豪，罪行重者枪毙，并打开监狱放出犯人。但敌驻军闻讯，迅速派兵镇压，暴动失败了，暴动指挥者牺牲甚多。江阴、常熟尚未举事。无锡动起来了，已属孤军奋战，敌我力量悬殊，恐不能持久下去。”他在荡口住宿一夜，翌晨，和陈枕白一起乘轮船返回县城。

此时的无锡城，军警到处巡逻，特务侦探密布，气氛很紧张。王若飞和陈枕白离开码头后，径直往崇安寺走去，途经原县委机关堵家弄口时，王若飞停立不前，朝路牌标记东张西望，又直望弄底，想进去找县委领导人。他不知道县委已遭破坏，县委机关已布满了密探。陈枕白急中生智说：“弄里没有厕所，向前走一段路就是。他俩急步向前奔走，免遭被捕。王若飞在县城住下，找不到地下党领导人，也了解不到情况，第二天返回上海。

不久，王若飞根据省委的指示，又领导了江阴、青浦等地

的农民暴动。各地农民暴动，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先后遭到失败，但都打击了各地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镇压了一批恶霸地主，造成了农村的革命气氛。这年冬天，许多反动分子携带巨款潜逃到上海。各地县委要求江苏省委在上海予以打击。王若飞同省委其他领导人商量后，决定挑选二十名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的老战士，成立一支锄奸自卫的武装力量“打狗队”，并指派黄逸峰为这个队政治指导员。他对黄逸峰说：“这个队的成员尽管都是党员，但如果思想教育抓得不紧，掌握了武装，还可能出乱子，你的任务是做好队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具体行动，由队长负责，你们商量好了，一定经过审批才能采取行动。”^①

江阴暴动后，一个恶霸大地主逃亡上海。“打狗队”根据掌握的情况，拟订行动计划，报请王若飞批准。他对计划作了些修改，指定队长负责执行，只许成功，不得失败。“打狗队”经过严密地侦察，顺利地除掉了那个大地主，并把非法租界地主家中抄出的全部财物，上缴省委。这次行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特别是张贴宣布地主死刑的布告，给租界当局以很大的威胁。

十一月十四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其中批评王若飞曾同意几个在国民党市党部工作的同志“组织‘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欢迎叛变革命后的汪精卫，是指导党团工作的错误，属组织上、政治上的极大错误”，给予王若飞“警告处分”。王若飞于十

^①黄逸峰：《回忆王若飞》，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6辑。

一月二十日向中央申诉了三点：（一）他这样做有两个目的：探听反动党部消息；设法释放在狱同志。（二）开会欢迎的作法，是在市党部工作的同志报告他后他同意的。他于当日区委常委会上提出此事讨论，多数人却不同意他的意见，他虽不以为然，但服从多数人的意见，随后通知停止进行。（三）他是分工负责指导派往上海市国民党部内的同志的工作的，根据省委以往做法，他有权批准在反动团体内工作同志的活动。所以，这不能算组织上、政治上的错误。瞿秋白领导的中央没有同意王若飞的申诉，仍错误地坚持对王若飞的处分^①。

年底，王若飞了解到他舅舅黄齐生已到上海住在法租界西门路，但为了保密，一直未去看他。黄齐生有一学生在敌军当营长，驻扎在青浦一带。青浦暴动指挥员吴志希在暴动失败后被敌军俘获，王若飞想请黄齐生给他的学生写信保释吴志希。一天，王若飞找到黄逸峰让他化名“王如飞”，按地址去找黄齐生。当黄齐生听到王如飞名字时，很惊讶，问“认识王若飞否？”黄逸峰回答知道他的名字，但不认识。黄齐生会心地一笑，立即写了保释吴志希的信，并说：“请告诉王若飞，我很好，要他安心工作”^②。

不几天，在泥城桥畔，黄齐生偶然遇上王若飞，非常高兴，便一起到一酒家相叙；分手时约定某晚去王若芬家看望王若飞的母亲。王若飞见到母亲后，亲切地安慰她说：因革命需要，今后不通讯，望不要想念他。母亲说：我和你舅舅相信你做的事是对的，我不念你，你也不要念我。他与母亲惜别后，

^①《中央扩大会议政治纪律决议案》，《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②黄逸峰：《回忆王若飞》。

便再也未相见。

一九二八年二月，王若飞到南通、如皋巡视工作，召开了汇报会。会上，他分析当时的斗争形势，指出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的重要性，要求把农民运动深入一步，组织武装起义，支援苏南和全国的革命斗争^①。

王若飞从南通回上海后，参加了省委扩大会议，省委书记邓中夏作了形势报告，王若飞作了关于江苏农民运动和部分地区的准备武装起义的报告。会后，王若飞建议省委派黄逸峰、彭汉章到南通工作，黄任特委书记，彭为特委军委书记，负责领导南通地区的农民暴动。行前，王若飞会见黄逸峰和彭汉章，讲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和战略战术，反流寇主义，扎根农民群众和建设苏维埃政权等问题。

四月，王若飞到无锡视察工作，经地下交通员联系，找到了杭果人。他们乘一只木船，化装成祭祀祖坟的样子，到夹山六祭祠召开干部会议。会议由无锡县委书记陈鸿主持，王若飞讲了话。他强调全力以赴地领导武装暴动，建立农村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他还宣布省委在如、泰地区武装暴动的决定，调杭果人去领导暴动。会后，王若飞和杭果人经江阴去南通地区。

四月底，王若飞在南通召开了如皋、泰兴、泰县、东台等县委负责人会议，了解了各县准备武装暴动的情况，决定暴动时间和领导人。暴动由南通城大生纱厂工人大罢工开始，接着通、海、如、泰地区八县“五一”农民大暴动，同时爆发。这次暴动持续了较长时间，大部分地方遭到敌人镇压而失败，有

^①刘瑞龙：《记红十四军》，载《百科知识》1979年第5期。

些地方农民武装转移到山区，开展小股的游击战争。

参加党的“六大”，担任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央决定派王若飞去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王若飞考虑到他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多次受到中央的批评，“同时又鉴于许多有问题的同志都以送莫解决”，因此他提出同意出席大会，但会后必须允许回国工作作为条件，以示不是处罚。瞿秋白、周恩来批评了他，说明作为党员应无条件的服从组织，不应提出前提条件。王若飞很快就认识到自己的不对，接受批评，无条件地去莫斯科参加大会。

六月初，王若飞离开上海搭乘俄国船到海参崴，经过了两周左右的旅行，于六月中到达莫斯科。到莫斯科后没有停留，就由专车直接送“六大”会址——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一座名叫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李培之由中山大学抽到大会当翻译，已先王若飞几天到达这里。两人分别近三年了，突然在此相会，真是喜出望外。

六月十四、十五日召开了政治谈话会，王若飞等二十一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就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和革命形势问题，党的工作路线问题，城市、农村工作及工人、农民运动问题交换了意见，对准备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进行了讨论。这个谈话会，实际上是大会的一个准备会议。

大会于六月十八日开幕，七月十一日闭幕。大会成立了十个专题委员会，王若飞被指定参加政治、组织、苏维埃运动、

宣传、农民土地问题等五个委员会。布哈林向代表作了政治报告。他详细分析了国际和中国革命形势，批判了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八七”会议后瞿秋白犯的盲动主义错误。

王若飞在讨论政治报告时，作了一次发言和两次声明，检讨了自己在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时所犯的错误。承认自己“在当时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很幼稚，不能深刻认识陈的错误，盲目的信仰执行”。因此，“自己应负一部分责任。”^①他对陈独秀所犯错误的性质和严重后果，作了揭露和批判，但他认为在党的“八七”会议、“十一月会议”上批判陈独秀的错误时，不允许陈参加是不对的，陈独秀据此不参加党的“六大”是“有部分理由”的。他还提议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②。

到会代表一致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连王若飞对陈独秀错误所采取的原则立场，也受到了非议，有些人讥笑他是陈独秀的“尾巴”。但事隔十八年后，在党的“七大”会议结束时，毛泽东郑重地对王若飞说：你在“六大”时对陈独秀错误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③。

七月一日，李立三作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会上，蔡和森、张昆弟等二十九人提议，以六次代表大会的名义电中央政治局，着重指出：中央政治局完全接受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在国内及时制止盲动倾向，把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参加反帝与城市、乡村群众运动的斗争作为当前

①《王若飞自传》。

②李培之：《回忆莫斯科学习的一段历史》（1968年2月），未刊稿。

③李培之：《飞度关山的人》，载1982年4月4日《人民日报》。

工作的中心^①。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反对这一提议，建议不予讨论。瞿秋白、张国焘亦表示反对。王若飞却发言支持二十九人的提议，同时认为米夫的建议是错误的，应予以否决。经表决，大多数代表赞成二十九人的提议。七月二日，讨论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王若飞作了发言。他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批评了党内右倾、“左”倾的错误立场，及其给农民运动造成的危害。他还同意前面发言者提出的农民问题的中心是解决土地问题的论断。七月六日讨论职工运动报告时，王若飞在发言中指出了强迫罢工错误的原因和纠正的办法，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各部分存在的问题以及对革命的态度，提出了我党发动工人、改造黄色工会的任务和要求。十一日大会闭幕，王若飞继周恩来之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了六大的功绩，展望了中国革命的前景，表达了对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心。

“六大”会议结束后，王若飞被留下来，参加七月十七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六大”之后，王若飞“为了表示自己纯无个人意图，与加深自己的理论修养，诚恳地请求留莫学习。”^②共产国际同意了王若飞的请求，并指派他代表中国农会为驻农民国际的代表，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飞等五人，合组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王若飞担任农民国际代表，事情不多，便决定投考列宁学院学习。瞿秋白了解到王若飞的这一行动后，派潘家辰到考场，向考试委员会反映意见，不同意王若飞入学。主考人要潘

① 《党史参考资料》1982年第3辑第103页。

② 《王若飞自传》。

家辰将意见当面讲出来，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潘家辰：“王若飞没有资格进这个学校，他和陈独秀的关系密切。”

王若飞：“我不否认我犯过错误。革命失败了，陈独秀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也不是没有责任，我不能象那些事后诸葛亮一样，把责任推给别人，好象自己一贯正确，请问你们在大革命紧要关头提出过什么建议？不过也是顺着走罢了。我不但犯过右的错误，而且也犯了左的错误，我并不打算隐瞒这些。”

主考人：“好一个勇敢坚强的人！”

潘家辰：“他是陈独秀的秘书。”

王若飞：“我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不是他的私人秘书。”

主考人：“这是另外一回事，象我们现在的卡冈诺维奇。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王若飞：“革命遭到如此重大挫折，我的心情是非常沉痛的，但我相信我们党会接受经验教训，今后一定会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主考人：“你被录取了。”①

王若飞在农民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工作时，写过不少有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关系的特点，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以及近百年农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他还批判了瞿秋白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意见书，指出“左”倾盲动主义者在农民问题上，不能正确的对待富农问题，一时主张将富农和地主一样统统消灭，一时又对富

①李培之：《飞度关山的人》。

农和中农不加区别，犯着主张联络富农的右倾错误。农民国际的一位负责人，赞扬王若飞说：“你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将来会用得上的。”^①

一九二八年上半年，俞秀松向中共代表团申诉王明等人诬陷他们组织“江浙同乡会”，要求代表团调查解决。瞿秋白将此案委托王若飞处理。王若飞调查了与此案有关的一切人员，找不到所谓“江浙同乡会”的任何材料和证据，认为这完全是一个假案。他将情况上送苏共中央监委会。中央监委书记雅罗斯拉夫斯基根据王若飞调查的材料，指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组织，也不存在组织什么别的企图。此事最后得到正确的处理。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王若飞和李培之同时入列宁学院俄文班听课。这是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一所高级党校，课程和中山大学基本相同，只增加一门“党的建设”。学院强调学生自学和研读马列原著，经常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生产第一线实习。为了照顾王若飞、李培之生活，学校分给他们一间住房。王若飞按照学校教学大纲的要求，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写出了几本读书笔记。他从自己多年国内斗争的经历深切地感到加强理论修养的重要性，经常结合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向同学讲述自己理论学习的心得体会。他遵守校规，尊重师长，热心各种勤务，在学生中表现很突出，多次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

这期间，王若飞多次同张国焘发生争吵。当时张国焘也在列宁学院听课。有一次课后两人在教室外的走廊里争吵起来，越吵越厉害。最后王若飞大声指着张国焘说：“你将来一定会

^①李培之的回忆，未刊稿。

当反革命的！”^①张国焘气得脸铁青，两手发抖，回去后马上向共产国际指控王若飞辱骂了他，要求处分王若飞。共产国际认为，这是个人间的纠纷，未予理采。

一九二八年七月，王若飞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他在会上发言，进一步批判陈独秀的错误，说：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党内主要是“右的危险”，导致“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拴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尾巴上”^②，使中国大革命遭到惨痛的失败。

一九二九年秋冬，中东事件发生后，陈独秀发表声明，攻击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王若飞立即写了文章，批判陈独秀的谬论，他的批判文章，受到了列宁学院院长和共产国际的称赞。

列宁学院党委为了帮助和了解王若飞，派了一名苏共老党员去做王若飞的工作。这个同志常到王若飞住室，王若飞也常到他家去。两人交谈的很多。经过一、二年的了解，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对王若飞说：对你，我现在了解得十分清楚，你是个忠厚的人，对人赤诚相见，不怀私敌，又勇于承认自己错误，襟怀坦白。象你这样的人不多。你是位好共产党员。

一九二九年末，苏共（布）在全党开展清党运动，共产国际指派一个清党委员会主持列宁学院的清党工作。王若飞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学院清党委员会根据张国焘提供的材料，给王若飞扣上了四条“罪状”：（一）在一九二六——二七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赞成陈独秀的错误领导；（二）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上，反对不让陈独秀

^①李培之的回忆，未刊稿。

^②《在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第十二次会上的发言》（1929年7月16日），见《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

参加会议的主张；（三）在“六大”会议时仍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四）参加了陈独秀的反党派别活动。根据以上事实，建议开除王若飞的党籍。

王若飞向共产国际据理申诉，说明自己没有参加陈独秀的派别活动，指出其他材料不能构成开除党籍的处分。列宁学院支部局召开党员大会，讨论王若飞的上诉书。会上，列宁学院院长基里桑诺娃认为王若飞是个好同志，“我同意并支持王若飞上诉”。其他党员都同意基里桑诺娃的意见，于是支部局通过了支持王若飞上诉的决议。不久，共产国际找王若飞谈话，并派人到列宁学院作调查，重新研究了王若飞的错误，指出王若飞从一九二八年六月以后，就不在国内，指控他参加国内陈独秀反党活动是没有根据的，并改变了原来清党委员会建议的处分决定：王若飞由开除党籍改成严重警告，下放劳动一年；李培之的处分被撤销。

一九三一年初，王若飞下到莫斯科斧头镰刀工厂做铁工。李培之对这件事想不通，认为这完全是张国焘的打击报复，感到受到很大的委屈。王若飞规劝李培之说：共产党人应该是最坚强的人，这一点事算不了什么。我们的胸襟要宽阔一些，忍辱负重，不记前仇。的确，他毫不计较，一切生活悉如往常。在工厂里，王若飞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工作得很出色。不到半年，一九三一年七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和列宁学院便将他调回列宁学院，等待分配新的任务。

包头被捕入狱

一九三一年七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获悉有关内蒙

德胜旗农牧民自动起来开展斗争的情况，决定派遣王若飞、田德秀^①、潘恩溥^②三人去内蒙成立西北工委，王若飞为西北工委特派员^③，田德秀为军事部长，组织领导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晋（山西）、绥（内蒙西北地区）、新（新疆）的农民解放斗争和民族革命斗争，领导回民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④。九月初，他们按规定时间从莫斯科出发，先到库伦（乌兰巴托）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取得了联系。在那里住了二十多天，然后分两路出发：一路由王若飞带领田德秀及三个蒙古族交通员，经绥远包头、五原，入德胜旗；另一路由潘恩溥带领两个蒙古族同志，经宁夏阿拉善旗定远营至德胜旗会合。

王若飞和田德秀打扮成商人模样，骑着骆驼，沿途进行调查访问，了解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形势，以及广大贫苦农牧民的生活状况。

十月，王若飞到达包头，住在商贾云集的复成元巷泰安栈三号（今东河区），以收买烟土为名，开展活动。不几天，

①田德秀即吉合，当时为莫斯科步兵学校排长，后一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任职，“文化大革命”后去世。

②潘恩溥，山西人，1924年入党，1925年由中共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毕业，后入东方劳动大学军事训练班和莫斯科步兵学校中国连作翻译工作。1931年9月同王若飞一起被派往内蒙古进行革命活动，被捕叛变，后曾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任国民党二战区长官部少将外文秘书，某大学教授兼总务长，图书馆长等，1949年太原解放后，被留用，任某师院教授。1956年被捕判处管制三年半。管制期满后，任某大学教授，“文化大革命”中去世。

③1940年5月15日王若飞填写的履历表“曾任何种职务”栏内为“西北工委特派员”。

④田德秀1933年10月1日给中共河北省委的报告。

与乌兰夫接上了头。此后，田德秀被派往陕北和刘志丹联系，并准备再在宁夏建立据点，包头方面的工作安排由乌兰夫负责。王若飞和乌兰夫在莫斯科就认识。为了保护王若飞的安全，乌兰夫建议他搬到乡下去住。王若飞说：以商人身分作掩护不会出问题的。于是，乌兰夫也化装成商人和王若飞接头。

根据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部署，王若飞制订了在内蒙古的工作计划：“（一）按着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国民党军阀及欺骗民族统治的压迫（原文如此——引者），实现解放的原则上，实行民族革命运动和民族自决，民族独立。（二）在一般地说，组织西北共党，领导（导）西北农民反对帝国主义屠杀及中国国民党军阀的压迫与地主的剥削，实行土地改革。（三）以宁夏为工作中心建筑军事工作，组织游击队，渐渐成为红军，在军事上行动的第一步打通西北路线”^①。

王若飞通过乌兰夫，调查清楚了绥远地区国民党的组织状况，和内蒙古广大农牧民的革命情绪，提出，内蒙古的工作要深入发动群众，做好民族工作，开展武装斗争，到一定时候，要进行土地革命^②。针对日本特务策动“自治运动”，企图把内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王若飞还提出要搞“平民革命党”，以加强蒙汉团结，共同抗日，解放民族问题^③。

根据王若飞的指示，乌兰夫深入到包头郊区农村和土默特旗山区，进一步发动群众。不久，在包头附近爆发了轰轰烈烈

①田德秀 1933 年 10 月 1 日给中共河北省委报告。

②乌兰夫回忆，见 1979 年 9 月 19、20 日《包头日报》。

③这种“自治运动”是 1931 年夏，日特盛岛角芳在北平拉拢和策动德王搞的。

的抗锅厘运动。受尽了奴役的群众，赶走了“锅厘税”的差役，废除了锅厘税。王若飞见群众发动起来了，十分高兴，又提出个开展包头西郊地区四十八合少（蒙话就是旗）的工作计划。他对武装斗争尤其关心。当听到一些蒙族青年已打入绥远老一团，进行党的地下工作时，他满意地对乌兰夫说：这是一支重要力量，要抓住不放，只要我们重视武装斗争，坚持下去，积蓄力量，将来定会出现一个新局面。乌兰夫帮助王若飞写了工作汇报，起草了一份《告土默特全旗蒙民书》。

为了进一步开展内蒙古的工作，王若飞在包头绥西宾馆以请客为名，召开了二十余人的会，调查了解各地工作进展情况。不久，他又去五原，开座谈会，访问地方基层干部，了解工作落实情况。为了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武装斗争，加强民族工作，他还准备去宁夏和陕北苏区，已让人买好了马和路上用的东西。十一月二十一日晚，乌兰夫和王若飞商定，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一起启程。

在王若飞呕心沥血开展蒙古族工作的时候，潘恩溥率领的另一路，行至定远营前哨子，被敌发现拘捕，押至定远营审讯。潘恩溥屈膝投降，全部交待了他所知道的我党关于内蒙古工作的情况和计划，以及王若飞等的行走路线。国民党特务机关根据叛徒提供的王若飞的行动路线，跟踪追查，找到包头，在泰安栈发现王若飞。就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晚，乌兰夫走后不久，警察局派出十几名警察、宪兵闯入泰安栈，捆绑了王若飞，将其带回警察局搜身。王若飞乘敌不备，将裤内的文件塞进嘴里咬嚼，被一警察发现，即用双手卡住王若飞的咽喉，王若飞拚命搏斗，竭尽全力咬烂文件。二三分钟后，敌警撬开王若飞的嘴，想取出纸团。但已被王若飞吞进了肚子里了。还有乌

兰夫用麻纸写的《工作情形》六张、《告全旗蒙民书》一张，没有全咬烂，被敌警拿去一部分。

第二天上午，乌兰夫按照约定时间到达客栈，刚走进院内，就受到一个手提水壶的“茶房”的盘问。恰在这时，屋里电话铃响了。趁“茶房”去接电话的机会，乌兰夫跑出了客栈。“茶房”随后紧追，并大声喊叫，“抓共产党！”乌兰夫窜进胡同，甩掉了敌人，一口气跑到西街老道巷住处，换了衣服，立即和在家等待的李森一起转移到外地去了。

敌警得到了七纸材料，如获至宝，迅速将它烘干熨平，发现《工作情形》记载：“台己村有党员三名，已设有支部，巴什村、王必前气寺、东西荣寿村，均有党员多少不等”^①；《告全旗蒙民书》指出了解除蒙民痛苦的方法：“（一）不能信赖国民党；（二）不能信赖班禅；（三）不能信赖王公；（四）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全是假话”^②。敌人根据这两个文件提供的证据，判定了王若飞的身分，并去台己村等地捉拿共产党人，但乌兰夫早已通知他们转移了。

敌警察局连夜审讯王若飞，妄图从王若飞嘴里了解出内蒙古地下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以便一网打尽。但是，他们没有从王若飞口里得到地下党的任何真情。最后，敌人将王若飞押赴刑场施行假枪毙，企图恫吓他屈从。王若飞神态自若，大义凛然，准备着从容就义。敌人被王若飞英勇无畏的精神惊呆了，只好将他押回警察局，假枪毙伎俩亦完全破产。

第三天上午，王若飞被带到审讯室，警察局长马秉仁亲自审讯，要王若飞交出组织名单。

^{①②}《绥远高等法院刑事判决》（1934年4月23日）。

王若飞轻蔑地说：组织名单是不能告诉你的。要审问嘛，随你的便！接着，又补充说：应当受审判的是你们，不是我，我要真正地审判你^①！

王若飞的答词，把马秉仁气的说不出话来。这时，王若飞又说：你看错了对象，想借用大刑威逼共产党人屈服，那是枉费心机，这样吧，你派人准备好笔砚拿来我写口供。马秉仁以为王若飞真的要写口供，忙令警察给王若飞送来一张桌子，将准备好的笔墨纸放在桌上。王若飞坐在案头开始秉笔疾书起来。他写完一张纸，放下笔，在室内走走，再接着写。警卒嫌他写得慢，每天都来催促。过两天，马秉仁实在放心不下，亲自到囚室查看，才知道王若飞所写的内容，先是阐明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接着逐条列举蒋介石卖国殃民的十四条罪状，写了八大张麻纸，还未收尾。马秉仁气急败坏地把王若飞写好的和未写的麻纸一起拿走了。

包头的反动派无法对付王若飞，只得将他解往归绥城。一九三二年一月底，王若飞被押送到归绥市牛桥“第一模范监狱”。这一天，监狱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王若飞在几个警卒“护卫”下，唱着国际歌走过来。他的歌声震撼着所有牢房，犯人们争相从囚窗窥望他的背影，向看守打听他的姓名。一位老看守悄悄地对犯人说：“唱国际歌的人，就是那个大共产党，这人胆子可大啦，他不仅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还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讲共产党如何好，国民党如何坏，骂蒋介石是个大卖国贼。这可是条好汉子。”“这个大共产党听说叫黄敬斋”。

^①杨植霖：《王若飞在绥远监狱》，载《四八烈士》，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从此，犯人们都知道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黄敬斋的名字。

这所监狱，有四个“号”，分别命名为“改”，“过”，“迁”，“善”。押来的犯人，该送到那个“号”，是以案情轻重作决定的。案情严重的多囚在“改”字号，快出狱的犯人被囚在“善”字号。王若飞被囚在“改”字号。

王若飞的才华和胆量，受到当时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赏识。傅作义曾对人说：“军人上战场，脸也得白一白，他在刑场上竟面色不变，态度自若，人才都出在共产党内。”傅作义曾把王若飞请到他的客厅里，作了一次长谈，表示只要他答应出狱后在绥远作事，就可无条件释放。王若飞拒绝了傅作义提出的条件，他要求傅作义按照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开放群众运动，反蒋抗日。他要求无条件释放，否则，宁愿老死囚笼或死于断头台，也不愿出来。

傅作义对王若飞的指望落空后，便将他交给绥远高等法院。法院多次开庭，王若飞则借机大谈马克思主义，吓得法官张皇失措，只好宣布休庭。敌人每次都以材料准备不足来掩饰审讯的失败。

高等法院接受了前几次审讯失败的教训，拚命搜集有关共产党活动的“材料”，等到他们认为准备充分以后，又开庭审讯。

法官劈头问王若飞，参加共产党有什么犯罪活动？王若飞反问法官：“什么叫犯罪？”法官说：“犯罪，就是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王若飞接着义正词严地指出：“什么民国，是骑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一批强盗？所谓紧急治罪法，无非是保护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律；试问制订这种法律的时候，有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其他劳动

者参加过？你们执行这种法律，只能说明你们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工具，是它们忠顺的奴仆而已！”法官无言以对，只得宣布退庭。

一九三二年春，黄齐生从定县赶到归绥探望王若飞。舅甥隔着铁窗相见，黄齐生不禁一阵心酸。他对王若飞说：“我们十年不通音信，你怎么落得这般光景？”王若飞恭敬地回复黄齐生说：“舅舅放心，我的行为洁白无瑕，我作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逮捕我，是因为我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黄齐生点头赞许：“你作的对，我放心，你宁可失去自由，也不要丢掉真理。”

黄齐生曾找傅作义，请求释放王若飞。傅作义要黄齐生规劝王若飞，并且表示如果王若飞愿在绥远干事，马上就可出狱。

黄齐生将傅作义的意见转告给王若飞。王若飞说：要我在他手下做事作为释放条件，这是不能答应的。我出狱后，愿作什么就做什么，愿到哪里就到那里，行动自由，不受他的限制。黄齐生说：“你这样刚直不阿他们不会放过你的，设有不幸，遗蜕何归？”王若飞答道：“一火了之。”黄齐生说：

“苟有幸，其葬于昭君墓侧？”王若飞对自己的身后事一笑置之。

黄齐生不愿离开王若飞，便在监狱附近的中西旅馆租间房住下，还用二十元在大青山下昭君墓侧买了块墓地，又设法买通管监狱人员，允许五天探监一次。黄齐生每次去都带上白酒，舅甥俩每次喝了酒，话题更多，总是亲切交谈，不能尽兴。王若飞见舅舅棉袄单薄，塞上日渐寒冷，便脱身上的皮裘相换，黄齐生还按王若飞的要求，买些进步书籍送进监狱给大家

着，深得同监难友的欢迎。

黄齐生在绥远住了一段时间，准备回定县。王若飞给黄齐生写了封送别信，称黄齐生为“托尔斯泰伯爵一流的人物”，

“十分同情于下层平民被践踏的生活，愿意到平民中去，并帮助他们。可惜他只有满腔的同情心，而没有使劳苦群众得到解放的办法。所以他只能是穷苦群众的好友，而不是革命的领导者……。”王若飞还从旧西服的衬肩上撕下一块白绸子，给他爱人李培之写了封信。叙述了狱中生活和准备就义的决心。他要求李培之忘掉他，不要为他的牺牲而伤痛，继续努力完成党的事业。信中说：“别了，我们在红旗下齐聚，又在红旗下分手！”

经过上次“审讯”之后，法院再也没有勇气继续开庭。经王若飞多次催促，拖了八个月，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才勉强答应开庭。这一次，王若飞针对反动派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外国引进来的，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是受俄国指使的；中国人讲外国人的主义是卖国等谰言，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哪里有阶级压迫，有反抗，哪里就必然要产生共产党。这是客观真理。至于谈到卖国，在中国却大有人在，这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反动政府，蒋介石就是头号卖国贼。接着，他列举了国民党蒋介石从“九一八”日本侵入中国东北以后大量的卖国罪行，吓得法官眼睛发直，慌忙站起来喊叫：“停住，停住！不准再往下讲！你这样侮辱党国领袖，咆哮公堂，就是犯罪！退庭！”

王若飞以他丰富的科学知识和雄辩的口才，批驳了法官鼓

吹的种种谬论，夺得了法庭上的主动权，真正地审判了反动派。

致 书 傅 作 义

在狱中，王若飞为了帮助傅作义认清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争取他同情我党主张，参加抗日行列，曾给傅作义写了许多信。但很可惜，这些信大部分都丢失了。现存中央档案馆的《致绥远傅主席书》，是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王若飞从同监难友处得悉日军进攻山海关的消息后写的，全文长达二万五千字。这封信对当时国内外形势，中日双方的特点，抗日战争的方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实际上是一篇理论水平、策略思想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论文。黄齐生在翻印这封信的前言中写道：“对于暴日得失强弱之点，与近两月各大报持论，什九相应，虽其他指陈，容有难于遽施，要其别有所见，有足供当世参考”。

信中首先对蒋介石反动派宣扬日本侵略的目标是苏联，企图暂时让出东北，把战火引向苏联等卖国投降政策，针锋相对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而取得之东三省必将企图永久占领”，日本从其帝国主义的国策出发，必将继续攻取热河，进窥华北。他认为，中国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坚决抵抗，做好全面对日绝交、宣战的准备。信中针对有人认为日本强、中国弱，对战争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详细地对中日双方的国力作了对比，提出了持久战的作战方针，预告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

王若飞指出：在军事力量上，日本有以下的优点，为我国

所不及。这主要是：军队的构成与作战能力十分强大；军队指挥的绝对统一与调遣、供给非常迅速；官兵军事教养程度高，物质供给比中国充分；日本是个岛国，不顾及对本土的袭击。但是，战争的胜败，绝不单系于军事的实力，而系于其他比兵力更重要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战争，更是如此。日本侵略战争本身潜伏着严重的矛盾和危机，随着战争的发展，各种矛盾更加激化，使日本帝国主义逐渐走向反面，陷入无法走脱的深渊。

王若飞着重分析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面临的几种矛盾。他指出：中日战争，必将引起中国民众的极大反抗；日本侵略者侵占东三省后，又攻占热河，进窥华北，进而谋求全中国的政权，将会引起与其他帝国主义巨大利害的冲突，特别是与美帝国主义的冲突，甚至会爆发日美战争，从而引起帝国主义间的大战；日本侵华战争需要庞大的军费，这日益加重的军费重担，主要落在日本的工农大众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将加深日本统治者同本国人民之间的矛盾。

王若飞在分析了日本方面的情况之后，又分析了中国方面的情况。他认为中国有四万万人民，有辽阔的土地，有数千年的经济文化关系，这样一个伟大民族绝不是可以轻易征服和消灭的。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后方供应、军事训练等方面虽不及列强，然而士兵作战的勇敢与吃苦耐劳精神，远远胜过外国士兵。而且我们进行的是反抗外国侵略者的革命战争，士气很高，兵源补充来源也很雄厚。在我军持久抵抗与义勇军的游击作战中，将会越来越充分表现出中国军队所具有的优点，去战胜貌似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

王若飞还正确地指出：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并不是孤立

的，它有极大的同盟者，我们将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支持，特别是日本国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高丽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更能给我们以实际的援助。

王若飞通过以上分析，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应绝对的相信，我们有很大的力量，我们的斗争一定能有积极的前途，最终埋葬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民族战争的胜利。我们在现实的艰苦的奋斗中，不应有丝毫的气馁与悲观。

王若飞在分析中日双方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合乎历史实际的斗争策略，其主要内容是：

（一）“应该动员全国民众积极起来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他强调“只有依靠全国民众对于这个战争之主动积极参加，才能使这个战争具有强大无比的持久抵抗与不可战胜的势力。”

（二）动员全国军队参战，改变军阀个人的军队为全民族的革命军队，“消灭军阀的割据混战”，强调要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提高部队革命精神，激发士兵反帝意识与参加民族革命的热情，提倡各民众团体通过各种途径，去与士兵发生极亲密联系，以便影响士兵，鼓励士兵奋勇作战。

（三）在敌人占领区，如东三省境内，秘密组织各种革命团体，继续坚持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抗日工作。他认为在阻扰日寇前进的各种工作中，义勇军的活动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义勇军要采取游击战术，以少量兵力，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乘空蹈隙给敌人以突然袭击；抓住敌人的薄弱处，毁坏敌人据点，杀伤敌人，使得敌人常常要用大量军力防守后方，不敢轻易向我进攻。

(四) 钻进敌军内部，破坏瓦解敌军。王若飞认为，这种工作虽然干起来有困难，要冒很大的危险，但不是不能成功的。

(五) 要使我们的抗日战争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发生密切联系，它们是可靠的同盟者。尤其要与日本国内工农群众革命战争和高丽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取得联系。王若飞还提出外交上要改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错误态度，立即与苏联恢复邦交并正式承认外蒙古人民共和国。所有这一切，都能给反日斗争以很大的有力的影响。

(六) 改善国内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立即制订正确对待国内各弱小民族的政策，并迅速地将这些政策在蒙、回、藏民中作广泛的宣传，尤其对内蒙古民众更是刻不容缓。

从中国国情和抗日战争发展的需要出发，王若飞特别提出发动农民起来抗日的问题。他说：“农民占着中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四万万的中国人口，农民便占三万万以上，在现时抗战中的一切战事的责任，兵士的来源，主要是出于农民。所以现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战争，若得不到农民自动的积极的起来参加，是不会使这一战争强大有力，是难望这一战争得到胜利的。”怎样发动农民呢？王若飞认为，农民关心的是谁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我们要想动员起他们，首先是要能解决他们目前生活迫切的问题，满足他们目前生活迫切的需要，要让他们感到这个国家政府的工作是为他们的……。”王若飞在信中还说：广大农民目前生活迫切的要求就是打破土地与水利的垄断者；解除建筑在我国土地之上的佃租、税租、商业、高利贷等各种剥削，要实际获得土地。如果我们承认农民要求之正当，赞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立刻会使广大农民群众忠诚

的热情的拥护这个国家政府，倘使这个国家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时，他们一定会起来保卫这个国家，力求使这个战争得到胜利。

王若飞在信中盼望傅作义站在中华民族革命战争立场上，给他以实际参加战争的机会，让他的热血能洒在这个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或赴前线作战，或赴东三省、热河组织义勇军。语言恳切沉痛，打中了国事的要害，使傅作义深受感动^①。

为了使傅作义早日站到人民立场上，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不久，王若飞又给傅作义写了封“论进步”的信。他在这封信中明确指出：一个人是否站在人民一边，关系到他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如能发动人民就能胜利，否则就必然失败。我们希望傅作义主席，扩大人民民主权利，和我们共产党人共同奋斗。

无 条 件 获 释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绥远高等法院开庭宣布判处王若飞十五年徒刑。宣判后，王若飞立即在自己的帽子上，用红线绣了个“出”字。有些难友问他“出”是什么意思？他笑着说：“出”就是表示快出牢房了！敌人判我十五年徒刑，我就熬他十五年，反正我要出去。老实说：我肯定坐不了十五年，因为中国革命用不了十五年定会成功。为了革命事业，我必须

^①杨植林：《悼王若飞同志》载《四八烈士》，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活着出去。

王若飞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早晨，用冷水擦身，直擦到皮肤发红为止。他自编一套“室内体操”，坚持锻炼，伸腿、弯腰、曲臂、转动，直到满身大汗。他患了关节炎，太阳出来后，就要求出去晒太阳。每逢这时候，他总是带本《孟子》当枕头，晒了前胸，再转过去晒后背，晒得全身出汗方回牢房。

王若飞用了全部精力看书学习，写文章。敌人除了限制他看马列著作外，其他中外著作只要能找到都允许看。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史书，诸子百家著作和他舅父从外地寄来的许多世界名著，历史知识和理论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傅作义也送给他一本《易经》。本来傅作义想以这本书来影响他的共产主义信仰。王若飞看后，很有兴趣，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易经》作了批注。傅作义看了他的“批注”后，惊叹地说：“他把《易经》讲活了。”王若飞还写了总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国向何处去、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十月革命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等文章，写了《王阳明学说批判》等哲学论文。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东渡黄河，打进山西，阎锡山手下名将、前线总指挥李生达被打死，部队伤亡惨重，绥远反动派闻之大为吃惊。他们忙着赶修碉堡，严查行人，加强防范措施；同时又担心狱中关押一个大共产党，目标太大，害怕招来红军的进攻，想将王若飞送交阎锡山。一九三六年春，山西抗日救亡运动有了发展，急需用人，张慕陶向阎锡山献殷勤说：归绥狱中关押了个王若飞，是个大共产党，此人过去在党内受过“打击”，如能争取过来，定有大用场。当时，阎锡山是太原绥靖

行营主任，绥远受阎锡山管辖。阎听到消息后，立即通知绥远政府把王若飞解送山西。一九三六年七月，王若飞被解到太原陆军监狱。

到太原监狱不久，王若飞利用“放风”的机会，认识了政治犯乔明甫、李安心，了解到六个号内所关押的犯人的一些基本情况。一次，王若飞对乔明甫等说：我们这里学习条件可真好啊！有拿过枪杆的战士，还有专门研究过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很难得的，是一所理想的学校。在他启发下，乔明甫等开始酝酿成立政治犯学习小组。

监狱里有二十几名“政治犯”，分住四个牢房，每个牢房编成一个小组。在学习组基础上还成立了学习核心小组，由王若飞负责。这个组是秘密的，由党员组成，实际上是党的组织。它联系各学习小组，并领导各组的活动和斗争。

在普通犯的牢房里，关着一位名叫刘振清的“犯人”，因反对军阀张培梅被判处无期徒刑，坐了十八年牢，折磨得腰弯背驼，面容憔悴。一天，一个看守班长强迫他去抬粪桶，他不去，那个看守班长正想向“犯人”耍威风。王若飞走过来严厉地说：“刘老汉身体不好，上了年纪，不应该强迫人家抬粪桶，我们应该帮助和爱护老人家。”很多难友围上来，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斥责，那个班长见势不妙溜走了。接着，王若飞抓住这个时机，向“普通犯”进行了团结斗争的教育。他说：“难友们，今天的事实，大家都看清了。我们要不受欺侮，就要团结起来。人多势众有力量，才把看守吓跑了。今后这类事还会继续发生，只要大家齐心，互相帮助和支持，我们就能赢得胜利。”难友们都说：“老黄（王若飞入狱后化名黄敬斋）说得有道理。”

一天开饭时，从一锅稀粥中捞出了两只煮烂的老鼠，所有“政治犯”和“普通犯”都气得两眼冒火。王若飞向难友们说：“我们都是活着的人，都有享受人的权利。我们不是猪，为什么吃的饭比猪还不如。”全体难友一致向监狱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改善伙食。监狱当局不但不答应，反而指斥犯人说：你们是“犯人”，吃坏饭，罪有应得，谁叫你们“犯罪”？全体“犯人”情绪激昂，“政治犯”们主张马上发动绝食斗争。

王若飞向要求开展绝食斗争的难友说：“绝食斗争是狱中合法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定要团结一致，不论出现什么情况绝不动摇，坚持到底，才能胜利；要严防敌人钻空子，寻机破坏。”他还与乔明甫等商量确定了绝食斗争三项要求：（一）改善伙食；（二）去掉脚镣；（三）阅读书报。

“政治犯”根据王若飞的意见，秘密地成立了绝食斗争领导委员会，负责研究敌情，部署落实任务，出面和敌人进行说理斗争。领导委员会下设纠察、宣传、互助三个小组。纠察组负责侦察敌人的破坏活动，检查督促自己的行动；宣传组负责揭露监狱的黑幕，联系“普通犯”和争取狱卒的同情与支持；互助组负责防止参加绝食的同志发病，对有病的进行急救和护理等工作。在王若飞的周密安排和指导下，各种准备工作均已就绪，于一九三六年农历八月初十晨，全体“政治犯”开始了绝食斗争。

狱卒打开各牢房铁锁大门，催促“政治犯”吃饭。大家都躺在炕上，一动也不动。典狱长王秉麟跑到狱房，声嘶力竭地吆喝：“赶快吃饭，不吃饭都是违法！”开始没有人理他。他从这个号喊到那个号，惹怒了政治犯，一齐质问他：“什么叫

违法？求生不得，求死也不行吗！请问典狱长大人，饿肚子不吃饭犯了什么法？”“你们简直是造反，简直是造反！”“不吃饭怎么叫造反！”王秉麟见势不妙走了。

监狱当局求救于王若飞，要他出来劝说“政治犯”吃饭。王若飞说：应该马上改善难友们的生活待遇，否则你们就要对“政治犯”的绝食后果负完全责任。王若飞还利用一切机会去看望难友，告诉他们要静卧，少起动，免得消耗体力。他到“普通犯”中去说明“政治犯”的绝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改善所有难友们的待遇，要求“普通犯”全力给以支持。

绝食斗争到了第三天，年纪小、个子大的武先列昏晕过去了。敌人将他抬到病房，要伙房做了鸡蛋挂面汤，催武先列吃，以为只要有人开始吃东西，就可以分化破坏绝食斗争。武先列清醒过来后，拒绝吃东西，吵闹着要马上搬回监房去。王若飞闻讯赶来，倒了一杯开水给武先列，摸着他的额角，鼓励他咬紧牙，坚持下去，一定能胜利。武先列坚定地表示：我撑得住，饿死也不屈服。王若飞随后来到监房，把武先列的决心告诉了难友，更加坚定了难友们的绝食斗争的意志和决心。

绝食斗争到了第五天，躺在炕上的政治犯已经没有一个人能站起来了，双颊塌陷，心如火烧，大家用眼色相互鼓励着：一定坚持下去。“普通犯”过来探望的越来越多。他们不理睬看守们的干涉，帮助倒便桶，送水，给政治犯身体虚弱的喂水。监狱当局对此更加惶恐不安，怕“普通犯”也参加绝食斗争，局势将更难收拾。王秉麟又一次找到王若飞，要他帮助劝“政治犯”复食。王若飞说：“政治犯”提的三个条件，你究竟怎样答复。王秉麟连声表示同意，一切照办。王若飞说：那好，你就当面去答复吧。王秉麟不得已来到“莠”字监，一条

条的背诵：改善伙食，除掉脚镣，阅读书报，这三条我都同意。至此，经过五天五夜的绝食斗争完全胜利了。

一九三六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薄一波去太原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临行时，刘少奇对薄一波说：“听说王若飞同志现在关在太原，你到了那里，要设法营救他出来。”

薄一波到太原后，到处打听王若飞的下落。山西党地下工作同志告诉他：王若飞已从归绥解到太原，改名黄敬斋，但不知关押在那个监狱。

薄一波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立即以他是阎锡山“上宾”的身分，乘汽车去查访关押“政治犯”的第一监狱、训导院和自新院，但名单上均无此人。后来他又到陆军监狱，在一张发黄的登记簿上，才查到“黄敬斋”的名字。接着，他翻阅了关于王若飞案情的原委和历次审讯的详细记录。档案中说：“黄敬斋是个大共产党，在包头被捕时候，销毁罪证，拒绝招供；在绥远狱中，傅主席优礼相待，黄犯竟无悔改之心，经常煽动政治犯，高唱国际歌，进行赤化宣传……”。

薄一波查清王若飞的下落后，立即找阎锡山商谈释放王若飞的问题。他开始向阎锡山讲了眼前山西抗日救亡运动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道理；接着，单刀直入地提出释放王若飞，他说：“太原狱中有个王若飞，是个有名的共产党员。我建议，也是向你要求首先把他放出来。”阎锡山装模作样地说，“有这个人吗！我怎么没听说过？”薄一波马上指明：王若飞就是黄敬斋，现关在陆军监狱，是自己的间接朋友。阎锡山只好表示让梁化之陪薄一波去看王若飞。

一九三七年春，日寇向华北步步逼进。薄一波又去找阎锡山，要求他释放“政治犯”。阎锡山找来梁化之和张慕陶商量

对策。双方谈判结果，他们同意提前无条件释放王若飞。随后，薄一波到陆军监狱找王若飞，告诉他：“你现在可以出去了。”王若飞问：“无条件的释放吗！”“无条件！”“不过，只希望你答应我一条：出去后，先到我安排的地方小住几天，略尽朋友之道……过些时，就可以回延安了。你觉得如何？”

王若飞说：一波同志，现在我完全相信你是个好同志，是党派你来营救我的。我也急着出去为党工作，可我在监狱里住了五六年，很希望党对我的一切进行全面的审查，得出结论。你能否找个我认识的人，到这里来证实一下，以免将来发生旁的问题。薄一波将王若飞的请求，报告了北方局。不几天，北方局派柯庆施赶到太原来，到监狱和王若飞见了面，交谈了情况。被囚禁五年零七月的王若飞，很快就要跨出牢门了。

柯庆施走后，王若飞来到“莠”号间，向难友们传达了中央负责人的通知：王若飞首先出去，其他难友分三批出去。他继续说：“阎锡山故意刁难我们，要我们经过他们的训导院转出去。”有的人对训导院极为反感，表示宁肯坐一辈子牢，也不去接受训导院精神上的虐杀。王若飞向难友们说明，现在是共同抗日的形势，情况与过去不同，“政治犯”可以接受去训导院过渡一下的条件。大家知道这是党中央的意思，都同意了。

王若飞出狱后，住在太原小北门二道巷永济路二号一座四合院。这时，李培之已从南方到太原照顾王若飞来了。

这期间，梁化之多次找薄一波，说阎锡山很想见王若飞，彼此认识一下。薄一波将阎锡山的想法转告给王若飞，并对他说：阎锡山的本意是希望你留在山西，给他撑撑门面，借以招

摇撞骗！如果你不干，他也不会勉强。从统一战线工作来说，只能婉言谢绝，留有余地，你可作个思想准备。

一天，薄一波陪王若飞去见阎锡山。阎锡山点头合手，毕恭毕敬，颇具“礼贤下士”的风度，表示仰慕和敬重王若飞的才能和气节，盛情挽留王若飞在山西帮助工作。王若飞没等阎锡山把话说完，就接着话头说，阎先生称赞我党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山西释放了“政治犯”，这种举动，甚受全国工农的欢迎。我在绥远、太原坐了六年牢，领受过国民党地狱生活的滋味，深知国民党反共政策的过错。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山西出现了共同抗日的局面，是个大进步。我一定把这种情况带到延安去，我党中央也会表示欢迎的。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由北京迁到太原。在这里，刘少奇会见了王若飞。王若飞向刘少奇汇报了六年多监狱生活的感受，和不留山西而回延安的原因。刘少奇同意他的意见，指示他立即返回延安。阎锡山从薄一波处得到这一消息后，当即要梁化之准备二千块法币，送给王若飞作回延安的路费。薄一波将这一情况告诉王若飞，要他请示刘少奇。刘少奇明确地说，钱一文不要。当梁化之带钱前来送行时，王若飞委婉地说：“我从你们监狱出来，受到热情款待，非常感谢！我返回延安途中，虽需长途跋涉，但我党我军沿途护送，不会发生困难。”当即把那包法币原封奉还。

回 到 延 安

一九三七年秋，王若飞和李培之一行离开太原，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停留几天，向办事处人员报告了狱中斗争情

况。九月初，由八路军办事处派人护送，经铜川、洛川、富县到达延安。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接见了，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王若飞情绪非常激动，对李培之说：我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快活，这次我们真的回到“家”了^①。

初到延安，王若飞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长、统战部长，负责宣传鼓动文化教育和团结联络上层民主人士的工作。他根据党中央洛川会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的全面抗战方针规定了宣传要点，把动员全民抗战放在边区宣传工作的首位。他创办了陕甘宁边区党委理论刊物《团结》月刊，作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阵地。他是这个刊物的主要领导人，也是主要撰稿人。

王若飞同时兼任陕北公学教授^②，他经常深入该校，接触来自各地的学生，了解学生思想情况，多次向他们作报告，宣传抗日战争的性质、形势和我党全面抗战的主张，动员知识青年努力学习抗战理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陕北公学校刊第一期上，刊登了王若飞撰写的《欢迎全国革命青年学生到延安来学习抗战知识》一文，着重强调了青年学生在抗战斗争中的作用。他指出“目前我们争取民族生存的抗战，向全国青年学生提出一个重大的任务，要求他们跑到民众中间去做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来参加抗战的工作。”陕北公学之建设，便是为适应现时我们民族抗战的要求，适应现时全国青年学生的需要而成立的。“要求每个来学的青年，必须百倍紧张地学习，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获取一切必要的抗战知识，就迅速到

①李培之：《飞度关山的人》。

②何干之：《死者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见《四八烈士》，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民众中去，到前线去。”^①

一九三七年底，归绥、包头相继被日军占领，成立了以德王为首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挂起了日本旗。为此，陕甘宁边区党委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召开会议，讨论对策。王若飞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曾在内蒙古工作一段时间，熟悉内蒙古情况。他的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重视。会后，他将发言要点整理成《今天如何实现蒙汉联合抗日》一文，发表在《团结》上。文章认为，蒙汉团结是争取内蒙古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保证。文章把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与内蒙古的特点结合起来，提出了实现蒙汉团结的一系列具体政策，这在当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九三八年春，日军变更战略，由南转西，加紧向晋南进攻，在占领临汾及同蒲路南段后，陈兵黄河东岸，企图进扰陕甘宁边区；绥远方面的敌人也配合向陕北进攻。陕甘宁边区附近的土匪，趁机向边区进扰。在这种形势下，保卫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已成为全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从这时起，王若飞就把他的主要精力用在动员民众保卫边区的斗争上。

王若飞在《团结》上载文说：日寇目前进攻的行动，是和他攻下南京城后的第二期作战计划相配合的。其目的是在夺取武汉，而作战的计划，是先扫除我黄河北岸的军队，特别是压我在山西最坚强的抗战军队，完全从黄河北岸撤退，然后攻取武汉。同时，又出兵从风陵渡进击潼关，配合着由绥远与山西前进的敌军，占领西安，占领边区，占领我抗战重要后方的整个西北，达到灭亡我全中国的目的^②。王若飞还特别强调陕

① 《陕北公学》1937年11月1日。

② 《为保卫边区而抗战到底》载《团结》第1卷第3、4期合刊。

甘宁边区的抗战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关于怎样保卫边区的问题，王若飞分析了边界的政治形势和自然环境，提出了六个方面能够争取胜利的优越条件，要求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克服弱点，做好保卫边区的一切准备工作^①。

王若飞曾经多次到清涧、吴堡、佳县等沿河城镇，检查工作，了解群众发动的情况。他针对当时边区发动群众工作存在的某些错误倾向，明确指出：一切抗战动员工作之能否完成，全系于我们政治宣传工作是否深入。他强调要在宣传鼓动中，把每个边区人民，无论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保卫边区的斗争，把他们的一切能力，一切物力都贡献于抗战^②。王若飞还提出，要扩大抗战宣传。边区民众抗战后援会，根据王若飞的要求，组成两队战地服务团，准备各种文艺娱乐节目，分赴榆林、三边一带进行保卫边区的宣传，影响很大。

当敌军日益迫近边区的时候，边区党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研究抗敌之策。王若飞在会上强调，整理自卫军和少先队是目前一切抗战动员工作最中心的工作。他号召边区每个党员、群众为完成自卫军的整顿，建立起强有力的保卫边区的自卫军而努力^③。

当时，边区各县有的如吴堡、延川、神木、府谷等已处在战争前线，有的如延安、安塞、安定、保安等是备战区域。王若飞根据上述情况，提出了边区党政军和群众团体的工作方

① 《为坚决保卫边区而抗战到底》，载《团结》第1卷、第3、4期合刊。

② 《我们怎样保卫陕甘宁边区》，载《解放》1938年4月20日第53期。

③ 《加紧整理自卫军准备还击日寇的进攻》，载《团结》第1卷第2期。

法，要适应战时情况，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都要军事化，以便领导战争。他要求全边区的一切民众团体，如抗敌后援会、工会、青年救国会、妇女联合会、农民会、文化界救国会，都要尽力去动员全边区人民来参加抗战工作，帮助政府、军队，打击日寇的进攻。他还表扬了三月间敌人进攻到黄河边时，延川、延长、固临三县紧急动员了四十多名运输队员与一千多匹战马，很好地完成了运输任务的先进事迹。

一九三八年秋，王若飞被调担任中共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不久，又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王若飞对担任副参谋长这一职务有些为难。他找毛泽东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军队工作，担任这项工作，恐怕不行。毛泽东鼓励他说：“我开始也没有搞过军事，后来不是也搞起来了吗！你担任这个职务不会有什么问题。”经毛泽东这么一说，他就只好接受了。

七七事变后，特别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我党号召下的民众武装组织遍地开花。王若飞侧重考察研究了华北地区自卫军、游击队的建立发展和民众游击战争的经验问题。他提出民众武装应是不脱离生产的半军事性的群众性的抗日武装组织，不是官办的。这种民众武装在政治、军事上须接受当地民主政权与驻军的领导，它的组织是独立的，它的干部是民主选举的，它的基本任务是站岗、放哨、锄奸、剿匪、缉私、缉毒、追捕逃亡犯等^①。他赞扬了任邱县一个月内捕获汉奸二十余名，定县捕获汉奸七名的主动精神。他还肯定了游击队、自卫队、游击小组三种组织形式，说它最适合抗战需要，可以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②。

①② 《坚持华北抗战中的人民武装自卫队》。

一九四〇年春，日寇开始加紧了对我根据地的“扫荡”，我敌后许多根据地变为游击区，大的城镇被敌占领。王若飞根据毛泽东有关抗日游击战争的作战形式和任务的指示，适时地提出：将大兵团转移到山地，或分成若干小支队活动；游击区开展以地方游击队和游击小组为主要活动的武装斗争。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坚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他认为游击区各级党委必须组织一支有一定数量的地方游击队^①。

王若飞还深入到华北敌后根据地，考察游击队组织和游击战争的情况，同各级指挥员开座谈会。并于一九四〇年四月，在《八路军杂志》上发表了《华北游击队与民众游击战争发展的经验》一文，全面总结了抗日战争三年来华北地区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游击队的七条任务，为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发挥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指明了方向。

一九四一年冬，王若飞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党务研究室主任。

十一月六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开幕。王若飞协助林伯渠主持了这次会议，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他为林老起草了政府工作和参议会常驻会的工作报告，并为林老审定了大会宣言，并对宣言草稿作了很大修改。他跟起草宣言的周文说：全体大会通过的中共西北中央局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很重要，它肯定了边区已经存在的现实，这种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抗日民主建设很具体很实际的纲领，对全国有着极端重要的实际政治意义，应作为大会的第一大成就，放在宣言的前面。会议第二个大成就应是通过的所有条例，其中

^① 《准备根据地变为游击区的武装斗争》。

保障人权、地权、财权、政权条例，应放在头一项，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要求的東西，在解放区已经实行了，这将对国民党统治区产生重大影响。关于大会本身，他认为，应强调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不是咨询机关，而是人民的权力机关。他的这些意见，得到了林老的完全赞同。在整个会议期间，王若飞多次与林老交谈。林老对欧美民主政治颇熟悉，又有建设苏区政权的经验，议论精辟，引起了王若飞极大的兴趣。王若飞以惊叹的语气说：“林老这些丰富经验，是异常宝贵的，这次向他学了不少东西。”^①

一九四一年冬，王若飞受党中央的委托，组织一个小组，研究制定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他邀请了正在马列学院学习的毛铎、王从吾、何英才、刘秀峰等，协助他深入根据地进行考察。他们访问了农民、开明绅士，听取了各根据地负责人的汇报。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后又反复修改十多次，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最后颁发到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施行。《决定》体现了我党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它在各抗日根据地的贯彻执行，对于团结群众，发展生产，巩固抗日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

一九四二年秋，王若飞对根据地反“扫荡”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之后，指出：敌人以惨无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大政策”来制造无人区，最后消灭我们的有生力量，这是敌人采用的抽水捉鱼的办法，鱼大水少无法存在。我们人民军队、干部应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把大鱼变成许多小鱼，

^①转引自周文：《让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见《四八烈士》。

才能对付敌人^①。他的这种认识，是我党精兵简政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不久，党中央、毛泽东就把精兵简政的政策明确地提出来了。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王若飞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检查了在大革命时期对待陈独秀问题的错误认识，批评了自己身上存在的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他说：我在“日常生活上，是多少带有陶渊明所说的某些气质”，“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造饮辄尽”，“这种粗疏狂放的作风，每每不能深思熟虑，微慎其事地处理问题。即令是时时紧张的埋头工作，也常陷于没有方向的事务主义，以致工作无形中受到很多损失。”^②一九四三年底，王若飞在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回顾了党创立以来到南昌起义的历史，阐述党在大革命时期的方针、政策，着重总结了这一时期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说：当时我党处于幼年时期，不认识“搞武装、搞政权”的重要性，没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犯了陈独秀的错误，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③。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

一九四四年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

①《让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见《四八烈士》。

②《粗枝大叶、自以为的工作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载1942年6月27日《解放日报》。

③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见《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的大陆交通线，对豫、湘、桂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闻风溃逃。人民普遍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迫切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腐败局面。我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派林伯渠、王若飞等去重庆同国民党举行谈判。

四月二十九日，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离开延安，五月二日抵西安，同早期到达西安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先后进行了五次会谈。最后，双方同意议成四项十七条内容，各自报告自己的党中央。五月十一日毛泽东电林伯渠等，指示以承认中共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承认我党领导下的一切抗日军队，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发给粮饷弹药，恢复新四军番号；撤销包围我根据地之五十万国民党军队，恢复西安、重庆办事处等项作为同国民党谈判基本条件。

五月十七日，林伯渠、王若飞和张治中、王世杰同机飞抵重庆。二十日，中共中央电告林伯渠等，提出关于政治民主化，承认一切抗日军队，承认我党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等二十条谈判内容。二十二日，林伯渠、王若飞将谈判方案交付张治中、王世杰。第二天，林、王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两日来国共谈判的情况。

林伯渠、王若飞到达重庆后，发现国民党并无和谈诚意，国共谈判条件尚不成熟。王若飞根据形势和中央指示，分工负责抓南方局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六月一日，王若飞在南方局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作了关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危害，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改造的必要性，说明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需要经过长期痛苦的磨练过程，对一个革

命者来说，应该自觉地彻底抛弃小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要求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实际斗争中增强党性，提高政策策略观念，转变成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会后，在南方局各部门对王若飞的报告开展了认真的讨论。结合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广泛地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八月三十一日，王若飞又在南方局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阶段学习的总结报告。他肯定了两个多月的学习成绩和它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十一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董必武同林伯渠回延安，留王若飞在渝主持工作，由王若飞、刘少文（张明）、徐冰、钱之光、熊瑾玎、潘梓年、童小鹏七人组成南方局工作委员会。此后，中央筹备召开七大，周恩来、董必武参加中央领导和有关方面的工作，南方局的全面工作，主要由王若飞负责。

十一月，王若飞会见刘文辉派来的代表杨家桢。杨家桢向王若飞反映，蒋介石威逼刘文辉，密派特务监视刘文辉的行动，双方矛盾很尖锐，请求指点。王若飞告诉杨家桢，蒋介石集团是外强中干的，应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办法同他们作斗争，并鼓励刘文辉不要松劲。杨家桢走后不久，南方局根据王若飞的提议，派张友渔到成都，支持刘光辉反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排斥异己的方针。张友渔到成都后和刘文辉一起研究了在日本侵略者继续进攻下如何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力量保卫大西南，以及同蒋介石作斗争的问题。为了抵制国民党的青年军运动和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王若飞还指示成渝地区党组织，动员知识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到湖南、贵州、川

东北地区去工作。一时响应号召的青年达数百多人。

二月二十日，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前往“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检查违章用电，遭到国民党特务枪杀。南方局青年组刘光、张黎群等向王若飞汇报了这件事情。王若飞立即召开会议，决定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发动一场反国民党特务的斗争。南方局成立指挥机构，王若飞担任总指挥。

他提出将事件经过宣扬出去，组织力量，深入工厂、学校市民中去，广泛进行宣传。他还指示电力公司工人印发传单，散发到全市工厂和学校；动员学生到工厂区、市民集中的地点演讲；组织市民学生、工人到胡世合灵前吊祭、献花圈、送挽联，捐款、写信给死难者家属。在十余天里，胡世合惨案成了重庆街头巷尾、茶馆饭店谈论的中心，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争取民主自由，争取保障人权，成了重庆各界民众共同的奋斗目标。

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王若飞指示重庆电力公司工人坚决要求严惩国民党特务，否则就采取强硬措施：停电。这一消息传出后，使得国民党政府非常恐慌，因为它将使整个重庆变成黑暗的世界，大多数工厂（包括兵工厂）将要停工。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后，大骂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无能，命令他们赶快把事情结束。

在强大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重庆警备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旨意，组织临时军事法庭审判杀人凶手田凯，并被迫宣布判处田凯死刑，于二十六日晨执行。田凯被枪毙后，王若飞为了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主动说服群众将斗争停了下来，适可而止，使这场斗争胜利结束。

在利用胡世合事件广泛揭露国民党法西斯残暴统治的同

时，南方局还加强了对各民主党派和文化界、实业界的接触。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新华日报》社举行成立七周年纪念会，邀请柳亚子、沈钧儒、马寅初、陶行知及文化、戏剧界人士数十人参加，潘梓年作了长篇发言。一月十四日，王若飞、徐冰、王炳南在枣子岚垭八十三号同左舜生、张申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等就改革国民党政府、实现国共和谈交换了意见。一月十六日，《新华日报》公布了中国民主同盟发表的对时局宣言，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权，召开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以及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职业、身体的自由等十项主张。一月二十一日，王若飞根据中央书记处关于推动孙科参加民主运动的指示，同孙科进行了交谈。

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电周恩来、王若飞：南方局在目前时期，除开进行一般的民主号召和上层联络工作外，应大力进行下层群众工作，在大后方农村建立可靠基础。南方局应设法发动与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中去，利用合法与非法方式为农民服务，并努力获得成绩，以便在日寇进攻云、贵、川或将来国内重大事变中有可靠发动游击战争的基础。周恩来和王若飞当即认真研究了中央电报，随后召集南方局直属机关和直辖的地方党组织开会作了布置，要求各单位广泛地动员党员、进步人士及知识青年到基层和农村去，加强群众工作。南方局在红岩嘴和下属的一些据点，举办了农村工作人员训练班，各省市一些党组织也相继举办了训练班，训练出一大批开展农村工作的骨干。

二月底和三月初，中共中央两次致电王若飞，指出“国民党不能代表民意”，要“坚决坚持召开党派会议，结束党治，成立联合政府，说服民盟在渝、蓉、昆与我们配合行动。”为了贯

彻中央电示精神，王若飞在良庄沈钧儒住所邀请了各民主党派领袖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出席的有章伯钧、沈钧儒、左舜生、屈武、王昆仑、张申府、邓初民、陈铭枢、杨耿光、谭平山、冷遹、郭沫若、许宝驹、黄炎培等。王若飞在会上谈了我党坚持民主、反对一党独裁、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要求召开各党派协商会议，坚决反对蒋记“国大”，指出蒋介石在三月一日演说的实质是要实现其一党独裁专制，蒋提出在十一月召开的“国大”，是他的御用会议。我们不要相信蒋介石的假民主，希望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和我党联合一致，大力发展大后方民主运动。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发表讲话，表示赞同王若飞代表我党提出的主张，愿与我党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

五月三十日晚上，王若飞发电报给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南方局的工作情况，提出了可能出现的问题。电报说：一般民主人士认为，美国今天只援助蒋，蒋还有力量、有办法；同时又认为日寇很快投降，可以坐待胜利。所以他们一面说毛主席论“联合政府”很好；一面又认为蒋还有前途，因而对目前民主运动表示消沉、观望。对于两党尖锐对立的形势，很忧愁，认为内战不可避免，替我党担心。六月十七日，中央复电王若飞，指出：“美政府现行政策，确是扶蒋抗日反共”，“但结果与其希望相反，日蒋如决战，蒋必再败，日如撤退，蒋必内战，统一无望。只有美扶助中国的民主力量，才能战胜日寇，制止内战，取得战后和平”；“我们反对内战，同时却又表示我们不怕内战，以压蒋之气焰，坚定同盟者对我之信心。”^①

^①电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王若飞随即召开了南方局领导成员扩大会议，讨论、贯彻中央六月十七日电报精神，认定蒋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们有力量胜过他。因此，我们应积极准备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派出武装工作队，分散在川、贵地区；还要对友军以交朋友为目的，进行统战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这项工作要与办事处和报馆公开工作不发生任何联系，指定专门机构和专人进行领导，绝对保守秘密。会议还确定加强同民主党派的联系，支持他们开展各种文化科学技术活动，扩大民主运动的宣传，联合更多的人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六月三十日，王若飞在七星岗星庐同黄炎培等举行谈话会，商量去延安同中共中央领导人研究恢复国共两党商谈的办法。七月一日，王若飞陪同国民党参政会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五参政员（王云五因病未成行），由重庆抵延安。

七月二、三、四日，王若飞陪褚辅成等五参政员三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商谈三种力量合作问题。由于王若飞从中斡旋奔走，双方很快一致同意：（一）停止召开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结束一党专政；（三）政治会议前释放政治犯等。这个协议，成为以后中共中央和民盟在政协会议上采取联合一致行动的基础，对团结各民主党派力量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斗争，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四五年六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若飞当选为中央委员。

八月三日，王若飞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国内形势》的报告。他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指出从去年下半年日寇发动的对中国领土的新进攻后，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溃

败，激起了蒋管区的基本群众和上层人士对蒋介石的愤怒与不满。蒋介石统治异常危急。我党为实现党派会议联合政府而斗争的口号得到了国内外各阶层人民热烈拥护，威信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他还强调指出：援助大后方斗争，必须发展解放区。解放区越扩大，大后方人民的信心和力量亦越大，要放手发动群众，争取中间力量。他说：“我们要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能光靠谈判和发动民主运动，而要靠人民力量，要农民起来”，要加强乡村工作。

谈判斗争和黑茶山遇难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同月，蒋介石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抵重庆。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山洞林园出席蒋介石举行的欢迎宴会，留宿林园。

八月三十日，周恩来、毛泽东、王若飞由山洞林园返回城内，在曾家岩办公。三十一日至九月三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就一般性的政治、军事问题进行商谈。从九月四日至十月十日，国共两党谈判代表举行了十次正式谈判会议。周恩来是中共代表团的首要发言人，王若飞配合周恩来作了多次发言。他讲话从容不迫，铿锵有力，击中要害，常常使对方处于被动地位。

在九月四日的会议上，继周恩来发言之后，王若飞对国民党代表张群、邵力子不承认中共领导下的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

问题作了发言。他指出：自抗战以来，国共两党由于做法不同与所处之环境各异，彼此有许多方面不尽相同。我党在敌后创建了军队，开辟了解放区，拥有一百二十万军队、十九个解放区政权。此种既成事实，如不蒙政府合法承认，而要用武力解决，则不仅为今日之国情所不容许，而亦为我党所坚决反对^①。

九月八日，王若飞在发言中说：今天要解决国共两党问题，必须承认现实，我等此次来渝，乃正视现实。我们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军令政令之统一原则，但亦要求政府承认我党解放区政权和军队，彼此相互承认，始能求得问题的解决。你等要求我党减少军队、缩小地区，我方皆可考虑。我们已同意将一百二十万军队缩编为四十八个师，这怎能算是扩充军队？华北五省是我们占领的，故要求此五省由我党负责，江南六省，我们只占领一部分，只要求参加政权，何谓争夺地盘？文白（张治中）兄谈国家要现代化，这种理想，我很赞成，但必须看到目前两种政权都存在，这是抹煞不了的。接着，王若飞还用事实反驳了张治中关于中央军队并非国民党一党之军队的说法，指出：在国民大会尚未颁布宪法、实施宪政的现在，国民党处于党治时期，所说中央军队实系国民党之军队。

九月十一日，国共两党代表就国民大会的代表及延期问题进行商谈。国民党代表叶楚傖坚持要承认国民党已选出之国民代表为合法代表。对此，王若飞指出：过去所选出之代表，乃国民党一党执政时所产生的，不足以代表各方面，且代表之任

^①两党代表谈判情况均见《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期只有六年，至今任期已满，自然不能再代表国民。十五日会上，王若飞就地方政府人选问题发言指出：中央依据法令统一之原则，处理各项问题，尽可不必否认地方之现存事实。今我方提案，规定解放区各省中由中共推荐人员请中央任命，并未有违政令统一之旨。我们所提办法，乃目前过渡时期之必要办法。吾人以为民主统一之理想，未可一蹴而就，须经过此必要之步骤与过程方能达到。

关于解放区施行的制度、政策、人事问题，周恩来反复作了说明，指出：我解放区一切行政设施并未脱离三民主义之范围。就制度言，我们并未要求改变中央之制度，而依照中央之规定；就政策言，我方所推行者，都是中央过去所颁布者……。王若飞又进一步作了补充发言，指出：凡解决问题，必须承认事实。我党现在所提之办法，为由训政进入宪政，由一党专政进入普选之必要办法，亦为解决当前现实问题，以避免内战所应采取之必要步骤。关于缩编军队问题，王若飞严正指出：我中共之军队，乃历史之产物，即要裁减，亦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与步骤，且整编之后，亦非永远为中共的军队，将来全国整编军队，仍可以公平合理之原则，整编为国防军。关于军队集中地区问题，他强调指出：我党之军队集中于淮北及黄河以北之地区，乃是一大步让步。现海南岛、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和京、沪、杭三线之郊区等，皆有我党之军队，我们将考虑予以撤出。现我党所提十一条，实充满让步之精神。国民党对中共的忍让求全精神不予顾及，仍坚持只给十二师的编数，是极不公正的。

在九月二十一日会上，双方代表继续就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进行商谈。首先，张治中对我军整编及驻地问题，作了系统

发言，坚持国民党的一贯立场。周恩来对张治中的发言一一予以驳斥。王若飞在周恩来发言后发言指出：军队要国家化，所谓国家乃人民的国家，而非一党的国家。如能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则一切军事政治问题，皆可解决。解放区抗战八年，守住大门，以掩护后方的安定，但反不能取得其应有的承认，其地位反不如汉奸伪军。过去人民从敌人手中取得政权，而现在中央要从人民手中取回政权，要解决“解放区”问题。这是何种道理？

王若飞在发言中，对国民党作了尖锐的批评，使得国民党代表十分难堪。张群连忙解释说：若飞兄所说汉奸伪军之委任，实因为他们在抗战期间反正投降过来，给以自新之路。中共军队乃是另一种情况，现在中央请兄等来协商，即是要确定具体办法，加以整编，而并非不予承认。

十月八日，国共两党代表就《会谈纪要》交换意见。十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至山洞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并留宿林园。次日，王若飞、张治中乘机陪送毛泽东返回延安。十二日，王若飞和张治中同机由延返渝。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斗争，至此结束。《纪要》虽未解决我解放区的地位和政权问题，但迫使国民党承认我党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地位，同意召开各党派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协会议，承认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从而争得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依据。这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十月二十日，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继续就政治协商会议之性质、代表总数和各方应推出之代表、会

议职权、表决方式以及由谁出面召集等问题，进行协商。二十二日，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商谈停止进兵、恢复交通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关于停止进兵问题，王若飞在周恩来发言之后严肃地说：我方最不满意者为：（一）美军不断在沿海登陆，美国帮助国民党空运军队开入解放区的人数已达七十余万；（二）利用敌伪军作前锋进占城镇和交通线，以便阻止中共军队之前进。关于解放区政权问题，周恩来、王若飞一致认为，现有解放区的村、乡、县行政区各级政府机构人员，皆由民选产生，可报中央政府承认加委。各边区政府（包括冀、热、察、鲁）维持现状，俟宪政实施后，再依法改选。国民党代表均不同意，此次商谈未获结果而散。在二十六日国共两党谈判时，周恩来、王若飞指出：“在解放区问题未得解决、受降区没有重划以前，中央军之进兵，即为进攻，而我方之破坏交通，以阻止中央军进兵，乃为当然之事”。我方认为，“交通理应恢复，但必须于和平状态之下，始能恢复。若中央必欲武装占领交通线，而将我军驱出于交通线之外，那便是战争。”“恢复交通之目的在避免内战，而避免内战唯一途径即是停止进兵”。国民党代表只同意停止进占，不同意停止进兵。

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王若飞：“目前的谈判，国民党方面全为缓兵之计，无诚意解决问题，彼方一切部署均为消灭我党。”同意在宣传上，应当采取“哀者”态度，以利于“团结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而要仁至义尽。”随后，王若飞召开了南方局各组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央七日电示，讨论研究如何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战争的问题。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党政府礼堂开幕。王若飞出席会议。全体代表分成五个小组；王若飞参加政治组和施政纲领组。因施政纲领组有董必武参加，他主要是参加政治组的工作。

政治组的主题是改组国民党一党专制，成立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这是关系到蒋介石个人专制独裁的存亡问题。蒋介石的打算是以改组政府为名，保持个人独裁的实质，因此这个组坚持民主和专制独裁的斗争尤其激烈。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根据蒋介石的意图，抛出个“扩大政府组织法”，以“扩大”几名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了事，不触动原机构。原来的国民政府委员会是“党国元老”养尊处优的敬老院，名义上是政府指导机关，实际上什么权也没有。蒋介石妄图把在野党派的人骗到这个闲散机关，算是成立联合政府，以掩人耳目。

王若飞认定改组政府的关键问题，是改变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局面。他同民盟代表反复研究对策，认为必须把这个委员会变成个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最高国务机关，用委员的集体政府来代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总统制。规定行政院委员包括各部会长官，应由这个委员会任免；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应由这个委员会同意；国家预算决算，应经这个委员会通过；立法原则、施政方案、军政大计，须由这个委员会讨论决定。经过几天斗争，上述条文才获得通过。

当时同王若飞一起参加政治组会议的民盟代表罗隆基回忆说：“王若飞是政治斗争中的一员杰出的能将。在小组讨论时，他攻的时候总是勇猛，守的时候真是坚强。”“当他依据原则坚持条文中某句话或某几个字的时候，上午是这样，下午

还是这样；今天是这样，明天还是这样。寸步不让，寸土不让”，每次开会前他总是找我商量“当天会议的战略战术，并叮咛我，‘不要随便退却，轻易让步啊’。我坚定地回复他，‘王司令官，你放心，我不会轻易让步，随便退却的’。”

“等我说完那几句话，他就在我肩上拍几下，笑着一块进小组会议室。”^①

政府委员会的职权斗争告一段落后，就转到委员名额的问题上来。原有国府委员三十六人，王世杰原提案只增加十二名。王若飞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我们讨论的是重新改组政府，而不是“扩大”成员。几经争执，政府委员名额定为四十名。王若飞声明，国民党是个大党，可以占国府委员名额的半数，其余二十名，由其它党派和社会贤达充任。商量结果，共产党和民盟共占十四名，青年党和社会人士占六名。这样，国民党认为他们可以稳占多数，也就同意了。但在表决法中，王若飞和民盟代表一起提出并通过了“国民政府所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始得通过”的规定。有了这个条文，使共产党和民盟在国府委员中占三分之一以上，就掌握了否决权。

在国民大会代表人数问题上，引起了一场大争论。国民党坚持保留十年前他们选出的一党代表一千二百名，再补选一部分其他党派的代表组成国民大会。民盟和其它民主党派代表都坚决反对。这个问题使旧政协会议开不下去了。周恩来、王若飞劝民盟代表团不要为着这个问题，而把当前为民主、统一而

^①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召开的协商会议弄破裂了。经过再三协商，最后，同意承认国民党预选出的一千二百名代表，增加“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并增加台湾和东北几省的代表一百二十名，总共代表二千〇五十名，商定共产党和民盟两方共同的代表席位占代表总数四分之一强，并坚持“议会讨论的提案，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的同意，才能形成决议。从而防止了蒋介石把国大变成他的表决机器，使这个棘手问题达成了协议。

王若飞在同国民党、各民主党派代表谈判协商中，表现出来的坚持我党原则立场，与灵活的妥协、让步，以及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精神，受到了多方的赞扬。沈钧儒说：“若飞先生分析事理之细，记忆头脑之清，对人恳挚，一片真诚，吾无闲然。尤其是在每一会谈或一会议中，那一种韧性的辩争，众口纷拿、屹然不动，虽有责难弗避，真不愧民主战士的前导。”^①

一月十八日，王若飞应陪都政协协进会之请至沧白堂报告政协商谈情况。二十日，王若飞出席重庆各界在沧白堂举行的庆祝国内和平大会，李德全、冯玉祥、王若飞都讲了话。二十七日，王若飞再次参加沧白堂集会并发表演说，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殴打进步人士。目睹现场的记者报道说：王若飞怒斥特务暴行，充满着坚贞不拔的气概。

二月十日，王若飞由重庆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十三日，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由延安飞渝。这时重庆的政治气氛继续恶化。二十二日，国民党反动派煽动重庆学生举行反

^①沈钧儒：《敬悼若飞、博古、希夷诸先生》，载1946年4月19日《新华日报》。

苏游行，特务暴徒乘机捣毁《新华日报》民生路营业部。王若飞与博古一起，代表中共代表团接见了青年学生，当场向他们揭露国民党特务制造行凶事件的阴谋。从而争取了群众，有力地回击了敌人的破坏与捣乱。

三月一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公开叫嚣政协决议无法律效力。全会推翻了政协决议。三月二十二日，周恩来自延安致电董必武、王若飞，告以对国民党谈判应持强硬态度。三月三十日，王若飞根据形势和周恩来指示，在政协综合小组会上发表声明，指出蒋介石四项诺言迄未切实履行，国民党二中全会造成违反政协决议之混乱情形，尚未澄清，中共方面不能考虑参加国民政府及行政院人选。

四月一日，王若飞参加政协综合小组会议，讨论国大和宪草问题。青年党陈启天提出：“省议会制定省自治法，经立法院通过后，中央法令不得变动之”。王若飞当即指出这是糊涂观念！陈启天、曾琦无言以对，恼羞成怒，退出会议。第三天，政协综合小组继续开会，政协秘书长雷震宣读陈启天、曾琦因上次会议上受到中共代表严厉批评拒不出席会议的抗议信，对中共代表团进行要挟。王若飞当即指出：“民主国家各个政党因不同意见而在会议上展开激烈争辩与严正批评是正常习见之事，青年党代表如因重大政治原则不同意而不出席会议是可以的，如因受了严正批评而不出席，殊失政党应保持的民主讨论风度。曾、陈二人此种态度，完全是对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工作进行之一种威胁与破坏行为”，“望曾、陈二人自己改正其错误或青年党内部自己起来纠正其代表的错误”。言毕，孙科表示，以他个人名义，托人去劝说曾、陈出席会议。

四月八日，王若飞奉命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政协工

作，同机回延的还有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十三人。途中，因气候变化，飞机迷失方向，于当日下午在山西兴县东南之黑茶山遇险机毁，全体遇难牺牲，王若飞时年五十岁。

“一切为人民打算”，这是王若飞临别重庆时向周恩来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名言却成了他对人民、对党的最后遗言，也是他一生革命实践最公正的总结。

作者附记：

我们从一九八〇年开始搜集王若飞烈士的资料，先后访问了陆定一、李维汉、乔明甫、杨植林、罗章龙、肖三、师哲、王景任、王若芬、马文彦、吉合、王炳南等数十人，得到了中央档案馆、中央组织部、中国革命博物馆、南京第二档案馆，以及开封、无锡、重庆档案馆、纪念馆的支持和帮助，还得到了郑洪泉、刘富恒、李育安、郑建英、药英、陈文秀、姜沛南、张守宪、董建中等的热心帮忙；特别是烈士夫人李培之、亲属王兴、张延忠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材料和访问线索，在此一并致谢。

安子文

宋荐戈 李茂盛 赵 晶

安子文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活动家。他自幼投身革命，直到“老骥伏枥”，仍以“志在千里”的气魄为党忘我地工作，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

（一）

安子文，原名安志瀚，字浩然，一九〇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双湖峪镇（现子洲县城）。

安子文的父亲安庆云是前清秀才，民国年间曾任陕西省议员，是一个颇有名望的乡绅。安子文童年时，家有耕地二十九垧（每垧合二亩半），还经营了一个杂货铺。他十二岁时父亲病故，家业无人经营，杂货铺很快倒闭，耕地逐年变卖，到后来几乎全靠借贷度日^①。

安子文七岁进入村塾读书，第二年转入距双湖峪六十里的绥德县城国民初级小学就读。一九二一年春，他又和大弟安志铭一起，来到绥德以北的米脂县，借住于外祖母家中，在县城的高级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新成立的绥德师范。

^①安子铭谈话记录。

绥德师范是当时陕北二十三县内唯一的一座师范学校。一九二四年，共产党员李子洲出任该校校长。他聘请杨明轩、王懋廷、田伯英三人分任教导主任、国文教员和英文教员，校内革命空气愈来愈浓。在这些老师的教育、指引下，安子文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向导》等书刊，思想觉悟大有提高，很快加入了革命团体“共进社”^①。

不久，安子文又结识了榆林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刘志丹。他俩志趣相投，常常在交谈和通信中讨论如何献身革命，改造中国的大事^②。

一九二四年冬，安子文从绥德师范毕业。这时，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发动了“北京政变”，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在共产党的倡议和支持下，发起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在革命形势的鼓舞下，年仅十五岁的安子文告别故乡来到北京，准备去河南报考由共产党员刘天章担任队长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学兵队。因年龄太小，未被录取，遂到保定育德中学读高中。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中，安子文受共产党员王敬臣的指派上街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事后，他被勒令退学，只得重返北京^③。

安子文回京后，住在吉安所左巷六号“共进社”机关内。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经蔡振德、王懋廷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这时，他考进了京兆高中，一面读书，一面积极从事革命活动^④。

①③④《安子文自传》（1966年10月4日）。

②参见安子文病中谈话笔录。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安子文参加了李大钊等人领导的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军舰在大沽口炮轰国民军的示威游行。当两千多人的游行队伍行至东城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请愿时，临时执政段祺瑞竟然命令卫队向请愿群众开枪射击，造成了震动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安子文由于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也被打伤。京兆高中得知他参加了“三·一八”示威游行的活动后，开除了他的学籍。此后，党组织派他到共青团北京地委工作。

安子文在北京团地委主要是从事交通联络工作。他骑辆自行车，顶烈日，冒风雨，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地传送党内和团内的机密文件和革命传单。有一次，他带着一些重要文件和传单走到什刹海附近，被敌人便衣盯梢，敌便衣侦探也骑着自行车在他身后紧追不放。他急中生智，把自行车骑得飞快，等敌人追上来时，他猛一刹车装成摔倒的样子。敌探也慌忙刹车，摔倒在地。安子文却趁敌人爬在地上起不来时，直起身把车一蹬，拐进了小胡同，巧妙地甩掉了敌人^①。

一九二六年九月，统治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查封了“共进社”设在北京的机关，逮捕了几十个住在“共进社”机关里的陕西籍学生。安子文也被抓了起来。但是敌人没有得到给他治罪的真凭实据，所以十月十日就让他取保释放了。

安子文被释放后，组织上考虑到他在北京的活动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为了防止意外，决定让他回西安工作。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安子文经绥德转道去西安。在绥德时，当地的左派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又推选他为出席陕西省国民党第一次代

^①参见安子文病中谈话笔录。

表大会的代表^①。

一九二七年一月，安子文到达西安，先在《民国日报》社临时担任发行工作；后来，中共陕西省委又把他派到冯玉祥部队第三路军第十九师担任政治处副处长。十九师师长吉鸿昌，是一位性格耿直刚烈，秉公好义的开明军人。安子文到任后，经常和吉鸿昌在一起，向吉鸿昌宣传共产党的正确主张，用革命思想启迪吉鸿昌和部队官兵的阶级觉悟。在安子文等政治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吉鸿昌对共产党的宗旨和主张逐渐有了认识，他所领导的十九师，成了冯玉祥部队中战斗力很强的一支劲旅。一九二七年五月，冯玉祥率部从陕西出发东征河南，十九师担任全军的前锋，边打边走，所向皆捷，斗志极旺^②。同年六月，武汉北伐军和冯玉祥部队在郑州会师后，冯玉祥同武汉国民党首领汪精卫等举行郑州会议，随后又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举行徐州会议，公开同蒋、汪合流反共。冯玉祥提出要“礼送共产党出境”。一天深夜，吉鸿昌获悉了有人来抓安子文的消息，赶忙跑去送信，并赠送银洋二百元作为路费，劝安子文快走^③。安子文立刻离开了第三路军，但未能走脱，被抓回送进了冯玉祥在开封专为共产党人办的“训练班”。由于吉鸿昌从中说情，安子文被放出“训练班”，又留在第三路军政治部工作。这时，党在第三路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大都被“礼送出境”，党组织通过宣侠父，委托安子文担任了第三路军中党的领导工作^④。不久，他又被冯玉祥的军法处逮捕关押，再次

①《安子文自传》（1943年8月17日）。

②参见安子文病中谈话笔录和《安子文自传》。

③安子文病中谈话笔录。

④《安子文自传》（1966年10月4日）。

获释后便离开了冯玉祥部队^①。

（二）

安子文从冯玉祥的军法处释放出来以后，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到开封，向中共河南省委汇报了在冯玉祥部队中的工作情况，河南省委正式决定安子文由团转党，并分配他担任省委交通科长。安子文把充沛的精力投放在党的交通联络事业上，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三月，由于叛徒告密，党的开封市委机关遭到破坏，市委的许多领导同志被敌人逮捕。当时，安子文就住在开封市委机关的附近，因此也被株连逮捕。他们先由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审讯，后来案子移交河南省高等法院，安子文等被投入开封第一监狱。

安子文是作为嫌疑犯被逮捕的。他在狱中用的是假名字，编的是假口供。加之他到开封工作的时间不长，很多人包括叛徒在内都不认识他。因此敌人只判了他十一个月的徒刑，而且在狱中的活动也相对地自由一些。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安子文主动担负起狱中“交通”的任务。监狱中一些共产党员创办的《狱灯》、《镣声》两种用手写在小纸头上的“刊物”，就是经过他的巧妙传递，得以在各监号的共产党员中间秘密传阅。据当时和安子文关在一个牢里的一位同志回忆说：“安子文那时只有十八、九岁，为人机警干练，很乐观，即使身陷囹圄，也保持着充沛的革命干劲”^②。

^①《安子文自传》（1966年10月4日）。

^②侯镜如谈话记录。

几个月后，党的河南省委机关也被破坏，省委书记周以栗和宣传部长任作民在被逮捕后审讯时，被敌人用烙铁烙得皮开肉绽，伤势很重，连吃饭拉屎都不能自理。为了照料这两位党的负责干部，安子文设法和他们住到一起，担负起了护理任务。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喂水喂饭、端屎倒尿，想方设法地寻找药物给他们治疗创伤，使周以栗和任作民较快恢复了健康。他还帮助这两位负责同志和监狱外边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使狱内和狱外的革命斗争汇合在一起。任作民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病逝的。他生前曾在自己的日记里写到过在开封坐牢时，有一位小同志如何精心护理他和周以栗同志，并打通了狱内外联系的事情。但是直到临终，他还不知道曾经那样无微不至地照料过他的就是安子文^①。

不久，开封第一监狱因为犯人急遽增加，另外又开辟了一个分院，安子文被送进分院关押。在这里，安子文协助河南党组织的另一位负责同志开展狱中斗争。他们曾计划组织一次暴动，并且已经推定了暴动总指挥^②。这个计划虽然未能实现，但其勇敢斗争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后来，由于狱外党组织的营救，也由于蒋冯大战中韩复榘倒戈，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安子文和其他一些同志都被释放出狱。

安子文出狱后，一九二九年秋天，组织上安排他到上海担任了党中央的交通，往返于上海和武汉、宜昌、沙市之间，为党一次又一次地传递文件、党内指示和重要通知；护送党的重要干部到新的工作岗位：他曾于一九三〇年春护送任弼时夫妇

^{①②} 《安子文自传》（1966年10月4日）。

到汉口；一九三〇年四月护送周逸群、段德昌等从洪湖苏区回上海党中央机关；另外，还亲自去洪湖苏区送过阻截敌人军火的情报等等^①。

一九三〇年八月，党中央拟让安子文经北方局转赴陕西省委工作，开辟陕西工作的新局面。他到天津北方局机关后，北方局书记贺昌鉴于去陕西省委的工作干部已经派出，就决定让他留在北方局担任交通科长。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安子文根据自己跑交通的经验，制定了交通工作不能冒险而要避险的交通工作原则，并提出了一系列对付敌人的策略和方法。例如，交通人员的服装要多样化；交友要广泛化；要熟悉和适应各地的风俗习惯；要住在普通群众杂居的地区，以便隐蔽等等。北方局交通科的同志们按照安子文提出的这些原则和办法行事，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②。

一九三〇年十月，北方局经过反复查证核实，掌握了原天津河北区委负责人李纯已经叛变投敌的确凿证据。这时，李纯表面上仍然伪装为共产党员，实际上已经被敌人任命为天津市警察局的侦缉队副队长，成了北方局和天津市党组织的最大威胁。为了铲除这个祸害，北方局书记贺昌决定由安子文负责惩处叛徒。安子文受命后，立即和天津市委书记童长荣等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领导党的地下武装人员，在万国桥（现称胜利桥）的桥头将李纯干掉了^③。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取消北方局，改称顺直省委，以陈原道为省委负责人，下辖天津、北平、唐山

①安子文病中谈话笔录。

②③周仲英谈话记录。

三个市委和直南、保属、冀东三个特委。安子文担任顺直省委的秘书长。时隔不久，党中央又指名调他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就在安子文交待工作准备离京赴沪之际，叛徒张开运来天津担任了国民党警察局的侦缉队长。顺直省委要求安子文在离开天津前负责完成这项除奸任务。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行动，敌人便先下手了，安子文又一次被捕。

那是一九三一年三月的一天，安子文带着一个同志到顺直省委在法租界设立的一个以“垦野公司”作招牌的机关里去处理公事。那知这个机关已被敌人发现，安子文一进门就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关进了天津监狱。

在天津监狱里，任凭敌人严刑逼供，安子文坚不吐实。他还和周仲英一起，从牢房墙脚的一个小洞里，用线吊窝头的办法传递信件，发动在押犯人进行了一次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绝食斗争，迫使监狱当局修理了厕所，清理了卫生；看守们也不敢再象过去那样随便打骂犯人了^①。

一九三一年六月，安子文和周仲英等政治犯从天津押送北平，先被关押在国民党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同年冬季又转送到草岚子监狱。草岚子监狱对政治犯实行所谓“反省政策”，妄图通过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压迫，使被捕的革命者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向他们屈膝投降^②。为了对付敌人这种“感化”、“诱降”的恶毒手段，领导狱中的共产党员坚持斗争，在一些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同志的提议下，建立了狱中党支部，陈原道、孔祥祯、殷鉴、薄一波、赵鏊先后担任过狱中党

①周仲英谈话记录。

②参见熊怀济：《天地有正气》第16-21页，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支部书记，安子文担任过党支部委员。党支部的建立，使狱中的斗争有了核心，它成了反对敌人“反省政策”的坚强堡垒。

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安子文等发动全体政治犯进行了一次争自由的斗争。结果使刑重者被酌情减刑，有十多个判了刑的犯人被释放出狱；并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玩弄“大赦令”的骗局。其后，党支部团结广大政治犯开展了革命气节教育，提出了“红旗出狱”的口号，还把“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警句作为狱中共产党员的座右铭，要求党员在漫长的岁月里接受各种考验和磨练。针对监狱当局在推行“反省政策”时采取的所谓请法官讲课、请牧师说教布道和强迫政治犯写“反省”文章等措施，狱中党支部团结广大政治犯与敌人斗智斗勇，进行了巧妙而有效的抵制。以后，狱中党支部还多次发动了为改善生活和反对虐待的斗争。这些斗争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①。

为了更好地开展狱中斗争，狱中党支部迫切需要和外面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寻找联络人这个问题上，安子文想了很多办法。他凭着自己长期搞交通工作的敏锐眼力，发现多数看守都是当差混饭吃的。其中有个山东口音的看守班长，平时沉默不语，有正义感。通过进一步的接触，安子文知道了他叫牛保正，出身贫苦，对共产党员同敌人进行斗争表示钦佩。安子文把这个情况向党支部负责人薄一波作了汇报。经过慎重研究，党支部确定安子文和薄一波等同牛保正交朋友。此后，他们一面在生活上关心牛保正，一面启发牛保正提高阶级觉悟和确立

^①参见熊怀济：《天地有正气》和杨献珍《入草岚子监狱前后》，载《革命史资料》第8辑。

爱国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争取，牛保正真的觉悟了。他利用自己身上那张“虎皮”，替狱中党支部做了大量工作^①。

有了牛保正这条通往狱外的重要渠道，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如《大公报》、《华北新闻》以及一些外文版的马列书刊都被送进了监狱。党支部决定让懂外文的杨献珍、廖鲁言等把外文版马列著作翻译成中文，以供大家学习。与此同时，狱中党支部还秘密地编辑了《红十月》刊物，供大家交流思想，传播党的指示和红军胜利的消息，把敌人关押和迫害共产党人的监狱变成了革命者学习马列主义的学校^②。

一九三三年冬，何应钦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军法处，接管了草岚子监狱。反动派为了逼迫草岚子监狱中的政治犯自首投降，宣布对政治犯要实行定期“审查”，规定凡反省自首者，履行出狱手续；登了“反共”启事的，就释放出狱；而三次“审查”还不反省的就枪毙。面对这种形势，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和安子文等一大批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毫不畏惧。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抗日有理，无过可悔。”使得敌人无计可施。后来经过狱中党支部研究，决定进行一次绝食斗争以粉碎敌人宣布“定期审查”以来对政治犯施加的种种压力。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安子文和薄一波、殷鉴、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多个政治犯绝食开始。他们走向牢房，用顽强的革命意志绝食七天，迫使敌人答应了改善伙食，允许订报、买书，每天放风三次（每次一小时）的条件。“定期审查”的失败和政治犯绝食斗争的胜利，使敌人大为气恼。

① 《安子文自传》（1966年10月4日）和安子文病中谈话记录。

② 杨献珍：《入草岚子监狱前后》。

一九三五年六月初，反动当局派宪兵三团进驻监狱，并指使两名特务冒充“政治犯”，用“苦肉计”来侦察狱中党组织的活动情况。由于看守班长牛保正已把情况告诉了薄一波和安子文等同志，狱中党支部和共产党员先是对特务严加戒备，后来又找了一个借口，把其中一个叫小吴的特务狠狠地揍了一顿轰出去了。但是，狱中党支部的一些活动还是被宪兵三团发现了。于是，主管监狱的宪兵三团团副向南京呈报，把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刘锡五、胡锡奎、张玺、董天知、张振胜、韩钧、张友清、杨献珍等十二个同志判处死刑。特务们给这些同志加上重镣，不许放风，严加看管，等待执行^①。

在这最后的时刻，敌人还是妄图借助于死亡的威胁迫使安子文等人屈服。但安子文等泰然自若，他们早已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思想准备。当敌人最后提审时问安子文：“你不怕死吗？”安子文回答说：“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现在死了，你们以后不是也要死吗？”敌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讲，安子文果断地回答：“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杀了我们，以后你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多少。”^②

华北事变后，日寇攫取了我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宪兵三团离开了北平，安子文等十二人幸免遭难。

一九三六年春，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鉴于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华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向中央请示，准备让关押在草

^①参见熊怀济：《天地有正气》和安子文病中谈话记录。

^②杨献珍：《入草岚子监狱前后》。

岚子监狱的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和安子文等五、六十名党的重要干部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营救出狱，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党中央书记处经过讨论，由张闻天代表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请示报告，并指示北平党组织贯彻执行。同年秋，安子文和殷鉴、薄一波、刘澜涛等五十二位同志按照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分九批相继出狱。他们出狱后立即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走上北方局指定的工作岗位，投入了火热的斗争^①。

根据北方局的决定，安子文出狱后以北平五三中学教师为掩护职业，担任北平市委的组织部长。为了适应在新形势下进行革命斗争的需要，他抓紧时间认真学习列宁关于批判“左”倾幼稚病的著作和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学习党中央和北方局下达的各项指示和文件^②，对于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有了一定的认识。他把学习和总结以往的革命斗争实践紧密联系起来，逐步认识到推行“左”倾机会主义只能把中国革命引上失败的道路；只有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才能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于是，他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和市委的其他同志一起，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西安事变”之后，安子文接替黄敬兼管领导北平学委的工作。这期间，他和学委书记蒋南翔等一起，经常研究市学联和“民先”的工作；采取各种形式，发动、组织和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在短短的七个

①在“六十一人”案中除五十二位共产党员外，其余九人情况不同，不属于这一范围。

②刘尹南谈话记录。

多月的时间里，从学生运动骨干中吸收了二三百名党员。同时，他们还组织学生对宋哲元、何基沣以及国民党二十九军官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促使他们采取了抗日的立场^①。

这期间，薄一波等根据党的指示，在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统战关系，接办了刚刚在太原成立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还办起了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培养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战争的革命干部。为了向山西输送人才，安子文通过北平市委组织部和学委，把大批“民先”队员和思想进步的爱国学生以及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介绍到太原参加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的学习。这些青年后来成了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骨干力量。

安子文出狱后一直在废寝忘食地工作。有一次他得了霍乱病，休克在过道上，幸亏及时请来医生救治，才转危为安。病好后过了三天，就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一九三七年四月，经孔祥祯介绍，他和山西籍著名民主战士刘少白（抗战开始后经王若飞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秘密党员）的次女刘竞雄结婚。刘竞雄当时就担负起了掩护地下党工作的任务^②。

（三）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军队抗战不力，七月二十九日北平沦陷敌手。这时，作为北平地下党负责人的安子文，首先让市委机关和其他单位的同志撤退，然后自

^①蒋南翔谈话记录。

^②刘竞雄谈话记录。

己才离开北平，到天津爬上一列货车，途经德州、济南、徐州，又折向郑州，石家庄，辗转到达太原，向刚由平、津地区迁到太原的中共北方局报到。北方局把安子文留在组织部工作，很快又派他和几个同志去临汾建立后方，以便一旦太原失守之后，把北方局搬到那里。安子文在临汾县刘封镇找到办公地点后，又解决了生活供应中的许多棘手问题，为北方局迁到临汾准备了良好的条件^①。

还在太原失守前夕，曾经和安子文等一起坚持过狱中斗争的薄一波，遵照朱德总司令和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指示，通过统战关系，担任了山西省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兼保安司令，管辖沁县、沁源、安泽等十三县。不久，薄一波率领山西新军决死一纵队到达沁县（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公署所在地），准备在太岳山区创建一块抗日根据地。

为了完成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刘少奇特地找安子文谈话，让他随同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到沁县协助薄一波开展工作^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安子文和李成芳、刘竞雄等随同彭真从临汾出发，经过安泽、沁源到达沁县。根据工作需要，彭真在沁县筹建起党的太岳区工作委员会以后，便于十二月底转赴晋察冀区，留下安子文担任太岳区工委书记，领导白（圭）晋（城）路以西，同蒲路以东，平遥、介休以南，曲（沃）高（平）公路以北广大地区党的工作。从此，安子文就参加了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活动。

太岳抗日根据地创建之初，政治环境是相当复杂的。当

①② 《安子文自传》（1966年10月4日）。

时，太岳区没有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薄一波率领的决死一纵队和驻扎该区的国民党军队相比，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在装备方面都处于劣势；县、区、村政权还是阎锡山的旧班底；各种反动会道门都有一定的势力；加之日寇占领太原之后，在直取南同蒲路各县的同时，正准备进攻晋东南，以完成其对山西的占领。在这种形势下，怎样才能把广大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军队抗日和逐步改造阎锡山的旧政权，这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足够的谋略。

为了更加顺利地发展党的力量和开展党的活动，安子文将党的太岳工委挂上了八路军联络处的牌子。有了这个合法的名义，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它既可以在上层和国民党军队以及地方政权搞统战工作；又可以在基层发动群众；还可以保护受迫害、受摧残的群众，向国民党军队和阎锡山的旧政权进行政治斗争，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①。

一九三八年初，太岳工委正式归属中共晋冀豫省委领导，安子文任晋冀豫省委委员、统战部长，并继续兼任太岳工委书记。他根据晋冀豫省委二月会议精神，协助薄一波在太岳山区大抓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为了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战动员”热潮，他们从牺盟会和决死队中抽调了大批干部，组织民运工作队深入广大乡村，采取开会讲演、写标语、散传单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和民主政治、减租减息等革命主张，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支援抗战事业。经过

^①高扬文等：《太岳根据地创建时期的安子文同志》，1980年9月30日《山西日报》。

一段工作，不仅为抗日军队筹集了充足的粮款，而且随着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农民参军，决死一纵队充实了原有团队，又组建了新的团队，加强了战斗力。与此同时，民运工作队还常常同那些残害人民，压制抗日的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工作队在各地由下而上地建立了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和文教会等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使发动起来的群众有了组织上的依托。从此，太岳区“抗战动员”的热潮日趋高涨。这个时期，安子文还对阎锡山以及太岳区境内国民党驻军的高级将领冯钦哉、高桂滋、刘勤、武士敏等人进行了统战工作，力争团结尽量多的军队和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斗争。有一次，国民党一六九师挑起事端，把机关枪架到决死一纵队司令部门口，要“兵戎相见”。安子文闻讯后立即协助薄一波和武士敏师长谈判，晓以团结抗日的大义。在安子文和薄一波那种诚挚坦率态度的感召下，武士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此后，他一直和太岳军民并肩战斗，最后牺牲在对日作战的战场上^①。

一九三八年三月，朱德、彭德怀、和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经安泽、屯留，进驻沁县。安子文经常向他们请示和汇报工作，协助薄一波着力于进行统战工作和通过实行合理负担解决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掌握各级政权。为此，他和薄一波利用日寇准备进攻晋东南地区、阎锡山的旧政权处于土崩瓦解状态的有利时机，及时派遣共产党员去各地担任抗日的县长和区长。当时，有些共产党员认为县长、区长是反动政权的象征，他们宁愿到前线战死沙场，也不

^①史怀壁谈话记录。

愿到地方上去当“官”。针对这种认识，安子文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反复说明掌握政权的重要性，使这些同志愉快地背起背包上任。

正当太岳山区掀起“抗战动员”热潮，群众刚刚发动和组织起来的时候，日军集中了三万多兵力，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向太岳和太行发动了第一次“九路围攻”。企图消灭晋东南地区中国军队的主力，一举摧垮日益成长中的太岳和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安子文和薄一波按照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在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通过党政军系统和群众救国团体进行了反围攻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他们指示太岳各县在敌人来到之前，要以村为单位，举行群众大会，宣传进行反围攻斗争的重要意义；揭露日寇的欺骗伎俩和残酷暴行，并要组织好担架队、运输队；安排好粮食、蔬菜供应；肃清汉奸、捉拿奸细；破坏敌人交通，为部队带路、送情报等工作，以保证抗日军队在反围攻作战中能够行动自如，耳目灵通，后方支援及时。为了给进犯日军制造更多的困难，安子文和薄一波还指示各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实行“空室清野”，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一块肉，一滴水。由于地方上做了充分的支前准备工作，八路军、决死队和部分爱国的国民党军队经过二十多天的奋战，歼敌四千多人，收复了晋东南的十八座县城，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

一九三八年六月，安子文出席了中共晋冀豫省委在沁县古城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朱德、彭德怀的参加指导下，经过二十多天的讨论，通过了《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的决定》（即“六月决定”），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党的任务主要是发展党员与开展群众工作；统一群众运动和基本武装；

确立党在抗日根据地各个工作部门中的领导地位；转变工作方式和健全党的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取各项工作取得成绩，把晋冀豫边区建设成为坚强巩固的根据地。

按照“六月决定”，安子文在太岳区狠抓了党的建设。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时，太岳区已先后建立了沁县、沁源、长子、屯留、平遥五个县委，还建立了安泽和介休两个县的领导机关，对浮山也建立了党的领导关系。全区建立了二百六十多个党支部，共有党员三千八百四十人^①。这时，太岳工委奉命改称太岳特委，仍以安子文为特委书记。

为了进一步提高党员的质量，太岳特委还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开办了党校，培养和训练党的基层干部；党的各级组织也普遍地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方针政策，从而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和党的战斗力，使各地党组织在进行减租减息、春荒“借粮”、实行合理负担的斗争中；在为八路军、决死队和其他抗日军队筹粮筹款、扩大军队、建立地方武装、对付敌人残酷“扫荡”等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一月，太岳特委又改称太岳地委，仍由安子文担任地委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太岳地委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和贯彻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安子文在活动分子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使党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任务，党组织就应该在巩固中求发展，把巩固与教育、整顿和建设党的组织，当作今后的主要任务。他还强调，要不断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

^①太岳特委组织部 1938 年 11 月工作报告。原件存山西省档案馆。

为此，他要求做政权工作的党员应该注意民主改革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要整顿和改造地方武装，加强文化教育工作；做群众工作的党员应该巩固和扩大各种群众团体，动员群众积极参战。活动分子会议之后，太岳区掀起了学习和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使全区的党组织遵循党的正确路线，更加巩固和健康地向前发展。

一九三九年七月，日本侵略者集中重兵，对太岳和太行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这时候，太岳和太行区的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打到敌人的占领区，开展交通破击战；太岳各县在以安子文为首的太岳地委领导下，成立了战时指挥部，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他们利用境内七沟八岭的险要地势，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反“围攻”斗争，终于迫使敌人退出了根据地。但是，由于日军在第二次“九路围攻”中占据了白晋路沿线包括沁县县城在内的所有城镇，打通了白晋路，把太岳和太行割裂为二。安子文和薄一波率领太岳地委和决死一纵队领导机关由沁县转移到沁源。从此，沁源就成了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中心。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投降逆流愈演愈烈。山西的局势更加紧张。当时，阎锡山在秋林会议之后大造反共舆论，采取反共措施，妄图把薄一波等共产党员领导的山西新军和牺盟会消灭掉。面对日益严重的形势，山西各地的党组织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开始了粉碎反共投降逆流的斗争。在太岳区，薄一波几次主持召开了决死一纵队和第三行政区的干部会议，部署和落实应付突然事变，实行自卫反击的各项措施。安子文除了协助薄一波的工作之外，还于十一月间主持召开了太岳地区党的代表大会。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

“发动广泛持久的反投降运动”，使广大群众都了解当时的形势，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反对和彻底粉碎反共投降逆流。会后，安子文又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进一步部署了开展反逆流斗争的各项工作。在地区党代会和活动分子会议的推动下，太岳各地党组织纷纷发动群众举行各种集会，谴责、声讨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共投降活动。同时还广泛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清除了包括决死一纵队纵队长梁述哉在内的阎锡山的旧军官，并积极进行除奸和禁毒活动。由于安子文和薄一波领导太岳军民做了以上防变的准备工作，所以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时，尽管太岳区境内也有一些反共顽固分子蠢蠢欲动，但抗日政权和抗日军队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太岳抗日根据地一直巍然屹立。

一九四〇年一月，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派遣陈赓率领八路军三八六旅开进太岳区，参加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这时，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决定，太岳地委升格为太岳区党委，仍以安子文为书记。薄一波和陈赓也参加了区党委的领导工作。区党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第一次整党运动，清除了一批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处理了一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纯洁了党的组织，使全党同志受到了一次极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一九四〇年秋冬，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严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日军在“百团大战”结束后，对太岳区进行了残绝人寰的“扫荡”，使成千的村镇化为焦土，数以万计的抗日群众惨遭杀害。一时间，群众情绪低落，军需民食，居住条件，无不成为严重问题。

面对这一现实，安子文严肃地指出：“我们对敌人的‘三

光’政策估计不足，斗争不得法，是造成这次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①。他认为要保卫和巩固根据地，就必须狠抓武装建设，不但要扩大正规部队，而且要广泛地建立民兵和自卫队。

开始时，有些人觉得，在日军全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面前，民兵和自卫队的土制武器是没有什么作战能力的，因而对组织群众武装信心不足。为了用现实例子教育干部和群众，安子文把沁源县绵上村民兵药彦明空手杀敌夺枪的英雄事迹作为典型；广泛地进行宣传。他亲自为《太岳日报》写了关于开展学习药彦明杀敌立功运动的文章，告诉大家在敌人血与火的烧杀中，只有象药彦明那样下定“拼死命、换活命”的决心，通过英勇斗争，才能克敌制胜。他还指示报纸对药彦明的事迹要用连环画等形式进行多样化的宣传。同时，他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奖给药彦明一支手枪。在太岳区参议会上，他再一次讲了开展药彦明运动的意义^②。药彦明这面群众武装斗争的旗帜，鼓舞了太岳区的广大群众。此后，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自动报名当民兵。他们以石雷和刀矛土枪为武器，为保卫家乡、保卫根据地勇敢杀敌。与此同时，在安子文和薄一波、陈赓的领导下，太岳各地对被敌人杀害的群众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悼念；对遭受劫难的群众多方进行慰问；用召开军民誓约大会的办法向群众进行民族气节和坚持对敌斗争的教育，还发动党政民干部捐款捐粮，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很快激发了广大群众杀敌复仇的斗志，克服了因敌人烧杀而造成的消极悲观情绪，纷纷投入新的斗争。

^{①②}高扬文等：《太岳根据地创建时期的安子文同志》。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和水旱灾害的严重袭击，太岳区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安子文和薄一波、陈赓等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北方局制定的政策，在群众中大力提倡生产救灾和互助互济，领导全区人民，用实行减租减息、建立“三三制”政权、优待军烈属以及精兵简政和节衣缩食的措施来渡过难关。那个时候，安子文和普通干部一样，有时每天只吃十一、二两粮（十六两一斤的旧秤），反“扫荡”战争时往往白水煮野菜，很少有肉食。紧张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使他的身体日益虚弱和消瘦。他爱人刘竞雄得知这一情况，在延安变卖了自己战前从家中带出来的衣服、首饰、毛毯等物，将所得四千元边币托人捎给安子文，让他买点补养身体的食物。但安子文接到钱后，除留下一小部分交给机关供大家改善伙食外，其余的钱全部交了党费^①。随着日军的“扫荡”和蚕食，太岳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不仅边沿地区大都被敌人“吃掉”，根据地的腹心也安上了敌人的据点。敌人采取高压手段，强迫老百姓组织“维持会”。在这种形势下，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能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安子文和高扬文等同志深入到沁县等地的许多游击区村庄进行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在敌占区和游击区，采取符合当时敌我斗争形势的“两面政权”的策略。这个策略的生动解释是：当日军威胁群众成立“维持会”的时候，群众开始只是口头答应，而实际不予“维持”。这叫“拖延”。一拖再拖，实在不能再拖延时，就勉强应付地“维持”起来。这叫“从拖延到维持”。在日军误认为群众已经成了“良民”的时候，就再开始拖延，

^①刘竞雄谈话记录。

该送的东西不送，该办的事情不办。这叫“从维持到拖延”。当日军逼得紧了，就应付式的送几个鸡蛋，几斤食油，或者干脆挑个空担子去，说送的东西被八路军“劫”走了。这叫“拖延中有‘维持’，‘维持’中有拖延”。如此敷衍，虚与周旋，一旦时机成熟，就立刻把日军的据点连根拔除。安子文提出这些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对敌斗争策略，不仅很容易为群众接受，而且实行起来大见成效，因此得到了北方局领导同志的赞赏^①。刘少奇赴延安途经太岳区时，在听取了汇报后，明确地指出：“这种两面政策，实际上就是使用合法的形式向敌人进行斗争。合法斗争即两面政策，两个术语的含义是相同的。”^②

为了粉碎日军的残酷“扫荡”，安子文和薄一波、陈赓等一起，不断地总结反“扫荡”斗争的经验。他们根据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愈来愈有效地组织和指挥全区军民进行反“扫荡”斗争。一九四一年日军进行秋季“扫荡”时，把太岳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十六团、十七团、二十五团、五十九团都包围在马森以北，程璧以南的大林区。形势十分危急。当搜山敌人搜索到离安子文和薄一波、李聚奎、周仲英等隐蔽处只有十几丈远的山梁上时，隐蔽在附近的一匹战马突然惊叫起来。饲养员为了保护安子文和其他首长的安全，毅然跳出隐蔽区，追着马向前疾跑，把搜山的敌人吸引过去。尽管情况如此紧急，但安子文和薄一波等仍然镇定自若，凭着地形和敌人血战两昼夜，然后把部队化整为零，乘着黑夜从敌人的缝隙处突围出

^①高扬文等：《太岳根据地创建时期的安子文同志》。

^②刘少奇1942年12月致薄一波、陈赓、安子文的信，原件存王光美处。

去^①。在敌人的又一次“扫荡”中，安子文和高扬文，郭钦安等太岳区党委的同志从沁源阎寨向外转移，与大队日军在沁源县阳泉村遭遇。安子文沉着指挥大家利用地形迂回撤退，终于化险为夷^②。后来，安子文和太岳区的其他领导同志通过总结经验，改变了过去领导机关在敌人扫荡时用主力掩护、到山区隐蔽的办法，采取区党委机关和薄一波、陈赓等指挥的主力部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游击战术，袭击敌人的补给线，摧垮敌人的据点和碉堡，消灭留守的敌人，迫使“扫荡”根据地的敌人退兵回援，从而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军的所谓“铁壁合围”、“分进合击”，以及“铁滚”、“篦梳”等各种形式的“扫荡”，使太岳根据地的形势不断好转。

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太岳区和其它各个抗日根据地一样，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安子文对整风运动非常重视。他根据毛泽东的整风报告和太岳区党的实际情况，于四月二十七日在《太岳日报》上发表了《改造我们的作风》一文。这篇文章列举了“三风”在太岳区的种种表现，批评了一些同志对整风运动存在的模糊认识，号召广大党员和干部对整风文件要“细嚼烂咽，化为血肉，并与检查自己各方面的工作结成一气，真正地掌握这个改造工作、改造自己的武器。”五月四日，薄一波在太岳各界三千余人举行的集会上，也发表演说，号召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七月，在安子文的主持下，太岳区党委制定了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并

①周仲英谈话记录和安子文病中谈话笔录。

②郭钦安谈话记录。

在各系统的各级干部中进行了思想动员。从八月开始，整风运动就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了。

安子文在太岳区还和薄一波、陈赓等一起直接领导和指挥了名震中外的“沁源围困战”。沁源地处太岳根据地的腹心。日军几次试图侵占沁源县城，但都被太岳军民赶出去了。一九四二年十月，日军分兵七路“扫荡”太岳区，又一次占领了沁源县城，并且扬言说他们不走了，要在这里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安子文和薄一波、陈赓等分析了沁源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的状况，认为共产党在沁源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有战斗力很强的正规部队，加上沁源境内沟多山多，具备坚持对敌斗争的有利条件。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决定，沁源的对敌斗争要采取“围困战”的战术，要断其路、绝其粮，强迫敌人撤走。

在安子文和薄一波、陈赓等的决策下，沁源县成立了围困指挥部，以八路军蔡爱卿团的参谋长李懋之为总指挥，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为政委。他们把沁源县城和“二沁”（沁县至沁源）大道两旁二十三个村镇的居民有组织地疏散到群山之中，造成了一个长约百里，横宽十里，面积共约千余平方里的困敌区。在这个地区，群众把粮食统统坚壁起来，猪羊牲畜全部转移，水井中填进污物，使敌人吃饭喝水都十分困难。而转移在附近山沟里的群众，白天隐蔽起来对付搜山的敌人，晚上组织起来到县城和敌人占领的据点里去劫取资财，抢种抢收。当地的民兵、游击队，则在蔡爱卿团的配合下，巧布地雷阵，冷枪袭扰，常常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他们还掩护群众不断地破袭敌人的交通运输，隔断沁源敌人和外界联系。就这样，沁源的八万军民把敌人围困了两年半，终于迫使敌人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从

沁源撤走了^①。

围困沁源的过程中，安子文和薄一波等对转移到山沟里的群众极其关心。他们曾多次指示沁源县委要认真安排好群众的生活，想法设法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和居住问题。安子文还多次深入到疏散群众的山沟了解情况，挨家慰问。他要求太岳区的党政军民工作人员，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来支援沁源群众。这就更加密切了干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坚定了群众围困斗争的信心^②。

一九四三年春，安子文奉调离开太岳区，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他向党中央汇报了太岳军民开展对敌斗争的情况，并把《太岳日报》社副社长董谦（江横）写的许多围困沁源的通讯交给《解放日报》陆续发表，使“沁源围困战”这一斗争奇迹传遍全国^③。

（四）

安子文从太岳区回到延安，因病在杨家岭休息了两三个月，便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一九四三年七月担任了中央党校二部的副主任，协助张鼎丞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党校二部的学员绝大部分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县、团级干部。这些学员入学时，康生搞的那个“抢救运动”正在延安的许多机关单位推行。安子文和张鼎丞等二部领导同志一起，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二部学员的政治状况，决定在二部不搞“抢救

①刘开基：《围困沁源》，载1965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董谦：《没有人民的世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③高扬文等《太岳根据地创建时期的安子文同学》。

运动”，对需要审查的少数学员在政治上、生活上也一视同仁，不但不歧视、打击，还鼓励他们积极地配合组织把问题搞清楚。后来的事实证明，党校二部的审干工作、完全符合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方针^①。

党校二部学员开始整风的时候，安子文在动员报告中要求各支部要把启发自觉，弄通思想，提高认识，改造作风，作为主要措施。为了搞好整风，安子文和张鼎丞采取多种办法，引导学员从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整风文件的精神实质入手，进而联系实际检查思想，检查工作，总结历史教训；先做个人思想、工作和历史的检查，再作对所在地区和工作部门的检查，然后发展到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研究党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安子文等二部领导同志特别强调要造成“实事求是”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气氛，让学员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养成敢于独立思考的好习惯^②。

在整风过程中，安子文和张鼎丞等二部领导同志，坚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用说服的办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去解决党内矛盾；即使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学员，也要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掌握分寸，留有余地，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十七支部有个学员，过去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犯过严重错误，进入党校后又对支部领导散布不满情绪，给支部领导列出所谓“十大罪状”。安子文知道这件事情后，指示支部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这个

①张文豹：《关于安子文同志革命一生的一些回忆》。和牛书声、刘佩荣、白伶谈话记录。

②崔毅田谈话记录。

学员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后来这个学员终于转变了认识，站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了^①。二部的广大学员，由于整风中思想问题解决得好，后来都精神振奋地奔赴各个战斗岗位，为党为革命做出了许多贡献。

一九四五年四月，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安子文是这次党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在这次大会上，张鼎丞作了《关于整风问题》的发言。这个发言稿是张鼎丞和安子文以及其他一些同志通过共同讨论后写成的。它不但概括地叙述了全党整风的意义和经验，而且也着重介绍了党校二部的整风经验。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毛泽东提名，安子文担任了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于八月十七日去组织部报到上班。一个月后，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被派往东北工作，于是安子文主持了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直接受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领导。从这个时候起，安子文除一度担任过中央党校教育长外，一直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二十一年。

安子文初到中央组织部，就接受了选拔干部随同主力部队去东北开展工作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安子文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开会做动员报告，有时找干部谈话，并想方设法地解决调派到东北工作的干部的实际困难。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和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们一起圆满地完成了调派两万名干部赴东北工作的任务^②。

安子文和中央组织部还按照中央指示，选派了一批干部去

①牛书声、刘佩荣、白伶谈话记录。

②王甫、帅孟奇、廖志高谈话记录。

国民党统治区域做党的地下工作，以加强党在那里的领导力量。它为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开辟第二条战线创造了条件^①。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进犯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继续留在陕北领导全国解放战争，同时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安子文被任命为中央工委的秘书长。他随同刘少奇和朱德离开陕北，经过晋西北到达河北省建屏县（解放后并入平山县）西柏坡一带。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接着，陈赓率领太岳兵团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越过陇海铁路，进入豫皖苏地区。三支野战大军在江淮河汉地区摆开了战场，解放了愈来愈多的城市和农村。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去接收新开辟的解放区，建立各级政权，开展群众工作。这个选调干部的任务又一次落在了安子文的肩上。他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和华北各解放区的组织部门一起，很短的时间内就先后派遣了五万名干部南下到新区工作。

在革命战争猛烈地向前发展的同时，各个解放区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为了取得指导全国土改和整党的实际经验，中央工委和刘少奇决定由安子文负责，组织两个以中央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土改整党工作团，分别在平山、建屏两县开展土改和整党工作。安子文也亲自参加了建屏县南庄村的土改整党工作。土改初期，建屏和平山都一度出现过乱斗乱打的“左”倾偏向。安子文把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刘少

^①王甫、帅孟奇、李楚离谈话记录。

奇作了汇报，使中央工委及时地采取了纠偏措施。后来，安子文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建屏县委书记钱俊瑞一起向中央工委提出了采取“抽补调剂”的办法来分配土地的建议^①。实践证明，这种办法是完全正确的。

建屏县和平山县开始整党时也采取过“搬石头”的错误做法，把凡是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一律撤换斗争，有些地方甚至把凡是有错误缺点的干部也都“搬”掉了。这就严重地伤害和打击了一大批干部。安子文和冯文彬、钱俊瑞、王甫等向刘少奇汇报了这种情况。中央工委根据建屏、平山以及其它地区的情况，经过研究决定，整党中对于不能在当地工作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采取“回避”的办法，调到其它地区继续工作，对于犯了错误还可以教育的党员干部，都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团结教育方针^②，使整党工作健康地向前发展。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安子文作为中央工委的秘书长，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筹备和会务工作。他还和钱俊瑞等一起起草了在土地会议上介绍建屏县土改经验的报告。这个报告着重介绍了建屏土改中采用“抽补调剂”的办法分配土地的经验。平山县也在土地会议上介绍了整党经验^③。这些经验对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和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培养大批思想进步又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干部。安子文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在城南庄成立了干部训练班，对刚刚吸收进革命队伍的石家庄、保定一带的进步知识

①②③钱俊瑞谈话记录。

分子，进行短期思想教育和理论教育后，派赴各地补充了干部队伍。不久，中央又决定让安子文主持筹办华北大学，作为培养革命干部的高等学府。华北大学很快在河北正定创办，以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为副校长，钱俊瑞为教务长，很短的时间内就培养和造就了数以万计的干部，为支援新解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作出了贡献^①。

一九四九年三月，安子文列席了党中央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安子文随党中央机关进入北平。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他和中央组织部的其他同志一起，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九月二十一日，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初期，安子文在担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部长仍由彭真兼任）的同时，还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副书记（朱德为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和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委员。国家初创，百废待兴，安子文的工作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安子文主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分别是党中央和政务院管理干部的办事机关。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干部调动和人事安排，都要由他提出初步意见。他熟悉的干部“成千上万”，并对党的重要骨干的历史和现状、长处和短处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详细的分析，真可谓是一部“干部活档案”。有一次，周恩来总理要求安子文推荐一个干部担任一项重要职务，安子文不加思索地一口气说出十几个备选干部的名字，并简要地介绍了他们的情况。当周恩来选准其中一个干

^①钱俊瑞谈话记录。

部时，安子文又重新介绍了这位同志的长处和短处。对安子文能够如此地熟悉干部的情况，周恩来曾赞叹不已^①。

安子文调配干部始终贯彻党的任人为贤的干部路线，把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作为检验干部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他常常强调“在党内一定要有正常的政治生活，上上下下都要讲真话”^②，这就使他能够较多地掌握真实情况，果断准确地处理问题。“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使他有根有据地向党中央反映了许多关于群众生活疾苦的极其重要的事实真相，也使它能够较快地发现和改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③。

安子文对干部是十分爱护的。他指示组织部门妥善安排那些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老同志。他提出，这些老同志凡能工作的可以分配适当工作；失去工作能力的干脆养起来，切实地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有一次，中央组织部准备调派一个老同志到南方的一所大学里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当安子文登门征求意见时，这位老同志表示服从组织调动。可是他又从侧面了解到这位老同志正患着慢性病，不宜在南方工作，便取消了原议。事后，安子文对主管调配干部的同志说：“调配干部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对于干部本身来讲是应该要求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的，但组织部门也要尽量考虑到干部的实际情况，照顾干部的实际情况，照顾干部的实际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干部体会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④

安子文是反对求全责备干部的。他在一次会议上曾经说

①帅孟奇、王甫、李楚离谈话记录。

②③胡耀邦在安子文追悼会上的悼词，载1980年7月13日《人民日报》。

④乔明甫谈话记录。

过：“考察干部不能搞形而上学。一个人不能不犯错误，其实我们每天都会说错话，做错事。拿个日记本，把每天的错话、错事记下来，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如果把三百六十五天的错误都集中起来，那么任何一个干部都会被搞成反革命。这就叫一棍子打死。”^①他主张考察干部要看主流，看基本的方面，即使是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也要给他们留下改正错误的机会。在他的领导下，中央组织部和人事部成了“党员的家”、“干部的家”。

为了搞好执政党的建设，安子文和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们一起分析了建国初期党的状况，于一九五〇年三月向党中央提出了召开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的建议。中央批准后，安子文主持中央组织部开了两次预备会议，对党的建设方面的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酝酿和讨论。一九五一年三月，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正式召开。会议决定在对全体党员进行党员标准教育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会后，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整党在全国逐步开展。

一九五二年初，“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安子文担任中央“三反”、“五反”运动办公室主任。在北京市召开的“三反”运动动员大会上，安子文作了动员报告。此后，党中央决定“三反”运动和整党结合进行，要求按照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各级党组织对所属干部进行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大胆地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级领

^①转引自安黎等：《须待历史证明的话》，载1980年7月18日《人民日报》。

导岗位上来。根据党中央的要求，中央组织部在安子文的主持下成立写作班子，编印了大批整党文件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小册子。同时，他还常常深入到各机关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整党运动中的新动向、新问题^①。一九五三年一月十日，安子文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学习会上作了《为消除党组织内的消极的不健康的现象而斗争》的报告^②。他在报告中首先肯定了党内积极的健康的因素是基本的、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事实；接着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党组织内的消极的和 unhealthy 的现象：第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还没有充分展开，还存在着压制批评的现象；第二，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特别是不反映工作中的缺点，“报喜不报忧”的现象还很严重；第三，在选拔干部上存在着“资格论”和“任人唯亲”的现象；第四，在很多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作风，在党和政府的下层组织中，普遍存在着强迫命令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等。为了清除党组织内的这些消极的不健康的现象，安子文在报告中提出了六条办法：进行教育；开展批评；严肃党的纪律；改善干部工作方法；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的思想工作。这个报告经毛泽东批示印成小册子发行全国，对整顿党的作风起了很大作用。

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党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制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问题。会议期间，高岗和饶漱石开始了分裂党的活动。他们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使会议一度不

①李楚离、王甫、帅孟奇谈话记录。

②该报告人民出版社 1953 年 3 月出版单行本公开发行。

能按中央原定方针进行。当时，安子文和高、饶都是会议的中心小组成员，饶漱石曾向安子文施加压力，逼着他在会议上发言，说什么“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①面对高、饶挑起的这场斗争，安子文一面向中央组织部副处长以上的干部们打招呼，要大家注意看财经工作会议的文件和简报；另一方面，鉴于有人在会议上指名道姓地提出中央对某些干部使用不当的意见，就让自己的秘书韩劲草调阅这些干部的档案，准备材料，以供党中央领导同志了解情况。他在会上会下，都没有说过一句对党的团结不利的话；也没有做过一件有损于党的团结的事，坚决地抵制了饶漱石对他施加的压力。

一九五三年九月，在党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积极支持高岗，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这时，中央已经开始着手解决他们的问题。为了让中央掌握更多的情况，安子文在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后的日子里，把许多知情同志揭发高、饶的材料及时地报告了党中央。后来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胜利地粉碎了高、饶反党阴谋，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

粉碎高、饶反党阴谋之后，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仍然主持组织部的日常工作。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安子文又按照中央指示，选调优秀干部加强工业战线。在他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努力下，中央组织部前后向工业战线输送了十六万名干部，

^①韩劲草：《悼念党的组织活动家安子文同志》（打印稿）。

其中为一百六十五项重点工程输送的领导干部就有三千多名^①。这就为完成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创造了干部条件。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还选调了一大批干部加强文教战线，对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的中央组织部有一百多个干部，安子文对他们的情况都很熟悉。他关心干部的工作，也关心干部的生活，甚至连干部食堂的饭菜做得怎样，他也要亲自去尝一尝。工余时间他有时和干部们在一起谈心，有时和干部们在一起打排球，平易近人，没有一点部长的架子。干部们都把他看做知心人，心里话都敢向他讲。整个中央组织部上上下下亲密无间，团结战斗，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

（五）

一九五六年九月，安子文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冬，安子文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

安子文就任组织部长之后，曾在一次部务会议上表扬了副部长乔明甫把组织工作做到干部家门上的好作风。号召大家都要广泛地接触干部。他说，各部委有什么事情，我们要主动找上门去谈谈。不要老是坐在办公室里等着人家来找，不要把组织部办成“官衙门”。

其实，乔明甫那种能够广泛接触干部的作风，正是从安子

^①李楚离等：《学习安子文同志的坚强党性》，载1983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

文的身上学来的。还在乔明甫初到组织部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安子文的办公室里看到打来的电话很多，找安子文的人也很多，简直忙不过来。于是就向安子文建议：把电话接到秘书办公的地方，谁有什么事可先和秘书联系，讲明要谈什么问题，需要谈多长时间，然后逐个安排接见。安子文不同意这样做。他对乔明甫说：“干部们来电话或者亲自来谈问题，在他看来总认为是必须找组织部长才能解决的重要事情。有的人说话罗嗦一些，本来是十分钟就能够谈清的问题，他要讲半小时。但如果限制了时间，他就会拘谨起来，不能畅所欲言了。我们对干部采取什么态度，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对组织部的影响问题。我们决不能把自己同干部隔离开。”^①这番话使乔明甫很受启发。在平时的接触中，乔明甫还看到，安子文对于所有的来访者都热情接待，没有一点官架子；每逢全省的省委书记来北京开会，安子文总要利用会议的空隙，一个一个地去访问，征询他们对人事安排方面的意见和要求，了解下边干部的情况，使许多问题得到了及时的解决。乔明甫学着安子文的样子来做干部工作，不但掌握了干部中间的思想情况和存在的实际困难，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在他们和部领导全体成员的带动下，整个组织部门的工作作风都有了很大的改进。

安子文十分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一九五六年一月他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专门作了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报告，其后又主持制定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计划，要求各级党委要提高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采取切实措施，从

^①乔明甫谈话记录。

思想上和工作上克服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好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①。一九五七年前后，许多长期以来一直为党的事业而勤勤恳恳地奋斗的知识界知名人士，如李四光、李德全、钱学森、钱伟长等，都由中央组织部请示党中央批准，光荣地参加了党的组织^②。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也吸收了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入党。这不仅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而且加强了党在知识分子中的领导作用。对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安子文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一直把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作为党的一项战略任务来抓。一九六三年上半年，他派赵汉副部长到一些省市调查领导班子情况，发现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领导干部年龄较大，本地干部所占比例较小。安子文根据赵汉的汇报和他本人了解到的情况，进一步组织干部对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的情况作调查，向中央写了报告。经中央书记处讨论批准后，安子文又主持召开了两次会议，研究和讨论了大量培养、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要求和措施。他提出，为了大胆地、积极地、破格提拔优秀年轻干部，就必须用革命精神打破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要选择几个标兵，做个桥梁，说服那些想不通的同志”^③。为此，安子文先从中央组织部做起，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把两个较年轻的干部提拔为副部长；把另外几个青年干部提拔为处长、副处长。在他的提议下，中央组织部还决定每年选拔一百名左右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由中组部管理，先下放到基层锻炼，然后把他们充

①③李楚离等：《学习安子文同志的坚强党性》。

②乔明甫、王甫谈话记录。

实到干部队伍中，担任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职务，以此逐渐改变领导干部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使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①。此外，安子文还提出要采取“干部交流”的办法来培养干部，把在上级机关工作的干部派到下级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同时也常把在下边搞实际工作的干部抽调上来担负上级机关的工作，如此反复对流，促使干部尽快地成熟起来。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安子文深深感到只有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才能把工作搞好。因此，他十分重视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一九六四年春天，他响应党中央关于读书的号召，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到中央党校当学生。在那里，他拜杨献珍、艾思奇等为老师，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直到“四清”运动开始后，他才离开了党校。

安子文特别重视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平时在家中，他可以和孩子们开心地说笑蹦跳，却绝对禁止孩子们走近他的办公桌、翻动他的文件和材料，也从来不允许家属亲友打听他们不应该知道的事情。他经常教育孩子：不该知道的事就不要去知道，偶而知道了的事，也不要出去随便乱讲。并嘱咐他爱人刘竞雄，在他打电话或者有客人来谈话时，一定要让孩子们躲远一点。就是刘竞雄本人，几十年来也很自然地养成了一种习惯，当看到有人来和安子文谈工作问题时，就主动地离开了。她从来不向安子文打听属于组织部工作方面的事情^②。在生活方面，安子文一直保持着延安时期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从没有要求过什么特殊照顾。他不赞成干部给领导同志送礼品，自

①帅孟奇、李楚离、王甫谈话记录。

②刘竞雄谈话记录。

己也不愿意接受别人送给他的礼品。即使是很熟悉的老战友替他买了东西，也一定要让刘竞雄付钱。安子文的专用汽车，家里人是不能随便坐上办私事的。就连眼睛高度近视的刘竞雄要单独外出看病，除非万不得已，也是去挤公共汽车的。安子文严守纪律，严以律己，严格要求亲属子女的模范行动，受到了周围同志的尊敬，毛泽东也多次赞扬他很能“克己”^①。

（六）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安子文就被“罢官”、“监护”批斗。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直接策划的迫害安子文的活动，接踵而至。一九六六年九月康生在安子文专案组成立会上曾说：安子文“这个人起码是叛徒、黑帮、特嫌”。接着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安子文对于康生一伙的恶毒诬蔑义愤填膺。他对专案人员说：“在狱中，无论是敌人的严刑拷打或是利诱，我从未叛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是服从组织纪律，执行中央决定出狱的。这是符合我们党历来的纪律原则的。”“我出狱后，向各级组织多次作了报告，从未隐瞒。”^②

一九六七年四月，江青、康生发现把刘少奇打成叛徒的材料不足，就急忙派专案人员找安子文谈话，说：“现在有件头等功等着你，只要你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马上就可以去钓鱼

①安子文在淮南期间给安国的信。

②转引自熊怀济：《天地有正气》。

台和中央首长（指康生）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安子文轻蔑地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二十一年，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说过，也没有从任何材料中看到过刘少奇有叛变行为。”他还幽默地说：“钓鱼台我去过，红旗车我坐过，我现在不想去钓鱼台，也不想见康生。”^①

康生一伙恼羞成怒，要给安子文增加罪名。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生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人员大会上煽动说：“安子文不仅仅是个叛徒，安子文手里有电台^②。”“他是不是利用组织部长职务进行现行特务活动？”就这样，康生又制造了一起所谓“特务电台发报案”，将安子文打成了“特务”，并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将安子文正式逮捕，带上手拷投进了秦城监狱。这样做了以后康生一伙仍不罢休，他们又造谣说一九五五年刘少奇曾指使安子文秘密销毁了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档案。于是，一个纯系凭空制造的“销毁敌伪档案”的罪名又加到了安子文的头上。面对严酷迫害，安子文始终坚贞不屈。在一次由专案组布置的追问“销毁敌伪档案”的群众大会上，他一连喊出了十八个“没有”^③。

安子文被投进秦城监狱以后，备受摧残虐待，被打掉了两颗牙齿，但从未讲过一句违心的话，面对手提镣铐的暴徒，他冷笑着说：“军阀和国民党的刑具我见过，敌人的监狱我住过四次。手铐脚镣你们给我戴吧。可手拷脚镣对我是不起作用

①安黎等：《需待历史证明的话》和刘竞雄谈话记录。

②彭真于全国解放前夕的1948年曾送给安子文一部英制旧电台收听新闻广播。这部电台经总参技术部门检查根本不能发报。

③中组部《关于“销毁敌伪档案”和“特务电台发报”两个案件的调查报告》。

的，不给我戴手铐脚镣我这样讲，给我戴手铐脚镣我还是这样讲。”^①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宁折不弯的品格，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江青一伙把安子文赶出北京，“下放”到安徽省淮南市。

安子文一到淮南，就和当地人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以小学生的姿态倾听人民的教诲，虚心向人民学习，主动地为人民办好事。同时也时刻惦记着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遭遇和他熟悉的成千上万的干部。有一次他听到了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消息，禁不住痛哭失声。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总理逝世，这使安子文万分悲痛，曾数日不思饮食。他不顾江青“四人帮”的禁令，和大儿子安民一起，一次又一次地参加当地群众自动组织的追悼仪式。粉碎“四人帮”后，每逢获悉某一个他熟悉的干部恢复了工作，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所谓“六十一人案”、“销毁敌伪档案案”和“特务电台发报案”等重大错假、冤案予以彻底平反，并为一九六六年前的中央组织部彻底平反和恢复名誉。这样，就把康生、江青一伙强加在安子文头上的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顶帽子全部推倒，安子文终于获得了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安子文接到党中央要他回北京等候分配工作的通知。回到北京后，他对前来探望他的干部

^①王光美：《时穷节乃现，正气万古存》，载1980年7月14日《工人日报》。

说：“我还要为党做十年工作，要活到八十岁。”^①不久，安子文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

安子文一到中央党校，就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七点二十分去上班，八点准时开始工作。他深深感到：“自己十多年没有工作了，必须加紧工作，才能了解和熟悉新老干部的思想状况^②。为此，他常常深入到师生员工中去谈心。后来，每天晚上和节假日找他谈话的人越来越多了。紧张的工作，使他感到疲劳，但他却以自己能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多做些工作，感到心情十分愉快。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安子文兴致勃勃地和中央党校的同志们一起植树。由于受了风寒，第二天病倒了。长期遭受折磨潜藏在体内的各种疾病一齐爆发，低烧、肝脓疡、肾病，最后又发现了癌症。

在身患不治之症后，安子文仍然以惊人的毅力，继续进行着对党有益的工作。

一九八〇年二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夕，安子文在病情越来越严重、说话与活动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认真准备了提交五中全会的书面发言稿。他在发言稿中指出：“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党正面临着重新改造自己的任务”。“我认为党的十二大在党的建设方面，需要着重研究两个问题：一、防止林彪、康生“四人帮”事件的重演。二、把我们党建设成

^①刘尹楠谈话记录。

^②安黎等：《须待历史证明的话》。

为真正有能力领导群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党”。“在接班人问题上，过去有过深刻的教训。经验反复证明：对于敢于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的干部，一定要重视和爱护；而对那些大赞大颂、加码加番、爱抬轿子、看风使舵、搞政治投机的人，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万万不能重用。挑选接班人必须立党为公，不能徇私，更不得结帮营私。我们的老同志，要以高度的责任心，为党认真物色和负责推荐确实优秀的干部。该交班时主动交班，能交班时及时交班。……，看到年富力强的好干部把担子挑起来了，就是看到了党的事业在前进、在发展，也就等于亲眼看到了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后，安子文认真地学习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时他已经不能亲自动笔写文章了。但出于对革命事业负责的心情，他用口授的办法写了一篇《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心得》。这篇文章对《准则》作了精辟的论述，是全党学习《准则》时的一篇重要参考文件。《人民日报》在《准则》发表的第二天，就用“发表谈话”的形式，摘要刊登了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

四月，安子文又勉力完成了一篇纪念刘少奇的文章，题为《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文章通过对刘少奇一系列建党活动的追忆，结合学习刘少奇写的《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的一封信》、《论共产党员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等各篇著作的心得体会，论述了刘少奇建党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少奇同志所深刻阐明和坚决维护的建党原则，是他留给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份珍贵遗产。我们纪念少奇同志，就有责任坚持党的领导，把我们的党建设好。”

五月下旬，安子文病情恶化。他以断断续续的词语，口述

了一封给党中央的信，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建议，其中有一条是建议把靠造反起家钻进中央领导岗位的人清除出去。口述完毕后，他以最大的毅力，用左手托住已经近乎完全萎缩的右臂，在信末尾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写的三个字：“安子文”。向党中央交出了又一份优秀的答卷。

此后不久，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探望安子文。他向胡耀邦建议说：“一定要为党的十二大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一定要对林彪、‘四人帮’的遗毒保持高度的警惕。”^①他请求党中央不要再考虑他为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说：“应该把自己的位置腾出来，让真正优秀可靠的、能够为党作更多工作的、年轻一些的同志来担任党的中央委员。”^②

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去看望安子文。他又恳切地对彭真说：“要教育干部，多做实事，少说空话，要加强对高级干部的管理、教育和监督。”^③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安子文病逝于北京。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二日，党中央在北京隆重举行了安子文的追悼大会。胡耀邦在悼词中指出：“安子文同志的七十年岁月中，有五十五年是我们党的事业连在一起的。他是我们党杰出的组织活动家。”^④这是党中央对安子文一生的恰当评价。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有：

1.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安子文同志平反的报告》。
2. 安子文：《接受教训，增强党性》（1957年9月11日《人民日报》）；《我的一段经历》（《革命史资料》1980年第1期）。

①②③④胡耀邦同志在安子文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

3. 刘晋：《我所知道的安子文同志在河南开封第一监狱的一点情况》（手抄稿）。
4. 牛荫冠：《关于安子文的回忆》（手抄稿）。
5. 刘国华：《志士不忘在沟壑》（1980年9月4日《淮南报》）。
6. 武迎生：《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华纺》——华东纺织工学院院刊，1980年10月14日）。
7. 刘竞雄：《关于安子文传的意见稿》和谈话记录。
8. 安民：《阅读〈安子文传〉（草稿）笔记》。
9. 山西省档案馆所藏太岳区党委的早期档案。
10. 访问帅孟奇、王甫、李楚离、乔明甫、陈野苹、蒋南翔、周仲英、侯镜如、方仲如、刘亚雄、钱俊瑞、史怀壁、陶桓馥、刘佩荣、白伶、牛书声、郭钦安、廖志高、李冰、张志杰、徐迈、崔毅田、武承宗、刘尹楠、安志铭等谈话记录。

李 之 龙

吴 德 才

李之龙，字在田，号赤显，是大革命时期颇有影响的人物，曾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英文翻译，后充任国民革命政府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参谋厅长兼中山舰舰长、代理海军局局长（中将军衔）等要职，是当时共产党人掌握海军大权的青年将领，是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的主要受害者。一九二八年二月八日被国民党反动派以“来粤运动海军叛变”的罪名杀害于广州红花岗，时年三十岁。

（一）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日，李之龙出生在湖北省沔阳县杜家窑乡李家垵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李照亮是一个勤劳贫苦的农民；父亲李国元为了寻找生活出路，随其堂兄李国镛到武昌替人做小信（伙计），后任小职员。李国元目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暴行，痛恨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常给李之龙讲屈原、岳飞、文天祥以及李自成、洪秀全的故事，这些民族英雄和农民领袖的高大形象和动人事迹，在李之龙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之龙自幼好动胆大，天资聪颖。他七岁时，随同父亲到

武昌两湖师范附小读书。一九一一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武师附属高小。适逢武昌首义前夕，父亲李国元加入了同盟会，受命赴赣、皖游说友人同举反清义旗，故送之龙回家乡。回家后，李之龙亲眼见沔东大土豪王声扬强占乡亲们土地，霸占草八垸湖水；并自封督办，借修堤防为名，在乡镇上建造了洋楼，十分气愤。便同年龄比他大的同学联名写状，控告王声扬鲸吞修堤公款的罪行。因县官与王声扬同流合污，结果状子送到县衙如石沉大海。王声扬反而洋洋得意地说：“嘿，李家狗小子，喝了几口墨水，胆敢与老夫斗笔墨，真乃自不量力也！”^①农村的残酷现实，在他心灵里播下了“反叛”旧世界的种子。

一九一二年秋，李之龙离开家乡，再次来到武昌，考入了刚创办起来的外国语专科学校英语科学习。

在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李之龙发愤读书，不仅攻读英语，而且对自然科学、文化艺术也十分有兴趣。他曾组织同学成立新剧社，自己创作了一出讽刺封建官吏的新话剧《叶老爷现丑记》，并自扮主角，化装上街演出，围观群众甚多，社会影响颇大，遭到反动军警的追查。

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夺后，年仅十六岁的李之龙关心国家民族的危亡，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极其气愤，曾秘密串联同学，进行反袁宣传。七月中旬，李之龙在四叔李国良的影响下，响应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号召，毅然随同四叔奔赴江西，参加李烈钧领导的湖口起义，经受了初次战火的考验。起义军失败后，李之龙回校复学，后又参加“反校长争民

^①1982年12月李光雄等老人的忆述资料。

主”的学潮，被外语学校开除。

李之龙被开除后，独自乘轮船到了上海。父亲派人把他找回家，教训了一番。不久，他又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商业学校。因父亲工资微薄，负担不了高昂的学费开支，只读一年就辍学了。

(二)

一九一六年秋，李之龙考入烟台海军军官学校，刻苦学习军事知识。立志要以岳飞为榜样，做一个为国尽忠的爱国军人。基于这种思想，他在钻研战略战术的同时，非常关注当时中国的混乱局势。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反动军阀张勋拥溥仪复辟，全国人民强烈反对。李之龙与同学李夫烈组织集会，并挥笔疾书，讨伐“民贼张勋拥宣统复辟”，痛斥“秦桧张勋，千古同臭”。恨不能亲手“歼彼恶魔”。他还题词赠王夫烈：“文官当如文信国，武官当如岳武穆”^①，用以互勉。这期间，他常和同学们吟咏岳飞的《满江红》词句，抒发忧国忧民之激情。

在烟台海校，李之龙经常驾驶舰艇在茫茫的海面上训练，参加武装泅海，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紧张的海军训练，使他感到当一个中国海军军官，抗御列强舰队侵略，不仅要有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而且还要有坚强的体质，才能适应海战的需要。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总结实践经验，编写了一本《实验健身术》的小册子。小册子分二十节，每节有若干操

^①李之龙亲笔题词的影印件，存中共沔阳县委党史办公室。

法，绘有图型并文字说明，便于仿效实验，深受海校学员欢迎。此书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曾连续再版九次。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李之龙不顾海校当局施行高压，书写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等标语，发动海校学员、校工、卫士和舰上水兵，冲破反动教官的阻挠，上街游行示威，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伟大的五四运动对他影响很大，他开始学习《新青年》、《每月评论》等进步刊物，阅读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章，广泛接触和研究各种新思潮，使他的思想更加活跃。

一九二一年六月，烟台海校非法克扣军饷，校工、卫士和舰上水兵三个月未发薪水，对官佐极其不满，李之龙发动水兵和校工们罢工罢航，要求补发所扣军饷，使北洋军阀控制很严的烟台海校，一时卷起了革命怒潮。海校当局施行高压，追查所谓煽动水兵闹事的为首者，要将李之龙押送北京海军总司令部军法审处，终因多数学员、水兵和校工、卫士的强烈抗议，才免受军法审处，但被海校开除了军籍和学籍。这次事件使李之龙认清了北洋政府的反动面目。他愤愤地离开了烟台，乘轮船去上海。

一九二一年八月初，李之龙来到上海，很快结识了来沪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等。他们介绍李之龙阅读《共产党宣言》以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使他的世界观产生了一个飞跃，从一个信仰三民主义的爱国青年，逐渐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九月，李之龙回到武汉，随同董必武从事革命活动，于十二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二年春，李之龙受聘赴河南陈州中学任英文、数学教师，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他同学生们生活在一起，传播革命思想，深受学生爱戴。年底，辞聘返鄂，在董必武等创办的武汉中学任教，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秘密从事工人运动。

一九二三年初，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蓬勃兴起。为了加强对工团的领导，中共武汉区委派李之龙、李伯刚在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负责联络工作。时值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议决于二月一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李之龙、李伯刚奔走于各工团之间，联络代表赴郑州参加总工会的成立盛典。经过他们紧张的工作，去郑州的各工团代表及新闻记者共百余人，附以奏乐队，于一月三十日晚上在江岸工会集合，由林育南、施洋等带队乘火车北上，李之龙、李伯刚等留在工团联合会总部，继续作好联络工作，发动各工团组织声援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由于军阀吴佩孚拒绝承认京汉铁路总工会组织，并对工人运动进行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以总罢工来保卫自己的权力，反对封建军阀的压迫。于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

为了组织工人参加罢工，李之龙深入到各工厂向工友们发表演说，号召工友们团结起来，“为争自由作战，为争人权作战”。有一次，李之龙深入到扬子江机器厂，在工人集会上演说，强调指出，这次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是打倒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共同仇敌，解除共同的压迫，求得共同的幸福。号召广大工友要同京汉铁路工人并肩战斗，夺取斗争的胜利。他挥动拳头，激情地说：“我们向封建军阀要自由，要民主权利，就象同老虎较量要剥虎皮一样，老虎是要疯狂反扑的。唯一的

办法就是团结起来与军阀搏斗。只要我们工友团结一心，紧握铁拳，坚决与军阀搏斗到底，直搏斗到剥下虎皮，夺取斗争胜利。”^①正当李之龙演讲到最激动的时候，一伙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冲入会场，行凶抓人。李之龙在工友们的掩护下脱险，旋即投入新的战斗。

在中共武汉区委的领导下，李之龙、李伯刚等秘密联络和发动各个工团组织和学生联合会，于二月六日举行了声势浩大、气吞山河的游行示威。北洋军阀吴佩孚、肖耀南惊恐万状，于二月七日下午，派出两营全副武装的军队，包围江岸分工会和工人住宅，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时，一个铁路工人跑到工团联合会向李之龙、李伯刚报告情况。李之龙听了万分气愤。他机警地说：“现在我们不能屋里呆着，敌人已经下毒手了，我们应该到外面和工人联络，要将情况转告林育南、施洋等同志。”李之龙、李伯刚出门不久，军阀即派部队来封闭工团联合会，到处搜捕工团联合会的负责人。时近黄昏，李之龙、李伯刚到三元里和日租界几处党的联络地方，但未找着林育南、施洋等。直到八日凌晨，他们才在施洋家中会面，向施洋谈了江岸惨案情况，研究对敌斗争策略，并请他回避一下。他们离开施洋家不久，军警即闯进施洋家中，将施洋逮捕了。林祥谦、施洋等工人领袖和工会代表先后壮烈牺牲。在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下，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失败了。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二七”惨案后，武汉的共产党员被迫转移。李之龙随同

^①引自李之骥忆述资料：《李之龙在二七罢工斗争中》，存中共沔阳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陈潭秋、李求实等到湖南，继续进行工人运动。

（三）

一九二四年初，李之龙任中共汉口地委执行委员。不久，国民党召开“一大”，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李之龙奉命调到广州，担任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的英文翻译，协助鲍罗廷工作。黄埔军校成立后，我党派李之龙进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兼任鲍罗廷来军校授课的翻译工作。在黄埔军校，他认真学习理论，研究古今兵法和外国军事著作，并和共产党员蒋先云、陈赓等组织血花剧社，被推选为社长。七月六日，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成立，李之龙当选为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五委员之一，以学员代表的身分，参加了军校特别党部的领导工作。

蒋介石为培植自己的势力，经常请学员们到蒋公馆去作客。有一次，蒋介石邀请李之龙、李奇中等十余人到蒋公馆，声称：我有三件宝，谁找出来了，本校长特别给予嘉奖。学员们七猜八猜，东寻西找，屋子里几乎翻遍了，也没有找出来。机警的李之龙在其他人寻找的时候，观察蒋介石的脸色变化，从蒋的枕头底下翻出了《俾斯麦传》、《曾胡治兵论语》、《曾文正公家书》等三本书。蒋介石当即点头默认，对李之龙大加赞扬^①。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李之龙从军校第一期毕业，留在军校

^①李奇中忆述资料：《李之龙在黄埔军校》，存中共沔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政治部协助周恩来主持部务工作。为了加强军校政治思想和组织工作，团结教育驻粤各军队的青年军人，在周恩来的倡导下，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以李之龙、蒋先云、王一飞、周逸群等为首发起，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六月三十日召开代表大会，李之龙当选为“青军会”会议主席团主席和中央常务委员。他主持大会讨论通过了蒋先云起草的《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报告》，并亲自起草了《对沙基惨案决议案》，主要内容是“限期收回沙面，撤退外舰”，“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革命军人誓拚热血为外交后援”，“帮助组织学生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誓与各帝国主义者决一死战。”并决议为“死难同志公祭。”^①这次代表大会是团结革命军人坚持反帝反军阀的宣誓大会。

以李之龙等为首的“青军会”出版有会刊《中国军人》和旬刊《革命军》，在驻粤的粤军、滇军、桂军、湘军以及海军舰队中的影响很大。“青军会”成立不到两个月，会员就发展到两千余人。

可是，戴季陶、蒋介石等人忌恨“青军会”在驻粤各军中影响的扩大。为了排斥和打击共产党和进步力量，蒋介石指使王柏龄、贺衷寒、陈诚、缪斌等人，组织以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为宗旨的“孙文主义学会”，同“青军会”相对抗。一九二五年六、七月间，戴季陶抛出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哲学基础》的小册子，向共产党进攻，破坏国共合作，并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孙中山说成

^① 《中国军人》1925年第6期。

是周公孔孟的继承人，阉割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性。为了批判戴季陶主义，李之龙执笔画了一幅著名的漫画，画面是：戴季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疙瘩小帽，背着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塑像，十分吃力地朝着阴森破败的孔庙里走；旁边站着洋人、军阀、党棍、财东在拍手称快。这幅漫画对国民党右派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很快贴遍了军校内外，各进步报刊纷纷转载，反响十分强烈。蒋介石看了极为恼火。但漫画影响很大，众怒难犯，他也只好忍气吞声。从此，李之龙就成为国民党右派的眼中钉了。

李之龙以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团结革命军人，坚决与军校内的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王柏龄是蒋介石的亲信，担任军校教授部主任，被称为蒋介石的“第一只手”。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王柏龄怂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恶毒攻击“青军会”，到处寻机挑起事端。有一次，“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林振雄与“青军会”成员李汉潘发生争执，王柏龄有意怂恿林振雄向李开枪（幸未击中），激起革命师生的极大义愤。李之龙调查了事情的原委经过，立即向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报告，要求严肃处理此案。后经廖仲恺批准，将林振雄撤职查办，打击了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但是，王柏龄并未就此善罢甘休，继续采取特务手段，暗中派人监视共产党员，限制共产党员的活动，甚至在深夜偷窃共产党的文件和拆阅往来信件，破坏国共合作。面对国民党右派的猖狂挑衅，周恩来与李之龙、蒋先云等商量，决定打击蒋介石的这“第一只手”。李之龙等组织“青军会”采取画漫画、写墙报等形式，张贴在军校内外，公开揭露王柏龄破坏国共合作的卑劣行为，使王柏龄一时威风扫地。

(四)

一九二五年二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李之龙任黄埔学生军教导团的营党代表，随同周恩来率领学生军出师东征，参加东征军右翼作战。为了鼓舞东征军的士气，他指挥学生军高唱：“同志们前进！……杀！杀！杀陈炯明，不杀不甘心”的《杀贼歌》，以及“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的《爱民歌》，雄赳赳地向东江进军。二月十五日，东征军进攻惠阳、淡水，陈炯明军洪兆麟部万余人疯狂反扑。在东征军内部任教导团第二团团长的国民党右派王柏龄，临阵逃跑，动摇军心。蒋介石也惊慌失措。在这危急时刻，周恩来号召共产党员带头冲杀，抵抗敌人反扑。李之龙带领五百余学生军，和敌人激战数小时。后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叶剑英指挥部队配合作战，终将洪兆麟部击溃。林虎拥兵二万余，是陈炯明军的劲旅。当学生军与洪兆麟部激战得很疲惫，来不及休整时，林虎调动万余部队向鲤湖、棉湖一带猛扑过来，占领有利阵地，居高临下，发起密集冲锋，企图一举消灭黄埔学生军。在周恩来的指挥下，李之龙、蒋先云等率领教导团三千余学生军，坚守阵地，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战斗中，学生军营长王俊被林军俘虏。李之龙指挥学生军冲破敌军阵地，硬是将王俊抢了回来。战斗由朝到暮，黄埔学生军在仰攻的不利条件下击溃了林军，残敌退至五华、兴宁一带，负隅顽抗。李之龙带领学生军五百余人，由农民带路秘密进至五华城外，见城门紧闭，敌人守备甚严，不能强攻。遂当机立断，决定智取五华城。他从敌俘口中了解到敌军部署和口令，亲自

带领少数人押着俘虏，扮作林虎的部队，佯称进城运弹药，叫开了城门。此时，埋伏在城门外的学生军蜂拥而起，冲进城门，直捣林虎的指挥部，缴获了大批枪械弹药，俘敌参谋长以下官兵六百余人。三月二十日，李之龙率领部分学生军乘胜追击，当晚就攻克了兴宁，林虎残部向江西逃窜。叶剑英指挥粤军第二师配合教导团英勇作战，在梅县截击逃敌，全歼林虎残部。至此，基本上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

为了团结革命军人，宣传发动群众支援革命军，讨伐军阀陈炯明，李之龙以“青军会”和政治部名义，经常在军民会上发表演说。梅县攻克后，李之龙在一次军民联欢大会上讲话，阐述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伟大意义。他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中国封建军阀割据的关系，说明中国的军阀不仅代表最反动的封建势力，而且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要打倒军阀必须打倒帝国主义，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必须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的演说浅显易懂，说理透彻，博得群众的热烈掌声。当时，“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贺衷寒也上台讲话。他曲解三民主义精神，公开反对三大政策，引起群众不满。李之龙和贺衷寒在集会上当场争论，双方发生冲突，一直闹到司令部找蒋介石评理。李之龙严厉痛斥贺衷寒破坏国共合作，挑起械斗事端的罪行，迫使蒋介石不得已宣布给贺撤职处分。

五月四日，梅县各界人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六周年，周恩来发表了演讲，李之龙组织血花剧社演出革命文艺节目。有一个独幕话剧——《新时代》，是反映五四运动时期，一对男女青年学生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参加革命斗争的故事。李之龙不仅创作了剧本，而且上台主演，表演十分精彩，有很强的感

染力，给群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教育东征军官兵加强团结，保持高度警惕，他还创作了新话剧《革命军来了》，揭露封建军阀阴险狡猾的反动本质。可是，在血花剧社排演时，却遭到“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胡宗南的反对。周恩来接到报告，立即指示政治部大力支持血花剧社演出，使国民党右派的破坏活动未能得逞。李之龙领导的血花剧社沿途演出，在群众心里播下了革命火种，激励广大军民团结战斗，共同对敌，促进东征胜利进行。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早就与英帝国主义、段祺瑞政府秘密勾结的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从东江撤回部队，威逼广州，占领了广州部分地区以及广州电报局、火车站，形势万分危急。周恩来指挥学生军日夜兼程，回师广州，讨伐杨、刘。六月十日，黄埔学生军进攻石碑，与滇军胡思舜部激战一夜，击毙滇军六百余人。十二日拂晓，学生军进攻广州，夺回了火车站。敌人退至越秀路，依靠工事，继续顽抗。李之龙，蒋先云等带头端起枪往前冲，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紧紧跟上，学生军如潮水般地冲入敌人阵地，杀得滇军落花流水，全线崩溃。学生军很快进入市区中心，占领滇军指挥部，同时加强政治攻势，号召滇军兄弟反戈一击，瓦解了滇军，获得了平定杨、刘叛乱的辉煌胜利，使广州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五）

一九二五年十月，李之龙因在第一次东征中表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被晋升为广东国民政府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任。一九二六年一月，海军局长斯米洛夫（苏联人）离职归国，李之

龙受命代理海军局局长（中将军衔）。

李之龙在海军局任职期间，正值省港大罢工，工人和广东农民协会农民、革命军人联合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高潮的时期。为了打击英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二千余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封锁广东各个海口，开始只有六艘未装火炮的小火轮在港口巡逻，无法封锁海口，走私活动猖獗。李之龙以海军局的名义，大力支持工人运动，派遣大虎、天安、山西、江雄、龙飞、汉口等六艘装有火炮的军舰，每舰约一百余人，全副武装，参加工人纠察队。这样以来，十二艘军舰组成了封锁海口的巡逻队，结合沿海各地农民武装自卫队，东起汕头，西至北海，组织蜿蜒千里，金鼓相闻的封锁线。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自恃与蒋介石是同乡，在日本士官学校是同学，又结拜为换帖兄弟，在虎门私收过境船货保护费，贩运私盐。中途若遇海军检查，即出“公文”一纸，上书“拿获私盐若干，拖运返省究办，希予放行云云”^①曾多次骗过海关检查。李之龙将此情况报告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密令严加查办。不久，海军江大舰果然在莲花山附近海面拿获虎门要塞司令部差舰胜利号私拖盐船二艘。江大舰当即报告海军局。参谋厅长欧阳琳接到江大舰党代表报告时，陈肇英对他恐吓说：“你们如不释放，将以相当手段对待！”欧阳琳胆小怕事，不敢如实上报，口头应允释放，又不敢下令释放。江大舰党代表报告政治部主任李之龙说，欧阳琳从中圆乎，此案难办。欧阳琳则对李之龙说：“陈肇英自称蒋介石兰谱兄弟，又系蒋保充司令，此事与蒋面子有关。他现在只要求释放胜利号差舰，允给

^①李之龙：《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1927年4月出版。

一万元为江大舰官兵酬劳。”李之龙说：“蒋介石保他做要塞司令，是要他革命的，不是要他来扒钱的。扒钱才对蒋介石无面子，这个黑幕不打破，更对蒋介石无面子。无论如何，非报告不可！”欧阳琳说：“他说要用相当手段对付。”李之龙气愤地说：“什么相当手段！至多不过是用朱卓文对付廖党代表的手段（指暗杀廖仲恺事件——引者），那又算什么！”^①正当这时，教导师党代表包惠僧同蒋介石、王柏龄（教导师长）到虎门、东莞检阅部队。陈肇英一面向蒋介石告李之龙的阴状；一面托王柏龄央求包惠僧出面说情，希望李之龙不要与他为难。然而，李之龙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被淫威所吓，也不为金钱所诱，将此案如实报告总政治部和军事委员会。结果，军事委员会将陈肇英撤职查办。可是，蒋介石暗中保护陈肇英，又把他调任黄埔附近的长洲要塞司令部，以便进行阴谋活动，伺机反扑。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因陈炯明叛乱时，孙中山曾在此舰上避难五十六天，故更名中山舰以示纪念。它是当时国民政府海军中唯一的一艘装备完全的大舰。国民党右派欧阳格时刻梦想掌握海军实权，窃取中山舰舰长职务，把攻击目标集中在其堂兄欧阳琳身上。欧阳琳任参谋厅长兼中山舰舰长时，也搞过走私活动，做贼心虚，庸懦胆怯。欧阳格抓其要害，进行种种威胁，使欧阳琳弃职逃港。欧阳格自认为有蒋介石担保，可夺得海军实权。结果，中央军事委员会却命李之龙兼任中山舰舰长，使欧阳格大失所望，更加忌恨李之龙。李之龙奉命任职后，立即整顿该舰军纪，亲自带领宪兵前赴广南船坞，将舰上

^①李之龙：《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1927年4月出版。

非法从事走私的十三名官兵缴械扣留，并约法三章，严禁海军人员参与走私活动，使中山舰面貌一新。

李之龙的革命活动和当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顽固派和早就具有独裁野心的蒋介石，都是极大的威胁。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学会”反动分子经过阴谋策划，一次震惊中外的反革命事变爆发了。

三月十八日，由蒋介石的亲信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向海军局转达蒋介石的命令：“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①当天晚上，欧阳格派三人来文德楼李之龙寓所，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飭派有战斗力的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时适李之龙外出，此三人将来函交给作战科长邹毅。李之龙回家阅函后，邹毅报告说，奉校长命，我已通知宝壁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自由、中山二舰可派。李之龙先到对门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家商量派该舰前往。因自由舰刚从海南岛返省，机件有损，正在修理，不能及时开动。李之龙遂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听候差遣。此时中山舰舰长已由副舰长章臣桐代理，故李之龙签发调令，即交宝壁、中山二舰舰长执行。十九日六时许，中山、宝壁二舰冲破晨雾，开赴黄埔，停泊在军校大门前，升火待令。下午，因苏联军事顾问团要检阅舰队，李之龙打电话报告蒋介石，得其允许，又将中山、宝壁二舰调回。这就是李之龙派舰开赴黄埔的真实经过。

然而，蓄谋已久的“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欧阳格、陈

^①引自《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0页。

肇英等大肆造谣：“共产党阴谋暴乱，要推翻国民政府，唆使中山舰开赴黄埔，升起火炮，企图炮轰军校，劫走蒋校长，送往海参崴转莫斯科，事态万分严重……”等等。十九日深夜，蒋介石来到第一军经理处，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命令实行全城戒严，派惠东升带领全团兵力，配合广州公安局的武装警察包围苏联顾问团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以及省港罢工委员会；公安局长、国民党右派吴铁城带领一部武装警察，包围汪精卫住宅，名曰“保护”；派蒋鼎文率部队占领海军局，解除海军局的武装；派陈肇英去逮捕海军局局长李之龙，并指使欧阳格劫夺中山舰，令其代理该舰舰长。蒋介石又命令第一军中亲信的师长、团长，要他们将本部的共产党员，立即加以扣押，并加派刘峙率部配合这一行动。反革命政变布置就绪后，蒋介石潜往造币厂隐匿，命总司令部军法处长马文车坐阵司令部，随时向他电告行动情况。

三月二十日凌晨三时许，广州全市戒严，“孙文主义学会”头目缪斌集合第二师全体官兵讲话，当场逮捕共产党员四十余人，其他各部均按蒋介石的严密布置，统一行动。二师部分士兵包围东园省港罢工委员会，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并要逮捕工运领袖，因工人纠察队反抗未遂。二师五团开赴东山，包围苏联顾问团的住宅，扬言要驱逐苏联顾问团出境，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于此同时，陈肇英派出的特务来到李之龙住处，将从梦中惊醒的李之龙抓走，押到万福路第二十师办事处楼上，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也被扣留在这里。稍顷，欧阳格走来，故意向李之龙问道：“你为什么这早起身？”李答：“未有起身，是你们派人到我家把我拿来的。”欧阳格接着凶相毕露，命人将李之龙的军衣剥下，捆绑起来，用毛巾蒙住眼

睛，又用驳壳枪启子将两条手巾塞进嘴里，然后绑架下楼，押上汽车，解到第一军经理处。经理处长徐桴问：“是李之龙吧？”李之龙用舌头极力将嘴里的手巾抵出来，气愤地回答：

“是，为什么捉我？”徐问：“你有什么事对不起校长未有？”李答：“未有。”徐又问：“中山舰是哪个派到黄埔去的？”李答：“是校长的面谕，叫邓教育长演达打电话到办事处要我派去。”徐问：“是哪个调回来的？”李答：“因为苏联顾问团定于昨天下午参观舰队，曾用电话向校长请示，得其允许才调回的。”徐问：“你能指挥哪几条舰？”李答：“我以海军局长名义，舰队都可以指挥，以私人的名义，一条舰也不能指挥。”徐问：“你为什么这早就起身登舰呢？”李之龙气愤地说：“并未起床，是欧阳格、陈肇英他们派人到我家中，从梦中将我捆绑来的。”徐说：“报告人说你深夜起来上船有暴乱之举动……”李之龙更加气愤地说：“这是反革命分子的阴谋，请处长转告校长，务必将报告人扣留，以免逃逸。”徐说：“好吧，我去报告校长。”言罢遂去。旋即将李之龙移到小房里，解开蔽眼毛巾，另加几条粗绳将他的手脚紧紧绑住。陈肇英来看时，喝令道：“校长命令，绑紧一点。”监守兵紧了一次。稍顷，陈又来喝令道：“校长命令，再绑紧一点。”监守兵又竭力捆绑，绑得李两臂红肿，痛入骨心。约三刻钟后，陈肇英得意洋洋地说：“嘿，我们的李局长，想不到会有今天吧！”李之龙愤然冷笑道：“哼，想不到你们会这样阴险可恶，卑鄙可笑！”随后，陈肇英带领卫队用汽车将李之龙押至造币厂内，由第六团特务连监守^①。

^①参见李之龙：《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1927年4月出版。

李之龙被非法绑架拘留后，蒋介石企图从他口中捞到按他们的意思诬陷共产党的“供词”，密令总司令部军法处长马文车和第一军经理处长徐桴开庭审讯。但连审两次，李之龙态度强硬，拒不诬供所谓“共产党阴谋暴乱……”之事，并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右派欧阳格、陈肇英等阴谋诬陷共产党，制造反革命政变的罪行。马文车向蒋介石报告审讯情况，蒋介石极不满意，说：“你一个人审问不了，加派第二军军法处长戴贞缙会审。”马、戴等会审数次，李之龙态度仍很强硬。马文车遂书面向蒋介石建议：“本案迭经会审，仍无充分罪证，原报告是否完全属实，有待调查，拟先保释。”蒋介石的批示是：“暂行看管，再侦查。”^①

帝国主义者对蒋介石一手炮制反革命事变，同声喝彩，大肆宣扬。香港总督金文泰在西商会议上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二十日广州政治已上轨道了。”^②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喉舌——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的英文、中文版报纸，都在显著地位发表他们编造的有关事变的消息，给蒋介石打气。早与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有勾结的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持志分会，给广州孙文主义学会致函祝贺：“诸君学养有素，大义凛然，爱党爱国，不遗余力，兹竟能助介石先生，于短时间僦平叛党祸国之分子。”^③恶毒攻击共产党，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三月二十日事变后，以周恩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极力主张对蒋进行反击。他们分析当时形势，认为就广州

①马文车遗稿：《中山舰事件的内幕》家属吕德懿提供，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②③周士第：《蒋介石制造三月二十日反革命事变与独立团的反映》1959年，载广东档案史料丛刊《中山舰事件》。

一地而言，蒋介石的实力较大；但就粤桂全局来说，蒋介石的实力是小的。只要我党坚持原则，团结和争取中间派，就能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然而，周恩来等的正确意见，却遭到苏联顾问和陈独秀的反对，因而未能实现。关于“三二〇”事变，周恩来于一九四三年作了科学的论述：“李之龙同志当时是中山舰的舰长，他抓住了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走私的事，报告汪精卫。陈肇英是蒋介石的人，自然向蒋介石报告。于是蒋介石在右派的支持下，乘机发动了三月二十日事变，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他们逮捕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把我也软禁了一天。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从此，“蒋介石的地位更加巩固了，于是他回头来又打击右派。”“蒋介石打击左派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这就是他的流氓手段阴险刻毒的地方。”①

（六）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国民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0—121页。

和组织下，决定出师北伐。北伐军正式出师的前几天，李之龙才获释，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协助邓演达，负责宣传工作兼任新剧团主任，率领文艺队伍随军出师广东、湖南、江西。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和李之龙研究决定，将新市场开辟为革命宣传阵地。李之龙和董必武、张复初、宛希俨、刘蔚如、刘仲衡等召集汉口总商会负责人开会协商，决定在新市场由总政治部和汉口市特别党部筹备成立中央人民俱乐部，由李之龙、李国焯、杨一如三人为筹备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将新市场命名为“血花世界”，取以先烈之血浇灌主义之花的意思。随后，武汉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李之龙为中央人民俱乐部主任，并兼任《血花日报》社社长。

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政府决定收回英国租界。英帝国主义调来三艘军舰，威逼武汉，对国民政府进行恐吓。为鼓励革命军人和人民群众的反帝斗志，李之龙以一八九六年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蒙难的历史事件为题材，编写了一部革命话剧《孙中山伦敦蒙难记》，揭露英帝国主义与清朝政府驻英公使相勾结，违反国际公法，拘捕中国民主主义革命领袖孙中山，妄图把孙中山押回中国交清王朝处死的罪行，此剧在血花世界剧场演出时，李之龙亲自扮演孙中山这个主角。在人民大众的支持下，武汉国民政府顶住了英帝国主义的威吓，坚决收回了武汉的所有外国租界。

为纪念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李之龙在血花世界创办了仲恺图书馆，还搜集整理出版了《廖仲恺文集》。一九二七年二月，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来到武汉，李之龙陪同她参观了仲恺图书馆，并向她介绍了创办仲恺图书馆的经过。他还请何香凝在血花世界“总理纪念堂”作报告，介绍廖仲恺的革命事迹，控诉

国民党右派残害革命，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罪行。这些消息在《血花日报》报道以后，在群众中影响很大。

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叛变的消息传到武汉时，武汉到处是一片反蒋讨蒋的怒吼声。李之龙立即挥笔疾书讨蒋檄文——《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由中央人民俱乐部印成小册子散发。四月二十五日，武汉举行有三十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讨蒋大会，李之龙在大会上历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滔天罪行，提醒共产党人要警惕象蒋介石这样的反革命两面派。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李之龙按照邓演达的安排，化装成商人，乘英商客轮潜往上海，几经辗转，来到广州，和妻子潘慧勤及女儿们一起，同住在岳父家中，以港商作掩护，从事兵运活动，秘密策动海军起义。李的行止引起了陈策的注视，陈策立即派肖广业、舒中流来监视他的活动，肖广业、舒中流佯称陈策对蒋介石不满，约李之龙到香港皇后酒楼会谈。为了摸清陈策的海军舰队动向，李之龙带着妻子潜往香港，在皇后酒楼与肖、舒二人会面。通过谈判，李之龙发现他们来谈“生意”是假，监视他的活动是真，便机警地摆脱了肖、舒的纠缠，从香港返回广州，转入更加隐蔽的地下活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失败以后，李之龙被迫渡海赴日避难。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李之龙从日本经香港回广州，不幸被特务发现，当晚被捕。二月八日，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广州红花岗。就义前，他给妻子潘慧勤留下一封遗书，写道：

“我革命的义务现在结束了，不要悲伤。希望你把孩子抚养成人，继承我未完成的革命事业。”这份遗书后来由一个看守士兵交给了潘慧勤。

李之龙牺牲后，广州、香港、天津、上海等地报纸和英国人操纵的粤海关英文情报均刊登了《粤杀李之龙》的消息，说他是“赤色领袖。”李之龙短暂的一生，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附录：

（一）吴玉章同志给中央组织部的信

中央组织部：

来信收悉。据我所知，李之龙当时是中山舰舰长（中山舰是由清朝的飞鹰舰改名的），李在被捕后叛变的事，据我所知，不是事实。

此复并致

敬礼

吴玉章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原件存中央组织部，后转中央档案馆）

（二）聂荣臻同志给广州市委组织部的信

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

我一九六〇年八月关于李之龙同志在中山舰事件中被捕后变节的信，记不清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经查证资料，没有李之龙同志变节的记载，也不记得他有变节行为。所以一九六〇年的信撤销，以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给杨

献珍同志的信为准，并请转告有关部门。

此致

敬礼！

聂荣臻（签字）

一九八二年四月六日

（原件存广州市委组织部）

（三）荆州地委办公室给沔阳县委的信

沔阳县委：

省委黎韦同志关于你县准备举办李之龙同志遗物、文件陈列展览的意见，杨献珍同志给陈丕显同志的信，地委领导同志已阅，现将原信件转给你们，请你们按照黎韦同志的意见，把展览工作安排好，抓好。

中共荆州地委办公室（盖章）

一九八二年二月一日

（原件存中共沔阳县委党史办公室）

（四）罗明同志的证明材料

李之龙被蒋介石抓住后，并没有写声明退党，也没有投降蒋介石，在党内没有听说这些事，如果有投降叛变、退党声明的话，我们在党内应该是知道的。

罗明（签名）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于广州

（原件存中共沔阳县委党史办公室）

（五）原广东区委组织部秘书饶卫华同志的 证明材料

我没有听说李之龙有发表脱党声明叛变的事实。当时陈独秀对李之龙有看法，认为李之龙没有捧蒋介石，李之龙画了戴季陶的漫画，他认为李之龙是过左，对国共合作有影响，要批评。但是我知道，当时党没有对李之龙作什么处分的结论，更没说他叛变。

饶卫华（签名）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原件存中共沔阳县委党史办公室）

（六）早期广东工人运动领导人谭天度 同志的证明材料

李之龙同志在1926年广州中山舰事件中，是被蒋介石抓的，在全党全国都有很大影响。我没有听说李之龙声明脱党的事情。如果他声明脱党，蒋介石会重用他的，怎么后来国民党反动派杀他呢！当时两广区委有十三个主要成员，周总理是其中成员之一，陈延年是区委书记。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反共的信号，从此，我们都认为蒋介石不可靠，国共合作是危险的。之后，蒋介石说中山舰事件是误会。陈延年把两广所有党员（包括黄埔军校党员）集中起来，要蒋介石公开承认错误，陈独秀和鲍罗廷生怕国共合作破裂，迁就国民党，党内同志都很气愤，陈延年非常

气愤，在我们面前都骂他父亲陈独秀是“老糊涂”……

谭天度（签名）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原件存中共沔阳县委党史办公室）

（七）黄埔一期学员李奇中同志的证明材料

我和李之龙在黄埔军校是第一期同队的同学，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关于中山舰事件的问题。我认为是一个历史冤案，要给李之龙同志恢复名誉。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搞的反革命圈套，他伙同一批右派分子，阴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开刀。蒋介石派人抓了李之龙，诬说李之龙受共产党指使搞阴谋暴乱，这纯属捏造和诬陷。我没有听说李之龙有叛党行为，也没有见到李之龙发表声明脱党的事情。中山舰事件后，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主张推翻蒋介石，由共产党来领导北伐。但党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不同意，他们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向蒋介石一再让步，把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名单交给了蒋介石，又把中山舰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到李之龙身上，说李之龙在中山舰事件上有错误，在党内要给李之龙的处分，这是历史的冤案，我认为应该给李之龙恢复名誉。

聂荣臻同志当时是中共广东区委驻黄埔军校联络员，他对李之龙的表现是了解的。据我了解，李之龙没有叛变行为，也没有发表声明脱党的事情。共产党中央要给李之龙的处分，那是陈独秀向蒋介石的让步，那是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李奇中（签字）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日

（原件存中共沔阳县委党史办公室）

（八）粤海关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英文情报译文

在广州，每天都进行着搜查赤色集会和逮捕共产党人。上星期一，一个名叫周文雍的共产党高级官员同他的妻子一起被枪杀；另一个赤色领袖，前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昨天被逮捕处死。

（九）《大公报》民国十七年二月十一日 消息《粤杀李之龙》

国闻社十日下午二时三十三分上海电、港讯：广州庚（六日）捕获前海军局长李之龙，即日枪决，谓系来运动海军叛变（按李系前年有名之中山舰事之主要人物）。

作者附记：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阅了文末附录的附件，李之龙的《实验健身术》、《〈临阵心法〉批语》、《东征军来了》、《三二〇反革命事变真相》和亲属提供的19封家书；《黄埔军校史料》、《中山舰事件》等档案史料，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张太雷以及蒋介石等讲话、文章；茅盾、罗明、饶卫华、谭天度、包惠僧、周士第、李伯刚、马文车等人的有关回忆录；访问杨献珍、罗明、饶卫华、谭天度、李奇中、韩浚、吴奚如、胡应球、魏子静、刘渠、张冠兰、陈平澜、李之骥、季方、方墩、李光雄等的记录。

陈佑魁

曹木清 吕芳文

陈佑魁，字斗垣，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于湖南麻阳桐云乡槐树垅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陈恩容，母亲夏翠云。兄妹六人中，他排行第三。陈佑魁八岁入私塾，一九一三年入麻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一九一七年秋考入芷江第九联合中学。他在中学期间，受了一位姓龙的教师的影响，开始接触康、梁学说，思想逐渐开阔。又由于芷江第九联合中学与县衙门仅一墙之隔，反动官吏逼迫贫苦农民交租还债，官匪串通一气、冤杀农民的事情，时有所闻。陈佑魁作为一个饱受封建势力欺压的农民子弟，耳闻目睹这类事件，对被压迫的农民深表同情，对反动政府更加不满和愤恨。

一九二〇年秋，陈佑魁中学毕业后，勉强凑了一点旅费，前往省会长沙，寻找升学或就业的机会。可是，若大的长沙城，竟容纳不下他这个穷学生。正当他无路可走的时候，恰好碰上湖南自修大学招生。陈佑魁便高兴地入了这所学校。一九二二年秋，自修大学增设补习班。陈佑魁一面在自修大学认真学习，一面在补习班兼任英语教员。

陈佑魁在自修大学期间，通过自己刻苦学习和接受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的影响，开始认识中国各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根源，逐渐懂得改造中国社会制度的道理，思想觉悟迅速提

高，大约在一九二一年底或一九二二年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①。

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长沙发生日本水兵殴打、枪杀湖南外交后援会检查人员和人民群众的惨案。惨案发生后，群众抬尸游行，要求赵恒惕政府向日交涉。赵恒惕政府竟受日本帝国主义指使，禁止群众游行，并下令解散湖南外交后援会，捉拿郭亮、夏曦、夏明翰等负责人。当时有的爱国志士，眼看帝国主义如此欺负中国，愤恨难忍，发生过“愤国事之不可为而自杀”的事情。陈佑魁积极参加长沙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要求收回大金码头的斗争，并在斗争中进一步加深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仇恨和认识。他充分肯定这些爱国者“舍身为国”的崇高气节，同时正确地指出：“自杀”是“弱者行为”，“既能舍身为国，何不奋身以杀国贼？”^②把一部分青年消极的报国思想，提到反帝反封建的高度，引导他们进行积极的斗争。

一九二三年，湖南自修大学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了一个月刊——《新时代》。陈佑魁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积极宣传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他在《北京政府是什么东西？》一文中，指出反动政府搜刮民财，戕贼民命，动辄以数十百万计，他们才真正是“用武力以掠夺他人之财产”的土匪，被北京政府称为土匪的人，实际只是“介于土匪与非土匪之间的弱者。”^③在《利用与同情》一文中，他指出过去一切统治者的

①据龙淑回忆陈佑魁在1921年秋入党。但这个时间还有待进一步查实。

②湖南革命史资料选辑《新时代》第270页。

③《新时代》第268—269页。

成功，大都是靠了互相“利用”，但革命事业的胜利，却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一事业的“同情”与支持，而不是靠互相利用。法国革命，美利坚独立，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国辛亥革命，都是靠了人民的同情和拥护而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现在正表同情于孙中山，进一步要表同情于共产主义。察过去知未来，中国“将来的成功”，是“可以推想而知”的^①。在《货币革命观》一文中，他运用马克思关于货币的学说，解释了货币的本质及旧货币的掠夺作用，提出要进行货币革命。而“要想得到合理的货币制，要达到经济革命的目的，就非先行政治的革命不可”。并且满怀激情地说：“我很希望政治的，经济的各种社会生活的大规模革命立即实现！”^②启迪人们对共产主义这一美好制度的信仰和追求。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封闭。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活动中心转移到清水塘。党派陈佑魁去领导学生运动。他随即考入长沙邮政总局当邮务员，以社会公职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并为党筹措部分活动经费。他利用传递邮件的机会，同各校进步学生团体和学运活动分子广泛联络，积极推动长沙的学生运动。不久，邮政局把他升了一级，叫他在省邮政总局办公。他以因此失去了与学生直接联系的机会，便转到省教育会图书馆当管理员，复利用新的工作上的方便，广泛联系青年学生，向他们介绍、输送进步的文化知识，宣传革命思想。后来，陈佑魁又放弃了图书馆这个工资收入较好的工作，转到长沙兑泽中学第三分校担任补习班教员，直接负责组

① 《新时代》第268页。

② 《新时代》第219页。

织兑泽的学生运动。

反动文人易家钺，在《民铎》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的丘九问题》的文章，大肆攻击湖南和安徽的学生运动，骂学生是“丘九”，说学生的天职，“第一是读书，第二是读书，第三还是读书”，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为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辩护。陈佑魁立即在《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发表了《丘九问题与易家钺》一文，对这种攻击学生运动的谬论进行回击。文章针对学生的唯一天职是读书的论调，指出凡有头脑的学生应该关心政治。因为恶劣的社会制度不改变，不但学生无法读书，一旦国家遭到灭亡，连自己生存的权利也没有了，又怎能埋头读书呢？反动派要学生“永远供他们所奴役和驱使”。易家钺先生对反动统治者如此“忠勇”，要是袁世凯还在人世，一定会请他“到筹安会去”^①。在《中国工人与三民主义》的文章中，他着重指出，工人阶级的远大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要想达到共产主义高的远的目的，非先努力于三民主义的革命不可，非三民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共产主义是不会实现的。三民主义是达到共产主义独一无二的康庄大道。打倒专制军阀，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之后，才有共产主义之可言。”^②初步指明了中国达到共产主义的途径，以及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

陈佑魁还在《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上发表了《中俄交涉与法国》、《泰戈尔来华》、《誓雪国耻》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或者揭露法帝国主义者利用中俄交涉归还中东路的时

①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卷上册第385页。

② 《湘报》增刊《五一节纪念号》（1924年）。

机，干涉中国内政，扩大侵略中国的罪行；或者大声呼吁不能让泰戈尔把他的颓病传播到所有被压迫的民族中去；或者猛刺那班宣扬封建老八股的复辟派，“欢迎野火烧长沙”^①。或者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利用曾在北洋军阀政府当过教育总长的彭允彝关于“近来各学校都染有过激派学说”的话，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受到广泛欢迎，“过激派在中国势力之可惊”。

一九二四年夏，陈佑魁调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他化名文中生，除了继续为《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写稿之外，还为麻阳旅常德、旅省学友会主办的《锦江潮》写文章；还组织党的活动分子深入到群众中去，举办平民学校、平民女子职业学校、补习班，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与此同时，他还被推选为团湖南区委执行委员，主持秘书、教宣和宣传委员会的工作，并兼管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经常往来于常德、衡阳、衡山、湘潭等地。他亲自组建了中国共产党衡阳和常德两个地方委员会，为发展这两个地区的革命运动作了重大贡献。

一九二五年元月，陈佑魁与几年前在自修大学补习班认识的进步女青年龙淑结婚。婚后不久，他即患严重伤寒病，许多天不大便，小便红得象血水，但他还是躺在床上批阅投考黄埔军校的试卷。当这批被录取的青年去广州学习时，他强打精神从床上爬起来，坚持给他们送行，勉励他们要“经受革命的考验”。

^①《湘报》副刊《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第5期，中华民国13年5月7日。

一九二五年十月，在陈佑魁等领导下，长沙发生了向日本轮船公司收回大金码头的事件。十七日，各工会和各校学生万余人举行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到达大金码头后，将占据码头的流氓势力赶走，把码头的全部用房交给码头工人管理，并迫令当局交涉司长答应，不再把大金码头租与日人，取得了这次反日斗争的重大胜利。同年十二月十七日，陈佑魁等领导长沙工人、学生、市民数千人举行了反“关税会议”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赵政府”等口号。示威群众涌到金家码头，举火烧了日商戴生昌轮船公司的趸船及警厅派去保护日轮的警船，并到仓皇街启封了赵恒惕戒严司令部封闭的铅印活版工会，打毁了通俗报的招牌与公众阅报栏。在中共湖南省委的正确领导下，湖南的反帝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一九二五年，陈佑魁派孙家信等人回到家乡麻阳县开展工农运动。孙家信回县后，在陈佑魁的关心和指导下，很快地建立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农会，使麻阳县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同年十一月初，长郡、兑泽中学开除曾三、段湘等省学联活动分子和二十余名进步学生，陈佑魁等人领导长沙三十多个学校三千多学生包围教育司，要求撤换长郡、兑泽校长，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这次请愿虽遭到军阀政府的武力镇压，但提高了学生的觉悟和团结力。

一九二六年春。全国面临北伐革命战争前夕。湖南省长赵恒惕与直系军阀吴佩孚联成一气，全力进攻投向广东革命政府的唐生智，并企图乘胜进犯广东。广东革命政府一方面准备派兵入湘援唐，一方面发动湖南人民展开驱赵运动。陈佑魁根据省委决定，召集长沙工会领导人张汉藩、袁福清等人开会布置，组织工人连夜印制和散发革命传单，同时利用湖南军阀内

部的矛盾，乘势组织群众逼赵恒惕下台。陈佑魁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同赵恒惕谈判下台条件。赵恒惕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被迫于三月十三日从长沙出走。五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进入湖南。七月十二日，北伐军进入长沙城。同月，陈佑魁接替罗学瓚的职务，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并掌管工会、农会、学联等团体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五日，陈佑魁奉命由长沙奔赴湘南重镇衡阳，接替郭亮临时任职，担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兼衡阳县委书记。陈佑魁抵衡后，即马罗芬、周鲁、彭平之、吴立广、刘子直、宾利用等人，分别在蒸湘、新民、成章、三中、三师等校教书，以教员身分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斗争。

为了加强党对湘南一带工作的领导，陈佑魁以极大的精力，着实地抓了党组织的建设。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衡阳建立起三十多个党团支部，发展党团员百余人，团结了大批革命积极分子和革命群众；还创办了《衡阳日报》，以罗芬任主编。陈佑魁白天教课，晚上则协助罗芬修改稿件、撰写社论；间或还到工农运动有基础的水口山、衡山等地去宣传，发动群众。陈佑魁还通过湖南区党委将派到叶挺独立团去的衡阳工农运动领袖屈淼澄调回来，负责领导衡阳近郊农民运动。他与屈淼澄一起深入到郊区农村，指导农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退押毁约和组织平粜的斗争。一天，陈佑魁和屈淼澄等农运骨干来到塑田余家祠堂，以代书问讯为名了解当地农民受苦受难的情况，发现当地许多贫苦农民都欠了土豪余纯伯的债，不敢起来和土豪作斗争。陈佑魁将代书问讯处搬到那土豪的家门口，以县党部名义发动周围的农民群众，到余纯伯家里开大会。在会上，陈佑魁用当地农民受剥削和压迫的具体事实，启发农民与余纯伯进行

面对面的斗争，迫使余纯伯当众承认减租退押，推动了该县农民运动的发展。

陈佑魁、屈森澄等还深入发动工人群众，并找衡阳正大公司总经理李向荣个别谈话，使他认清大革命形势，迫使李向荣把其控制下的衡阳城内的肥料码头行会交了出来，从而使得一千余码头工人从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紧接着陈佑魁等人立即把这些工农组成担架队和运输队，积极支援北伐战争。后来又以这支千余条扁担的农工队伍做骨干，在城郊办起了五十多个农民协会，发展会员数万人。广大农民在农会带领下，打土豪、斗地主，掀起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一九二七年春，在陈佑魁和湘南特委领导下，整个湘南地区有农协会会员一百五十万余人，约占当时全省农协会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衡阳一县竟达六十万，为全省之冠。

为适应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需要，陈佑魁与农委商定，在城南惠文学校和城北广德中学开办了两所农村短期学校。一所是农民运动讲习所，从各中学学生中挑选了一百三十多学员，编成两个中队，进行有关农运理论和军事常识的教育，并进行一点初步的军事训练。学习时间两个月，结业后，从中挑选了三十名送到武昌叶挺师教导大队受训，其他分到各县区、乡农协会中做农运工作。另一所是农村师范教育讲习所。结业后，分发到各乡充任小学教师兼作革命工作。陈佑魁亲自为两所学员讲授政党和历史课程。与此同时，陈佑魁还商得省党部和农运特派员陈清河、戴述人等人的同意，在省立第三中学原址扩充蒸湘中学规模，开办了衡阳政治讲习所、衡阳工运讲习所、衡阳妇运讲习所，分别分期对进步分子和知识青年进行基本理论知识的训练。学员毕业以后，派赴湘南各县广大农村和乡

镇，担任各项民众运动的领导骨干。陈佑魁本人选定衡阳北乡集兵滩作为全县开展农民运动的重点，派了共产党员肖觉先、戴经吾、毛泽建等人去领导。使这里农民运动搞得很出色，受到省党部的特别表彰，授以“模范农协”的金字大匾和“党国之光”的锦旗。

一九二七年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陈佑魁等人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他召集各种会议，举办各种训练班，并撰写文章，发表演说，积极学习和宣传这个报告，驳斥各种诬蔑农民运动的谬论，严惩敌人破坏农民运动的活动。正在这时，道县发生了惨杀省党部农运特派员陈清河的严重事件。陈佑魁对这件事特别关注和警惕。他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省党部，并和戴述人、张琼等，以省特派员身分，带领枪兵，星夜兼程，赶至道县，迅速将杨龙青等凶手捉拿归案，押到省城处斩。

为了反击土豪劣绅的猖狂进攻，陈佑魁按照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布置各县取消伪团防，迅速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在衡阳，陈佑魁商同县农协委员长罗子平，接收了县政府和县团防局三百多条枪枝，在蒸湘中学召开大会，成立了县农民自卫军，任陈卓一为自卫军大队长，设队部于彭氏祠堂。其后，陈佑魁又和特委其他成员，分别下到各县，帮助各区乡建立农民纠察组织，指导他们制造各种武器。仅衡阳一县，就造鸟铳一百三十枝，松树炮三十门，竹削刀十万余支，梭镖三十余万枝。陈佑魁还很重视在各县成立特别法庭，并常常亲自掌握严重案情的审判工作。特别法庭给革命群众掌腰，农民武装常常把罪大恶极，破坏农民运动的反动分子押解到县城，请求特别法庭处决。比如衡阳县特别法庭，在陈佑魁的支持下，

在庭长、共产党员罗子平的主持下，就及时镇压了血债累累的衡阳金兰寺团防局长黄庆萱、“地主党”（又称白化党）头子刘笠僧等一批反革命分子，沉重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

陈佑魁在一九二六年底至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还以公开共产党员身分，参加国民党衡阳市、县党部的工作。他在湘南特委委员、分管统战工作的蒋啸青的协助下，大力分化瓦解“左社”和国家主义派，争取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大多数中小学教员，积极扩大革命统一战线；他还积极改革教育、兴办学堂，繁荣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经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支援北伐革命战争，作了大量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佑魁深入衡阳东阳渡兵工厂和常宁水口山铝锌矿作调查，为成立工人武装纠察队作准备。

一九二七年四月底，陈佑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武昌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与湖南代表一起，力赞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提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他还多次访问都府堤毛泽东的住所，同夏明翰、罗哲、杨开慧等叙谈湖南政治情况，讨论对时局的看法。

长沙“马日事变”后，陈佑魁立即召开特委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衡阳反动县长徐芳济，和自封为衡阳警备司令的反动团长俞业裕，一面对陈佑魁等妄图安抚拉拢，一面发表威胁性演说，压制革命运动。陈佑魁针对其阴谋，于五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先后在雁峰寺坪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反蒋示威、铲除反革命分子的大会和县民大会。陈佑魁亲自主持这些大会并作政治报告，向各界代表阐明时局真相，揭露蒋介石、许克祥等反动派叛变革命的罪行，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加强团结，组织武装力量，坚决与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随

后，他布置城内革命同志，暂时放弃城镇，转向农村。五月二十七日凌晨，反动派在衡阳发动“沁日事变”，宣布封闭衡阳总工会、衡阳县农民协会，解散了农民自卫军、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革命团体，公开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但当他们将机关枪架到总工会、农讲所、农协会大门口时，各单位的革命同志早已按陈佑魁的部署撤走。当天晚上，陈佑魁等人在衡阳县北乡集兵滩庙溪山上，召开特委紧急会议。会议作出发动群众、组织工农、武装暴动、加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等五项决策；决定派罗子平等将工农武装分成四队，向东、南、西、北四乡，实行武装抵抗；派陈芬、夏明震等分赴衡山、来阳、郴县、道县、祁县等地，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发动工农，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武装斗争；特委和其他革命团体机关的部分同志，转移到南岳山，开展游击活动。陈佑魁将特委机关由濂溪祠转移到莲湖中学，旋又转到城郊接龙山；设置各种通讯联络渠道，指挥各地的游击活动和起义暴动。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分在湖南新省委会议上，毅然决定“湖南秋收暴动以长沙为中心”^①，通过总暴动，夺取长沙，“建立革命委员会”^②。陈佑魁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陈佑魁仍任湘南特委书记，并兼任湘南二十四县游击队总指挥。为了迅速开展工作，他和特委其他同志，日夜奔赴县区农村，恢复和重建党的基层组织，尽快将星散各地的同志秘密集中起来，分批开办短期训练班。“训练班的教材以新省委紧急会议决议案，湘南紧急会议决议案，游击战争

①②唐振南：《秋收起义原定湘南发动的原因》，载《湖南党史通讯》总第27期。

计划及农村暴动政纲等文件为主”^①。陈佑魁亲自为训练班作报告，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罪行。他还写了《建立武装参加秋收暴动》的诗歌，歌词大意是：工农团结起来向前进，拿着枪，扛着炮，纪律严明，精神百倍，冲向帝国主义大本营……^②。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衡阳。陈佑魁在县城，处境十分险恶。为了坚持斗争，他常扮作大商人、小伙计，或教书先生，坚守秘密联络站，联络同志，聚集力量，筹措枪支弹药，发布指挥命令。特委机关多次转移，最后，以潇湘河街三顺祠庙和八十一号邓牧良家为交通联络站。陈佑魁化装隐身于三顺祠庙。白天，端坐在香案前，敲击木鱼，口念经文，俨然一个活道人；夜晚，“接待各县来衡同志，把特委的指示传下去”^③，指挥各路游击队，积极响应和配合全省的秋收暴动和起义。

一九二七年十月间，陈佑魁指导屈淼澄、黄常岗等在衡北组织暴动，屈带领农军二百多人“夺取了衡山石桥团防局步枪三十余枝”。罗子平、夏明震带领几十人来支援，并广泛发动受苦农民参战，全县各乡的群众，“相机而起，声势浩大，乡里的反动大豪绅，几乎全肃清，县团防局与我战斗月余，均节节失败”^④。在衡北暴动影响下，相继建立了衡北游击师、第九支部等农民革命武装（后来又称工农革命军第八师、第九师），在衡

①陈佑魁：《关于湘南最近情况的报告》（1927年11月30日）。

②龙淑：《回忆陈佑魁同志》，载《湖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

③周子丙等：《马日事变前后的衡阳》，载《衡阳文史资料》1983年第1期。

④屈淼澄：《回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在湘南的战斗》，原文存衡阳市湘南学联纪念馆。

阳西北乡等山区坚持武装斗争^①。衡山、衡阳的反动军队和挨户团，龟缩县城，不敢出城门。

一九二七年年底，湖南省委又奉临时中央命令，布置年关暴动，攻取各个县城。陈佑魁即派屈淼澄去衡山，派夏明震、杜家俊、溥模等九人去耒阳、郴州一带开展斗争。随后又派团特委书记周鲁去这一地区协助指导军事行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衡山、耒阳、永兴、郴州、宜章、资兴、桂阳、蓝山、临武等县党的组织又迅速恢复或重建起来。在各地党组织的秘密领导下，各地农村不断发生暴动，武装斗争猛烈地开展。陈佑魁亲自到水口山矿区，依靠宋乔生等党团员骨干，组织上千工农群众，解除了矿警队和矿务局两处反动武装，得枪三百六十多枝。由此组成的工农武装，成为后来井冈山根据地红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斗争中，以陈佑魁为首的湘南特委的“左”倾情绪不断滋长。如在衡山召开的特委紧急会议就没有考虑革命处于低潮的实际情况，盲目地决定在各地公开举行反新军阀宣传活动^②，致使一些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同志惨遭杀害，不少革命群众和革命同情者被关进牢房。当时，在汝城、郴州一带工作的部分同志主张利用敌人的矛盾，让我们一部分武装力量暂时接受范石生收编，以谋保存工农武装。可是，陈佑魁等特委成员却认为这个办法是投机行为，决定“凡我之武装，皆不能受范收编”^③，拒不接受郴汝党组织的正确意见^④。

①衡南县、衡阳县农运调查办：《工农革命军第八师的战斗历程》、《衡北游击队的成立和斗争》，载《衡阳文史资料》1983年第1期。

②陈佑魁：《关于湘南最近情况的报告》（1927年11月30日）。

③④陈佑魁：《湘南特委给省委的报告》（1927年12月）。

一九二八年一月（即阴历腊月），陈佑魁派夏明震等参加了朱德在汝城召开的湘南和粤北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随后，他以湘南二十四县游击总指挥的身分，派高静山、胡世俭等前往广东韶关犁头铺，沟通朱德、陈毅部队跟湘南特委及宜章县委的关系，共同研究在湘南举行年关暴动的问题。同年二月十六日，陈佑魁等率领衡阳各地农民武装开赴衡阳将军庙矮子岭整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由屈淼澄任师长。接着，七师战士出击南岳，转战衡阳，牵制国民党反动派李宜煊师，紧密配合朱德、陈毅在湘南的行动，成功地支援了宜章年关暴动^①。嗣后，陈佑魁率特委及其指挥部移驻郴州，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连克郴县、永兴、资兴，直取耒阳。

湘南暴动后，在朱德、陈毅统率的工农革命军及地方农民武装的支持下，湘南特委和各县县委，迅速在湘南有关各县建立起人民政权——苏维埃政府。一九二八年三月，特委在永兴召开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大会选举陈佑魁为湘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制定和公布了湘南苏维埃政府政纲和宣言。革命群众欢欣鼓舞，庆祝苏维埃成立的活动持续了三天^②。

一九二八年二月，特委在永兴县城召开了宜、郴、耒、安、资等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即湘南党代会，陈佑魁出席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讨论和研究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和肃清反革命分子等问题，重点研究了土地革命问题。会议决定，必须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农民在暴动中得到利益。土地的

^①屈淼澄：《回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在湘南的战斗》。

^②徐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1928年6月），载《回忆湘南暴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

分配以乡为单位，紧密结合肃反斗争进行。

正当湘南暴动进入高潮的时候，蒋介石慌忙调集白崇禧、许克祥、范石生等部，联合当地反动地主恶霸武装挨户团，分别从曲江、乐昌向北，由衡阳向南，进行“会剿”，妄图一举扑灭湘南的革命烈火。以陈佑魁为首的湘南特委，没有冷静地分析形势，妥善筹划破敌之策，却错误地命令各县县委，动员群众“杀尽所有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以分散敌人的目标，焚尽湘粤大道（衡阳、郴州一线）五里宽民房，以打断和两广联络”^①。并错误地认为只要这样做，敌人就会不打自垮，在湘南站不住脚。特委书记陈佑魁和省巡视员尹澍涛等人还认为“中国文化落后的农民，要他们起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它，使他们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之余地。”坚持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左”倾理论。他们说“烧杀不会吓跑群众——我们的群众只有工农无产阶级，其余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②这种“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遭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反对，给地主豪绅造谣惑众、制造暴乱以口实，终于导致了郴州反革命暴乱事件（又称“反白事件”）的发生。

二月二十一日，郴县县委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进一步动员群众开始烧房子。一伙反革命暴徒蜂拥上台，把县委书记夏明震等县苏维埃的干部通通拖了下来，肆意毒打，用梭镖将他们全部杀死。接着，暴乱迅速扩大，仅郴州城内就有一千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会和农会干部以及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其他县亦有类似情况发生^③。

^{①②③}徐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1928年6月）。

远在耒阳的朱德接到郴州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消息后，立即派陈毅率部回师郴城。以陈佑魁为首的特委也从永新调来两个连增援。在两支部队的合力攻击下，很快平息了叛乱。陈毅在郴州召开了紧急会议，判处了煽动叛乱的地主豪绅，并公开向群众承认烧房的错误。在陈毅的帮助下，陈佑魁等湘南特委成员，积极处理善后，重建了郴县县委，陈毅任县委书记。特委书记陈佑魁被撤职调省，由杨福涛接任特委书记^①。

一九二八年四月初，陈佑魁怀着沉痛的心情，躺在一只装满了荸荠的小木船上，装成病人，由衡阳赴省检讨汇报工作中的错误。不料，他的行踪被叛徒胡光煊发现后向敌告密，接着，陈佑魁在长沙中南旅社被捕。

陈佑魁被捕后，敌党校教务处指导员李章送茶送水，假献殷勤，妄图策动陈佑魁自首。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不能，万不能！”李又叫叛徒罗璋和胡光煊轮流向陈“劝降”。陈顿足拍案，将两个叛徒骂得狗血淋头。几天后，敌人又请出陈的熟人、同学、同事、老师，甚至将他的同宗陈嘉任、陈嘉勋两兄弟也请了来，反复进行“劝说”。陈佑魁最后将计就计，要求给他一些时间，写篇自传在报纸上发表。敌人以为劝降成功，欣然应允。

陈佑魁利用有限的时间，愤笔疾书，写下了自己全生的斗争经历，洋洋万言。写到最后他以“甘愿砍头，流血，牺牲，此志坚决不渝，希望再不要向我作任何妄想”^②等豪言壮语结尾，表示了自己坚贞不屈的决心。敌人看后，这才知道中了

^①徐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1928年6月）。

^②许茹春：《目击陈佑魁烈士被捕及被杀害的经过》，载《衡阳文史资料》1983年第1期。

计。他们凶狠地质问陈佑魁：“你这最后几句话是什么意思？”陈佑魁义正词严地说：“这就是我的成功，我不徒今日成功，明日还要成仁。即成功，又成仁，这是人生最痛快的事。这个痛快事，又只有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才能做得出来。现在我的任务已告结束，什么顾虑也没有了。应做的事，应说的话，都已在我的自传中交代清楚。我这个陈佑魁没有了，我后面还有几千百个陈佑魁，都会照我这样去做，我再也没有什么顾虑。前次要求你们给我几天时间写自传，现在要求你们尽快缩短时间，把我提前处决。言尽于斯，请你们快点商量执行！”①

四月十九日清晨，陈佑魁被五花大绑推出囚牢。一路上，他气宇轩昂地高呼口号。刽子手用刺刀刺他的嘴，他仍呼不绝口，并以鲜血喷敌人。最后在浏阳门外壮烈就义。

陈佑魁对革命的耿耿忠心和勇敢的献身精神永远留在人民的心里。谢觉哉曾写诗怀念他和罗学瓚烈士：

浑身是劲陈佑魁，
鞭劈入里罗学瓚。
远瞩高瞻天下小，
出生入死一边站。
忠义之血不白流，
阶级之仇彻底算。
三十年前恶战场，
巍然两个英雄汉②。

①许茹春：《目击陈佑魁烈士被捕及被杀害的经过》。

②原件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龙淑回忆资料《忆佑魁》等，原件存衡阳市湘南学生联合会旧址纪念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2.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 湖南省图书馆校编：《新时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 衡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衡阳文史资料》1983年第1辑。
5. 长沙《大公报》（1919年—1928年）。
6. 湖南革命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湖南革命史资料集》第2卷。
7. 衡阳市委编：《衡阳市概貌》（1958年9月）。
8. 《衡阳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学录》，原件珍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9.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湖南党史资料通讯》，中共衡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衡阳党史通讯》，中共郴州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郴州党史通讯》。
10. 访问李维汉、易礼容、肖三、刘英、曾志、张琼、谷子元、屈子健、刘爱农、郑家钧、向大名、陈新宪、龙立初、刘子直、许郁、肖伯麟、蒋隶衡、陈锡圭、邓牧良，及亲属龙淑、陈仇白等的记录。

朱 少 连

陶 宗 侃

朱少连是安源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九年一月壮烈牺牲。

朱少连，原名天资，字汉英，号孝莲，一八八七年三月二十日（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二月十六日）生于湖南省衡阳县竹花乡（现在的曲兰乡湘西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朱尧乾，靠租种朱族两亩公田和打短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朱少连八、九岁时，就上山砍柴、割草、放牛，晚间父亲教他读《三字经》，后借钱送他到宝莲堂刘朴斋先生那里上私塾^①。

朱少连读书勤奋，学业进步很快。朱族长辈见他聪颖过人，商定从公田中提取部分租谷，资助他于一九〇四年进入衡阳城里一所中学读书。毕业后，考上了湖北铁路学校。一九一二年在铁路学校结业，被分配到株萍铁路实习，随后正式当了火车司机，成为我国早期的有文化的铁路工人之一^②。

一九二一年，朱少连被提升为株萍铁路管理局行车部总司机^③。他的妻子黄琼英带着年幼女儿子昭、子明，也从衡阳老家

①烈士女儿朱子明回忆材料。

②《湖南烈士资料辑》第41页，湖南省博物馆1966年撰编。

③《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第427——45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

迁来江西萍乡，在安源镇牛角坡租住一间房子。一天，经老工人杨连秋引荐，朱少连在安源镇的刘和盛小饭店内屋，第一次会见了来安源考察的毛泽东和李立三。这次会见使他十分高兴，当即要求毛泽东能来安源帮助大伙赶走欺压工人的安源煤矿总监工王鸿卿（外号王三胡子）及其干儿子石七麻子，并历数了王三胡子和石七麻子等人横行霸道的罪行。毛泽东、李立三与他一起谈到深夜，讲了许多工人求解放的道理，少连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第二天，毛泽东等人乘车返回湖南，临行时对朱少连说：“不久就会有人来安源帮助你们工作。只要把工友们团结起来，提高觉悟，事情就好办了①。

十多天后，李立三乘车来到安源，一开始就住在朱少连的家里。朱少连协助李立三，很快办起了平民学校。不久，蒋先云和蔡增准等人亦陆续来到安源。在平民学校的基础上附设工人补习班，吸收工人夜晚上课。朱少连参加校务委员会，并积极发动路局工人和煤矿工人来校学习。

那时，毛泽东住在长沙清水塘，担任中共湖南支部（后为湘区委员会）书记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李立三常叫朱少连利用跑车的机会，去清水塘向毛泽东汇报安源的工作情况。毛泽东也常让朱少连把《新青年》、《工人周刊》等进步刊物带回安源。一九二二年二月，李立三在安源发展了朱少连等六名工人入党，建立了全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②。

党支部成立以后，朱少连立即与支部书记李立三商量组织

① 《红色安源》第318——320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2版。

② 《湖南党史资料通讯》第4期，（1982年3月25日）。

工人结成团体的事。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六日，李立三、朱少连在工人补习学校召集积极分子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确定团体定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把铁路工人和煤矿工人都组织到一块，并推选出李立三为工人俱乐部的筹备主任，朱少连为筹备干事。会后，李立三和朱少连草拟了成立工人俱乐部的章程草案，规定俱乐部的宗旨为“联络感情，交换知识”。在四月一日召开的第二次筹备会议上，讨论了章程草案和呈文立案事宜。商定以李立三、朱少连、蒋先云等十人的名义呈报萍乡县署，并设法利用副矿长舒修泰与矿长李镜澄的矛盾，使呈文很快得到了县署的批准。四月十六日，李立三、朱少连主持召开第三次俱乐部筹备会，决定在“五一”劳动节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部址暂设牛角坡五十二号。第三次筹备会议通过投票，一致选举李立三为俱乐部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还选出评议干事七人^①。

五月一日下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如期召开。李立三讲话之后，朱少连向大家宣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诞生，宣读了工人俱乐部的章程和部员公约。会上还散发了传单，广泛宣传工人组织团体、成立俱乐部的意义，会后举行了大游行。这是安源工人第一次公开的有组织的行动。工人们手拿彩色小纸旗，唱起刚学会的《五一纪念歌》。朱少连领头高呼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劳工万岁！”“俱乐部万岁！”这天虽然下起了小雨，但工人们游行时情绪激昂，晚上还演出了新剧，一直闹到深夜。

俱乐部成立以后，如何扩大俱乐部在工人中的影响，发展更多的工人参加到俱乐部中来，朱少连认为必须帮助工人解

^①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决一些切身利益问题。他找李立三商量说：“假如我们能在经济上帮助工人解决一些困难，一定要比在口头上讲俱乐部如何好会有效得多。”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干事会上，李立三提议立即着手创办工人消费合作社，让部员能买到一些便宜物品，减少商人的中间剥削。根据干事会的决定，参加俱乐部的工人每人拿五角钱作股本，办起了小型消费合作社，门市部暂设俱乐部内，朱少连兼任工人消费合作社副总经理。合作社七月份开门营业，商品齐全，价格低廉，工人个个说好。从此，加入俱乐部的人迅速增多，在册部员一下子增到七百多人^①。

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日（农历六月初七），朱少连受党组织的委派，来到株洲转运局，通过多方串连发动，九月二十三日，株洲工人俱乐部也正式成立了，定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分部。至此，萍、株两地路矿工人都有了自已的组织。朱少连在团结教育工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一九二二年七月，湖北汉阳铁厂工人因资本家用武力强迫解散工人俱乐部，掀起了全厂大罢工并获得胜利。消息传到安源，工人们大受鼓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趁此时机，向工友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是为了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这样，入部的人越来越多，声势一天天壮大。路矿当局十分着慌，想方设法，企图控制、解散这个组织。但鉴于汉阳铁厂因封闭俱乐部引起了罢工，不敢轻易动武。掌握矿局实权的副矿长舒楚生，便想用重金收买俱乐部的领导人。一天，舒楚生满面堆笑，亲赴俱乐部，对朱少连说，

^①工人消费合作社在大罢工后扩充股本。于1923年2月7日另立门面开业，由易礼容、毛泽民相继任总经理。

当局打算调出一所上等房子给俱乐部办公，并愿意给俱乐部办事人员一大笔津贴。当即遭到朱少连义正辞严的拒绝。舒楚生自讨没趣，十分气恼地走了。

舒楚生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并不死心。他了解到路局职员徐海波是朱少连的老同学，便同路局机务处长商量，叫徐海波去做朱少连的工作。九月七日，徐海波怀揣三百块银元，来到俱乐部小房子里，见到朱少连，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把路矿当局已经注意俱乐部的事情讲了一番，并说：“看在好友份上，愿以三百银元相赠，请不要再替俱乐部办事了。”朱少连听了极为生气，认为这是对他极大的污辱，顿时变了脸色，厉声说：“别胡说了，你以老同学的身分来这里玩玩，我欢迎；要是来替路矿当局做说客，那就莫怪我不讲情面了！我朱少连秉光明正大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说着，把手向门外一指：“请吧！”徐海波又碰了个大钉子，红着脸悻悻而退^①。

路矿当局阴谋未逞，便诬蔑俱乐部是“乱党机关”，呈请萍乡县署正式出示，“训令”俱乐部自行停闭，并驱逐朱少连出境。工人闻讯，极为愤慨。马上召集俱乐部工人代表开会，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采取强硬的罢工斗争办法来对付路矿当局。此时，粤汉铁路罢工的消息也传到安源，对工人的鼓舞更大。路矿当局害怕工人闹事，便向俱乐部提出不将县署“训令”公开，并表示愿意前往官厅疏通，保护俱乐部。朱少连等趁此时机，向路矿两局提出三项条件：一，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二，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二百元；三，从前积欠工人存饷限七日内发清。此条件

^①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须于二日内完全答复，否则即行罢工。

九月十一日，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派刘少奇来安源参加罢工斗争的领导工作。朱少连闻讯，赶往株洲把刘少奇接到安源。

十二日晚，在李立三主持下，党支部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具体部署罢工事宜。会上，朱少连宣读了毛泽东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关于支持工人罢工的来函。毛泽东在信中指出：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依靠工人坚强的团结和顽强的斗志；同时，要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来函说：

“……请你们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伏。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有代价，死有价值！我们对于你们表无限的同情，决设法为诸君的声援！”^①这些来函给朱少连和工友们以极大的鼓舞。会议经过讨论，成立了罢工领导机构——罢工总指挥部，李立三任总指挥，朱少连任副总指挥，刘少奇任全权代表。

十三日晚十二时，震撼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了；朱少连指挥安源车站火车房的汽笛，首先大声吼叫着。与此同时，他把事先拟好的罢工宣言和向路矿当局提出的十七个条件四处张贴。宣言“哀而动人，言简意明”，其中写道：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啊！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啊！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啊！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啊！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

^①转引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啊！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下面另附。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作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作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①

大罢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得到了兄弟组织的声援和全社会人士的广泛同情。路矿当局慌了手脚，向赣西镇守使署、萍乡县署和上海总公司连发了三份所谓“乱党造反”的告急电报。接着又使出了各种阴谋手段，破坏罢工。矿长李镜澄一面假意表示愿意派代表与俱乐部接洽，一面指使总监工王鸿卿召开路矿两局包工头的紧急会议，布置各包工头动员与自己有亲戚关系的工人去上班，叫喊“凡入窿者，即不作工，亦照常发给工资。”工人监察队对此早有准备，使路矿当局的阴谋未能得逞。路矿当局又以重金雇佣军警来矿镇压。十五日上午，赣西镇守使肖安国宣布安源为“特别戒严区”，派旅长李鸿程任戒严司令，带领军队从萍乡开到安源。工人一见，群起反抗，数千工人冒死冲入俱乐部，把军队赶了出来。朱少连与刘少奇商量，组织宣传队向军队宣讲工人罢工的道理，指出：工人罢

^①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工，是由于受资本家、工头的压迫剥削太重，无法生活。你们当兵的，也多是工人、农民的子弟。工人、农民、士兵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苦同胞。你们不要受骗，应该同情罢工。通过宣讲以后，士兵们都各自四散了。有的还说：“我们都是外地人，谁愿意来干涉你们的事！我们不过是两块钱一天请来的呀！”就这样，武力镇压的阴谋也破产了。

武力解决不行，路矿当局于是发出请帖，说是“由路矿两局代表同李能至（即李立三）去商会谈判”。朱少连带领几个工人陪同李立三一道到达商会会议室后，见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酒餚和一捆捆红纸包好的银洋。李立三严正指出：“要谈，就把工人提出的十七条摆到桌上来谈，想用这种勾结行贿的办法，那是把谈判的题目弄错了！”朱少连斩钉截铁地说：“不承认条件，便没有说话之余地！”

路矿当局慑于工人的强大力量，唯恐不能保住千数百万之产业，又在商会及地方绅士的请求下，不得不同意实行调和，磋商条件。十七日晚，朱少连和刘少奇、李立三等代表一万三千多工人，在坚持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原则下，同路矿代表、安源镇商会、地方绅士等调人进行磋商，将十七项条件简缩为十三条。十八日早晨，路矿当局终于在条约上签了字。为期五天的安源大罢工，至此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朱少连与刘少奇后来在台写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一文中写道：“……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五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用费计一百二十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

罢工胜利以后，加入俱乐部的工人由原来数百人一跃而为一万三千多人。工人阶级的觉悟得到很大地提高。经中共湘

区委员会同意，安源党支部把在罢工中涌现出来的大批先进分子，吸收为党团员。俱乐部也进行了重新改组，选举出各级代表及职员。按照俱乐部章程，每十人中选一名“十代表”；每百人中选一名“百代表”；每个单位还选出一名“总代表”，共选四十五名。在十月下旬召开的工人代表会议上，选出俱乐部四个主任，即：总主任李立三，路局主任朱少连，窿外主任刘少奇，窿内主任余江涛，成立主任团。下设各股和委员会，委任了各股股长和各股委员三十余人。

通过罢工，工人工资普遍提高了三分之一。在代表会议上，工人代表纷纷提出要给朱少连等领导人以高薪金，每月至少应拿两百块钱。朱少连严肃认真地说：“我们搞革命，不是为了图享受。既然大家都信赖我们，就不要拿我们当外人，更不要把我们和资本家当官的相比。大家生活都很苦，我们拿一二百元钱不就脱离工人群众吗？我看有十五元一个月就不错了！”李立三、刘少奇也同意朱少连的看法。最后，俱乐部作出正式决议：从主任、股长到勤杂人员，每月的生活费都为十五元。消息传出以后，工人们无不称赞：“我们俱乐部的这些负责人，个个一心为大家，不辞劳苦，不计报酬，真是工人们的好领导啊！”

俱乐部改组以后，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了罢工的胜利成果，为工人创办了各种事业。如设立文化补习学校七所，工人读书处五所，工人图书馆一所；还扩大了消费合作社，建立了青年娱乐部。

原来，俱乐部在牛角坡办公，以后搬到半边街的延龄堂，房子都比较窄小。罢工胜利以后，部员迅速发展。为了进一步提高工人的觉悟，需要召开各种会议或举办训练班，都因房屋

窄小没法进行。大家认为：俱乐部要是建造起一座大楼，那就好了，一方面能够解决开会的场所，二方面也可以壮一壮工人的声威。经过俱乐部代表会议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刘少奇、朱少连提出兴建俱乐部讲演厅的建议，并确定朱少连负责有关地址的选择、图纸的设计、材料的安排等各项筹备工作。十月八日，俱乐部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成立建筑委员会，从部员中推选十二人为委员，朱少连为委员长，负责建筑讲演厅的全部领导工作，下设采办处、庶务处和工程处，从十月十八日起全面动工。朱少连深入工地，加强领导，建设工程进展很快，到第二年五月一日便宣告落成。这座大楼从外看，宏伟高大，落落大方；从内看，画栋雕梁，古色古香；正中宽敞的讲演厅，能容纳八百多人，讲台的对面和左右，共建通楼三层，能坐五六百人；主席台的墙壁上悬挂着列宁的巨幅画像，上方挂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大字横幅。工人们来到这里，都感到十分亲热^①。

朱少连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路局主任以后，更加积极地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他代表株萍铁路工人，到长沙新河总站，出席粤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这个总工会是由徐家棚、岳州、株萍、新河四个工会组织起来的。毛泽东主持了成立大会。会后，朱少连作为株萍铁路的工人代表，提出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建议，得到了各个工会代表的一致赞同。十一月五日，召开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筹备会议，朱少连被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章

^①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4 月版；
《红色安源》。

程，议定了代表会议的八条规则，选举毛泽东为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瓚、朱少连、朱锦棠等为各部正副主任^①。接着，朱少连又作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代表，赴汉阳、大冶等地参加了组织汉冶萍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在他和其他代表的共同努力下，这年十二月十日，汉冶萍总工会正式成立^②。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朱少连与李德炳两人，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派遣，前往株洲转运局领导工人罢工，给转运局的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局长胡省三被撤职，工人们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经济生活得到很大改善^③。

六月，朱少连作为株萍铁路工人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④。

一九二三年八月，为了总结一年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经验，朱少连与刘少奇合写了近两万字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详细地叙述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情况。其中写道：

“……安源路矿工人过去的胜利，一面是靠着工友坚强的团结、得时的反抗、以及对自己的团体——俱乐部——之悦意的服从与热诚的拥护；一面乃是由于路矿两局前此森森的黑幕与此时不智的应付。……我们今后不仅应为我们自己的团体，为我

①1922年11月11日《晨报》；李锐：《毛泽东同志初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版。

②《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③《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大事记》（1919—1930），安源纪念馆编印。

④《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载1981年6月4日《人民日报》第5版；罗章龙给中共衡阳县委党史办的信。

们万余苦朋友，努力奋斗，我们更应为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苦朋友努力奋斗！我们一面要去唤醒后营的伙伴，一面自己打迭精神收拾器械预备开赴前敌。时机何等紧迫，责任何等重大！……”充分体现了安源工人为谋取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决心。

同年九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为纪念罢工胜利一周年，出版了《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朱少连为纪念册亲笔书写了如下的题词：“保存精确诚实的计划，经济的做事，不要骄傲，不要游荡，操作时，遵守严格的规律。”^①

一九二五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呈现出风起云涌的形势。五月一日，朱少连与刘少奇、李立三等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上通过了三十多个决议，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朱少连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②。

九月，汉冶萍公司总经理、大资本家盛恩颐窜来安源，暗中勾结湘赣两省军阀，谋划用武力镇压安源的工人运动。九月二十日深夜，赣西镇守使李鸿程率领军阀部队开进安源，包围了工人俱乐部，断绝所有交通，对俱乐部、学校、合作社和工人餐宿处进行大搜捕、大抢劫。这时候，朱少连已离开俱乐部回到家里，刚入睡，就被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惊醒。居住在俱乐部后面的铁路工人家属陈妈妈，以借米为由跑来送信，告知俱乐部、夜校、合作社等机关都已被围，敌人正在大肆抓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和一些工作人员都被捕了。朱少连闻讯，心急如焚，要去抢救。陈妈妈一把拖住他说：“敌人正要抓你，你

①题词照片存安源纪念馆。

②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1930年6月）。

去不是自投罗网吗？还不快走！等以后再设法救他们嘛！”说着，陈妈妈就把他带到后山一个姓易的工人家里。朱少连离开不久，敌人就进了他家的门，见他不在，便将他妻子打倒在地，限第二天交出人来。第二天天未亮，陈妈妈的儿子和姓易的工人，掩护着打扮成农民模样的朱少连，从后山绕道走出萍乡^①。

俱乐部遭破坏后，安源工人运动受到极大的摧残。朱少连根据党组织安排，组织一部分工人去广州学习和参加革命军，一部分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朱少连在醴陵阳三石又组织了株萍铁路总工会，他被选为总工会主任^②。五月一日，朱少连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会上作了《安源路矿工人之奋斗》的发言，向大会报告了工人俱乐部受到反动势力摧残的情况。他说：“五年前的‘五一’节，株萍铁路工人与萍乡煤矿工人合组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适于是日成立，厥后以很幼稚的组织，处于很恶劣的环境，竟能奋斗三年，颇著成效；不幸经‘五卅’惨案之余波，忽被武力摧残了！牺牲了我们的领导者——黄静源同志及战士三人，劫抢并捣毁了我们的建设事业——消费合作社、学校、图书馆、旬刊社……等机关，驱逐了我们的战士一万三千人，使之受失业的痛苦和恐慌。……”接着，朱少连讲了“失败的原因”、“失败时的情形”、“失败后的各方面”等三个问题。最后，他说：“综观以上情形，我们一面看出敌人的罪恶，一面也应注意并纠正自己的缺点，即工会的内部组织不能完全公开，应付的策略要十分确当！这是我们所得的教训。此

①老工人陈建元回忆材料：《红色安源》。

②《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第14期，（1926年12月15日）；老工人刘运林回忆材料。

后我们要努力于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及其走狗工贼的工作。我们应为死者复仇！我们要求解决失业问题！我们要恢复保障我们利益的工人俱乐部！”^①

同年八月，朱少连代表株萍铁路工人，向国民革命军总部请愿，要求发放工人欠饷^②。九月六日，北伐军从湖南进入江西，到达萍乡。赶跑了军阀部队。十日，朱少连与俱乐部干部刘昌炎、周怀德等一道回到安源。安源工人敲锣打鼓，夹道欢迎。萍矿矿警局局长沈开运九月十二日在致汉冶萍公司经理的信函中写道：“……九月十日，工党首领朱少连，由醴陵来安恢复工人俱乐部，聚众欢迎者不下万余人，此安源近日之情形也。……”^③朱少连到达安源后，立即把工人组织起来，包围矿局办公大楼，把那些一贯欺压工人及帮助军阀屠杀工人的反动分子抓来作了处理。并召开了有二十七个工农团体和二万三千多群众参加的俱乐部恢复大会，成立了萍矿总工会。工人秘密保存的俱乐部大旗重新飘扬在安源上空，俱乐部门前牌坊上写着“也有今天”四个大字。党在安源成立了地委，工人运动又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十月十六日，安源路矿工人为纪念黄静源烈士牺牲一周年，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朱少连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会为黄静源烈士在殉难处竖立起高大的纪念碑，朱少连亲笔撰书“静源同志事略”的石刻碑文^④，记述了黄静源烈士英勇牺牲

①《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刊》第6期（1926年5月8日）。

②1926年8月28日《湖南民报》，《劳动界要讯》。

③汉冶萍公司历史档案《萍矿矿警局局长沈开运致公司总、副经理函》（民国15年9月12日）。

④碑文照片存安源纪念馆。

的感人事迹，表达了安源工人继承烈士遗志的革命信念。十二月，朱少连代表萍矿总工会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并作了《萍矿总工会工作报告》^①。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制造了血腥的“马日事变”。朱少连、刘昌炎以安源工人纠察队为骨干，立即组织了一支两千多人的武装队伍，准备参加农军进攻长沙的战斗^②。工人武装和农军队伍到达易家湾时，与许克祥的反动军队相遇，发生激战。打死敌人两个连长，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枝^③。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朱少连只得把工人武装撤回安源。

六月十一日晚上，地主武装分四路乘夜袭击安源，被安源工人武装打退后，又改取围困的办法，将安源团团围住，断绝了路矿工人的粮食、蔬菜供应，并不时对工人武装进行突然袭击。朱少连、程昌仁采取“小股解决”、“重点突破”的战法，对付敌人。对于前来骚扰的小股敌人，他们指挥工人武装与之搏斗，速战速决。工人武装枪支弹药不足，朱少连组织大家用矿上炸岩石的炸药，放进铁砂、铁钉、瓷渣、玻璃碎片等物，装上雷管、引线，制成简易手榴弹（形状象蒜头，浑名“洋蒜古”），响声大，杀伤力强，打得敌人惊恐万状。朱少连乘机派铁路工人开火车冲出包围，到丹江等地从大土豪家里搞

①《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第14期，（1926年12月15日）。

②《湖南党史资料通讯》第7期，《关于马日事变后农军进攻长沙问题座谈会纪要》；《朱少连简历》，载《党史研究资料》总69期。

③王正光、王再庭等当年工人纠察队员的回忆。

回稻谷，分给工人兄弟，解决路矿工人的粮食问题。

地主武装对安源久攻不克，军心开始动摇。朱少连等决定加强政治攻势。他一边命令战士们对俘虏实行宽待政策，向他们进行工农一家人的教育；一边组织工人武装利用战斗空隙，向敌方高声喊话：“我们工农都是劳苦人民，同是受压迫的穷兄弟，不要为地主土豪卖命！”敌人的士气更加低落，开小差的日渐增多。

安源被围困十七天后，醴陵县的农民自卫军前来支援，地主武装被迫撤退。一场保卫“小莫斯科”^①的战斗，终以安源工人的胜利而宣告结束^②。

“八七”会议后，朱少连受“整理汉冶萍委员会”之委派^③，以株洲转运局长的名义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九月初，毛泽东从长沙到株洲，会见了朱少连^④，随后便去安源张家湾召开有秋收起义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和军事负责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对起义进行具体部署。九月八日，中共湖南省委、行委颁发了《关于秋收起义的命令》，任命朱少连为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⑤。朱少连在株洲与袁德生、蒋长卿等人迅速组织工农起义队伍，以运煤工人为主体的联合八迭、残梅等地的农民武装三百余人，准备在九月十日（农历八月十五）攻打株洲团防局。

①当时全国各地工农革命群众把安源称为“小莫斯科”。

②《安源工人运动史》，《安源煤矿矿史》（均1959年6月稿）。

③《朱少连赴株组织转运所及逃散情形》，（汉冶萍公司历史档案，民国16年10月11日）。

④陈永清的回忆材料。

⑤《湖南省秋收起义的命令》存安源纪念馆。

九月九日，朱少连用火车从安源运来大批安源工人自制的武器——“洋礮古”和“土炸弹”。晚上，他把参加起义的工人积极分子集合到衣冠冲开会，教练“洋礮古”和“土炸弹”的使用方法，布置分三路包围团防局：住在八迭一带的工人，从河边堵住团防局的出路；住在南华一带的工人，堵住团防局的侧门；白关一带的工人担任正面攻击，信号是“九响棒棒”（毛瑟枪）打一枪，口令是：“前进”、“冲锋”。

为了作好充分准备，暴动按原计划推迟了两天。九月十二日晚上，一百多工人暴动队伍，汇集到七斗冲的凉坨坳上。午夜时分，信号枪打响了！朱少连带领一队战士从田坎上一跃而起，冲至团防局，纷纷投掷“洋礮古”和“土炸弹”，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以冯福林为头子的团防局四十多名团丁，一边慌乱地打枪，一边向侧门退却。刚退到侧门边，又遭到南华一带工人队伍的阻击，敌人更加慌乱，一窝蜂似的跑出了后门。由于担负堵住后门的三十多人没有及时到达，敌人从街上冲到江边，解下江边的渡船，划到湘江西岸，与藕花庵团防局会合。起义队伍追赶一阵之后，即返回进行搜索，共获步枪十二枝、刺刀二十把^①。

由于敌人的疯狂反扑，朱少连等带领的这支队伍没有可能与其他起义部队会合，不得不暂时分散隐蔽到附近农村。随后，他们先后袭击过姚家坝、白关铺，镇压了保产党大地主刘先岩、黄世益等人。

一九二八年二月，朱少连等人根据党的指示，在株洲靠近浏阳、醴陵的一个山区——残梅乡，召开湘潭、醴陵、浏阳

^① 《株洲工人运动史片断》，《秋收暴动的株洲》（均1959年稿）。

等县工农骨干大会，筹划扩充游击队伍，奔赴井冈山。参加这次大会的近两千人，朱少连在会上讲话宣布：参加队伍上井冈山的同志安排好妻儿家室后，立即出发；其余的同志留在当地继续搞隐蔽的斗争。会上共组织一个团的兵力，由朱少连任团长，率队去醴陵黄土岭同其他上井冈山的队伍会师。在途经醴陵时，朱少连曾组织队伍攻打县城。但守敌已有准备，起义军伤亡甚众，不仅县城没有攻下，去黄土岭会师上井冈山的计划也未实现。此后，敌人四处设防，起义军弹药耗尽，湖南省清乡督办署又悬赏三百大洋通缉朱少连。于是，朱少连只好只身潜回衡阳老家，在朱公祠小学教书。

这时，国民党在安源驻扎几个团的兵力，声称要“血洗安源”、“杀尽共产党员”，并千方百计寻找朱少连的下落。农历十一月，敌人欺骗住在安源的朱少连家属谢清秀和族叔朱洪锦，叫他们去衡阳找寻朱少连，诡称安源的共产党组织已经恢复，望朱少连速回安源，开展革命工作。谢清秀和朱洪锦信以为真，遂返回衡阳竹花乡找到了朱少连。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四）下午，朱少连与家住醴陵的工人石作东^①同车到达安源，便衣特务立即跟踪。当天深夜，朱少连即遭逮捕，被押往萍乡县监狱。

反动派捉拿到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朱少连，如获至宝。开始，他们用金钱和地位作诱饵，企图收买朱少连，遭到朱少连的严词痛斥。后又施行种种毒刑拷打，企图迫使他屈服，供出党的组织。朱少连守口如瓶，坚不吐实。一月八日凌晨，朱

^①石作东 1922 年入党，俱乐部恢复时任过路局副局长，与朱少连一道被捕牺牲。

少连被敌人杀害于萍乡，时年四十二岁。

当天下午，安源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得悉朱少连被害的噩耗，个个悲愤填膺。他们开上小火车来到萍乡。青年工人陈建元、王仁照冒着生命危险，把朱少连遗体抬到僻静的铁路旁，装上火车运回安源，安葬在花冲南面的山坡上。一九五六年，江西省人民政府拨出专款，在安源镇牛角坡为朱少连烈士修建了陵墓。

附 本文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有：

1. 《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2 月版。
2. 《湖南省志》：《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湖南省博物馆 1958 年撰编。
3. 《朱少连烈士专题整理资料》，安源纪念馆 1980 年 10 月稿。
4. 肖劲光、陈永清、刘亚球、易礼容、张琼、吴化之、罗章龙、张理全、胡华全、易友德、黄其福、王正光、王再庭、陈建元、谭汉清、彭国俊、邓佑满、邓岳芳和烈士家属、亲属黄琼英、朱子昭、朱子明、朱子金、朱梅初、谢清英、杨因哲、聂玲珊、邹修荃、朱湘、朱天章、朱清松等回忆和访问材料。

刘 愿 庵

王 斌

刘愿庵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他自一九二五年入党后，历任中共成都特支书记，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秘书长、代理书记、书记等重要职务，为发展四川党的组织，发动工农运动，组织武装起义等，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一九三〇年五月，在重庆英勇就义。

(一)

刘愿庵，原名孝友，字坚予，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六日出生在陕西咸阳，其父刘次候是个军人，驻防西康，全家随其移居四川成都。刘次候知识渊博，阅历丰富，并擅长医术，为人正直廉洁，虽在军界任职，却很少积蓄，加之乐于助人，常周济亲友，因而家庭经济并不宽裕，刘愿庵成长在这样的家庭中，对他后来走向革命道路有一定的影响。

一九〇八年，十三岁的刘愿庵随父去南昌，进入大同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刘愿庵弃学参加了学生军。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学生军被解散，刘愿庵又回到四川，在乐山电报局担任长途电话线路的勘测工作。他同工人在一起，并常与附近农村的贫苦农民接触，深感人世间之不平，思想感情发生了急剧变化。

一九一九年，刘愿庵经人介绍，到驻万县的军阀卢锡卿部当参谋。他博学广闻，能写善辩，深得卢锡卿的赞赏，凡是难办的事情，卢都要他去办。当时，在卢锡卿管辖区内的一个深山老林里，有一股土匪，颇有势力，卢想去招安，苦于没有办法，于是派刘愿庵去做招抚工作。刘愿庵进山后，住在一所寺庙里，与和尚谈佛论经，甚为投机。待混熟后，他动员长老说：劝匪投诚是化恶为善，希望长老能大力帮助。并先奖给了寺庙一笔现金。长老被说服后，去见土匪头子，以官位利禄相许诺，规劝土匪头目投诚，获得成功。刘愿庵怕土匪投诚有诈，先要他们去平定另一股土匪，以作归顺的“进见礼”。土匪头子为了升官发财，唯命是从，奋勇登山，终将另一股土匪荡平。时值数九寒冬，土匪头目见刘愿庵穿着单薄的衣衫，即以狐皮袄子相送。刘愿庵婉言谢绝说：“我个性耐寒，不需此物，可分给军中无衣者。”后来他对人讲：“盗贼赃物，岂能污吾身！”平匪任务完成后，卢锡卿更加器重刘愿庵，先调他任杨春芳部秘书，一九二二年又任丰都县县长。

刘愿庵到丰都县上任时，身着布衣，脚穿草鞋，进县城后先住在旅馆里，调查社会，了解民情。当地豪绅为了向新县长献殷勤，纷纷送来厚礼，均被刘愿庵谢绝。上任后，他首先复查案件，清理冤狱，将一些无辜受害的劳动群众释放回家；对各种徭役赋税一一清查，对那些残酷盘剥劳动群众的苛捐杂税全部废除；将一些欺压人民群众的团总，贪赃枉法的官吏，分别给以撤职，警告和罚款等处分。他采取的一系列有力措施，深得群众拥护，人民称他为“刘清官”^①。

^①见《朱挹清同志谈话记录》（1979年）。

刘愿庵的行动，引起了当地劣绅和驻军团长的憎恨，纷纷跑到杨春芳那里去告状。杨春芳对刘愿庵的作法也早已不满，便下令革除了刘愿庵的县长职务。刘愿庵愤然离开丰都，去成都刘泗英办的西南公学当国语教员，从事教育事业，开展新文化、新思想的宣传活动。丰都人民对新县长遭到排斥打击，愤愤不平。为了表彰刘愿庵的功德，群众自动给他立了得政碑。

(二)

一九二三年初，恽代英由泸州经重庆到成都从事革命活动。他约集成都的先进知识分子刘愿庵、邹进贤、刘春晖、刘竹贤等，组织学行励进会，以切磋学习，砥砺品行，不吸烟，不嫖赌，勤俭节约等规范相约束；并发行《励进周刊》，传播革命思想^①。后又建立起蓉社，发展社员二十多人。这期间，刘愿庵与恽代英接触频繁，相知渐深，遂结为好友，立志“以谋求中国人民及全世界被压迫者的解放为终身事业”。经恽代英介绍，刘愿庵去川南师范教书。

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逐步高涨的革命运动从广州波及全国时，刘愿庵到宜宾，任刘光辉第九师司令部咨议官、兼《叙州日报》总编辑^②。此前，刘春晖回到宜宾，已先后邀集同盟会员陈宣三、尹绍州和郑量澄、黄雨岩、潘学海、张立如等人，成立了青年读书会。刘愿庵来后，由于他活动能

^{①②}张立如：《关于宜宾青年读书会成立的经过》（讲话记录，1964年）。

力强，又在师部和报社工作，接触面广，联系群众多，很快就介绍了叙州联中等校师生多人参加读书会。他们在宜宾东街天顺祥旧址内阅读进步书刊，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不仅提高了所有参加者的思想觉悟，而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①。

接着，刘愿庵同郑佑之、许培高、熊吉安、张立如等，在将军街曾家祠设立通俗讲演所，吸收当地教育局长韩敬元参加。每天傍晚，他们分别到街头讲演，向老百姓讲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罪恶行径，揭露封建军阀的狰狞面目。群众很喜欢听刘愿庵等人的讲演，听众日益增多，常是挤满街头。可是，群众的爱国热情被当地军阀视为洪水猛兽，派军队进行干预和镇压，讲演活动进行了几个月就被迫停止。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重庆、成都、宜宾等地。在宜宾，成立了叙州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推选同盟会员尹绍州、郑量澄和刘愿庵负责领导。刘愿庵等贴标语，散传单，进行街头讲演，揭露帝国主义屠杀蹂躏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坚决抵制英、日仇货，实行经济绝交。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宜宾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更加高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长江上游的侵略势力。

“五卅”惨案发生不久，党派尹伯明和郑则龙回宜宾发展党团组织。行前，恽代英对尹、郑说，刘愿庵“忠诚朴实，善读书，笔下很快，一直倾向党。当县长时所挣的一点钱，都为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学术团体和创办刊物花掉了。虽现在还未成为我们组织的同志，可却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要他们

^①张立如：《关于宜宾青年读书会成立的经过》。

“回宜宾后一定要把刘愿庵吸收到党组织里面来。”^①

尹伯明、郑则龙回到宜宾，同尹绍州、郑量澄一道，耐心地做刘愿庵的思想工作，消除他觉得家庭人口多，父亲年老，负担很重，怕影响党组织的顾虑，很快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中共宜宾党组织派他到成都开展工作。^②

(三)

一九二五年冬，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四川的部分共产党员在重庆中法大学内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由杨闇公任书记，统一领导全川的党团工作和群众运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把四川党组织的工作推进到新的阶段。党的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后，刘愿庵任地委委员兼成都特支书记。他在成都期间，以办报为社会职业，后任四川省参议会秘书。

一九二六年初，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化，四川国民党右派依附四川军阀猖狂地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左派势力进攻。以曾琦、李璜等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又以四川为大本营，纠合党徒与共产党公开对立。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国家主义派公然跳出来为帝国主义和段琪瑞政府辩护，明火执仗地诬蔑中国共产党、刘愿庵同国家主义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次，成都的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公开的群众性讲演会，刘愿庵和李璜等人都被邀请参加。李璜自命为思想界的权威，

^{①②}郑则龙：《宜宾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载《宜宾地区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期。

在台上大演反共卖国丑剧。听众谴责他不象中国人在讲中国问题，完全是一副奴才相。刘愿庵走上讲台，虽然衣着朴素，看起来“土里土气”，但他谈笑自若的态度、坚定正确的立场、犀利而流畅的言词，对李璜卖国反共的谬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驳斥，听众纷纷为他叫好，拍手称快。李璜招架不住，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这时，由徐佑根主办、张秀熟任义务主笔的《西陲日报》，亦发表了关于“三一八”惨案的社论，无情地揭露国家主义派在“三一八”惨案后充当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帮凶的罪行。刘愿庵很重视《西陲日报》，积极协助报社工作，撰写文章、代审稿件，抨击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出卖民族利益，破坏国共合作和反对北伐战争的丑恶行径。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刘愿庵以成都代表的身分出席了大会。会议开幕的第二天，刘愿庵在省执行委员会举行的宴会上，代表全省出席会议的代表致答词，指出：“四川政治局面的推行，是由于中国全部政治之推进而演进的，我们不能以现在政治形势稍好便高兴得不得了。并且在军事方面，虽然迭告胜利，而对于宣传组织工作，却毫未有进展。现在四川将领所以只知有蒋介石，而不知有国民党，只晓得派遣代表与蒋介石接洽，而不晓得与莲花池省党部发生关系，一般群众所以只听着蒋介石打胜仗，而未听着国民政府之职能……这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①

^①《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日刊》1926年11月27日。

刘愿庵提出国民党（左派）各级组织应加强宣传组织工作，树立国民政府的威信，而不能让蒋介石树立个人的威信和特权的问题，是当时的一个关键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刘愿庵的政治眼光是十分敏锐的。

刘愿庵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两点建议，他说：“过去各县同志往往在工作进行中发生了许多错误，不是注意上层忽略了下层，就是注意下层而忽略了上层，结果这两种都成了党务进行上的障碍，代表大会应当对此有特别之注意而加以决定，……一党之下，集合多人，所以各人的言语举动未必都皆一致，其所以能够统一，就是靠一个纪律。本党是一个民主集中制者，就是未决议以前，任随个人发表意见，只要决议以后，无论任何人都应当绝对服从，没有丝毫迟疑的余地。”

大会期间，刘愿庵担任文牒股主任，起草大会宣言、决议和其他文件。在他参与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在中国必须动员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起来赶走列强、打倒军阀，民族才能复兴，国家才能强盛，民众才能翻身。号召各阶层民众团结一致，奋斗益力，遵照先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遗嘱，力争国民革命早日胜利。会上，刘愿庵还同一些代表提出“组织平民教育机关和提倡平民教育运动案”，建议省执行委员会成立四川平民教育协会；请省党部宣传部编定平民读物；吸收成年的工农群众、店员和学徒等参加学习。大会通过了刘愿庵等人的提案，后因政局恶化，“平民教育案”未能实现。

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共重庆地委为加强民众工作，积极开展兵运、农运和工运，把革命推向新的阶段，派刘愿庵到陈书农部作兵运工作，以配合刘伯承等领导的

顺泸起义。陈书农是邓锡侯第二十八军下面的一个师长，思想比较开明，赞同国民革命。刘愿庵到陈部任师政治部中校宣传科长，兼任军官教育团政治教官，常给官兵上政治课，讲述国民革命、国共合作和一些政治常识。他讲的课有理论，有实际，生动具体，很受官兵欢迎。刘愿庵在部队中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没有旧军人的坏习气，官兵中不少人都愿意接近他。不久，党又调刘愿庵回成都，负责川西的工作。

大革命时期，刘愿庵十分重视各种力量的组织与联合。他曾根据党的指示，对军阀部队的上层军官作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争取他们参加国民革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邓锡侯、刘文辉部下的高级将领陈离、夏仲实、吴景伯等，后来不同程度地倾向革命和同情中国共产党。对后期的“赤心评论社”，刘愿庵也采取了团结、教育、争取的方针。“赤心评论社”的前期，是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后来在傅双无等政治投机分子的操纵下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同我党分庭抗礼，使成都地区出现了两个工会的局面，阻碍了成都工人阶级组织的统一。然而，“赤心评论社”仍同我党有一致的一面。他们同样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和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赞成国民革命。当时一些党员十分憎恨该社的错误行动，甚至抱着敌视的态度。由于刘愿庵坚持了正确的方针，终于使成都两个工会达到了行动的统一，共同组织了左派国民党成都市党部，从而推进了国民革命运动。^①刘愿庵对科技、文艺和教育等界朋友也作了很多工作，争取他们同情革命，进而参加革命。二十年代，

^①任白戈：《蜀中英华 功垂史册》，载1981年6月21日《重庆日报》。

在重庆、成都、泸州和宜宾等地受到刘愿庵的教育和影响，从而参加革命队伍或倾向革命的知识界人士为数不少。如著名作家李劫人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撰写的《纪念先烈赵世炎》一文中说：“我听见这个消息（即赵世炎牺牲）后，一如听见刘愿庵在重庆就义的消息一样，好多天不舒服，因而更引起我对共产党的同情，更增强了我对蒋贼中正和他那一伙的仇恨。我很感谢两位先烈！我敢于说，自我从法国回国以后，我确实受了他两位的无形影响，使我愈明确坚定我这二十几年来的行动方向！”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之前，密谋策划四川军阀反共反人民。驻重庆军阀刘湘首先举起屠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三月三十一日，中共重庆地委通过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左派）出面，组织各进步团体，在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抗议帝国主义炮轰南京的暴行，声援南京人民。军阀刘湘、王陵基、蓝文彬等开枪镇压到会群众，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血案。这次血案遭惨杀的有数百名革命群众，四川省委的负责干部和革命志士杨闇公、冉钧、漆树棻、陈达三等或当场遇难，或会后遭逮捕而英勇就义。

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刘愿庵领导的中共成都特支，与上级失去联系。但他们毫不畏惧，仍然带领党员和群众坚持斗争。四月四日，在中共成都特支的领导下，成都地区的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和国民党成都市党部等十五个进步团体联合组成重庆“三三一”惨案省会后援会，选出刘愿庵、孙壶东、李献亭、唐伯焜、袁亚群等为“省会成都援助重庆惨案各界代表”，同时作出如下决定：（一）电请中央（国民政府）派特派专员来川会同办理此案；（二）警告刘湘及渝中各将领，并

责成将王、蓝、曹、申等监禁查办；（三）质问向育仁并要求他表明态度；（四）推举代表与邓、刘两军长交涉，请负省会治安安全责^①。

四月八日早上九点钟，成都各民众团体代表在商业场集中，然后由刘愿庵率领赴二十八军军部请愿。刘文辉、邓锡侯到场后，刘愿庵首先发言，痛斥军阀刘湘、王陵基、蓝文彬等背叛国民革命，在重庆制造“三三一”大血案，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罪行，要求刘、邓两军长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上，讨伐刘湘，并切实维持省会治安，以杜绝类似重庆事件发生。刘文辉坐不住了。他毫无表情地说：“各位请惩办王（陵基）、蓝（文彬）、曹（燮阳）、申（文英）四人究竟有何证据，能说明彼等系此案祸首？”邓锡侯也帮腔说：“近日省会忽发现有农民自卫军总司令朱玺布告，同时发现三民自卫军总司令李廷布告，此两种主义不同的自卫军，随时都有发生冲突、扰乱社会治安的可能。所以维持治安责任要大家负责。”邓以此托词，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还说：“明白点讲，在青天白日下之成都，只有三民主义活动的领域”。刘愿庵据理驳斥邓、刘二人的谬论，指出：向育仁系蒋介石派回四川来进行“清党”的要员，他在重庆与刘湘密谋，制造“三三一”惨案，回到成都后，又企图镇压群众。他干了不少反对国共合作和破坏国民革命的事，要求两位军长将向育仁驱逐出境。邓锡侯听后，淡淡地说：啥子驱逐啊，警告一下就是了。而刘文辉则不然，怒冲冲地讲道：“全川清乡团务总办向育仁，系二十

^①夏以容：《大革命末期成都地区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纪略》，载《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总第10期。

八军、二十九军及本军代表，又得蒋总司令委派四川主持全川党务，蒋总司令之军权，系中央党部所给予行使”。进而刘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威胁说：“现在汉口，南昌闹意见，我们管不着，打开窗子说亮话，在我们防区内讲纯三民主义可以，掺沙的可不行”。说后拂袖而去。对刘文辉、邓锡侯的恐吓威胁，刘愿庵等无所畏惧，但认为：要想通过他们解决什么问题是不可能的，只有发动群众进行艰苦的斗争，才有胜利的希望。

成都各界群众开展声援重庆人民的活动和派出代表到第二十八军军部请愿，引起了军阀们的惶恐和憎恨。刘文辉、邓锡侯、田頌尧等在附署刘湘的“反共拥蒋”通电之后，于四月九日急忙加委向育仁为省会城防司令，以加强对成都地区的军事控制。

几天之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霎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四月二十四日，向育仁以四川整理党务特派员、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处长、省会城防司令和四川团练副委员长等四重身分，在成都导演了“成都农工商学兵清党示威大会”的反共丑剧。他们唆使党徒，网罗一批工贼、流氓和社会渣滓，在街上贴标语、喊口号，狂呼乱叫，反对国民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并将成都市工会捣毁，叫嚣要将刘愿庵、钟善辅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捉拿归案惩办。至此，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迫转入地下。

大革命失败后，四川党内少数不坚定分子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有的脱党离川，有的叛党充当敌人的走卒。共产主义战士刘愿庵毫不动摇。他将“三三一”惨案后从重庆等地来成都的任煜（白戈）、朱挹清等组织起来，转入地下，开展对敌斗

争。在成都附近县份，刘愿庵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选派从广州、武汉农讲所毕业归来的同志，去加强对农会的领导。在成都市内，刘愿庵领导钟善辅、刘亚雄（后叛变），李宗材、朱挹清等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劳动时间等口号，以团结广大工人群众，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作斗争。刘愿庵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工人的疾苦。针对当时人力车工人工资极低、车租很高的情况，刘愿庵提出开展一场为减低车租而斗争的运动。在刘愿庵等的努力下，成都一度消沉的工会工作又活跃起来。工人俱乐部、工人读书会和夜校又恢复活动。人力车工人减低车租的罢工斗争和长机工人、生绉工人要求就业的示威游行相继爆发。

这期间刘愿庵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对资产阶级、军政界和文教界的中上层人士，除极端反动者外，都要尽量争取。对于军阀、团阀^①等势力，要利用矛盾，作个别的争取工作。刘愿庵的姐夫周竹虚是刘湘部的一个团长，常常通过姐姐和亲属来进行“规劝”，要他向刘湘作某些妥协。有一天，周竹虚亲自来信写道：如果不反对刘湘，既可公开工作，无碍革命，又能在经济上对家庭有所帮助。刘愿庵见信很生气，但他仍耐心地给姐夫晓之以革命的道理，并对其错误的言论给予严肃的批评。有的同志劝刘愿庵割断与姐夫的关系，他笑着说：“用不着，他又不妨碍我革命，通过这点私人关系，有时还可透露点消息，如果关系搞坏了，党的机关能住在家里吗？”^②

①四川人民把封建地主、土豪劣绅组织的 地方武装头子叫团阀。

②当时中共成都特支机关就设在黄瓦街刘愿庵家中。

(四)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派傅烈、周贡植等到重庆，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恢复、整顿和发展四川党的组织。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周贡植家中秘密召开扩大会议，到会代表有来自成都、宜宾、涪陵、江津、重庆等地的二十余人。会议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着重讨论了四川全省春荒暴动问题，制定了《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决定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会议正式选举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委，傅烈任书记，周贡植任组织，刘愿庵任宣传，牛大鸣任秘书长；还选举了出席党的“六大”代表，正式代表刘愿庵，候补代表刘远翔、刘披云。会后，代表们赴各地开展工作，重点是把各地党员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成立县委；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抗税斗争；开展兵运，准备武装起义。

省委为了能集中全力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决定成立巴县县委。三月九日，中共巴县县委成立会议在重庆兴隆巷八号召开。傅烈、周贡植、牛大鸣等到会指导，不幸，会议被敌人发觉，除牛大鸣巧妙脱险外，其余十多人全都被捕。刘愿庵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营救办法，通知各地党组织加强秘密工作，保存好党的文件，调整干部，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紧急会议推选刘愿庵为代理省委书记。他临危就任、肩负起领导全省党的工作的重担。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虽经多方努力，终归无效。四月三日，傅烈、周贡植等九人，被军阀刘湘杀害于朝天门。此前，四川军阀亦在成都制造了“二一六”下莲池惨

案，屠杀我党、团员和革命青年袁诗尧(川西特委宣传部长)、钱祥芳等十四人。就在这时，刘愿庵又获知其七弟刘孝祐在河南被军阀杀害的噩耗。他悲愤交集，决心加倍工作，向蒋介石和封建军阀讨还血债。

一九二八年五月，省委派刘愿庵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四川的情况，要求派负责干部到四川加强领导。刘愿庵在上海汇报工作后，即北上哈尔滨，经满州里抵达莫斯科，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被选为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党中央根据刘愿庵的报告和四川省委的要求，于一九二八年五月，派穆青以中央特派员身分到四川指导工作。不久，又派李鸣珂到四川任省委委员兼省军委书记，负责军事和保卫工作。同年十月初，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二十余人，在重庆不幸被捕，党、团省委机关遭到破坏。

刘愿庵在党的六大闭幕之后从莫斯科回国。途经上海时，他千方百计联系当时在上海读书或工作的四川同志，鼓励他们战胜暂时的黑暗，渡过难关。当刘愿庵了解到任白戈在招商局公学教书时，就托人将他找到旅馆中见面。刘愿庵关切地问：

“你的组织关系接上了没有？”任说接上了。刘愿庵感到很高兴。接着，刘愿庵向任白戈扼要介绍了六大决议精神，说明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革命，革命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①。刘愿庵又约孙壶东在肖华清、陈觉仁家相见。旧友在患难中重逢，格外亲热。他仔细了解几位同志在上海的生活、工作情况和今

^①任白戈：《蜀中英华 功垂史册》。

后的打算，然后给大家讲述在莫斯科等地的见闻和党的六大的基本精神。他说：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在井冈山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我们回四川后要积极发展组织，大力开展工农武装斗争。他还对孙壶东说：“我们希望同国民党左派继续合作，共同反蒋。我们现在同国民党右派是公开地干，而你们可以在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可算是殊途同归，目标一致”。时至今日，八十多岁高龄的孙壶东每当回忆起白色恐怖中刘愿庵约他会面，那样地关心和鼓励他，仍十分感慨。

刘愿庵在上海没停多久，就匆匆返回重庆，并于十月二十五日在重庆成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开展党的工作。当时在川南视察的穆青尚不知道刘愿庵已经回川。他在得知省委受到破坏后，急奔成都，再赴潼南双江镇，约集川西特委等几个地区的负责干部开会，成立了临时省委，穆青任书记，省委机关设在成都。刘愿庵和穆青分别得知情况后，于十二月十八日在成都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穆青、刘愿庵、程子健、陈俊山、刘远翔五人组成统一的临时省委，穆青任书记兼省军委书记，刘愿庵任宣传鼓动部主任兼党报编辑，程子健任组织部主任。

一九二九年，中央四川临时省委认真贯彻六大决议，无论在党组织的恢复发展，或是工农群众运动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二月十二日，临时省委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刘愿庵传达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会议结合四川的实际指出：国内形势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四川革命高潮有到来之可能，应该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并总结了四川革命的经验，提出纠正盲目暴动的盲动主义倾向。会议正式选举刘愿庵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书记，穆青任组织部长，刘披云任宣传

部长，李鸣珂任军委书记，牛太鸣任临委书记兼秘书长。

为了恢复健全各地党的组织，经省委决定，派出巡视员分赴川东、川南、川北各地，宣传六大精神，贯彻六大决议，教育审查原有党员，恢复组织，吸收新党员。巡视员出发前，刘愿庵给他们布置工作，交待工作方法，要求战友们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

经过刘愿庵等的艰苦工作，四川各级党组织恢复发展很快。是年冬，全省党员发展到近三千人，其中工人党员约占百分之二十，农民党员约占百分之四十，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广大党员在各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

刘愿庵等在动员工人怠工、罢工和争取生存的合法权利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临时省委发出通告指出：夺取城市最重要的是城市工作，尤其是工人群众较多的城市。目前工作的重心应该是重庆、成都、万县等以及几个重要工人区域，如自贡、五通桥。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和以最大的努力去建立这几个区域的工作。六月七日至十一日，省委在成都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撤销特委，建立成都、重庆、自贡、万县等四个特区和宜宾、嘉定、泸州、三台、顺庆、遂宁、涪陵、绥定等八个中心县委，以建立起这些地区革命工作的坚实的基础^①。

刘愿庵亲自抓工人运动，他挑选培养工运干部，派往各工人群众较多的城市去开展工作。一九二九年二月省委扩大会议

^①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印：《民主革命时期重庆地方党史大事年表》（1983年9月）。

后，他派团省委负责人郝谦到自贡帮助中央自贡特支领导广大工人开展罢工斗争。郝谦到自贡后，同特支书记程攸生一道，领导了四月自贡工人为反对解雇的罢工和八月自贡盐业工人总同盟大罢工，取得了被解雇工人回原厂工作、增加工资、工资以米价为标准，以及改善劳动条件等成果。

六月十日，驻成都军阀借口保护路面，不准独轮车^①行走公路，并派军队砸毁了几百辆独轮车，致使大量工人失业。刘愿庵领导川西独轮车总工会，发动独轮车工人到成都游行示威，砸烂二十四军的两部汽车，挖毁成都到新津的公路，使汽车无法通行。二十三日，川西独轮车总工会发出告全川人民书。七月一日，川西独轮车工人举行罢工，激起各界群众对二十四军的强烈不满，驻军被迫撤销禁令^②。

在组织领导农村武装起义和兵变方面，刘愿庵和李鸣珂、穆青等分赴四川各地区，进行思想动员，配备干部，建立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等。川东北的宣汉、万源、达县一带，经王维舟、李家俊等几年辛勤工作，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具备。省委决定首先在这里举行武装起义，并于一九二九年三月成立了由李家俊任组长的起义领导小组。四月下旬，万源固军坝起义成功，在川东地区树立起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一九二九年六月，共产党员邝继勋、罗世文等发动川军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在遂（宁）蓬（溪）边界起义。起义前，刘愿庵是不同意的，他认为四川城市的工运、学运和妇运工作还很薄弱，有的地方

①独轮车又叫鸡公车，是当时成都至川西各地的主要运输工具。

②四川省总工会工运史资料组编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川工人运动大事记》（1981年6月）。

刚刚开始，农运更差一些，只有李家俊领导的川东北游击武装和下川东梁（山）开（县）万（县）等地的情况比较好，总的还是白色恐怖严重，缺乏群众基础，起义时机不成熟。后来，由于部队处境危急，部队中的党员干部又要求迫切，刘愿庵等才同意了，并派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罗世文、邹进贤等去该部参加指挥，加强领导。六月二十九日邝继勋率全旅起义，成立中国共产党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此举震惊了四川的大小军阀，鼓舞了全川的受苦群众。

以刘愿庵为首的四川省委，不但重视武装起义，掌握枪杆子，而且也十分注意宣传工作。一九二九年春，刘愿庵、李鸣珂等通过驻军师长、共产党员张清平出面筹集经费，创办《新社会日报》，由罗承烈任社长，川东特委书记项鼎任主编，刘愿庵、李鸣珂经常为其撰稿。该报猛烈地揭露和抨击蒋介石集团的种种罪行和劣迹，并联合各报向国家主义派展开斗争，深受群众欢迎，发行量为全市各报之冠。五月一日，四川省政府奉国民党中央命令，查封《新社会日报》，党领导该报坚持斗争，并得到广大群众和各界团体的积极支持。六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中央训练部长何应钦再次电令查封，该报终于被迫停刊。为此事，重庆报界协会和各进步团体发起请愿，声援《新社会日报》，并成立了民众力争言论自由大同盟^①。

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刘愿庵等在工作中也曾有过失误。一九二九年秋，他们根据当时中央指示精神，由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等组织“飞行集会”领导小组，发动赤色群众在重庆

^①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印：《民主革命时期重庆地方党史大事记》（1983年9月）

会仙桥、都邮街等繁华闹市举行飞行集会，发表演讲，呼口号，散传单等，使革命力量过早暴露。

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布置今后工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刘愿庵在重庆主持了省委第二次全委会议。这次会议认为，四川总的政治任务仍是争取广大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根据八月中央《关于四川组织问题给四川省委的信》的精神，作出了《省委二次全会组织问题决议案》，强调发展产业支部，增加干部中的工人成分，彻底改造党的基础，建立和加强中心区域的工作；加强党内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加强党员职业化、军事化，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作好准备等。

正当四川党的工作向前胜利发展的时候，四川军阀刘湘首先采取了罪恶的“自首”政策，利用我党叛徒充当爪牙，从内部来破坏我们党。重庆第二十一军军部设立了特务委员会，各县、市也建立了清共组织，收买一些叛徒组织“侦缉队”，专门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并成立“反省院”，开展所谓“心理战”。党内一些动摇分子如江（北）巴（县）士兵运动委员会秘书长易觉先、团省委负责人宋毓萍，以及游曼谷、游洪钧等先后叛党，充当刘湘侦缉队的凶恶鹰犬。

由于叛徒的出卖，一九三〇年春夏之间，驻在重庆的省委几次遭受重大损失。三月，临时省委组织部长穆青在重庆回水沟街被叛徒出卖而遭逮捕，五月壮烈牺牲。四月中旬，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外出办事，在朝天门碰上叛徒易觉先和一伙特务。狭路相逢，李鸣珂临危不惧，开枪打死易觉先，并打伤敌特三人，终因寡不敌众，被敌逮捕，英勇就义。五月五日，刘愿庵与省委秘书长邹进贤，宣传部长程攸生等四人，在重庆浩池街

三十九号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开会。叛徒陈茂华写了一张纸条叫一小贩交给附近岗亭里的警察，警察知此事关系重大，连忙报告第六区警察所长郭晴岚。郭立即派巡官王建之等率领便衣特务多人前往搜捕。突如其来的搜查，使大家措手不及，但都立即镇定下来。邹进贤将记录揉成一团，并高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警察吼道：“搜查”。此时，刘愿庵、程攸生等见上楼的特务警察越来越多，便主动出击，争取脱险。刘愿庵因身患肺病，体质较弱，与警察搏斗时被打倒在地，脸被打肿，眼睛亦被击伤，不幸被捕。程攸生与一便衣特务摔打滚下楼梯，也被捕。邹进贤在搏斗的混乱中跑出，因眼睛近视，不慎被门栏杆绊倒在地而被捕，只有一人跳窗脱险。

军阀刘湘早知刘愿庵的才华和在我党中的地位，妄图采取“蜜糖”的策略收买这位坚贞的共产党人。刘湘先后派刘愿庵早年的朋友、巴县县长冯均逸、刘愿庵的亲戚、某师参谋长等劝降，以“院长”、“厅长”等高位和每月二百元大洋的薪俸为诱饵，要刘愿庵脱离革命，退出共产党。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刘愿庵，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誓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什么升官发财，早已视为粪土。敌人的劝降骗局遭到破产后，五月六日，刘湘二十一军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在法庭上，刘愿庵神态自若，据理驳斥，把法庭当讲台，宣传党的主张及其共产主义真理。

当敌人的军法官询问刘愿庵的姓名、职业和住址的时候，他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答道：“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

军法官愣了一下，连忙说：“刘先生，你之为人，不但我们敬佩，就是军长也爱惜你。军长认为刘先生是国家的人才，

他要我们转达刘先生，希望能退出共产党组织……。”

刘愿庵坚定地答道：“我信仰马列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仔细研究和长期考虑的，是为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这是我的的人生观。至于生死之事，我早已置之度外，决没有什么退出共产党可言！”

军法官仍耐着性子说：“刘先生，军长对你非常惋惜，……”。

未等法官说完，刘愿庵轻蔑地笑了一笑，说道：“真的么？我倒有点替你们军长惋惜。他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把武力用来替劳苦大众办事，反而伤天害理，残害无辜百姓，这倒真值得惋惜。与其惋惜我，不如去惋惜他自己吧！”

军法官见引诱不成，遂以死相威胁说：“刘先生，军长劝你不要误入歧途，你要三思而行，考虑后果啊！”

敌人的威吓，激起了刘愿庵极大的愤怒。他高声斥责道：“什么歧途！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不可动摇的真理。去把你们军部的政工人员和所谓‘名流学者’都找来，看他们谁能在我面前说清楚是‘歧途’？除社会主义之外，谁能给中国社会及工农群众找出一条可以彻底解放的道路？我信仰真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祖国和广大人民的解放而战斗，走的是阳关大道，决不是什么歧途。我看，误入歧途的不是我刘愿庵，不是中国共产党人；那些替帝国主义服务，残民以逞的军阀、买办和官僚，才是真正的误入歧途，……①”。

①石灵：《刘愿庵同志的供词》，载1946年6月14日《新华日报》。

军法官们见刘愿庵正义凛然，威武不屈，毫无办法，只得草草收场，宣布闭庭。

(五)

敌人的劝降失败了，法庭上的斗争刘愿庵胜利了。这时，刘愿庵预感到敌人将采取最后的手段，置自己于死地。于是，他提笔给爱人写了如下的遗书：

我最亲爱的：

久为敌人所欲得而甘心的我，现在被他们捕获。当然他们不会让我再延长为革命致力的生命，我亦不愿如此拘囚下去。我现在准备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去就义，我已经尽了我的一切努力，贡献给了我的阶级，贡献给了我的党，我个人的责任算是尽到了。所不释然的是此次我的轻易，我的没有注意一切技术，使我们的党受了很大损失。这不仅是一种错误，简直是一种对革命的罪过。我虽然死了，但还是应当受党处罚的。不过我的身体太坏，在这样烦剧的受迫害的环境中，我的身体和精神，表现非常疲惫，所以许多地方是忽略了。但我不敢求一切同志原谅，只有你——我的最亲爱的人，你曾经看见我一切勉强挣扎的困苦情形，只有希望你给我以原谅，原谅我不能如你的期望，很努力地，很致密地保护我们的阶级先锋队，我只有请求你的原谅。

对于你，我尤其觉得太对不住了。你给了我的热爱，给了我的勇气，随时鞭策我前进努力，然而毕竟是没有能

如你的期望，并给以你最大的痛苦。我是太残酷地对你了。我唯一到现在还稍可自慰的，即是我再四的问你，你曾经很勇敢的答应我，即使我死了，你还是——并且加倍地为我们的工作努力。惟望你能践言，把死别的痛苦丢开，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应该懈怠、消极。你的弱点也不少，所以对一切因循、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极大的补救，你必须象《士敏土》里的黛莎一样，有铁一样的心。

对于你的今后，必须要努力作一个改革的职业家，一切教书谋生活等个人主义的倾向，当力求铲除，这才是真正地爱我。……假如我死后有知，我俩心灵唯一的联系，是建筑在你能继续我们的工作与事业，而不是联系在你为我忧伤和忠贞不二上面，这是我理性的自觉，决不是饰词，或者故意如此说，以坚定你的信念，望你绝不要错认了！

对于我们的工作，如果能给我以机会，我或者可以写出许多话来，但现在是不可能。不过这一切问题，历来的决议说得很多了……。然而我们的许多同志总是借口许多理由，说在实行上，事实上有某种困难，把他修改或者取消了，这充分表现出畏难苟安的小布尔乔亚的恶习。我们并不是说没有困难，但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是需用一切的努力去战胜这些困难，决不是对于困难屈服（修改原则或取消主义）。这是我理应能够而又必须最后说的一句最重要的话。

对于我的家庭，难说，难说，尤其是贫困衰老的父亲，……整个社会无量数的老人在困苦颠连中，我的家

庭，我的父亲，不过(是)无量数之一分子而已。我的努力革命，也何尝不是如此。然而毕竟对于家庭，对于父亲是太不孝了。社会是这样，又复何说。此后你若有力，望你于可能时给父亲以安慰和孝养，尤其是小弟妹，当设法教之成立，这是我个人用以累你的一件事。不过对于我死的消息，目前对家庭，可暂秘密不宣，你写信去说我已到上海或出国去了，你随时编造些消息去欺骗父亲好了。不过，可怜的父亲，是有两个儿子的生或死，永远不能知道了。五弟不自振作，可以说，五弟媳当使工作，不需她始终有个依赖丈夫想做所谓太太的观念，你应在可能时，在教育方面帮助她。

端儿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孩子，也是我们兄弟存留的一个独孩子，你在不妨碍工作范围内，可以抚养她，五弟媳是不会教育孩子的。只是我未免太累你了，然而这也是无法可想的，你能原谅我。

望你不要时刻想起我，……更不要无谓的思量留念，这样足以妨害工作，伤害身体，只希望你时时刻刻记起工作，工作，工作！

我被捕是在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诞生(日)晨九点钟。我曾经用我的力量想销毁文件，与警察搏斗，可恨我是太书生气了，没有力量如我的期望，反被他们殴伤了眼睛，并按在地上毒打了一顿，以致未能将主要的文件销毁，不免稍有牵连，这是我这两日心中最难过的地方。只希望同志们领取这一经验，努力军事化，武装每个人的身体。

你的身体太弱，这是我不放心的。身体弱会影响到意志不坚决与缺乏勇气，望你特别锻炼你的身体。主要方法

是习劳，吃药是不相干的，望切记。

我今日审了一堂，我勇敢地说话，算是没有丧失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精神，可以告慰一切。在狱中，许多工人对我们表同情，毕竟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的一线曙光，我的牺牲，总算不是枉然的，因此我心中仍然是很快乐的。

再，我的尸体，千万照我平常向你说的，送给医院解剖，使我最后还能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点贡献，如亲友们一定要装殓费钱，你必须如我自愿和嘱托，坚决主张，千万千万，你必须这样才算了解我。

别了，亲爱的……，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你的爱人死时遗书

五月六日午后八时

这封遗书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烈士对祖国的未来和共产主义前景充满了希望，充分地表现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和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

敌人在施展种种诡计均未得逞后，决定杀害刘愿庵。一九三〇年五月七日，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刘愿庵与邹进贤、程攸生一道，高呼口号，走向刑场。此时，监狱内外，群情愤慨，刘愿庵等在刑场上呼喊革命口号，难友们在牢中呼应，极其悲壮激昂。刽子手行刑后，群众一拥而上，瞻仰刘愿庵等烈士的遗容。当他们看到刘愿庵因用力高呼口号而喷在墙上的斑斑热

血，十分感动，有的不禁落泪，赞扬烈士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喜看今日欣欣向荣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刘愿庵烈士有灵，将含笑九泉！

柴 水 香

冯 明 王文达

柴水香是工人出身的优秀党员，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以后担任过中共宁波市委书记，是浙江南部红十三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一九三〇年九月壮烈牺牲。

柴水香又名柴志福，化名陈文杰、方均，祖籍浙江鄞县，一九〇三年四月十六日（农历三月十九）出生于浙江宁波乌楼庙跟（现改名英烈街）七号一户贫苦劳动人民的家里^①。姐弟五人，他排行老三。其父柴文清，是一位勤劳忠厚、笃信天主教的手工业者；母亲陈氏是个敦厚俭朴、富有正义感的家庭妇女。父母无力赡养众多子女，将大女儿柴秀英送给育婴堂抚养。

九岁时，柴水香入教会学校免费就读。三年后，因其父集资开设了一个织绸机坊，急需人做帮手，他被迫辍学，随父学艺至十七岁。以后父亲因营业竞争失败，机坊倒闭。十九岁时，柴水香到宁波华泰绸织厂当工人^②。

一九二三年冬，张秋人受中共江浙区委派遣来宁波建党。

^{①②}柴志刚：《忆哥哥水香先烈》（未刊稿）原件存温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一九二五年初，宁波基督教青年会办了一个俱乐部。俱乐部开设夜校，举办讲座。柴水香便同曹鸿棠（王中）、鲍悲国等一起参加夜校学习。在夜校学习中，他开始受到党的政治教育。

同年五月，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消息传到宁波，宁波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无不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六月二日，在党的领导下，宁波市各团体组成了宁波各界五卅惨案国民后援会，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柴水香同游行队伍一起到江北岸英国领事馆门口示威，还捣毁了一家专门供应外国人的“宝山”面包店。

在这场运动中，柴水香看到了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此后，他热心于工人运动，常常利用空闲时间向工人宣传，动员他们加入工会。当时，华泰绸织厂工人在柴水香等的组织发动下，曾为增加工资先后举行过几次罢工，均获胜利。

在斗争中，柴水香的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和要求。中共宁波地委经慎重考察，于一九二六年二月，正式批准柴水香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柴水香奉党之命，以个人身分加入国共合作的国民党。

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宁波市总工会成立，下辖产业、店员、手工业三大工会。柴水香被选为手工业工会主席，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王鯤的助手，致力于工人运动^①。

十月中旬，浙江省长夏超因与孙传芳冲突，匆忙宣布浙江独立，但不久即告失败。十二月，浙军第一师陈仪部响应北伐，在绍兴起义。中共宁波地委为支持第一师的革命行动，决

^①王安卿：《回忆柴水香》，鄞县党史办1981年9月访问记录。

定由柴水香、王鯤等二十几人组成前敌宣传队，慰问驻扎在宁波到曹娥铁路沿线的第一师官兵，并协助军队组织政治部。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由第一师改编的北伐军十九军和省防军同时开到宁波，市总工会、市总商会、代理鄞县知事金梦麟以及各界人士二千余人，热烈欢迎北伐军到来。北伐军进驻后，宁波城气象为之一新。窃据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为了控制江浙一带地盘，派遣亲信王俊坐镇宁波，为“宁（波）、台（州）、温（州）防守司令。”王俊秉承蒋介石旨意，唆使流氓焚烧手工业工会、店员工会，捣毁市总工会，并扣押了《国民日报》社长庄禹梅和前去司令部质问的杨眉山、王鯤两人。

四月十一日，宁波《时事公报》登出消息：宁波国民党党部以“捣乱”及“图谋不轨”等罪名，把柴水香、杨眉山、王鯤、庄禹梅等四十多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人士清除出国民党。

继宁波“四·一一”清党后，蒋介石又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中共宁波地委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命令已暴露身分的党团员分批撤离宁波。柴水香根据党的指示，去武汉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柴水香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武汉，住到设在汉口的宁波旅汉同乡会的江浙流亡同志招待所内。五月底，党组织在同乡会内办了一个训练班，组织所有被难的浙江同志一起进行学习。训练班学员中有党员、团员，也有国民党左派；训练班班主任由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央商民部部长经亨颐担任，但主要工作由张秋人、王贯三等负责。教师除张秋人、王贯三外，还有沈雁冰、宋云彬等，授课内容都是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现

实理论问题。一个多月的学习，使柴水香增长了不少知识，尤其使他懂得了谁是革命的动力，谁是革命的对象，谁是革命领导力量这一首要问题。

七月初，汪精卫的武汉政府逐渐撕下了“左派”的假面具，压制工农运动，反对共产党，武汉形势日趋紧张。党组织对流亡在武汉的革命者作了动员：一部分人去苏联；一部分人参加贺龙、叶挺领导的部队；一部分分散回各地坚持斗争。在这种形势下，柴水香毅然选择了投军反蒋的道路，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学兵队一连八班当兵^①。

当时，二十军贺龙部和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叶挺部，由武汉、鄂东出发、向南昌集中，准备举行武装起义。

柴水香随部队从武汉乘船沿长江东进，在江西九江下船。部队到达九江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汪精卫集团于七月十五日召开“分共会议”，公开反共。武汉政府的叛变，使柴水香更进一步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并且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七月二十六日，柴水香所在的二十军到达南昌。八月一日凌晨，由周恩来、贺龙、叶挺等领导的武装起义开始了。当时我军枪枝匮乏，学兵队学员都没有武器。起初，柴水香先在阵地上喊口号，作政治宣传，敦促敌军投降；缴到武器后，才正式上前线^②。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妄图消灭起义部队。根据前委决定，起义军撤离南昌，经抚州南下，准备南征到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举

①②竺扬：《回忆柴水香一些情况》，鄞县党史办1981年9月访问记录。

行北伐。为适应战争环境需要，学兵队边行军边学习军事技术。当时天气酷热，山路难行；敌兵阻拦，物资供应又得不到保证，所以起义军常常是饿着肚子行军打仗。这些更锻炼了柴水香的斗争意志。他在学兵队中，表现活跃，处处以身作则，经常帮助和鼓励战友去克服困难。

九月二十三日，柴水香随部队攻占潮州。不久，因敌我力量悬殊，潮州战斗失利。部队被分隔包围。柴水香等被俘。

敌人把柴水香和其他被俘战士临时关在一间民房里，既没有捆绑，也来不及审问。柴水香见房子前面是一片又高又密的甘蔗林，门口只有一个敌兵看守，要逃跑比较容易。他与战友商量后，骗看守敌兵开了锁，然后一拥而上，夺门而去，逃入密密的甘蔗林里，敌兵被柴水香他们冲得不知所措，只好胡乱往甘蔗林里打了一阵枪^①。

柴水香逃出后，回到宁波。这时，省委特派员卓恺泽抵甬，代表省委整顿宁波的党团组织，决定由柴水香担任中共宁波市委书记。

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由卓恺泽、柴水香、曹鸿棠等人组成了鄞南暴动委员会，指挥部设在周鼎所在的鄞南石桥小学。柴水香、曹鸿棠兼军事负责^②。

十一月五日，省委负责人王小曼由杭州抵甬，带来了省委制订的《浙东暴动计划》，准备发动一次从钱塘江边到温州湾内

①庄启东：《一个绸厂工人成为红军军长》（未刊稿），原件存鄞县党史办。

②张雪痕：《我所知道的关于水香同志几件事》，鄞县党史办1981年9月访问记录。

的浙东大暴动，原先打算的以石桥为中心的鄞南局部暴动暂停。由于叛徒告密，十一月十二日，王小曼一登上温州码头即遭敌逮捕，藏在枕头中的《浙东暴动计划》亦被敌抄去。温州防区司令甘清池根据《浙东暴动计划》中的线索，发电浙东各地，大肆追捕共产党人。

敌宁波市长收到密电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召集党、政、军各机关头目举行紧急防务会议，决定联合组设“宁波审查反动分子临时委员会”，实行大搜捕。柴水香住在宁波，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但他仍然坚守岗位，毫不畏缩地组织其他同志转移、撤退。不幸，由于周宗谟的投敌出卖，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底，柴水香在家中被捕^①。

与柴水香先后被敌逮捕的七十余人全部关押在敌防守司令部拘留所内。经初步审讯，“除二十四名保释、十七名暂押就地外，其余送省核办”^②。十二月初，柴水香与樊仲甫、庄启东等十三人，逐县递解至杭州，囚禁在浙江陆军监狱丙监^③。

柴水香从宁波敌人对自己初审中，发现敌人并不了解自己的身分。因此，他在杭州敌人开庭审问时，便假装委屈，大喊冤枉。敌人惟恐有诈，施以酷刑，逼他招供。但柴水香忍受痛苦，始终不吐真情。敌人无法定案，最后只得以“共党嫌疑”判处他两年半的徒刑^④。

柴水香父亲得悉儿子被捕，通过宁波药行街天主教堂戴主教设法营救。反动当局慑于教会势力，于一九二九年上半年准

①张雪痕：《怀念王小曼烈士》，载《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1期。

②1927年12月7日宁波《时事公报》。

③④庄启东：《一个绸厂工人成为红军军长》。

予提前保释出狱^①。这时，宁波党组织已遭破坏，柴水香只身来到上海，通过中共浙西巡视员卓兰芳，同党接上了关系。

为了加强浙南农民武装斗争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柴水香去浙南工作，一九二九年夏，柴水香化名陈文杰，从上海直接启程去温州^②。

同年十月，柴水香根据温州中心县委的安排，在王国贞的陪同下，来到永嘉（今属温州）莲花心村。他以莲花心为中心，把桐岭脚、上河乡一带农民发动起来，成立了农民赤卫队。

莲花心南侧新桥，设有敌一警察所，驻扎着二十几个警察，经常出来掠夺群众财产，抓捕革命同志；同时，新桥又出了一个名叫易大发的叛徒，此人曾任我农会会长，熟悉我们党内情况。这些都给莲花心的农民武装造成严重威胁。

为了拔掉这两颗“钉子”，柴水香于一九三〇年三月四日晚上，率领两百多个赤卫队员，手拿长矛、土枪，夜袭新桥警察所。那时，警察所只有一个警察站岗，两百多赤卫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警察所内警察全部缴械。有一敌警长负隅顽抗，柴水香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之后，柴水香又率赤卫队员，跑到易大发家，击毙了正在床上酣睡的叛徒。

这期间，浙南各地接连发生农民暴动，纷纷建立农民武装。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一日，胡公冕奉党中央之命，从海门秘密回到浙南，把分散在各地的农民武装集中起来，加强统一领导，建立“浙南红军”。翌年一月，党中央又派金贯真到

①鲍浙潮：《忆水香先烈》，鄞县党史办1981年9月访问记录。

②王安卿：《回忆柴水香》。

温州，担负筹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和浙南特委的重要使命。

一九三〇年四月，金贯真、柴水香来到楠溪，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浙南红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胡公冕为军长，金贯真、柴水香（时化名陈文杰）分别担任政委和政治部主任^①。

红十三军的政治工作，在柴水香领导下，搞得相当有气色。部队每到一处，政治部二十几个工作人员，为开大会、贴标语、分发油印宣传品忙得不亦乐乎。柴水香经常向群众讲述国内外大好形势，动员他们支持革命、参加红军。在部队中，柴水香也常常向干部战士们讲课，进行政治思想和部队纪律教育。部队每次行军前均宣布纪律，不准擅动群众一针一线。在攻打枫林时，发现有一个名叫李陀四的战士，不但到布店抢布，还到下箬溪私自收税。为严肃军纪，军部在枫林大操场上召开公审大会，予以处决。又一次，群众反映一些“红军战士”抢劫小商贩。柴水香获悉后，委派蔡宝祥带领十八名战士埋伏在事件发生地的周围，抓到几个冒充红军的土匪，当众枪决。

这一年，浙南一带连续发生水涝灾害，粮食歉收，饥荒严重，穷苦人民在反动派和地主豪绅压迫下，纷纷投奔红军，红十三军队伍日益壮大。红十三军的发展，引起反动政府的极大

^①关于柴水香在红十三军中所任职务，众说不一。《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和《辞海》记载均说柴为红十三军政委，当年参加红十三军的许多老同志如汪德威、胡国洲、蔡宝祥等都回忆他当时的职务是红十三军军长。本文所述是红十三军一九三〇年四月刚建立时所任的职务（见胡公冕：《回忆红十三军》）。金贯真牺牲后和胡公冕去沪汇报工作期间，他有可能担任过政委或代理过军长，因缺少文字档案材料，尚待考证。

恐惧。自五月一日起，温州“全城日夜戒严检查行人，日里都全副武装把守城门，至晚七时，全城各门都行关闭，八时后全城一律不准开店营业”，特别在红军攻下“枫林及碧莲后，恐慌更甚，甚至国民党县党部人员不敢在内寄宿，市民殷实者逃往上海也有，人声鼎沸，大有即日就攻大温州的形势。”当时驻温州的敌人虽已有一个团和两个营的兵力，但为维持残局，又派“泰安号”兵舰开进瓯江，以防不测^①。

五月十八日，政委金贯真在温州不幸被捕牺牲。五月二十四日（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红十三军指战员八百多人，组成四个大队，由军长胡公冕带领，从永嘉出发，在瑞安、平阳二千多赤卫队员配合下，第三次攻打平阳。“城内人民响应，马上占领，释放罪犯，搜捕土劣”^②。下午四时，红军主动撤出城外。

与此同时，柴水香率领另一部分红军，驻扎在瑞安永峰山西寺，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粮食。反动派获悉后，调遣国防军两个连，向永峰山推进。柴水香带领战士将敌击退。

五月二十五日，柴水香率红军离开永峰山，翻过桐岭，到达永嘉（今属温州）娄桥东坑，准备去慈湖山上的白云寺驻扎。当时，在河东活动的张维来等，因遭敌破坏，已先率赤卫队集中在白云寺，与柴水香所率的红十三军会合。不料，此情报被陶山恶霸地主叶再臣的儿子叶安志、叶安吉获知，立即到桐浦的地主武装“保卫团”报告。桐浦“保卫团”与陶山、永嘉方面的“保卫团”分三路包抄白云寺。敌人摸掉红军岗哨，很

①《温州金贯真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5月12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1930年5月31日《上海报》。

快包围了整个寺院。正在寺中休息的红军和赤卫队员，听到枪声，急忙往外冲，但寺门已被封锁。在这严重情况下，柴水香沉着镇静，指挥部队安全突围，到后龙山集中。

平阳一战后，胡公冕绕道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领导红十三军的重担就落在柴水香身上^①。

柴水香身为军部领导，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部队开饭时，他总是替哨兵站岗，让哨兵吃完饭自己再吃；战士宿营时，他总要去巡视几遍；部队开拔，他都亲自去检查群众纪律。当知道有的战士借东西未还或买东西未付钱时，他一面代为赔偿或代付货款，一面找当事人耐心教育，使违反纪律的战士心悦诚服，虚心接受批评意见^②。

红十三军的生活十分艰苦，行军时，战士们全靠一顶大箬笠防风雨遮太阳。有一次，部队从潘坑出发到八亩田去，一个战士在前一天夜行军时不小心把箬笠丢失了，夏季骄阳如火，那个战士顶着烈日行军，步履艰难。柴水香远远看见了，赶上去问明原因，二话没说，摘下自己的箬笠戴在那个战士的头上。战士们还经常看到柴水香把草鞋送给别人，自己赤着脚，在滚烫的山路上行走，脚板都烫起了泡，战士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赤脚大仙”。这个美名，不但全军上下个个知晓，而且在浙南人民中间广为传扬^③。

一九三〇年六月，王国贞从党中央开会回来，于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在瑞安渔潭中村召开了浙南特委成立会议。王国

①胡公冕：《回忆红十三军》，载《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1年第5期。

②《杨进尧访问笔录》（1982年10月17日）。

③叶大兵：《浙南农民暴动和红十三军》，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贞、柴水香、金咸三、郑贤塘等二十五人出席会议。会上传达中央指示，成立暴动部，下设军事、土地、经济三个委员会，分别由柴水香、金咸三等三人负责；并宣布成立中共浙南特委、柴水香为特委军事委员^①。

由于当时中央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军事上采取了攻打大城市的冒险主义做法，使后来红十三军的工作遭受很大的损失。但是由于红十三军的影响不断扩大，广大贫苦农民不仅积极参加红军，而且密切配合，大力支援红军作战，在柴水香领导下，红十三军指战员英勇奋战，还是打了不少胜仗。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农历七月初三），红十三军军部发出命令，集中桥下关、五漈樟岙、碧莲、上董五个地方的部队，在永嘉石染会师。在会师大会上，柴水香代表军部宣布了向缙云进军的命令^②。

缙云是个小山城，四周群山环绕，南边有一条宽长的好溪相隔。红军要攻入缙云县城，必须通过一座铁索桥，一座石板桥，地势十分险要。国民党缙云县长郑希据险负隅，不把红军放在眼里。正当郑希得意忘形的时候，红军战士在柴水香的率领下，经过一夜急行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缙云城南。

八月三十一日（农历七月初八）拂晓，红十三军与从碧湖开来的敌浙保四团一个营遭遇。敌人在铁索桥和石板桥上分别架起机枪，阻挡我军前进。柴水香当机立断，命令部队两路出击：一路攻打铁索桥，一路攻打石板桥。铁索桥这一路先打响，敌人

① 《浙南特委关于本身分工等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7月1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红十三军解放缙云县城》，载《缙云党史通讯》，1982年第3期。

重机枪的火舌不断喷射，阻住了红军的去路；石板桥这边，敌人也用机枪封锁了六尺多宽的桥面。柴水香命令雷高升带领二十多名战士，在我军火力掩护下，奋勇冲过桥头，打死了敌人的机枪手。机枪一哑，大队人马冲过石板桥，然后绕到铁索桥敌人背后，前后一夹攻，敌人丢下机枪，放弃铁索桥阵地，拚命往桃花岭逃去。“红军一千余攻入缙云县城，缙云城保卫第一团机关枪连及步兵一排，完全失败缴械，连长同县长混在平民中逃了。红军入城，开放监狱，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地少及无地农民，烧毁县署的文契，召开民众大会，肃清反革命，建立苏维埃”^①。

红军胜利攻克缙云县城后，声势大振。敌人急调保安五、六、七团各一营，兵舰二艘，镇海炮台陆战二连到温州；“苏浙皖剿匪总指挥”熊式辉，亦派教导师一营五百余人，于九月六日乘轮赴温；妄图“围剿”我军。

九月三日，红十三军自动撤离缙云，来到小源（属青田县）进行整编，取消原大队、中队、分队的建制，为分团、营、连、排。在整编时，柴水香批评了董佐光部擅自乱拿武器，不遵守群众纪律的现象。董佐光怀恨在心，未经军部同意，擅自将部队拉回上董。

小源整编后，红十三军在白沙召开干部会。决定攻打后渠。九月十六日，红军兵分三路：一路从东南大头墙上往下攻打；一路从西面黄皮泉进攻；还有一路从正面直冲。反动“保卫团”据险顽守，红军从上午五时打到下午三时，还未攻进后渠。此时，后明岙、芳山等村赤卫队三百余人开来增援，红军

^①1930年9月10日《红旗日报》。

主力集中射击徐家祠堂。因红军事先已有几个同志潜入作内应，他们在祠堂内放起火来，敌人军心大乱，抵挡不住，便从一处岩洞落荒逃走。

后渠这一仗，红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由于打的时间长，子弹消耗多，人枪一无所获，柴水香亦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了。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军部决定部队分散休整；鉴于董佐光部武器装备较好，上董又是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便决定柴水香在上董养病，并嘱董佐光加以保护。

董佐光是个钱迷心窍、利欲薰心的家伙，完全是抱着投机思想参加革命的。他见红军生活艰苦，特别在小源整编受到柴水香的批评后，心怀不满，于是便决定把出卖柴水香作为投靠国民党的进见礼。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八日（农历七月二十六）早晨，董佐光假说自己要去参加战斗，用兜子把柴水香抬着走。走到半路，董佐光又劝柴水香回去，说等他向军部汇报后再来通知。等柴水香回到上董时，国民党“救乡团”头子陈华早已派兵埋伏。柴水香发现敌情，立即拿出手枪还击，可是子弹早被董佐光卸掉了。柴水香把手枪一掼，准备和敌人肉搏。但他重病在身，力不从心，五、六个敌兵一拥而上，将他逮捕^①。

敌人抓到柴水香，妄图从他口中得到整个红十三军的机密，进而消灭红十三军。因此宁、绍、温、台“剿共”指挥官王文瀚亲自审讯。他们软硬兼施，要尽一切手段，用上各种酷刑，但柴水香视死如归，坚强不屈，没有半句口供。敌人恼羞成怒，最后决定对柴水香下毒手。

^①陈岩权：《忆陈文杰军长》，原件存温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许，柴水香被反绑双手，在一群荷枪实弹敌兵的押送下，昂首挺胸地坐在一辆黄包车上，赴温州市郊松台山刑场。沿途，他对两旁群众高声地说：“杀了我陈文杰一个人不要紧，会有人替我报仇的。我们红军是杀不完的。杀了父亲有儿子，杀了儿子有孙子，世世代代闹革命，最后总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把敌人送进坟墓！”临刑时，柴水香从容不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二十七岁。

残暴的敌人将柴水香头颅悬挂在温州城头示众^①。入夜，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分别将柴水香的头颅和身体埋藏起来。全国解放后，柴水香的遗体合拢埋葬在翠微山公墓。他的事迹陈列在温州市江心屿革命烈士纪念馆和鄞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内，供后人瞻仰、学习。

作者附记 本文除注脚外，还参阅了：

1. 鲍浙潮：《“赤脚大仙”柴水香同志》，载《浙江革命史料特辑（五）》，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2. 浙江省总工会：《浙江工运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2辑。
3. 1927年的宁波《时事公报》、1930年的《红旗日报》和《上海报》。
4. 叶大兵：《论浙南农民暴动和红十三军》，（未刊打印稿）。
5. 访问史永、徐雪寒、彭猗兰、蔡宝祥、周闪耀、汪德威等老同志及亲属柴富祥等的记录。

^①据李立敬1982年11月3日致鄞县党史办函。

江 浩

李腾俊 姜廷玉 董振修

在海参崴附近一座长满苍松翠柏的山上，长眠着一位中国革命的先驱者——江浩。毛泽东称赞他“是一位象松柏长青的革命元老”^①。

江浩，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大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早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月革命后，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从一个爱国民主主义革命家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长期的艰苦斗争岁月里，他不屈不挠，鞠躬尽瘁，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江浩原名江文浩，字注源，后改名为江浩，常用江著源、江著元、江竹源等名，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清光绪六年庚辰十月十一）出生于直隶省玉田县北刘家桥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

清末民初，江浩家中拥有土地三百余亩，瓦房三十五间。

^①转引自张明远：《冀东早期革命家江浩同志》，载《浩气长存河北革命烈士史料三》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

父江瀚曾与本村大地主邢瑾（拥有土地七百余亩）合资在本县雅鸿桥镇开设过“福顺成”粮行，后因亏本停业。以后，江瀚除独资在该镇开设过“福增盛”粮行外^①，还与邢瑾合资在本村开设过酒厂，从事酿酒业^②。

江浩兄弟三人，姐妹三人，他排行第二。兄江文浚，清朝秀才、绅士。弟江注溪，因文化低，在家务农。江浩自幼聪颖，深得家人的喜欢，八九岁时就读于长楼庄塾馆。塾馆先生王树勋是个不随流俗，学识较有成就，容易接受新思想的秀才，对少年江浩的思想影响较大。江浩勤奋好学，进取心很强，读书勤于思考。十四岁那年，他回到本村，又与几个人聘请本县黄家铺举人郑经宇为塾师，在本村东头的庙里——“西方庵”设专馆读书。一九〇〇年，江浩与本县株树坞镇老中医刘辅廷的长女刘玉莲结婚。后生三女一子：大女儿江韵清，二女江挹清；儿子江震寰；小女儿江汰清。

青少年时代，江浩攻读经史，刻苦努力，善于思索，在清朝末年考中了末科“拔州秀才”^③。

青年时代的江浩，目睹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清朝政府腐败无能，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萌发了忧国忧民和民族民主的思想。尤其是他受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立志救国救民，渴望得到新知识。一九〇八年，他毅然摒弃仕途功名，考取自费留学生，东渡日本寻求新的知识，探索富国强民

① 1982年6月访问邢文泽记录。邢文泽系邢瑾之孙。

② 1983年9月4日访问江亚勋记录，江亚勋系江浩的侄子。

③ 应试成绩已达到录取秀才的条件，但本州县（因遵化、玉田、丰润三县属省辖，与一个州相等）内秀才名额已满，就拨到附近州县录取为秀才，故称为“拔州秀才”。

的道路。到达日本以后，开始攻读造纸专业，后来又转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①。

在东京期间，江浩结识了孙中山，接受三民主义，参加同盟会，积极从事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活动。在东京的冀东二十名留学生中，只有江浩一人参加同盟会，而且又是第一个剪掉了辫子；因此冀东的留学生都讥讽他为“疯子”和“江秃子”②。

一九一〇年江浩回国后，经清朝政府民政部复试，派赴奉天省昌图府任一个县的警察所长。不久，因丁忧返里守孝。在守孝期间，他深入群众了解人民的疾苦，曾在玉田县南门向群众发表演说，宣传反对封建主义。尔后，应遵（化）、玉（田）、丰（润）教育会聘请，任设在遵化的直隶省立第五中学学监职。在直隶五中期间，江浩积极向学生传播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思想。在江浩的鼓励和策划下，学生席景山、郝久亭等多人冒充旗人，到北京报考清室禁卫军，准备打入清朝政府内部，瓦解清室基本武装。但因考期已过，计划未能实现③。

一九一一年，全国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情绪日益高涨，清政府为镇压革命，决定在冀东举行秋操演习，由摄政王载沣为总检阅，贝勒载涛为总指挥。江浩闻摄政王载沣将亲往冀东阅操的消息，即派志士席景山等前去谋炸摄政王。时值武昌起义爆

①郝久亭1958年9月给冀东烈士陵园的信：《关于写传的意见》。郝久亭，曾系我党早期党员，1924年任过中共天津地委秘书。

②1982年4月访问王积衡记录。王积衡，玉田县人，系江浩的门婿。

③见《郝久亭自传》（1954年2月27日）。又见《江浩同志革命传略》，天津历史博物馆存稿。

发，演习取消，谋炸未遂。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江浩辞去直隶第五中学学监职务，来到天津，与王法勤、王葆真、张继、李锡九（字立三，又名永声）等在法租界天增里二十九号，设立同盟会北方支部机关。江浩经常来往京津^①，与革命党人共同策划推翻清朝政府的武装起义。

一九一二年初，为了响应和配合武装起义，江浩随白雅雨等赴滦州策动驻军第二十镇起义，王金铭、施从云等率部响应。一月三日，起义军宣布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布告安民。“远近闻之，莫不鼓舞雀跃，咸庆重见天日。”^②次日晚十时，起义部队向天津进军。临开拔时，三营管带张建功突然叛变，围攻军政府。起义军被迫退至火车站，乘火车出发，中途至雷庄与通永镇总兵王怀庆所部巡防营及曹锟所部第三镇猝遇，苦战一昼夜，死伤惨重。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被俘遇害，江浩幸免于难，潜回天津^③。在天津，革命党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重新部署力量，成立北方革命军司令部，统一领导各地斗争，并决定一月二十九日在天津发动起义。江浩等旋又策动天津直隶总督卫队团第二营配合革命党人进攻直隶总督府。一月二十九日夜，因起义信号提前误发，各路起义军尚未到齐，仅有一部分革命党人进攻总督衙门和金钢桥等地，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①王葆真：《滦州起义及北方革命运动简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5）中华书局版第398—424页。

②凌钺：《辛亥滦州起义记》。

③江韵清：《回忆父亲革命事略片段》（1959年5月6日），未刊稿。

因北方已无希望再次发动起义，江浩等革命党人遂南下转赴上海。当时正值山东烟台起义，宣布独立，请求援军。上海乃组织北伐军援鲁。江浩又随援鲁军转赴烟台。随后山东都督胡瑛邀请江浩出任山东交通司司长，江浩婉言谢绝。因清室已于二月十二日退位，江浩又重返天津^①。

是年八月，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天津同盟会奉命与统一共和党等合并，成立国民党燕支部，江浩任燕支部交际科干事和评议部评议员^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实行议会政体，江浩当选为直隶第一届省议会议员，一九一三年又当选为国会参议院候补议员。

袁世凯为了实行独裁统治，派人暗杀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不久失败。这时，袁世凯进一步加强独裁统治，下令解散国民党，一九一四年又下令解散国会，急于称帝复辟。一九一五年，江浩因为反对袁世凯被通缉，于是出走各地，继续奔走革命。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召集原国会复会，江浩复回北京。八月一日，国会复会，举行第二次常会。江浩由国会参议院候补议员，晋升为议员，出席了这次国会。

江浩十分关心人民群众，注意启发农民的思想觉悟。他每次回到玉田家乡，总是要用大部分时间去找乡亲们攀谈，了解他们的疾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他们介绍一些国家和世界的

①见《郝久亭自传》（1954年2月27日）。

②《革命文献》第41辑《民国初年之国民党史料》，原载《民国月刊》第1卷第2号。

大事。乡亲们喜欢接近他，或在村头巷尾，或在田边路旁，经常围着一大群人听他谈话。从一九一六年开始，他在“教育救国”思想指导下，在家乡先后创办了农余校、女子小学、读报社和息讼会^①。

农余校（亦称日工夜课学，又因夏用中午冬用晚上，也有叫夜校的）于一九一六年（一说一九一五年）七月在北刘家桥村北庙——“后庵”开办。学员多数是北刘家桥村和附近村子里没有文化的贫苦农民，一律实行免费入学。

一九一七年，江浩在北刘家桥村又办起了女子小学，这在当时的北方农村也是罕见的。女子小学设在村东头的庙里——“西方庵”，学生有二十名左右。刚开办时经费是村里摊派，后来报到县教育局，由县里拨一部分经费。江浩还把地球仪、中国和世界挂图等教具捐献给女子小学。江浩外出后，他和大女儿江韵清每年暑假回家乡时，就到女子小学讲课或作报告^②。在讲学时，江浩大力提倡妇女解放的思想。他指出：妇女受痛苦最深，应该彻底解放；男女应该平等，婚姻应该自主，父母不应包办儿女的婚事；妇女不应缠足等等。

江浩在家乡所创办的农余校、阅报社、息讼会、女子小学和讲学活动，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他在农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经过他的启蒙教育，广大农民群众受到了深刻的影响，文化程度和政治觉悟都有很大提高。这些工作为后来一九二七年玉田县的农民起义播下了革命火种。

①张凤岐整理：《北刘家桥村张安民、张士瑞口述记录》（1959年5月5日）；韩成印整理：《江浩初年的革命活动》（1959年7月28日）。

②1982年6月访问邢文泽记录。

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废弃国会与《临时约法》。孙中山发表声明，号召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发动护法运动。江浩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和部分议员南下护法。一九一八年，护法运动失败。此后，江浩和其它护法议员发表通电，声讨军阀政权，表示“护法救国，矢志不渝”，号召“凡我国人，其速奋起图之”^①。

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消息传到广州后，江浩和在广州的国会议员，于五月九日召开两院联席会议，发表通电，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严惩卖国贼。通电说：“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甘为外人鹰犬，密与日本勾结，……罪状昭著，天人共愤。京津学生急于国亡之惨；目击贼党横行，奋不顾身，义勇勃发，力毁曹宅，痛击章獠，有国以来，无此痛乐。乃北庭不思卖国奸党尽可诛，反任意捕禁学生，并有将加惨害，及解散大学之说。国人闻之，不胜诧异。……特开两院联合会，群情愤激，一致议决，通电各省，要求北庭即释已捕学生，维持各校现状，严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以谢天下”^②。

为了拥护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江浩奔波数载，坚持斗争，被环境逼得生活十分困难，连子女的教育费用也无法供给，最后只得求助于他的夫人。从他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三日自广州给他夫人的信中，可以看到他革命到底的精神和当时的困难处境：

① 《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1期第227页。

②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云南特派员公署档案》，载《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232—233页。

玉莲贤妻如见，倾接手函，借悉一切。所嘱各项事情，均极合理。定当照办。至儿辈就学各项费用，其责任本应由予负担，以尽为父义务。只因时运未至，且不肯违心作事，以致数载奔波，不惟少过家门，即外边亦无正当休止处所。自己受苦，当不足惜，乃竟以教育花销累吾贤妻，问心何以能安。但望国家平定，予得就一事，……则得仰事父母，……此时只得偏累吾妻支持一切……。

愚夫注源

五月十三日①

江浩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历尽曲折和艰辛，然而都一一失败了。正当他在为寻找中国革命道路而苦闷时，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他深受鼓舞，在思想上产生了希望，认为“中国革命也必须走这条道路”②，随即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渐渐信仰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〇年底，江浩回到北京，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不久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③，成为我党的早期党员。从此由一个爱国民主主义革命家逐步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江浩后来在回顾入党前的坎坷历程时深有感触地说：“摸索了十多年呵！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我才懂得，只有马列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

①江浩给妻子刘玉莲的信。

②江韵清：《回忆父亲革命事略片段》（1959年5月6日），未刊稿。

③朱务善：《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另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

呵！”^①

(二)

江浩入党后，仍利用国会议员的合法身分，从事革命活动。当时，他把在国会议员月薪收入四百元银币的大部分交给了党，而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仍很清苦^②。

一九二一年，江浩与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各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暑期，他通过社会关系到保定育德中学任学监。育德中学是北方著名的私立中学，“五四”时期曾受到爱国运动的影响，从学校领导到一般教职员和学生，大都倾向进步，民主和科学的空气很浓，马列主义和各种进步书刊在校内公开流行，各种进步社团非常活跃，有北方革命摇篮之名。

江浩在育德中学，通过各种方式，传播革命思想和马列主义。他在担任修身课的教学中、在大饭厅里向十二个班的几百名学生讲大课，以人生观为题，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③。

此外，江浩还积极赞助学生各种进步社团的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育德中学学生自治会、文学研究社、社会科学研究会、书报贩卖部等群众性的进步社团都十分活跃。文学研究会

①张明远：《冀东早期革命家江浩同志》，载《浩气长存——河北革命烈士史料（三）》。

②《天津革命烈士生活片断》，载1964年6月29日《天津日报》。

③1982年4月访问武纡生记录；又见武振华（即武纡生）：《关于江竹源的一些回忆》。

曾多次邀请江浩讲演。他在讲演中，启发同学们注意对人民群众开展宣传活动，指出要特别重视采用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如象赶庙会时那种“耍骨头”^①、“数来宝”的方法，容易产生效果，最受群众欢迎。在讲演中，江浩坦率地说，他是赞成陈独秀一派的社会主义的（当时社会上流行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等等）^②。

在此期间，江浩还多次应邀到保定第二师范讲演，宣传革命思想。

江浩在育德中学虽然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他和育德中学的师生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二二年暑假，当他离开育德中学后，很多学生给他去信。他在回信中热情地鼓励同学说：“勉之，勉之，鄙望无涯”^③。不少学生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军阀吴佩孚为收买人心，通电维护法统，恢复国会。同年暑期，江浩从保定回到北京，以国会议员身分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江浩在国会内外大力宣传“劳工神圣”思想，因此，在国会内他被称为“劳工神圣者”。当时中俄关系已中断，北洋军阀政府拒绝恢复中俄邦交。江浩在国会提出恢复中俄邦交的议

①“耍骨头”，是指旧社会的下层艺人的一种说唱形式，因为他们所用的乐器是两片带小铃铛的牛扇骨，反复撞击就能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②③见王斐然 1982 年 5 月 7 日来信。王斐然，我党早期党员，来信时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又参阅武振华：《关于江竹源的一些回忆》。

案。然而他的发言却遭到议长的无理制止，提案也被拒绝。为此，他和议长发生激烈争执，而议长则利用职权，不准江浩发言。由于江浩经常发表进步言论，提出进步议案，他竟被国会贬为“反动”议员①。

这一年的十月，开滦煤矿五矿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共唐山地委的领导下举行了同盟大罢工。十一月，直隶省警务处长兼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到唐山残酷镇压工人罢工。江浩等二十八名议员向政府提出质问，要求弹劾刽子手杨以德，声援工人的罢工斗争②。

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发生后，江浩与一些国会议员揭露军阀的罪行。二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参众两院议员一百余人，在众议院小议场开会。主席褚辅成报告说：工潮问题发生后，本院吴议长（即吴景濂）曾向政府提出三项调和办法，尚无正式答复。现范围愈形扩大，前途异常危险。为维持大局尊重大权起见，故特邀请同人商议办法。接着江浩、王葆真等议员发言，猛烈抨击军阀屠杀工人的罪行。讨论结果，决定一面由到会众议院议员提建议案；一面对政府要求办法如下：一、政府应根据约法承认工会；二、释放此次工潮被捕工人；三、抚恤此次工潮之伤亡者；四、撤退临时增调弹压军警，同时恢复各路工作③。

江浩对于曹锟的贿选阴谋，同样进行了无情的揭发和斗

①李世璋：《回忆江浩在国会的斗争》。当时李世璋系北大学生，兼任《京报》记者，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江西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6月在上海病逝。

②河北工运史料之一：《唐山市早期工人运动简况》。

③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173—180页。

争。不论曹锟一伙怎样采取重金收买，还是封官许愿，派他的好友拉拢劝说，他都坚决拒绝，表现了一个革命家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气质。曹锟曾指使江浩的盟兄弟武宜亭（时任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主事，北京警察厅总监的秘书，京兆尹办公署参议职），劝说江浩投曹锟一票，条件是：其他一般议员投一票五千元，江浩投一票可多几倍（一说二万元），还让江浩挑一个县去当县长。武宜亭的拉拢劝说当即遭到江浩的严辞拒绝^①。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旬，为了抵制曹锟的贿选阴谋，在江浩、李锡九等人积极带动下，一大批国会议员愤然离京南下，先到天津集中，再转赴上海。江浩与南下的一百八十五名议员于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离京《宣言书》，阐明了离京原因和返京的条件。六月二十八日，离京议员二百九十五人在津又发出致两院同人书，指出：为“保持议员人格计，亦即所以为保持国家人格计”，呼吁两院议员“猛醒”，反对曹锟贿选总统^②。

当时，不少国会议员，丑态百出，有些假装的硬汉，由津到沪，再由沪到津，最后又跑回北京。他们为了五千元的支票，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最后五百几十个猪仔，把自己的灵魂和骨头与五千元支票正式交换了，致使曹锟贿选总统的阴谋得逞。反对曹锟贿选的议员，斗争半载，毫无结果，其中许多人四散奔走，但江浩却矢志不渝，坚持斗争到底。在一些人携眷逃离上海的情况下，他不但将眷属接到上海，且于一九二四年元旦，同在沪眷属合照留念，并题词明志：

①见刘敬之：《江浩简历》（1982年12月12日）。参阅天津《支部生活》1981年第12期《前赴后继三代人》。

②见1923年6月23日、29日《晨报》。

“客夏北京政变，两院同人，主持正谊，南走沪滨，数逾百余，亦其一半年奋斗，竟无好果，同人多数他往，亦难言矣！余生性愚执，尚不以此自馁。时值岁暮，人人携眷分散，余决接眷南来，虽然余每冬多病，左右需人，老妻借此游历，子女均待教育，亦有种种原因也。本年元旦，天气异常和暖，遂携眷出游，拍照留一痕迹云。

十三年一月十三日”^①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形成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江浩出席了这次大会。会后，根据党的指示，他返回天津，与于方舟、李锡九共同担负起创建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和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重任。二月底，在天津法租界普爱里十七号建立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江浩是主要负责人。五月，他又与于方舟、李锡九在原法租界二十四号路普爱里三十四号（今和平区长春道普爱里二十一号）召开了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成立会议。会上，选举于方舟为书记，江浩负责组织，李锡九负责宣传；并决定中共天津地委机关就设在该处（六月迁至英租界义庆里四十号）。天津地委的建立，使天津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确定了党在天津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开展群众运动特别是纱厂工人运动，派党团员深入工厂、学校建立基层党组织，发展国民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天津人民迅速掀起了革命运动的高潮。

江浩和于方舟等天津地委负责人在加强党团组织建设的同时

^①见刘敬之保存江浩在沪全家照及亲笔题词。

时，还组织了以党、团员为骨干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组织了非基督教大同盟；改组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建立了妇女组织，出版了《妇女日报》。江浩还利用自己在天津、北京和直隶省的许多社会关系，泛泛接触各界进步人士，吸收了许多人加入共产党，并把他们分别派往京奉、京汉、津浦沿线各县充实或发展革命阵地。

为了掩护党的地下工作，江浩把家眷安置在普爱里三十四号。江浩在工作中十分注意运用过去他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很少请客赴宴。他不仅自己从来不到戏园、电影院、公园、游艺场所去，而且告诫别的同志也不要去，教育大家要严格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江浩生活俭朴，衣食住行，处处力求节约。他不饮酒，不吸烟，对衣着更不讲究。他常教育子女说：衣以蔽体，只要整洁就可以了，不要做衣服的奴隶，穿衣更不要追求华丽，一个人的好坏被人看得起还是看不起，不是在衣服上衡量，品质好的人穿多破也是好人，品质恶劣的人，穿多好也是丑恶的①。

江浩的夫人是一位缠过足又未受过教育的家庭妇女，江浩对她体贴、尊重，夫妇和睦相处。她原来不识字，江浩教她学习，从字母拼音开始，后来达到了能用以通信、记事的程度。江浩的家在天津地委机关居住时，她除了操持家务外，还为掩护党的机关操心尽力。在江浩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几个子女都先后参加了革命。一九二四年秋，大女儿江韵清经于方舟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妇运领导工作②。儿子江震寰也在

①江韵清：《父亲江著元的革命生活片段》，1961年7月4日《天津日报》。

②江韵清《自传》，未刊稿。

这一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入党，于同年六月入黄埔军校，九月肄业，旋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后来，二女儿江挹清也参加了革命。人们称赞江浩一家是“光荣的革命之家”^①。

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等人发动“北京政变”。十一月十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十三日离开广州北上，路线是经上海转日本，再经天津赴北京。这时，江浩以国民党特派员身分，组织领导了天津人民迎送孙中山和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等各项工作。

十一月二十七日，江浩、于树德和爱国教育家马千里在《新民意报》馆共同研究在孙中山路经天津时如何欢迎的问题。二十九日，江浩等以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名义，联络三十多个团体，召开了天津市民欢迎孙中山筹备会，到会二百多人。会议主席江浩报告了孙中山到津日期及联络各方面准备欢迎的情况。他提请大会讨论准备的事项主要有：一、向孙中山提议八条；二、推举代表马千里、宋则久、邓颖超等十人与孙中山谈话；三、赠孙中山锦旗一面，上书“代表全民众而奋斗”，等等。十二月一日，江浩同马千里到孙中山将下榻的张园联系。十二月三日，即孙中山到津前夕，江浩又同于方舟、马千里去南开中学联系借用大操场，以便在欢迎孙中山时让他同更多的群众见面。

十二月四日，孙中山由日本乘船到达天津，中共天津地委发动两万余群众到码头隆重欢迎。当天中午，江浩同于方舟、马千里来到孙中山住地会见有关人员，联系邀请孙中山讲演和会见群众的问题。八日和十八日下午，江浩和于方舟、马千里

^①乐天宇：《我所知道的中共北京地委早期的革命活动》，载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11辑。

两次就成立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问题进行研究。十八日晚，江浩主持召开了天津各团体代表欢迎孙中山大会。他向大会报告了孙中山的病情，说明孙中山因病不能在群众欢迎会上讲演和赴宴。他接着说：“天津市民欢迎筹备会可以结束，本会代表于孙中山赴京之前可以接见；他对大家的欢迎，甚表感激，因不能讲演，故请开列各团体名单，以便分送宣言书册等物，以代讲演”。就在这次会议上，江浩等人发起成立了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到会各团体纷纷签名加入。

会后，中共天津地委领导各界组织讲演队，到街头宣传民主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等政治主张。江浩、于方舟亲自参加讲演，他们在东马路讲演所、青年会礼堂及繁华地区的娱乐场所，每周一、三、五晚上或星期日举办讲演会，动员广大工人、学生、店员、社会人士及居民参加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内容的革命运动。

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江浩和于方舟的领导下，召开了天津国民会议筹备会，江浩当选为常委。在此之前，还成立了以邓颖超为首的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

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抱病赴京，天津人民举行了欢送孙中山大会。江浩、于方舟等代表全市百万人民到车站欢送，并派人护送到京。欢送大会通过和发表了《致中山先生函》和《致全国通电》，指出：“军阀所主张之善后会议，愚民欺世”，“则国民会议能否实现，能否尽符吾人之所望，万不能付之孙公孤军独战，尤在乎民众群起响应，民众利益之获得，唯在民众自身之奋斗获得”^①。

^①见1925年1月1日天津《益世报》。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成立大会，江浩被选为总务委员。此后，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部署和讨论有关国民会议的工作。这些会议大多由江浩担任主席。

三月一日，由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领导和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浩、于方舟、邓颖超等十名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参加了大会，江浩被选为常务委员。这样，江浩不仅是天津国民会议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全国国民会议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三月十二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江浩立即领导筹备在天津召开追悼大会的各项活动。四月十八日上午，天津市民隆重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前往吊唁的约有十多万人，挽联数千幅，散发孙中山的像片万余张，传单十余种二十余万张。江浩出席了追悼会并担任主席。会上，有三十多人登台讲演，广泛宣传了孙中山一生的伟大功绩和新三民主义，使天津人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①。

四月二十六日，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开会，江浩、于方舟、安幸生、王南复、门乞中、吕职人等十余人出席会议。江浩主持了会议，报告参加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情况。他强调指出：“若望开成国民会议，非先国民革命不可”^②。江浩还应邀到南开女中讲演，邓颖超主持了讲演会。江浩在讲演中揭露了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罪行，指出：“非革命不可

^①有关孙中山北上的史实参见1924年11月至1925年4月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及未刊稿《马千里日记》。

^②见1925年4月27日天津《益世报》。

……对内打倒军阀，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国乱日甚，四民流离失所，皆帝国主义之所赐也，欲根本解决，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①。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天津，激起了天津各界广泛声讨帝国主义罪行的活动。中共天津地委领导各界人民团体发出宣言与通电，对帝国主义提出了严正抗议。为了使斗争扩大到各阶层去，江浩和邓颖超等联络各爱国团体，于六月十日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并被推举为各界联合会主席团成员。六月十三日，在江浩和邓颖超主持下，各界联合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号召各界人民开展宣传、募捐、与英日绝交等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人民的斗争。会后，各界纷纷成立“沪案后援会”，参加各界联合会的爱国团体由三十多个发展到二百多个，反帝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

六月十四日拂晓，天津二百余团体十万余人在南开操场集会。江浩和邓颖超等出席会议。大会选出江浩、邓颖超、安幸生等七人为请愿代表，抗议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为了响应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发起的举行全国反帝大示威倡议，六月三十日，江浩和邓颖超等各界联合会主席团成员领导全市各界人民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长达十华里，每人臂上戴着黑纱，表示对死难同胞的哀悼。江浩走在队伍前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为上海死难烈士复仇”等口号，并在沿途讲演，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听者无不为之感动。

^①见1925年1月12日、14日天津《益民报》。

在“五卅”运动中，天津也同全国一样，迅速地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天津海员和纺织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奉系军阀为了镇压天津人民的革命斗争，派出大批军警疯狂反扑，大肆逮捕各界代表和工人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江浩被迫转移，离开天津，先后到玉田和张家口等地开展革命工作。

一九二五年七、八月间，江浩以国民党直隶省党部负责人的身分，组织和率领在京、津读书的进步学生到玉田县开展革命工作。他在玉田县的进步教师中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创建了国民党玉田县党部，并从国民党左派分子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玉田县，江浩还发动正在县城会考的全县高小学生、教师和部分知识分子、工人、商人、农民共约三千多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声援“五卅”运动。这次游行示威震动了全县，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八、九月间，中共北方区委派肖三、江浩、王仲一、卢绍亭等到张家口领导革命斗争。江浩、王仲一先在京绥路沿线领导了工人运动。这时张家口铁路车务、机务等大厂和京绥路沿线的南口、康庄、大同、包头各站，以及张家口市内电灯公司、造币厂、电话局以至大境门外的农村，已经普遍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迫切需要在张家口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机关。在这种形势下，肖三与江浩、王仲一 together，领导建立了中共张家口地方委员会，代号“张迪芳”，肖三任书记，王仲一任组织委员，江浩任宣传委员^①。江浩在张家口工作重点是做国民党和

^①肖三：《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载《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82页。

国民军中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联系的人主要有在国民军中的国民党代表李烈钧、国民军将领鹿钟麟等。

十月十二日，在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江浩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身分出席了会议^①，并代表中共北方区委发了言。出席大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瓦切尔劳夫、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丹巴道尔吉、中国国民党代表李烈钧等。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反对民族压迫，反对王公札萨克制度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对内蒙古人民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十二月上旬，江浩奉命秘密返回天津，继续领导天津人民进行战斗，筹备欢迎倾向革命的国民军进入天津。江浩到达天津以后，在“公卖局”负责人身分的掩护下，从事革命工作。一九二六年初，他和于方舟、邓颖超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江浩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委^②。会议结束之后，他又重返天津。

为了恢复被奉系军阀李景林解散的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二月二十五日，原该会主席团在天津县教育局召集全体委员会议。江浩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会议推举江浩为代表，与北京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系，以便恢复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③。

三月，江浩在大东旅社主持召开了直隶省国民党代表大会。他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深刻地分析了中国近年来的

①吉雅泰：《内蒙古革命史上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4期。

②见《国民党“二大”日刊》第18号。

③见1926年2月27日天津《益世报》。

政治形势。会议选举江浩、李锡九、于方舟、王积衡、吕职人、江韵清等九人为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执行委员。在江浩等共产党人领导下，天津及直隶各地革命运动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

革命运动的重新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端恐惧，千方百计要破坏中国革命。三月十二日，两艘日本军舰闯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还击。第二天，日本帝国主义援引所谓“辛丑条约”，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纠合签订“辛丑条约”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无理要求国民军撤除大沽防备。各国军舰也云集大沽口，进行武力威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掀起了抗议大沽口事件的高潮。三月十八日，北京群众在我党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段祺瑞下令开枪镇压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三月二十一日，天津一百四十多个团体一万余人在南开操场召开“废约驱段大会”，愤怒抗议帝国主义和军阀段祺瑞相勾结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江浩在会上做了“为大沽交涉案、为援助北京惨案”的报告，于方舟、安幸生在会上也讲了话。大会推举江浩、于方舟、安幸生、吕职人、郭隆真等十人为请愿代表，支持北京人民的革命斗争。当天下午五时，江浩、于方舟、陶卓然、安幸生、王卓吾等领导天津各界联合会召开会议，到会者有六十余团体三百余人。会议公推江浩和邓培、王卓吾、宋则久、安幸生等五人为天津各界联合会主席团成员，通过了“抵制英日货；电广东国民政府，急速北伐，推翻段祺瑞政府，通电全国；组织代表赴京调查并慰问被杀同胞家属”等决议^①。

^①见1926年3月22日天津《益世报》。

第二天，国民军在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夹击下，被迫撤出天津。奉系军阀占据天津以后，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江浩是敌人搜捕的主要目标。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指示江浩再次往张家口转移。江浩到达张家口后，首先帮助建立了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并在省党部担任常务委员。接着，他又参与重建了中共张家口地委，担任地委宣传委员^①。五月初江浩奉调广州，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任职。

（三）

江浩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工作后，出席了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张国焘、彭述之推行陈独秀的让步方针，强迫中共党团接受了蒋介石的提案。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分子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和中央党部的各部部长。江浩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分裂活动极为愤慨。张继原来是他的挚友，当他知道张继参加了“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后，断然与其绝交^②。

在广州，毛泽东邀请江浩为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作报告。“象松柏那样长青的革命元老”，就是毛泽东向学员介绍江浩时说的。江浩向学员报告了当时的革命形势^③，给学员留下了

①1982年3月27日访问乐天宇记录。

②张明远：《冀东早期革命家江浩同志》。《浩气长存——河北革命烈士史料（三）》。

③1983年6月访问张明远记录。

深刻的印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些学员常去找江浩请教问题，当一谈起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时，江浩总是非常气愤，痛恨不已。江浩在广州期间，勤恳学习，还经常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讲，按时到苏联顾问鲍罗庭处听政治报告。

十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江浩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召开的联席会议。十月二十六日，联席会议主席团指定江浩、毛泽东等七人为全国联席会议纲领起草委员。同日，主席团又指定江浩等七人为党务审查委员。

一九二七年一月，江浩随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后，在极其复杂的斗争形势下，紧紧地依靠党的组织，同各种各样的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三月十日至十七日，他出席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原定三月一日至七日召开，由于蒋介石的阻挠，使由广东北来的中央委员滞留南昌，致使会期拖延。在三月七日的会议上，由南昌来鄂的谭延闿等五人还为蒋介石阻挠会议作辩护，要求再延期等候蒋介石、朱培德来鄂，甚至胡说有人从中挑拨等等。江浩等人立即反驳了谭延闿的谎言。江浩指出，“本会定期三月一日，如有一再延期，恐生误会，谭同志所争亦会期，究竟是内容问题？抑为会期问题？因迁就事实而纠纷，如再迁就，则所谓提高党权者何在？关于会期问题，亦望南昌同志，稍事容纳。”^①

三月九日，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提案审查会上，会议主席团成员徐谦报告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这一提案限制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三月十三日，全会又通过组织廖

^①参阅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有关记录。

仲凯被刺案审查委员会，由吴玉章、林祖涵、江浩等七人组成。总之，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江浩同我党的大多数代表一起，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十八日，江浩的儿子江震寰等十五位革命志士在天津惨遭奉系军阀杀害。十九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出“通缉令”，通缉包括江浩在内的一百九十七名所谓“共党及跨党分子”。二十一日，江浩和谭平山、吴玉章、毛泽东、宋庆龄、邓演达等四十人联名发出通电，声讨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和自立政府的罪行^①。

五月六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次扩大会议决议组织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成员有江浩、于方舟、李希逸、徐谦、王法勤等八人。五月九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任命江浩为革命军事裁判所长。命令规定：“关于镇压反革命之审判权，由军事委员会革命军事裁判所统一行使。”^②

江浩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坚决、认真，秉公执法。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后，生俘了军阀吴佩孚的师长刘玉春。刘玉春系河北玉田人，不仅与江浩是同乡，而且续起来是江浩的小舅子。在审判刘玉春之前，江浩对裁判所裁判员赵雪村、郑铁山等人说：“今天我要演出一场‘赤桑镇’（京剧名，剧情是包拯铡堂侄包勉的故事），审一审我那个小舅子（指刘玉春），看他脑壳有多硬？”^③最后，江浩按照法令，严肃地处置了刘

①《记国民党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议》。

②见1927年5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

③王积衡1983年1月的回忆。

玉春。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背叛革命。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八月一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发动了有名的南昌起义，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江浩与周恩来、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徐特立等二十五人，当选为革命委员会的委员^①。

同日，江浩与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于树德、董必武、夏曦、邓颖超、韩麟符、恽代英等共产党员和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共二十二联名发表了著名的《中央委员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是“国民革命之罪人”^②。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之罪行。八月三日，江浩与其他部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武汉中央最近行动，三大政策既被根本破坏，三民主义亦被曲解，党之纪律与权威既扫地无余，党之名义早成为一二私人之工具”，“武汉中央既已表现反革命行动之事实，而与南京政府无异，本会决不能姑息盲从，亦必将以对待南京政府之手段对待之。”^③

十月十五日，江浩随中国工农代表团一百七十余人，乘苏联安迪吉号轮船，从上海启程前往苏联。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江浩在莫斯科参加了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活动。庆祝活动结束后，代表团全体成员离开莫斯

①③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革命史研究室编：《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版。

②1927年8月1日南昌《民国日报》。

科，前往南高加索的黑海海滨休养。江浩和向忠发、李震瀛则按照共产国际指令前往比利时出席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理事会扩大会议，他们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斗争和反帝运动的报告^①。会后，返回莫斯科。

一九二八年，江浩与林伯渠、吴玉章、何叔衡、徐特立等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学校为这些年龄较大、实践经验较多的同志，专门设立了特别班。江浩在特别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为有这样好的学习条件感到非常高兴，虽然记忆力已不如青年，但学习很努力，各门课程成绩都很好。

一九三〇年十月，江浩在特别班毕业，回国参加革命斗争。途中，他患了严重心门漏血症，只得留居海参崴疗养。疗养期间，他与吴玉章、林伯渠等一起，在海参崴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任教，对华工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还给国内同志写信，指出要学习革命理论，做好国内工作^②。

一九三一年，江浩因心门漏血症复发，病逝于海参崴，终年五十一岁。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海参崴市郊的一座山上。

作者附记：

1. 本传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有关单位的图书资料，得到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谨致谢意。这些单位是：天津市图书馆、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

^①向青、石志夫、孙岩：《中共代表等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介绍（三）》，《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4辑。

^②1982年6月访问江汰清、武纡生记录。

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河北省档案馆、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河北省政府民政局革命史料研究室、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唐山冀东烈士陵园、张家口地区档案馆、中共张家口地委党校、张家口市总工会、中共玉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武汉市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州中山图书馆、广东社会科学院、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讲所旧址纪念馆、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

2. 本传还得到江浩的亲属江汰清、江亚勋、侯乃赓、刘敬之、江宏烈（新光）、张世俊、王积衡和生前友好张明远、武纡生、吕职人以及李琦、王斐然、乐天宇、张申府、谌小岑、李国路、邢文泽、黄真、张钟、杨树升、董宝玉、李婉霞、袁继成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深表感谢。

刘 英

黄书孟 张继昌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八日清晨，中共中央闽浙赣特派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秘密杀害于浙江永康方岩，时年三十九岁。

刘英为民族的生存、人民的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英勇奋斗，历尽艰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从贫苦农民到红军将领

刘英，原名刘声沐，化名可夫、爱群、越人、锄非、王志远等，一九〇三年生于江西省瑞金县凤岗乡竹岗村一个贫农家庭。

刘英小时，家有少量薄田，但远不能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除种着刘氏家族的花利田外，还租种地主杨家裕的土地。因家境贫寒，刘英九岁时才进入本村群德小学读书。一九一六年，刘英初小毕业。在同族帮助下，得到到瑞金县城读高小。一九一八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高小毕业。但家境每况愈下，父母不愿增加同族的负担，刘英于是辍学在家。回家后他仍勤奋自学，曾在家里的墙上题诗一首以自勉，其中有两句是：“夜静书为友，

春深笔吐花。”

一九二四年，刘英到松山小学（原群德小学）任教。在这里，他接触到的进步书籍更多了，除能看到闽西地区出版的《岩声报》外，还能看到《新青年》、《向导》和《改造月刊》等。一九二七年，兵荒马乱，又遇大旱，半数学生退学，刘英也离开了学校。

不久，他同两个青年合伙，借资在瑞金城开了个小米店，想借此糊口。当学生，刘英是优等生；教书，刘英是里手；至于做生意，他却是个外行。经营年余，米店亏损关门。

在开米店期间，刘英结识了以行医为名进行革命活动的瑞金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邓生文。刘英经常到他家里去，听他讲述革命道理，觉悟不断提高，还协助邓生文进行了一些革命工作。

这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瑞金地区遭受天灾，田里没有收成，刘英的父亲刘方珍因交不出租谷，被杨家地主吊打，也受到了族长的严厉斥责。第二年刘英一家更加起早贪黑地耕作，指望有个好收成。谁知稻子正在灌浆时，刘氏家族的开坛绅士田孙却中途撤田起青苗。刘英得知这一消息后，便约集同时被撤田起青苗的几户人家中的年轻人，手持柴刀去找田孙算账。正在刘氏宗祠做祭祀的田孙等人知道刘英懂武功，怕吃眼前亏，只好收回成命。刘英这一闹，不仅打击了田孙等人的气焰，使他们第一次在下辈面前丢了脸，而且赢得了群众的称赞。

一九二九年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长汀进占瑞金县城。刘英便约同本村青年刘德连一起参加了红军，并改名为刘英。参军时，刘英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献

身革命的决心：“幼时不知路，今日上坦途。赤心献革命，决然无返顾。”

刘英参加红四军后，先在军部担任会计，不久担任了军供给部出纳股股长。每逢部队行军时，他总是跟军需运输队一起走。一次，部队从闽西回师赣南，有一个挑银元的运输员掉了队。刘英发现后，立即返回去，终于接到了这个同志，两个人轮换挑着银元，在深夜时分赶上部队。事后，同志们从运输员口中得知，刘英他俩一天一夜粒米未进，虽然挑着一担银元，却没有动用分毫去买块红薯吃。

一九二九年九月，刘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曾写信给一位同志谈及自己加入共产党后的感想。信中写道：“我自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之后，衷心感想到，不管阶级敌人怎样咒骂诬蔑，共产党终竟是人类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她有完整的革命理论、革命纲领和最高尚的理想，她有严密的党的组织与铁的纪律，她有正确的战略，她有广大的经过选择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员、群众，并且她还有得到全党诚心爱戴的领袖，她与无产阶级和一般劳苦群众保持亲密的领导关系，她对阶级以及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努力奋斗和牺牲精神，只要不是一条疯狗，都会对她表示敬意。共产党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光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直至生命都交给党去了！”^①

有一次，刘英写了一封信准备寄给家里，正巧被军党代表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看他文笔不错，就和刘英攀谈起来，详细

^①摘自《刘英给章士坦的信》，（1936年7月6日），存泰顺县党史办。

地询问他的情况。刘英一一作答。毛泽东临离开时，问刘英：你到军部来搞文书工作好吗？刘英表示同意。过了几天，刘英就调到军部当了文书。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刘英下到部队参加战斗。一次，刘英所在部队遭到了数倍敌人的包围。在掩护撤退时，刘英一个人抱着一挺机枪断后，直到部队撤出战斗。在前后几次反“围剿”中，刘英曾经遇到过多次生与死的考验，他从未动摇过。在革命战争中，刘英成长很快，先后担任过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治部主任和团政委。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刘英被调到新成立的红五军团担任十五军第四十四师政委。

一九三二年二月，刘英参加了攻打“铜赣州”战役。战斗中，插进赣州西门河川与城墙之间挖坑道的红一师被敌切断，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命令红十五军前往救援。刘英和师长王洪章立即率领四十四师随同十五军的部队冲了上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使红一师转危为安。

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共军委发布命令，决定恢复一九三一年十月被撤消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下辖第四军和原属第五军团的十五军，刘英仍任十五军第四十四师政委。

一九三二年四月，刘英跟随毛泽东率领的东路军东征漳州。四月十九日，军政委左权、四十四师政委刘英和师长王洪章率四十四师打前锋，佯攻宝林桥，强渡芄水，把宝林至南靖一线之敌一四五旅打得一败涂地，给了主攻部队以有力支援^①，

^①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4页。

四月二十日，东路军攻占了漳州城。

四月二十一日，刘英参加了毛泽东在红楼召开的师长、师政委以上的干部会后，回到天宝、南靖，组织四十四师的指战员，进行发动群众打土豪、扩红、搜查反革命分子、筹款筹粮等工作。在打土豪筹款中，由于缺乏工作经验、语言不通和大部分红军战士来自农村，因此出现了一些过“左”的作法，战士们看见一些戴礼帽穿西服的、穿大褂戴眼镜的、拿文明棍穿皮鞋的人，都当作土豪抓了起来。毛泽东发现后，立即召开了连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指出：你们打错了很多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你们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没有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你们赶快清查，错了的就改。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刘英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会后，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抓来的“土豪”逐个进行了审查。对于错抓的，一律赔礼道歉。这件事，对刘英教育很大。

攻占漳州，这是刘英生平第一次进入这样大的城市，真是大开眼界。他第一次看了电影（无声），第一次骑了自行车，第一次看到了停在地上的飞机，还第一次穿上了胶鞋。在漳州工作的四十多天中，他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受到了一次全面的锻炼，并对毛泽东有关正确的战略战术和策略思想有了切身感受，工作能力大大提高。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刘英调到九军团工作，先后担任三师、十四师政委^①；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又调到五军团任

^①林彪、聂荣臻：《对干部配备的意见》（1933年11月3日）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十四师政委（师长为张经武）^①；不久又被调到红七军团，担任军团政治部主任^②。

一九三四年七月初，中央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最后到达地为皖南，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成员是：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参谋长粟裕^③。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晚，红七军团六千多健儿，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在寻淮洲、乐少华、刘英、粟裕的率领下，由红都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的任务。先遣队出发后不久，打下了大田和水口县城，于八月初发动了攻打福州的战斗。福州未攻下，我军却受到相当损失，时又正值盛夏，部队有伤病员七八百人。在行军中，身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英，不仅与政治部的同志们一起沿途张贴布告、传单和刷写标语，而且还亲自为伤病员抬担架，对伤病员做思想工作。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先遣队在重溪地区接到已开始长征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红七军团和新十军合并成立红十军团以组成更强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命令。新组成的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④；原七军团改编为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刘英随十九师行动并兼任十九师政治部主任^⑤；新十军改编为二十、二十一师。由于战事关

①《红五军团给中央军委的电报》（1934年1月6日）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②③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载1981年7月26日《解放军报》。

④⑤乐少华：《关于红十军团出动的经过的报告》（1936年8月20日）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系，此时七军团和新十军尚未会合。十一月十八日，寻淮洲和刘英率领十九师离开重溪向皖南进军，取得许多战果。十二月十日，方志敏率领二十、二十一师到达安徽歙县的汤口地区，在此与奉命南返的十九师会合^①。在这里，红十军团接到项英、陈毅为首的苏区中央分局的电报：为了统一领导红十军团和创造新苏区，决定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组成五人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作为先遣队行动区域内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②。

此时，敌人正调集重兵对我军实施围追堵击。十四日上午，我军在谭家桥附近的乌泥关同敌人接火。终因敌众我寡，指挥又失当，我军被迫撤出战斗北移。当部队转移时，刘英在组织掩护的战斗中负伤，右手腕被子弹打穿，右手小拇指被打去一截。谭家桥战斗的失利，使我军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只得返回闽浙赣苏区略事休整，再图北上。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部队沿浙西天目山向赣东北的怀玉山进发。刘英由于身负重伤，流血过多，身体十分虚弱。同志们坚持要用担架抬他，他执意不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爬山涉水，沿途给同志们讲故事，还不顾伤痛照顾他人。当时和刘英一块从怀玉山突围的一位同志后来著文回忆道：“一九三五年一月部队在怀玉山突围时，前有敌军堵击，后有敌军追击，情况十分危急。……当我们冲向最后一道封锁线，敌人从碉堡里向我们射击时，前面有一丈多高的土坎挡住去路。我第一次往上

①《方志敏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页。

②中央军委：《关于红十军团的行动任务及军政委员会之组织的指示》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爬时掉了下来，第二次却一跃而上。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刘英用左手把我托上去的。在那样紧急的时刻，刘英同志不顾右手的伤痛，先顾他人后顾自己的这种高尚的阶级友谊，使我终生难忘！”^①

一月十二日晨，方志敏，刘英、粟裕率领先头部队八百余人进入江西境内，主力部队两千多人却陷入重围。方志敏不同意刘英和粟裕留下收容部队的要求，而命令刘英和粟裕率部先走。刘英和粟裕立即率领先头部队于当晚机智地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并很快和闽浙赣省委取得了联系。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后，中央指示苏区中央分局，命闽浙赣省委立即以先遣队突围出来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长期活动。一九三五年二月，挺进师正式组成，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②。挺进师组成时，“人数五百三十八，长枪四百四十五条，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八挺。”^③主要任务是：深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吸引和打击敌人，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配合友军行动，保卫闽浙赣苏区；在浙江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五年三月初，刘英、粟裕率领挺进师到达闽北苏区的崇安县坑口和车盆坑。刘英考虑到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心

①龙跃：《高尚的阶级友谊——纪念刘英同志殉难四十周年》，载《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2年第11期。

②③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载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1954年8月出版的《闽浙皖赣边区史料》第91页。

腹地区，没有红色根据地作为依托，于是在车盆坑进行了为时半个月的政治军事训练，使指战员学会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的两套本领。

鉴于挺进师将单独深入到白区和敌人长期作战，决定成立挺进师政治委员会，作为挺进师行动区域内最高党政军领导机关。政委会由刘英、粟裕等九人组成，以刘英为书记^①。车盆坑整训后，部队于三月下旬进入浙西南地区。

挺进师进入浙江后，在刘英和粟裕的统率下，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派兵阻击。自此，挺进师就处在前有福建保安团阻击，后有浙江保安团跟踪的困境。四月二十日，挺进师在上村被福建保安团马洪琛部袭击，牺牲了一个连长和十几个战士，丢失了十几担白洋、收发报机和全部电话机、电话线，从此和中央及苏区中央分局失去联系。刘英、粟裕总结了上村失利的教训，以电话兵为基础增编了第四纵队。从此，挺进师行军打仗轻装了，成为一支灵活机动的游击部队。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刘英、粟裕指挥挺进师取得了斋郎大捷。斋郎战斗，是挺进师进入浙江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迫使龙泉以南之敌由攻势转为守势，为挺进师在浙西南长期活动了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五月初，刘英在龙泉主持召开政委会，成立了浙西南特委和龙浦县委。这是师政委会在浙江建立的第一个特委和县委，为浙西南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九三五年七月底，挺进师在浙西南建立了第一个区苏维埃政权——松阳县玉岩区苏维埃；八月初，成立了中共遂昌王村

^①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

口区委和区苏维埃；稍后，又成立了龙泉住溪区苏维埃。这样，政委会就建立了以王村口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同时，挺进师也由五百余人发展到一千五六百人。这些胜利，标志着挺进师已在浙西南扎下了根，实现了党中央交给的开辟新的浙江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对于浙江的形势，敌人曾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来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前途实堪可虑。”^①为此，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清剿”总指挥，动用四十四个团的兵力开始了对浙西南根据地的第一次大“围剿”。

在这种形势下，师政委会同意了刘英的提议，除留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外，挺进师主力到闽浙边界活动，与闽东特委取得联系，共同打破“围剿”。一九三五年九月底，刘英、粟裕率领挺进师主力与闽东特委会合。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省委由刘英、粟裕、叶飞等十三人组成，刘英为书记，粟裕为组织部长，叶飞为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②。同时还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浙边临时军区，由粟裕任司令员，刘英兼任政治委员^③。

坚持浙闽边三年游击战争

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对闽浙边的整个干部和部队进行了重新调整，工作进行了重新布置。

①转引自龙跃：《坚持浙南十五年斗争的回忆》，原载《东南日报》，转引自1981年第4期《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

②③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

不久，临时省委获得消息说，浙西南基本地区受损，政委黄富武在战斗中受伤被俘牺牲；又获悉敌十八军有向两广开拔的动向。于是当即决定挺进师由粟裕、许信焜、张文碧等率领，全部回浙西南恢复浙西南工作，临时省委机关由刘英率领和挺进师分开行动。

挺进师出发后，刘英率领临时省委机关和一个配备六枝短枪、两枝长枪的特务班，在福鼎、泰顺、平阳一带活动，发动群众和建立各县、区党的组织。

但是，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摸到了我们的基本情况，知道红军主力已离开浙南基本地区。于是，平阳、泰顺等县的敌人经常以连排甚至以班为单位出来骚扰，气焰十分嚣张。当时，刘英率省委机关和特务班正在泰顺的白姑庵一带活动。敌人获知消息后，就派了“保安团”一个连跟踪开到了离白姑庵四里路的九峰山，并且扬言，第二天就要把红军消灭干净。

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和革命热情，刘英决定给敌人以打击。他对战士们说：“大鱼冲上网，我们应该把网拉紧，给它来一个一网打尽。”^①当天晚上，刘英把几个指挥员叫到一起布置了战斗任务，决定利用白姑庵一带的有利地形设伏，出其不意地打一个伏击战。

第二天清晨，敌人果然出动了。他们仗着人多武器好，根本没有把十几个红军战士放在眼里，毫无顾忌地爬上山来。敌人刚刚爬到山腰，埋伏在左边山上的红军就向敌人开了火。敌人慌忙向右边山头上冲，企图占领一个制高点。谁知还没有爬上山头，就被我埋伏在右边山头上的一挺轻机枪一阵猛扫赶下

^①转引自刘锡荣：《刘英烈士传略》。

山来。敌人被红军两面一打，丢下枪就往山下面的竹林里钻。刚刚接近竹林，就听到竹林里传出了“缴枪不杀”的喊声。这时，埋伏在两面山上的红军在刘英的指挥下也冲下山来。敌保安团在遭到我红军的三面打击后，落荒而逃；跑不及的，就当俘虏。

不久，在刘英的率领下，特务班又消灭了出来骚扰的敌第九师的两个班。经过两次战斗，特务班发展成了特务队，并且每人配备了一支驳壳枪。瑞（安）、平（阳）、泰（顺）一带的老百姓都称他们是七军团的驳壳队，并且到处传播消息说，七军团来了很多的便衣队，每人都是一长一短。

敌人在遭到几次打击后，由进攻转入了防御。在此种形势下，刘英率临时省委机关转到福鼎、鼎平等县检查工作，同时把在战斗中发展起来的特务队再扩充成第一教导团和第二教导团。一九三六年六月，刘英率第一教导团由鼎平转到瑞、平、泰与霞浦检查并布置该地区的工作。此时，两广事变已经发生，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调离浙江，形势对我十分有利。为进一步开展浙江斗争，刘英写信通知在闽东和浙西南的省委委员到闽东开会。

与此同时，刘英把主要精力用于建立和巩固浙南游击根据地方面。浙南游击根据地是刘英为首创建起来的，它包括福建的福鼎、浙江的泰顺、平阳、瑞安等县。这块根据地从一九三六年初创立，一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是我地下党和游击队活动的基本地区。

在建立和巩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刘英每到一地，总是深入群众做工作，他经常找一些群众开座谈会，一方面宣传党的政策，另一方面做社会调查。浙南地区和福建的福鼎县，地方语言较杂，在那里通行的是闽南话和温州话，非常难

懂。挺进师最初到这一地区时，简直象到了外国一样，群众听不懂部队指战员们的江西话，部队的指战员也听不懂群众的地方方言，许多事情都要靠打手势来表示。为了工作方便，刘英专门调了两个既会讲普通话又会讲地方方言的同志在身边做翻译，并向他们学习本地话，后来，他不仅能听懂当地群众的方言，而且还可以用地方话做群众工作或作一般性的交谈。由于掌握了语言，和群众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浙南一带的群众也都喜欢和他在一起谈话，亲切地称呼他“可夫同志”（刘英的化名）。

在建立与巩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刘英十分重视对于地方干部的培养和团结工作。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原红军挺进师的一部分干部先后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或兼任地方上的领导职务。为搞好这些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团结，刘英专门召集他们开会，反复说明培养、团结和爱护地方干部的重要性，并告诫他们说，红军挺进师要在浙江和浙闽边站稳脚跟、开花结果，完成党中央交给挺进师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没有地方干部参加工作是不可能的，要求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团结一致。刘英不仅要求下级干部这样做，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在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期间，他就培养和提拔了一大批地方干部，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的群众领袖。

为了加强对浙南地区工作的领导，六月间，刘英在鼎平县的李家山主持召开闽浙边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学习了中央“八一”宣言，讨论了《告国民党书》及《告各阶层人民书》，同时对浙南特委的领导作了调整。

七月下旬，粟裕率挺进师主力由浙西南回到浙南与临时省

委会合。八月，刘英、粟裕率部在浙江苍南、福建福鼎两县交界的李家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全歼敌浙保五团一个连，生俘敌连长以下六十多人，缴获了许多枪枝弹药。战斗结束后，部队当晚在李家山召开了庆祝胜利大会，刘英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大会结束以后，刘英亲手用刺刀在村里的两棵枫树上刻下了“打破旧世界，建立苏维埃”两行大字。刻完之后，他意味深长地说：“等这两棵树上的字长合的时候，也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① 围观的战士和群众极以热烈的掌声。

李家山战斗后，刘英、粟裕率挺进师频繁活动于浙江和福建交界的福鼎和泰顺一带，到处打击敌人，并协助各县、区进行分土地、分青苗和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的“四抗”运动。

九月一日，国民党浙江保安第四团一个营从付洋地方向泰顺峰文进犯。刘英、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在付洋乡车头与敌展开激烈战斗。由于我军作战英勇顽强，敌一个营被歼，死伤三百多人，被俘四十多人，副营长亦被我俘虏。我军还缴获了各种枪二百多支。十月，刘英率省委机关和挺进师一部在泰顺仓边打了一个歼灭战，毙敌五名，生俘百余人，缴获轻机枪三挺，步枪八十多支，驳壳枪十支，子弹十五箱等许多战利品。

仓边战斗胜利后，刘英率省委机关和挺进师一部转移到了淡竹洋，在那里召开了庆功大会，刘英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因为胜利，刘英以至指战员们都产生麻痹情绪，准备安安稳稳休整几天，再作新的行动。不料狡猾的敌人获得挺进师驻在淡竹洋的消息后，利用我们的麻痹心理，立即兵分三路前来报

^①引自《李家山的合抱枫》，平阳民兵斗争史办公室编印。

复。由于战前思想松懈，加上战时慌乱，部队在敌人发起进攻后，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最后，只好组织强行突围。淡竹洋一仗，部队受到了一些损失。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发生了令人痛人的“南阳事件”。挺进师一部奉临时省委指示，采取武力在浙江庆元县南阳村扣押了省委宣传部长兼闽东特委书记叶飞及闽东独立师的负责人，并解除了闽东独立师一百多人的武装，将叶飞等押往临时省委所在地鼎平。结果，途中遭到了大批敌人的伏击，挺进师的队伍被冲散，叶飞等被拘押的同志才得以走脱，辗转回到了闽东，并声明退出闽浙临时省委。这样，成立十四个月的闽浙临省委就宣告解体（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浙江临时省委成立之前，红军挺进师仍然沿用闽浙临时省委的名义）。“南阳事件”是由于闽东和挺进师两方面不同程度的山头主义，以及在肃反等问题上的看法不一致所造成的。对此，刘英是有责任的。

“南阳事件”发生后，粟裕等率部同刘英会合，接着在刘英主持下召开了临时省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同闽东方面的分歧，但不适当地开展了对粟裕的批评斗争。

闽浙临时省委分裂后，挺进师在刘英、粟裕的率领下，在福鼎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敌人，于一九三六年底转战到了浙南。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继续执行他的反革命内战政策，所不同的是由全面“围剿”红军，变成了“北和南剿”，命令国民党第四路军刘建绪部和浙闽两省当局立即向我边区发动进攻。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迎接抗日新形势的到来，临时省委决定恢复十九师建制，重打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

一九三七年一月初，敌人深入到浙南地区向我作试探性进攻。我军在刘英和粟裕的领导下，在平阳南宋垟打垮了敌人一个团，接着在泰顺的峰文又打垮了敌人一个加强团。经过几次战斗后，敌人发现我主力红军在平阳、泰顺和福鼎交界一带，并且通过叛徒获知我省委和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刘英等都在浙南地区。因此，敌十九师主力和敌第九旅，在敌十八师的配合下，齐头并进向我浙南地区进犯，企图一举消灭我临时省委机关和红军主力。

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同时又能胜利地坚持这场斗争，临时省委和军区经过研究，决定在军事上改变原来把主力留在浙南狭小根据地作战的打算，采取化整为零的方针，转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或敌人不注意的地区分散打游击；并决定刘英率省委机关和教导团的短枪队，从瑞泰边向东北方向转到敌人左侧翼活动，粟裕带领一部分部队留在泰东南活动。后因这块地方无法坚持，部队再转移到了龙泉河以北的浙西南地区。

在这一时期的斗争中，刘英率临时省委机关和短枪队，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战斗异常频繁，平均一天打好几次仗，有时一打就是一整天。特别是第二次在蔡垟，临时省委机关一清早就被敌人包围了，经过短兵相接突围后，在路上又连续受到敌人多次堵击，一直打到飞云江边的仙降附近，天黑后才摆脱敌人，这次单是特务班就牺牲了七位同志。

此时，敌人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山区。刘英趁机大胆地率部向敌人的腹地推进，把游击战争转移到了平原。临时省委机关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以瑞安县城后面的沙门山、后岗底和东区的肇平洋为依托，深入到永瑞水陆交通的要道塘河附近活动，并在那里坚持了下来。这样，敌人企图消灭我闽浙临时省委

和红军的计划宣告破产。

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临时省委发表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告各界人民书》以及《致国民党官兵的一封信》。尔后，刘英率临时省委机关所到之处，都把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放在重要位置。一九三七年三月，刘英又亲自起草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和闽浙两省当局》的快邮代电，派交通员送到峰门一带散发。

不久，国民党当局在《浙瓯日报》上刊登了启事，表示同意我们的建议，并提出双方派代表进行和谈。这时，闽浙临时省委机关已经移到平阳北港一带活动。四月十日，在刘英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专门会议，讨论谈判条件和代表人选问题。正在此时，临时省委接到了上海地下党让吴毓带回的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的电报全文，这样就有了同国民党谈判的依据。会议决定援引我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的基本内容，把其中的陕甘宁特区这一条改为闽浙边特区，其他内容完全相同，并决定由吴毓、陈铁军等三人作为我方的谈判代表。临行前，刘英告诫吴毓说：“这次谈判是不易成功的，蒋介石的阴谋是集中力量消灭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谈判结束后马上回来，以免发生危险。”^①

这次谈判，正如刘英预料的那样，没有获得成功。谈判中国民党提出要改编我们的部队，政工人员到南京受训后另行分配工作等等。对此，我方代表坚决反对。最后，蒋介石下了“停抚进剿”的手令，国民党当局无理扣押了我方谈判代表陈铁军。

^①转引自刘锡荣：《刘英烈士传略》。

谈判破裂后，临时省委发出了《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以及和平谈判破裂告各界人士书》和《呼吁各界人士要求闽浙两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临时省委还就谈判破裂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报告，经过上海地下党转到了陕北。五月间，党中央以贺龙的名义写了一封信，从延安寄到衢州刘建绪处。信件对刘建绪晓以民族大义，劝告他停止内战，和红军携手抗日，不要再做无益于民族的事情。“七七事变”后，刘建绪为形势所迫，从监狱里放出了我方谈判代表陈铁军，并亲自写了一封给刘英、关英（闽浙赣省委书记）和黄道（闽北特委书记）三人的信，交给陈铁军带回，表示愿意同红军通过谈判实现合作抗日。他还把贺龙给他的信一起交陈铁军带给刘英看，以表示他的诚意。

七月二十九日，陈铁军、吴毓二人在瑞安东区找到了刘英，把刘建绪的信交给了他。从八月开始，我方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又开始接触，经过几次交换意见后，双方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九月五日，谈判会议在我游击区的平阳县山门街西山正式举行。我方由刘英作为首席代表。这次谈判，我们鉴于浙南游击区根据地的现实情况，除主动放弃了第一次谈判时提出的将闽浙边区改为闽浙边特区这一要求外，仍坚持了以下三条基本原则：第一，保持党的独立性；第二，保持军队的独立性；第三，保持我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权。经过斗争，最后终于达成了协议。九月十六日，刘英代表我方在协议上签了字。

尔后，刘英派吴毓、龙跃二人到南京八路军驻宁办事处找叶剑英，汇报我方同国民党谈判的经过和结果，并请示今后的行动。吴毓、龙跃二人走后，刘英将瑞、平、泰、青（田）、

丽（水）、温（州）等县的二百余人集中在平阳北港，然后派人往浙东南、浙西南及金（华）衢（州）方向寻找粟裕、谢文清等领导人。不久，粟裕、谢文清等先后回到了平阳北港。九月底，刘英又派陈铁军、苏斗正、余龙贵去闽北找黄道联系、到赣东北找关英联系，把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情况通知他们。一九三七年十月间，闽浙军区以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刘英的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布告指出：“本军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民族利益而奋斗到底”^①。

至此，坚持了三年的浙闽边游击战争结束了，在刘英等领导下的挺进师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又投入了抗日战争的洪流。

主持浙江省委工作

部队在平阳北港集中后，番号改为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此时，临时省委一方面着手于部队的整训工作，另一方面以极大的精力创办干部训练班和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刘英亲自在干部训练班讲述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经常到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给学员们讲抗日的形势，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为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书写了“团聚与组织千百万的民众一致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②的题词。

①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布告》（1937年10月）。

② 《刘英遗墨》，见《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第11期。

一九三八年二月间，刘英派龙跃、余龙贵二人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汇报浙江党政军情况，并请办事处派人来浙江研究浙江红军部队的编制问题。东南局副书记、组织部长曾山听取了汇报，并在龙跃、余龙贵二人护送下于三月初从南昌到了温州。曾山向刘英等传达了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决定将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编入新四军，由粟裕和陈铁军率领开赴皖南前线作战；刘英留浙江坚持斗争；取消闽浙临时省委，筹备成立浙江临时省委。三月上旬，曾山回南昌时，刘英随他到南昌向东南局请示今后工作。

三月十八日，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在粟裕、陈铁军等率领下，奉命从平阳北港出发，北上抗日。

五月七日，刘英由东南局返回，沿途经金华、丽水、温州，对这些地区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后，回到平阳。接着，刘英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浙江临时省委会议。浙江临时省委由五人组成，刘英任书记，谢文清任组织部长，汪光焕任宣传部长，顾玉良任职工部长，赖大超任青年部长。不久，中央批准了浙江省委的组织和领导人选。省委成立后，刘英大多数时间住在温州城里，利用温州的地下交通站和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领导全省工作。这一时期，省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恢复原来被摧残地区和开辟新区、宣传和组织抗日救亡、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三个方面。

随着抗战的开始，浙江的局面由内战转入了团结抗战。这时，党的威信空前提高，党的影响空前扩大。在此形势下，省委和各个特委分别派出了一批党员和干部深入到各县去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同时，省委利用各种关系，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以群众团体和进步人

士的名义，出版各种进步报刊，领导青年抗日救亡活动。抗战一开始，温州就成立了由我党领导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刘英经常过问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的工作，并指示他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吸收各阶层青年参加战时青年服务团，要认真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大力开展青年救亡运动中去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省委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和团结了一批国民党中的抗战分子。

当时，国民党当局拒不承认我党在浙江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反而对我浙江党组织和刘英个人进行攻击。为了反击国民党的造谣中伤，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刘英写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申诉》，对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斗历程进行了回顾，对浙江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严正回击了国民党的造谣诬蔑。

十月十日，我新四军驻温通讯处被破坏，省委组织部长谢文清、青年部长赖大超等五人被捕。这是国民党浙江省当局蓄谋已久的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动。事件发生后，刘英立即派通讯处主任周饮冰到国民党温州防守司令部交涉，结果，周饮冰也遭到逮捕。刘英又派新四军驻浙办事处主任吴毓同国民党交涉。国民党当局借口搜获我党文件，拒不放人，反而把被捕人员押解到上饶盘石渡李家村。在他们入狱期间，刘英多次让省委秘书滕雪凡到狱中看望，并给他们带去书信，鼓励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

一九三九年一月，在刘英主持下，省委在金衢特委召开省委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建立浙西特委，开辟浙西工作问题，根据刘英的意见，调顾玉良前往组织浙西特委，并担任特委书记。

记。会议分析了浙西的复杂情况，认为在抗日前线和沦陷区，如果没有革命武装力量，是不易开展工作的。因此，提醒浙西特委必须注意武装工作，建立一支强有力的人民武装，打开浙西游击根据地的局面。

由于国民党到处搞摩擦，形势恶化，温州的环境也一天天坏起来，省委决定从温州搬到丽水。刘英随省委机关到了丽水，住在城外的夏河村，化名王志远，以“兴华百货商店”老板的身分作掩护，出入于省委各个交通点，领导全省工作。

三月下旬，刘英在丽水接到了曾山的来信，说周恩来要到浙江视察工作，要他到金华去向周恩来汇报浙江工作情况。在周恩来到达金华的前一天晚上，刘英化装成商人先期到了金华。第二天，周恩来在曾山的陪同下到金华，刘英向他汇报了浙江的工作情况。然后，刘英折回丽水，再同省委委员一道到金华，在金华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请周恩来对浙江工作作指示。周恩来向他们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分析了当时抗战形势和国际形势，并对浙江党的工作等问题作了指示，指出浙江党的组织经过了一九三八大年的大发展，今后要加强巩固工作，也要继续发展，但巩固必须重于发展，质量必须重于数量。他还提请浙江省委注意开展绍兴地区的工作。

四月八日，刘英在温州地下交通站主持召开了浙江省委组织工作会议，讨论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武汉后的抗战形势，着重研究了召开全省党的代表大会问题。

浙江党的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已经打开了一个很好的局面。全省有五十五个县建立了党的县委或工委，没有建立县委和工委的县也有党的支部或党员在那里起作用，全省党员已达

两万多人。在这种形势下，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时机是成熟的。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在刘英主持下，中央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阳北港凤卧乡的冠尖和马头岗举行。刘英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浙江两年来工作的书面总结。他在政治报告中，分析了浙江的政治形势，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加紧全民动员，加紧统一战线工作，提高民族意识与战斗意志，反对投降企图，推进民主政治，组织广大工农青年、妇女，发展民众团体，扩大民众运动，积极参加各种抗战工作。

大会选出了刘英、薛尚实、汪光焕、龙跃、张其林、郑丹甫、林辉山七人为省委委员。省委常委为刘英、汪光焕、龙跃、薛尚实四人，刘英任省委书记兼统战部长。大会还选出了刘英等十一人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刘英为代表团团长。

党代会结束后，刘英回到了丽水省委机关，领导全省落实省“一大”会议精神，布置安排省委主要成员离开浙江后的工作。

同年十月十六日，刘英和丁魁梅在温州举行婚礼。当天，刘英题书赠与丁魁梅：“站稳自己的立场，把握事件的真理，任何麻醉与利诱均不能动摇我们的斗志与决心。”^①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的革命情操。

十月十七日，刘英率参加党的“七大”的浙江代表团从丽水出发去东南局集中，十月底，到达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当时的东南局也设在这里。浙江代表团在皖南逗留期间，东南局

^①《刘英遗墨》，载《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2年第11期。

和新四军的领导人项英、袁国平、曾山等多次到驻地看望。刘英就坚持浙闽边三年游击战争和浙江斗争向项英作了详细汇报。项英希望他写一个书面材料作为浙江代表团向党的“七大”的汇报，如有可能可在新四军机关刊物《抗敌》上发表。于是，刘英利用在皖南停留等待其它省代表团到来这段时间，开始了《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一书的写作。

代表团在皖南住了不久，接到了中央的电报，大意是：时局发生逆转，浙江的主要领导干部不能离开浙江，要坚持浙江斗争，并指明刘英要留在浙江。刘英把浙江的代表召集在一起，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电报指示的精神，嘱咐他们要团结一致，到延安把党的“七大”的精神带回浙江来，并指定由林一心负责带队。十二月十六日，刘英一行回到了浙江省委机关所在地丽水。

这时，在省委宣传部长汪光焕主持下召开的浙江省委宣传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刘英等到达后，立即向与会代表传达了上级指示，指出国民党正在搞摩擦，我们要进行反摩擦、反分裂的斗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向代表们传达了党中央在纪念抗战两周年宣言中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在代表们即将离开前夕，刘英亲自起草了一份文件让他们回去传达。

会后，刘英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对全省工作作了部署：将处(州)属特委一分为二，成立丽水中心县委，统辖丽水、青田、缙云、云和等县和宣平、松阳两县部分地区，直属省委领导；将处(州)属特委改为中共闽浙边委，统辖龙泉、遂昌、江

浦、庆元等县委和宣平、遂昌、汤溪边区工作委员会、松阳县工作委员会。为了保存力量，将在国民党政府各部门工作、面目暴露的共产党员，陆续调离转往新四军；同时抽调一批愿意转入秘密工作的同志，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根据当时急剧变化的形势，刘英还提出了巩固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秘密工作的教育，提高警惕、严防奸细混入党内等五项紧急任务。

在丽水，刘英一方面继续以“兴华百货商店”老板的公开身分领导全省工作；另一方面继续完成他在皖南尚未完成的《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一书。在写作过程中，刘英非常认真，每一部分写完后，都要认真地检查核对，直到自己认为满意为止。即使在印刷出来之后，他也要一页一页的看过，从不马虎。他对秘书说：“现在形势有了变化，为了使同志们有一个思想准备，要把这些材料尽快发给各个县委。”^①完稿后，刘英没有立即把它呈送东南局，至一九四〇年夏，他第二次到皖南时又作了慎重的修改后才正式定稿。这篇回忆，对于研究和了解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一份极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九四一年一月，发生了“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为悼念我皖南阵亡将士，刘英写下了“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念我烈士，万古垂青”^②的诗句。

为革命壮烈牺牲

“皖南事变”发生后，浙江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一九四一

① 《张伟群谈浙江省委在丽水的情况》。

② 《革命烈士事迹选》，温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选印。

年四月初，省委从丽水搬回了温州。刘英准备按照东南局的指示，在平阳、瑞安交界的地方办一个训练班，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以适应形势的发展与变化。

五月中旬，刘英和省委机关到了浙南游击根据地，结果连遭敌人两次包围，险遭不测。在此种情况下，刘英放弃了在浙南游击根据地内办训练班的打算，将省委重新搬回温州。刘英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出自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省委在温州有一些社会关系做掩护；二是温州距浙南游击根据地较近，万一有情况可迅速组织撤退。

秋天，华中局（此时东南局已同华中局合并）政治交通涂峰来到温州，带来了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的指示、党中央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以及中央任命刘英为闽浙赣三省特派员的决定。接到华中局的指示后，刘英立即在温州向各特委传达。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省委要求各特委把主要工作放在巩固组织、隐蔽斗争方面，在领导体制上也作了相应的改变，实行单线领导。

一九四二年初，形势日益紧张，国民党到处搜索我省委、特委和县委机关。刘英认为省委如果继续设在城里危险性很大，决定在春节后将省委搬到浦城方面，并写信通知几个省委委员到温州布置工作。本来省委是可以及早转移的，但由于省委秘书周以群未经允许挪用了华中局寄给浙江省委的活动经费，致使省委迟迟未能转移。结果，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一九四二年一月，浙南武装工作团团长李小金在天台叛变投敌，向国民党浙江中统室提供了浙江省委、浙南特委、台属特委等组织的人事情况和浙江省委秘密机关设在温州城内、以“恒丰盐店”和一个百货店为掩护进行活动等情况，国民党浙

江中统室根据李小金和陈方汀（温岭县委书记，已叛变）提供的情况，于二月初派中统特务陈家壁率叛徒李小金、陈方汀等人到温州轮流化装活动，守候盯梢，秘密侦察。

二月八日晚，在“恒丰盐店”外不远，叛徒李小金首先发现刘英，立即上前去打招呼，特务陈家壁等一拥而上，将刘英逮捕。此时，刘英身上还带有文件，为了不使党的文件落入敌手，在经过一座小桥时，他趁特务们不注意将藏在衣袋里的文件扔到了河里。接着，在省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和交通联络员相继被捕。省委秘书周以群和省委交通郑爱婵当即叛变，并带领敌人搜捕我省委工作人员。浙江省委机关在一个晚间遭到了彻底破坏。

刘英被捕后，被特务押解到永嘉县警察局，敌人立即给刘英钉上了脚镣，关进了永嘉看守所。

刘英被捕，敌人如获至宝。国民党浙江省第八区行政督察员张宝琛得意地说：“刘英在浙闽两省边境活动多年，今一旦被捕，胜俘敌十万。”^①张宝琛还亲自到看守所去“看望”刘英，并给刘英送去请帖，但遭到了刘英的严正拒绝。刘英在永嘉看守所关押期间，国民党温（州）台（州）防守司令肖冀勉也亲自出马到看守所“探视”。当刘英获知省委秘书顾春林被捕时遭到枪击受伤的消息后，立即要求肖冀勉、张宝琛给予医治。他还同看守所交涉，要求看望顾春林。得到同意后，刘英在看守所长的“陪同”下，拖着沉重的铁镣来到了顾春林的牢门口看望他，语重心长地叮嘱他说：“你要坚强啊！”^②刘英在

^①郑嘉顺：《峥嵘岁月，战斗生涯》，载《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2年等11期。

^②顾春林：《缅怀刘英同志》，载1982年《浙江党史资料通讯》。

永嘉看守所关押了近两个星期。敌人想借此机会破获我整个浙江党组织的阴谋破产后，决定将刘英由温州押解到永康方岩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所在地。二月底，刘英被解到永康方岩，国民党浙江中统室指定特务陈家壁专门负责对刘英的审讯。陈家壁几乎每隔一日就对刘英进行一次审讯，但每次审问，刘英始终是那句老话：“我的情况均在档案中，再没有什么东西可说了。”^①他还严斥国民党不思抗日、一心反共的罪恶行径，使陈家壁狼狈不堪。

在狱中，刘英利用一切机会为党工作。他在同看守接触的过程中，给他们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讲抗日的形势，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捕杀共产党人的罪行。看守任根荣非常钦佩刘英，还拜刘英为先生。经过刘英的启发和教育，任根荣有所觉悟，在他做看守期间，曾帮助刘英传递条子，并常应刘英的要求将报纸和纸笔送进牢房。通过任根荣，刘英还接触了另一名叫鲁荣甫的看守。为了表达他渴望冲出牢笼、渴望战斗的心情，刘英写下了“十年征尘到如今，偷生弹雨患枪林。战死沙场堪自乐，囹圄室内何我分”^②的诗句，以锄非署名，送与鲁荣甫，望他保存。

刘英在方岩被关押了两个多月，国民党浙江中统室始终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在他们给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呈文中，只记载着刘英的籍贯、年龄、出身、职务、文化程度。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七日，蒋介石自重庆发来急电，飭速处决刘英。五月十八日清晨，天下着小雨。特务陈家壁带人

①刘怡生：《浙江省委组织被破坏，书记刘英等被杀情况》，原件存杭州市公安局。

②《鲁荣甫交待材料》，原件存杭州市公安局。

来到关押刘英的地方，谎称日本人来了要撤退，让刘英跟他们走。刘英看见进来一批荷枪实弹的特务和刑警队员，知道敌人要对他下毒手了，便镇定地对陈家壁说：“把话说明白一点，不必遮遮掩掩，我自从被捕的那天起就做好了这种准备。”^①特务们押着刘英到了汽车站后面的山坡上。这时，天已经大亮了，刘英最后望了一眼祖国的大好河山，从容地转过身来。特务陈家壁、单银昌害怕刘英呼喊口号带来麻烦，慌忙向刘英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刘英倒下了，他把生命献给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刘 英：《中国能不能抗日》（1934年7月）。
2. 刘 英：《一个共产党员的申诉》（1938年7月25日），存杭州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3. 刘英在中共浙江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政治报告》、《闭幕词》，1939年7月，存浙江省档案馆。
4. 刘 英：《给丁魁梅父母的信》（1939年10月16日），存刘英夫人丁魁梅处。
5. 刘 英：《给程美兴的信》，存程美兴处。
6. 粟 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载《党史通讯》1983年第15—16期。
7. 《刘英传略》，见《杭州市部分烈士简介》，杭州市民政局编印。
8. 吴哥、章夏：《漳州战役始末》，载《福建省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0期。
9. 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①转引自刘锡荣《刘英烈士传略》。

10. 谢文清：《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的战斗活动》，载《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9期。
11. 《刘英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任职情况》，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12. 《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2年第11期。
13. 《项英同志给刘英同志的信》。
14. 郑海啸：《平阳地下党配合挺进师在平阳艰苦斗争的回忆》，载《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1年第5期。
15. 杨进：《1936年浙南红军游击队找到上海党的领导并帮助闽浙临时省委与党中央恢复联系的经过纪实》，载《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1年第5期。
16. 刘先：《回顾红军挺进师》，载《苍南党史资料》1983年第3期。
17. 刘先：《从冠尖、马头岗到宝塔山下》，载《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2年第12期。
18. 谢廷斋：《忆刘英同志》，载《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10期。
19. 刘正发：《从闽北到浙西南》，载《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1年第8期。
20. 张文碧：《与浙南人民在一起》，载《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1年第7期。
21. 邱清华：《回忆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载《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1年第7期。
22. 龙跃、吴毓：《闽浙红军历次与国民党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谈判的经过》，载《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1年第6期。
23. 谭启龙：《给黄书孟、张建昌的信》（1983年6月20日）。
24. 郑丹甫：《回忆闽浙边根据地的斗争》，载《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3年第16期。
25. 陈挺：《我所知道的闽浙临时省委分裂的情况及其原因》，《回忆闽东红军斗争历史》。
26. 郑立于：《青春的火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27. 《殷铁飞回忆录》。

28. 《泰顺革命史资料》。
29. 《福鼎党史资料》。
30. 吴克斌：《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大事记》。
31. 赖大超：《回忆刘英同志》。
32. 访问罗明、林一心、赖大超、粟裕办公室、张文碧、郑丹甫、钱益民、林辉山、黄先河、顾春林、肖钢、滕雪凡、程美兴、谢文清、刘先、刘正发、丁魁梅、龙跃、郑一平、陈平、杜永康、刘亨云、陈挺、顾玉良、傅振军、涂枫、连珍、余龙贵、张金发、廖义融、陈辉、吴云鹰、张伟群、朱维善、余森文、王德珊、程有雨、王德云、邓生文妻子等人和竹岗大队的访问记录。
33.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江西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江西瑞金烈士纪念馆、浙江省档案馆、福建漳州纪念馆、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温州市委党史办、浙江省委党校资料室、杭州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杭州市民政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单位所藏的有关资料的一部分敌伪档案。

钱 兴

卢 权 禰倩红

田炳坤 陈欣德

钱兴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担任过福建省厦门市工委书记、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中共西江区工委副书记兼粤桂湘边副政委等职务。一九四八年冬，在祖国黎明前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终年三十九岁。

(一)

钱兴乳名阿树，原名钱岁年，号发瑞，曾用名钱瑞年、老陈（在闽南、桂林）、蔡十（在广西钟山）、李先生（在广西昭平）、李伟民、李钱兴（在广东西江）等，还曾用邨夫、林人、金等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一九〇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出生在广东省怀集县（解放前属广西）诗洞凤南村一个地主家庭里。兄弟共四人，长兄统年，三弟汉年，四弟范年，他排行第二。父亲早丧，由母亲日夜操劳，抚养儿女长大。

一九二二年，钱兴在协和乡（今安华乡）凤南初级小学读书；一九二六年升入怀集第一高级小学；翌年，又考入怀集县初级中学。诗洞地处怀集南部，距县城一百多里。钱兴自挑行李上学，平日勤奋刻苦，善于思考问题，成绩优良。他的班主

任兼语文课教师、地下共产党员梁一柱，见钱兴勤奋好学，为人正直，经常向他讲解革命道理。在梁一柱的启发、教育下，他开始思索：怎样才能挽救国家危难，使国家振兴昌盛？为了表示自己“毕生要为复兴中华而奋斗”的抱负，他后来给自己取名为“兴”。^①

一九三〇年，钱兴在怀集中学初级中学毕业后，前往广州求学，在广州知用中学念完高中一年级；又转考入中山大学附中高中就读。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寇。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又进攻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战争。蒋介石依然坚持“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把中华民族推入灾难的深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卖国政策，使钱兴无比愤慨。他经常与一些志同道合的爱国青年学生一道，秘密阅读进步书刊，探索抗日救国的道路，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中山大学附中有一名加入了“中国青年党”的教师，见钱兴勇敢有为，在同学中有一定影响，便想诱骗钱兴入伙。一天，他借“散步”、“谈心”为名，向钱兴大讲了一通青年党“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和加入青年党，日后生活、政治方面都有好处的谬论之后，从身上掏出一份“申请表”，要钱兴填写。钱兴从“九一八”以来中国时局的发展中，已经对各党派的政治纲领有所了解。他顾不得讲究什么“师道尊严”，向那个反动教师质问道：“你们标榜什么‘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为什么不敢公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强

^①据邹如冰回忆资料（1983年6月）。

权’对中国的侵略？为什么不敢公开谴责那些叫喊‘攘外必先安内’主张的卖国贼？”一句话，问得那个反动教师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只好收回“申请表”狼狈离去。

一九三三年秋，钱兴进入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读书。他在学校结识了一批进步同学和进步教授何思敬、邓初民等，受到他们的影响和教育，思想认识不断提高，便与一些进步青年秘密组织“读书会”等团体。他还同曾振声（即曾生）栗稔等同学在市郊的白云山上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小组。这个小组联系着一个校外读书会（设在曾振声家里），广州各校好些进步同学都参加了这个读书会。读书会收藏有不少革命书刊和马列著作，供大家传阅，还经常讨论国家前途问题，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钱兴平常喜欢写文章，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提倡爱国青年应做创造新世界的“开路先锋”。邓初民称赞他的文章立论明确，切中时弊，读后“深受启发”^①。

一九三五年六、七月间，王均予^②从上海来到广东工作，在中山大学、勸勤大学和广雅、知用、执信等中学的进步青年中活动，并在他们中间建立了中国青年同盟（简称“中青”）^③的组织。“中青”的宗旨是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推销进步书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中山大学里，钱兴首先加入了“中青”组织，接着，他又介绍了曾振声，栗稔等进步青年加入。最初，中山大学“中青”

①据钟远藩回忆资料。

②王均予原是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发行部的工作人员，因上海党组织被破坏而转来广州。

③中国青年同盟一年后改名为中国青年抗日同盟。

小组共七人，由钱兴担任组长^①；后来陆续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使组织进一步扩大。不到半年时间，“中青”在全广州各大中学校里发展到一百多人。钱兴等除了组织“中青”小组成员学习革命理论外，还通过“中青”在同学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抗日主张，把广大青年学生团结在“中青”周围，开展各种活动。

钱兴品学兼优，工作热情，乐于助人，在同学中享有较高威信。当时钱兴家里有其叔父掌握经济，很少寄钱给钱兴。钱兴在学校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往往要靠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稿子所得的稿费来维持生活。但如遇到别人有困难时，他就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一次，钱兴了解到一位姓张的“中青”会员经济有困难，就立即将领到的一点稿费赠送给他。后来，那个会员十分感动地说：“钱兴同志雪中送炭，我是毕生难忘的！”^②别的同学见他生活俭朴，也常为手头无钱犯愁，劝他不要这样做，他笑着说：“我吃点粗粮就够了，有的伙伴比我困难，更急需解决嘛！”^③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于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钱兴与曾振声、栗稔等同学一道，积极宣传《八一宣言》。他们还编印了一份油印小报，刊载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以及其它有关抗日文章，在师生中秘密散发。小报的刻印工作，都由钱兴一人负责。为了躲过特务的耳目，他经常跑到中山大学附近的石牌茶

①据曾生、温焯华回忆资料。

②③据邹如冰回忆资料（1983年6月）。

山上，以石头为桌子，或刻写腊纸，或编印传单、撰写文章、显得格外繁忙。在钱兴等“中青”骨干分子的组织发动下，中山大学不少学系班级，都先后成立了抗日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同年十月间，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在校内召开抗日大会，钱兴被选为大会主席。会上，他带领同学们在校内举行示威游行。法学院院长郑彦棻闻讯赶来威吓，说：“你们没有向学校报告，擅自进行政治活动，召开什么大会，这是非法的，应立即解散！”钱兴反驳说：“我们爱国同学开会讨论关于抗日救国大事，为什么不合法？难道你们愿意让国家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让中国人民当亡国奴吗？”其他同学也纷纷发言，斥责郑彦棻压制抗日救亡运动。郑彦棻被批驳得哑口无言，悻悻离去。这次抗日大会，使同学们深受教育。

（二）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爆发“一二九”青年救亡运动。广州青年学生奋起响应。中山大学爱国师生员工的抗日情绪更为高昂。在“中青”、“突进社”等进京社团组织的领导下，在全校同学的强烈要求下，经过钱兴等骨干的串联，中山大学于十二月十日晚上举行讨论抗日问题的各班代表会议，排除西南军阀所把持的“抗声社”分子的干扰，决定十一日晨召开全校抗日大会。班代表会议结束后，钱兴等又连夜发动进步同学组成了几个“夜呼队”，分头到文、法、理、工、农各学院的宿舍去高呼：“明天上午在大礼堂开抗日大会！”，把班代表会议的决定通知给中大全体师生。

十一日上午，全校三千多师生举行规模盛大的抗日大会。虽然大会主席团为陈济棠操纵的“抗声社”分子所把持，但慑于广大师生的威力，大会仍一致通过了呼吁全国实行抗日的通电，并通过了十二日到广州市区举行抗日救亡示威游行等项决议。会后，钱兴等人又分头进行有关举行抗日示威游行的各项准备工作。

十二日，全校师生（包括中大附中）共三千多人，高擎“中山大学抗敌示威大游行”的大横额，浩浩荡荡地离开了石牌，向广州市区进发。邓初民等进步教授也满腔热忱地参加了游行。途中，其他学校学生一千多人也相继参加了游行队伍。他们沿途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争取爱国自由”、“全国一致抗日”等口号，还散发了《告同胞书》等传单。马路两旁市民十分兴奋，有的跟着高呼爱国口号，汇成一股伟大的力量。这次游行一直到下午四点钟才结束。“钱兴、曾振声是这一次抗日示威游行的总指挥及带头人”^①。此后一连几天，在钱兴、曾振声等带领下，中山大学学生又组成若干小组，分头到广州各主要街道，公开场所，以及芳村、佛山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演讲，散发抗日传单和张贴抗日标语等活动。他们还到广州各学校进行联络，推动了广州地区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广州青年学生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广东省反动当局的不安和恐惧。他们布置了一些反动分子，在各校成立所谓“广州市学生救国会”、“抗声社”等团体，分裂和破坏

^①温焯华：《关于中国青年同盟的一点回忆》，载《广东青运资料与研究》1983年第7期。

抗日救亡运动。

面对这种情况，钱兴、曾振声、粟稔等“中青”骨干分子开会商量对策。他们认真总结了前一段活动的经验教训，找出存在问题，认为当前广州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发展还不平衡，其领导权还没有牢牢掌握在进步力量手中，经常受到反动分子干扰。为此，他们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联络和发动工作，揭露反动当局操纵破坏抗日救亡活动的阴谋。为了防范反动当局的破坏、迫害，他们作了分工：由曾振声等人公开出面，负责担任各项工作；钱兴不公开担任抗日职务。“在这次抗日救亡运动中，钱兴是领导人之一。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在后台，不在前台。”^①

十二月三十日，中山大学学生再次召开抗日大会。由于钱兴、曾振声等骨干在会前做了较充分的组织发动工作，同学们在会上纷纷谴责“抗声社”分子把持和破坏抗日活动的行为，一致决议撤销他们所把持的大会主席团的职位，当场重新选举出曾振声等五人为临时主席团，以曾振声为主席。钱兴以一般同学资格发言，提出再次举行抗日示威游行的建议。大会采纳了钱兴的建议，决定联络广州市各校学生于次日再次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

三十一日这一天，中山大学学生冲破了“抗声社”分子的阻挠，集队出发到广州市区游行。途中，庚戌、执信、广雅、知用、教忠等中学进步学生，也参加了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越华路“西南政务委员会”门口时，曾振声等六名学生代表向

^①据杨康华在广州青年运动史从化座谈会上的讲话（1982年11月）。

当局提出抗日要求，要求当局答应爱国学生有抗日行动、言论、出版及集会等自由。一九三六年一月九日，中山大学与广州各校学生再一次举行广州市学生抗日大会，一致通过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作为全市学生开展抗日活动的领导机构。曾振声当选为主席。从此，广州地区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钱兴、曾振声等为代表的进步力量手中。

在上述一系列示威游行中，钱兴都始终带头参加，并与曾振声等一起指挥。他还与宣传队员一道，沿路向市民进行宣传演讲。有一次，他慷慨激昂地向群众宣传说：“同胞们，我们愿意做日本帝国主义的牛马吗？不！我们中国人民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同胞联合起来，一齐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坚决反对卖国投降政策！”^①他讲到激动处，常常声泪俱下，周围听讲的群众，也感动地流出了热泪。

面对爱国学生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活动，广东反动当局陈济棠悍然下令镇压。一月十三日，当中山大学等校学生的抗日示威游行队伍走到市区荔湾桥时，陈济棠事先布置在那里的暴徒狂叫“杀呵！”向游行队伍冲过来，大打出手，用报纸包住的铁棍毒打游行学生，当场有一百多学生被打伤，冯道先等多名学生当场被绑架。后来，栗稔、张风楼、李驹良等人又被捕去；邓初民、何思敬等进步教授住宅被搜查；中山大学学生冯道先（中山大学学生纠察队队长）后来还惨遭杀害。这就是骇人听闻的“荔湾惨案”。惨案发生后，一名反动分子向当局告

^①钟远藩：《纪念广州一·二九运动的英雄战士——钱兴同志》（未刊稿）。

密说：中山大学的抗日运动是受曾振声、钱兴两人操纵的，一个在台上（指曾），一个在幕后（指钱）。为此，中山大学当局悍然宣布下学期不准曾振声、钱兴、李志民（朝鲜籍）等一批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学生注册上课。

随后，反动当局派出军警四处搜查钱兴等人。钱兴在进步同学的掩护下，机智地摆脱了反动当局的追捕，继续坚持斗争。他冒着危险，住宿在文明路中山大学附中的一座旧楼房中积极工作着。“荔湾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他和其他进步同学一道，连夜起草和油印抗议反动当局破坏、镇压学生抗日爱国行动的“抗议书”；紧急部署各校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领导成员转入地下，并继续组织进步同学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声讨反动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

与此同时，钱兴与其他进步同学一起，设法“奔走营救被捕同学”^①。他用中山大学全体同学的名义，起草和油印了一个“通告”，揭露当局横蛮逮捕迫害同学的真相，一一列举被捕同学的姓名，提出要召开大会，向学校当局交涉；呼吁人们行动起来，营救被捕同学。与此同时，中山大学学生金昌华（朝鲜族）、罗范群、黄焕秋等三百多人联名上书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要求当局负责救援被捕同学，并收回不准曾振声、钱兴、李志民等同学注册上课的布告；十七名朝鲜籍学生亦上书学校当局，声明要与被捕的朝鲜籍学生李志民共命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各方面的压力下，邹鲁恐怕招致更大麻烦，遂亲自驱车警察局把栗稔等人保释出来，并在车上一再表白他“不知道”同学们被捕，请栗稔代向同学“解释”。他还被迫

^①据钟远藩：《光辉的一页》。

宣布撤销不准曾振声、钱兴等人注册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学籍。

钱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经受了一次深刻的锻炼与考验，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拯救祖国于危亡之中的重任。因此，他与曾振声、粟稔等知己一起，迫切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争取党的教育与领导。

一九三六年，中共中央北方局王均予、薛尚实等在广东重建党的组织。七月，王均予向北方局汇报工作后回到广州，开始在“中青”成员中吸收党员。一九三六年八月，钱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政治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变。从此，他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钱兴入党后，奉党组织关于壮大党的队伍的指示，积极介绍中山大学以及广州地区其他一些优秀分子入党，为广州地区党组织的重建做了不少工作。一九三七年初，因钱兴原来住处收藏的《红旗周报》被盗，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安全，决定调他到香港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工作。

（三）

一九三七年三、四月间，因原厦门市委书记他调，钱兴奉“南委”的命令，调到福建工作，担任厦门市工委书记。他深深感到，这是党组织对自己的莫大信任，也是对自己一个很好的锻炼与考验。因此，他在工作过程中，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不久，“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新的形势下，钱兴与市委其他同志一起，利用一切可能

利用的合法形式（如派一些党员到《星光日报》等处工作），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积极宣传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组织了青年战时服务团等抗日团体，使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厦门地区形成热潮。他还注意对驻厦门的国民党军一五七师进行统战工作，利用一切机会或社会关系，向他们进行抗日救亡的爱国宣传教育，争取他们站到抗日的立场上来。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日军占领厦门。钱兴等市委领导人，与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等抗日团体一起撤往漳州。当时正是闽南红军独立第三团在卢胜等率领下开到龙岩白土与闽西红军汇合，正式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之后不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也已随军北上，留下方方担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对外则称闽西南、潮梅特委）书记，负责领导闽西南、潮梅等地区党的工作，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根据中央的指示，原闽粤边区特委改为漳州的中心县委，属闽西南特委领导。漳州中心县委下设漳州工委，平和县委、漳浦县委、云和诏县委等。钱兴被任命为漳州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并负责领导云和诏（即云霄、平和、诏安三县的边区）县委工作；何濬任漳州中心县委书记，朱曼平任中心县委组织部长。

闽西南地区当时的形势特点是：长期的内战局面虽告结束，但国民党反动派还在继续坚持反共活动，我红三团等部队开赴抗日前线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向我进攻；当地群众长期备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迫害，尽管生活等方面困难很大，但心向共产党；日寇虽已占领厦门，但仍未侵入闽西南。根据这种形势，特委书记方方曾向各级干部提出了“巩固闽西南”和“保卫闽西南”的任务，并指出今后的斗争是长期的，残酷

的，要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与有利斗争形式，壮大革命力量，为保卫乡土，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奋斗。

钱兴坚决拥护这一指示。他到闽南工作，面对的是农民问题、武装斗争等，过去的工作经验已不适应，加上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斗争复杂，困难很大。但他迎难而上，在敌特活动比较猖獗的云和诏地区坚持斗争。白天，他和同志们一起深入山村，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晚上住宿在山上的茅棚里，有时吃不到饭，就挖些野笋和野菜充饥。为了避过敌人的袭扰，他们有时一个晚上要搬三次家。山路崎岖难行，加上钱兴同志眼睛深度近视，有一次夜间转移，竟跌落到田头井里。别的同志把他救上来时，他忍着伤痛，风趣地说：“多谢马克思在天之灵，跌我不死！”把同志们逗得笑了起来。

闽西南红军整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后，原与红军战士一起坚持斗争，几个儿女都为革命献身，被人们被誉为“红军阿姆”的李梨英，奉党的指示留在闽南。大约一九三九年，李梨英在漳州中心县委机关工作时，钱兴夫妇曾与李梨英战斗、生活在一起。钱兴夫妇十分尊敬这位“红军阿姆”，象对待自己的亲娘一样，关心她，照顾她，体贴她，使老人感动不已。由于钱兴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当地干部群众都喜欢接近他，有情况及时向他反映，使他很快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打开了工作的新局面。

在钱兴主持下，漳州中心县委出版了一份油印小报《前哨报》。他对撰稿、审稿以至编排、刻印等工作的要求都是一丝不苟的。他说：“我们的报纸是代表党说话的，一定要认真！”这份小报内容充实，版面活跃，除了通俗地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外，还经常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对日英勇作战的消

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的言行，使群众深受鼓舞和教育。

平和县地处山区，文化落后，群众迫切要求解决子女读书问题。钱兴在根据地山区筹办了一所小学，委派一位从厦门撤退到漳州工作的干部担任教师。学校除向孩子们讲授文化课外，还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深受学生家长的欢迎。

（四）

抗日战争初期，广西的党组织原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领导。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后，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一九四〇年冬，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为了加强广西地下党的领导，决定派钱兴到广西筹建党的广西省工作委员会，由他担任工委书记。一九四一年新年前夕，他和爱人邹如冰（任广西省工委秘书）从闽西南来到了桂林。钱兴的公开身份是中学教师，大家称呼他“老陈”。

当时，党的组织基础比较薄弱。钱兴到桂林后，根据上级指示，首先筹建中共广西省工委，由苏曼任工委副书记，黄彰任组织部长，彭维之（后叛变）任宣传部长。他与苏曼、黄彰等同志分头深入了解和掌握情况，有步骤地把桂林、南宁、桂东南、左右江和柳州等地党组织的关系恢复起来，整理与健全各级党组织，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工作。

省工委成立后，根据党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结合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和广西地下党组织的实际情况，大力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钱兴亲自起草了《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组织

的决定》等文件，把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作为巩固发展党组织的中心环节。为此，省工委先后在桂林、灵川等地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钱兴亲自给学员讲课，与同志们一起讨论问题，提高了大家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对形势与任务的认识。与此同时，省工委还根据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开展广西抗日民主运动。

皖南事变后，广西反动当局也策划在后方掀起一个反共高潮。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对形势发展的分析不全面，认为广西的政治动向不会很快逆转，对桂系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钱兴听到这种思想反映后，立即指出：广西是桂系的老巢，C. C. 想插手，他们之间确有矛盾，焦点是争夺广西的控制权；但他们在反共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皖南事变后，桂系反共已成为他们的需要，那种认为桂系与 C. C. 有原则区别而丧失警惕的思想是不对的。为此，钱兴根据中央关于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指示，亲自起草了《关于切实作好准备应付地方性突然性事变的通知》，指出全国性的全面破裂可能不会马上出现，但地方性的突然事变则是随时可能发生^①。因此，从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省工委在钱兴领导下，将全省党组织的各级领导机关的组织形式作了相应的调整和必要的改变，把“委员制”改为“特派员制”，在基层建立平行支部，不发生横的关系；加强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制定应变的联络符号和寻找组织的方法。为了掩护省工委机关，钱兴与黄彰等商量决定，由黄彰的爱人高天梅负责，在桂林市东郊六合路开设一间“健民牛奶棚”，既是

^①据黄嘉同志的回忆资料（1976年9月）。

联络点，又可解决活动经费。钱兴和苏曼、黄彰等经常在牛奶棚内秘密碰头开会，分析情况，研究策略，指导全省工作。当发觉牛奶棚被敌人注意时，钱兴立即布置转移，在东江镇江边街另设联络点，仍由高天梅以摆故衣摊为掩护。

当时，广西大学有些党员认为局势逆转，C. C. 特务统治加强了，没法再搞群众工作了，工作缩手缩脚。钱兴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动高潮，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说明他们在政治上日趋孤立，因而有利于我们发动群众。我们要放手在各种倾向的学生中交朋友，开展个别活动，把工作做深做细；还要善于把 C. C. 特务与桂系军阀相区别，把反共分子与落后分子相区别，把各种抗日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在钱兴的教育、启发下，该校的党员增强了信心，除加强在进步学生中的工作外，还利用各种关系打入同乡会、同学会、基督教青年会等一些灰色团体中去，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一九四一年夏，广西大学爆发了一次拒高学潮。因原校长雷沛鸿被 C. C. 特务挤下台，C. C. 准备拥李运华为校长，但桂系不同意，经协商，推出 C. C. 头子陈立夫的表兄、亲日派头子高阳为校长。学生们为了表示反抗，提出“拒高拥雷”的口号。钱兴分析了桂系与 C. C. 间的复杂情况，及时给该校党组织指出：“拥雷”是桂系的心愿，不能在口号上与桂系混同，以免在群众中造成分裂。实际上，雷、高、李都应该拒绝。但由于我们力量尚小，许多党员已在放暑假时离校，不能左右局势；另外，到一定时候，桂系与 C. C. 又可能联合起来镇压我们。因此，我党对此次学潮的态度应当是：只支持“拒高”，但不支持拥谁。后来，国民党以武装保护高阳登

台，由于该校党组织在学潮中没有暴露，故高阳登台后我党没受到什么损失^①。

当时，广西建立了一支拥有五六千人的学生军，我党秘密派了一批党员和团员到学生军中去工作。学生军在宣传抗日救亡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四〇年冬，日寇从南宁撤退，把主力指向越南，广西战事暂时缓和，因此，桂系于一九四一年夏趁机把学生军解散。钱兴与省工委其他同志及时作了研究、布置，把学生军中的党团员全部转入后方：一能回学校读书或当教师的，便动员回到学校去；二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进国民党的机关团体，如三青团，地方干校和“合作指导室”、“合作训练班”等；三是到农村去，加强农村抗日宣传工作。这些措施的实行，既为党保存了力量，也继续发挥了他们在抗日中的作用。

一九四二年六月中旬的一天，钱兴与苏曼、黄彰等正在东江镇江边街黄彰的住处开会，有个人鬼头鬼脑地从窗口探头向里面窥看。接着，高天梅又前来报告，说有一个凶神恶煞的家伙到故衣摊查问老板的来历。钱兴等立即研究分析，认为在形势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敌人很可能要向我地下党开刀，遂决定马上暂时分散转移。当晚七点钟，省工委领导同志都迅速转移，留下高天梅作掩护。第二天，果然有便衣特务前来搜查。由于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敌人一无所获。事后，在钱兴的安排下，高天梅也安全转移了。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桂系军阀在桂林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七九”事件。这一事件是由

^①据王祥彻的谈话记录。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出了叛徒郭潜引起的。郭潜带领国民党中统特务首先破坏粤北省委和南方工作委员会，然后到桂林同桂系特务一起破坏广西省工委。七月八日，敌特首先秘密逮捕了在桂林市委工作的地下党员梁耀宝。梁被捕后也叛变投敌，并供出省工委负责人和其他地下党员的名单。七月九日，省工委副书记苏曼、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苏曼爱人）、省工委交通员张海萍等相继被敌逮捕（后壮烈牺牲），并到处缉捕钱兴。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钱兴没有考虑个人安危。他仍然坚守在桂林市内指挥还没有暴露的同志们撤退。他通过桂林市委、桂林中学党支部、广西大学党支部等党员骨干，星夜通知广西大学、师范学校、被服厂、航空站、修炮厂等单位的党团员迅速转移。同志们知道钱兴有高度近视和断指的突出特征，容易被敌人辨认出来，都劝他赶快撤离桂林。他镇定从容地说：“我不要紧，等同志们撤退完了再走。”事件发生的第三天，应该撤退的党员都已经及时地转移，钱兴仍然没有离开，一直关心着苏曼等被捕后的消息和等待南宁、桂东南地区的来信。身边的同志焦急地说：“请你快点走，大家都挂心着你的安全！”直到他对以后桂林的工作作了具体布置之后，才决定转移。

当晚，钱兴回到盛家园住所，收拾东西，准备与爱人、小孩一起转移。这时，房东上楼急切地说：“有几个人跟踪在你后边来了，我已经把大门门好加固顶牢，请你赶快从后门走！”不一会，外面便有人拍门。房东夫妇俩，一个当即带钱兴夫妇从后门出走；一个在门口与敌人周旋。在好心的房东夫妇掩护下，钱兴和爱人、孩子终于安全脱险。第二天一早，他们由桂林师范的学生党员肖雷掩护，搭了第一班火车离开桂林到灵川

县。这班火车开出后，敌人就下令封锁桂林水陆交通三天，连续三晚进行全市大搜查^①。

（五）

钱兴夫妇带着初生小孩到达灵川后，先住在县城南街城门口肖雷的家里。几天后，转移到县城北面七里多路的横岭村小学暂住。他们的公开身分是阳雄飞（当地人，地下党员）的老师，暑假期间来乡下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在那里住了二十多天，又转移到县城西面约三、四里处的西峰山南侧山沟里肖雷的亲戚家里。在这里，钱兴怀着对敌人反共暴行的无比义愤，起草并印发了《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全体同志书》、《告父老书》等文件^②，揭露顽固反共分子残酷逮捕，虐杀革命同志和叛徒出卖革命的罪行，赞扬在“七九”事件中英勇牺牲的苏曼、罗文坤、张海萍等革命烈士的崇高精神，号召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严重的时期中，必须坚决地执行党的纪律和实行党内团结互助及刻苦耐劳坚韧奋斗的精神”，“要更加严密我们的组织，遵守秘密条件，以防叛变分子（如梁耀宝之流）和顽固分子的鹰犬——特务与侦探的继续破坏与打击”，“每个同志要深切地与群众联系和更深地依靠群众，这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加强自我学习，每个共产党员应该认识，不学习就没有前途，就要迷失方向”，“将‘七九’以来所有顽固分子向我们进攻的残酷事实，一丝不挂地向全省父老开明人

^①据邹如冰：《忆战友钱兴同志》，《广西文史资料》第13辑。

^②据阳雄飞、高天梅等同志的回忆文章。《告全体同志书》等文件现存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士和文化先进、爱国侨胞及各界人士作普遍的揭露”，“不管党今天遭受了如何严重的打击，中国抗战一定要坚持下去，而中国革命也一定要胜利的”。

文件印完后，钱兴便派肖雷等秘密送到桂林等地张贴，有的投寄给省府、三青团、国民党省党部和警备部等。广大人民群众看到这些著名“中共桂委”（即广西省工委）的文件传单后，深受教育和鼓舞，而反动派看后却十分恐慌，立即在桂林进行全城戒严和搜查。

当时，广西地下党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钱兴面对十分严重的局势，对革命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定信念。他经常鼓舞同志们说：“革命形势是好的，党的力量暂时掩蔽起来，国民党的嚣张气焰是不会长久的，叛徒是会受到惩罚的！”^①“虽然‘南委’（即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被破坏了，我们暂时无法和上级党取得联系，但党中央一定会关怀我们。我们党的利益是和群众一致的，群众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必然取得胜利。”^②

钱兴根据党的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分析了当时形势，确定把党的组织和活动重点转移到农村。他有时化装成商人，深入到各地部署转移工作，把已经暴露或可能暴露的同志转移到农村来，并把因“七九”事件而断了关系的同志设法联系回来，重新建立各地党组织。

一九四二年十月，钱兴从灵川县转移到钟山县英家乡白沙井，在桐林中建立了中共广西省工委临时机关。为了加强省工委临时机关和英家乡附近党的工作，他先后从各地调了黄嘉、

^①陈枫 1976 年谈话记录。

^②据邹如冰：《忆战友钱兴同志》。

吴赞之、肖雷、庄炎林、黄悦卿、覃舜思等来到英家，在当地党员张赞周，王家纪等掩护下，开展党的工作。英家特支也在这时候建立起来，由黄嘉任书记，具体领导英家乡党的工作，并吸收了一些经受考验的优秀分子入党，壮大了党的力量。

这些同志来到英家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有的当了私塾教师，有的当了小学教师，有的挑货郎担，有的当庙祝等。钱兴在英家的公开身分是广东难民、张赞周的朋友。他在桐林中搭了个茅棚，在小茅屋前开垦了一块土地，种上了芋头、豆角等庄稼，还养了一群鸡，这一方面可以掩护身分，也可以帮助解决生活费用。

钱兴当时正患肺病，而生活条件很苦，每天靠张赞周等送来一点米，营养之类根本谈不上。他爱人很担心他的身体健康，钱兴却乐观地说：“这里是养病的最好场所，空气清新，胜过打针吃药！”有一天，他跟一位同志到外面抓到一条大蛇，回家后高兴地说：“我们有营养品了！”他的病一直没有很好治疗过，但却始终带病工作。

省工委临时机关建立后，钱兴一方面迅速设法把大批党员从城市转移到农村隐蔽；另一方面，设法通过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撤退后留下来的地下党员张兆汉，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了间接联系，把广西发生“七九”事件以来的情况报告上级党组织。后来，中央和南方局有什么新的指示精神，张兆汉也及时向广西省工委传达。^①

一九四三年秋天，钱兴把省工委机关迁到钟山县的黄宝

^①庄炎林：《“七九”事件后的中共广西省工委》，《广西党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3期。

村。有一次，日寇路过黄宝村，钱兴一家人随群众到村后的一个小山上暂避，他便趁这机会，在山上找到一个岩洞住下来，但仍经常到英家一带活动。一天，一位从别处撤退下来的地下党员来到岩洞与钱兴一起居住，在闲聊时，他们从该地的岩洞谈到延安的窑洞，钱兴满怀豪情地说：我们是为解放全中国而住山洞的，我们要象毛主席在延安一样，身在山洞，心怀天下，不要只看见洞前几棵树，而要看到全中国和全世界！”^①

后来，钱兴带着爱人和小孩，和吴赞之一起转移到钟山县燕塘乡的牛峒，与吴赞之组成一个简单的家庭。钱兴化名为“蔡亚十”，吴赞之化名为“蔡亚祥”扮作叔侄关系，说是从广东新会逃来的难民。钱兴故意蓄起胡须，说他已四十五岁，其实他才三十出头。

牛峒四周有石山环绕，中间方圆七八里全是荒地，被月小寨姓莫的地主霸占着，谁要在那里开荒或割草、烧石灰，得先经过他的同意，而且要送礼请酒；种的作物要交租，烧的石灰也要以比别人便宜的价钱卖给他。该地住有莫晚叔等四户穷苦人家。钱兴通过地方党组织的关系，认识了莫晚叔。莫晚叔是一个饱经患难的贫苦农民，原籍贺县，妻子早亡，遗下两个儿子，一个卖给地主，另一个给地主放牛，他自己孤身在牛峒开荒种地，有时给地主打零工或割草、烧石灰，过着悲惨的非人生活。

钱兴他们来到牛峒后，通过莫晚叔与地主讲情，在牛峒开了一块荒地，盖了一间茅屋。几口人生活十分艰苦，每餐仅得三、四两米煮粥充饥。后来，他们还开始烧石灰、经济状况虽

^①邹如冰：《忆战友钱兴同志》。

逐渐好转，但生活仍很艰苦。

牛峒的秘密机关建立起来后，各项工作相继开展，各地党组织也逐步恢复发展起来。但是，由于一些党员刚从城市转到农村来，有的怕苦、怕累；有的缺乏工农感情，与群众关系搞不好；还有的对革命前途信心不足，钱兴认为，若不及时解决这些思想问题，便不能提高党的战斗力，无法带领群众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忙着领导全省工作的同时，组织省工委机关和英家特支的同志进行整风学习。根据党内存在的各种思想和延安整风精神，他提出整风的任务是：提高思想觉悟，坚定革命信心；批判各种错误认识，树立长期隐蔽在农村的思想；加强革命气节教育，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①。他设法弄来了毛泽东在延安的整风报告和有关整风的文件，利用晚上时间，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在此基础上又引导大家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钱兴带头检查自己在“七九”事件以来的缺点错误，认真总结广西发生“七九”事件（桂林）、“一一三”事件（玉林）、“一一五”事件（南宁）的沉痛教训，并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在他带动下，同志们纷纷自觉地作了深刻检查。通过这次整风，提高了大家的政治觉悟，党的战斗力大大增强。

正当钱兴满怀信心规划牛峒春耕生产和发展全省党的组织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国民党八步专员公署发现了牛峒这块肥沃荒地，决定在牛峒建立一个农场，要驱逐住在牛峒的贫苦农民，强夺他们勤劳开出的几十亩熟地和几间茅屋，

^①据肖雷：《战胜艰难险阻的保证》，广西《支部生活》，1984年第1期。

甚至连夜放马吃光农民的庄稼。钱兴决定组织大家起来反抗。他把附近的五户穷人发动起来，与八步专署建设科长为首的一伙人进行说理斗争，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教育了群众，然后，搬出牛峒。钱兴把省委机关搬回英家白沙井桐林里原来的地方，并立即紧张地开展工作。他与其他同志商量，把在牛峒烧石灰和货郎担卖货得来的钱做本，在白沙井马路边开设了一个粥店，作为党的联络站，一面掩护桐林里的秘密机关，一面扩大党的经费来源。

一九四四年夏，广西省工委通过张兆汉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当前抗战形势有了较大的变化，日寇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从湖南直下广西、贵州、广东，过越南，通南洋，准备把那里的军队搬回大陆；国民党在日本侵略军新的进攻面前，势必张惶失措，逃跑退却，广西将沦为敌后。在日寇入侵广西后，省工委主要领导全省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①。钱兴认为中央这一指示十分正确和及时，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他立即派出一批干部分头到桂北、桂南、桂东南等地进行传达、部署，发动宣传群众，利用各种关系，组织抗日武装。钱兴自己与庄炎林扮成商人到来宾县大湾板塘村（现属柳江县）找“七九”事件后担任省工委副书记的黄彰，研究贯彻中央指示和组织抗日武装问题，决定在桂东北，桂东南建立抗日根据地。钱兴负责桂东北，黄彰负责桂东南一带的工作。

在省工委的领导下，各地的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桂北，有从抗日服务队发展起来的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即临阳抗日联队）、由灵川特支建立的潞江抗日自卫

^①据庄炎林：《“七九”事件后的中共广西省工委》。

队；在柳北，有长安、三江、融县一带建立的柳北人民抗日挺进队；在桂东南，有博白、玉林、容县、兴业、陆川、贵县一带建立的桂东南抗日游击队和武鸣抗日义勇队等武装。一九四四年冬，仅博白县的人民抗日武装人数就达千人以上，与广东南路游击队互相呼应。他们广泛袭击入侵日寇，武装保卫家乡，有些县还建立了抗日民主新政权，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一九四五年二、三月间，在我地下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包括贵县、陆川、博白、兴业等县的桂东南起义和钦廉四属（合浦、灵山、钦县、防城）武装起义。这些英勇武装起义虽然被敌人所镇压，但仍给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以沉重的打击，为配合全国抗战，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此同时，省工委还通过文化教育界的民主人士，组织了一支宣传抗日的文化队伍，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当时，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从事城市文化工作的干部从桂林疏散到昭平县的黄姚地方，其中有演戏的、唱歌的、绘画的、教书的、搞新闻的，等等，还带有电台、机器。钱兴非常重视这一支抗日宣传力量，及时派出一批党员到黄姚，做这些文化教育新闻界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把他们发动起来，团结在我党周围，并把《广西日报》（昭平版）掌握在我地下党手里。《广西日报》（昭平版）这一时期的很多社论都是经我地下党研究后由民主人士撰写或我党同志起草的，其编辑方针是宣传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斗争。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省工委机关从英家搬到黄姚中学，并先后安排了二十九名党员到该校任教，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钱兴同志十分重视这一阵地，并亲自过问黄姚中学党支部的工作，使黄姚成为当时抗日活动最活跃的地区。

在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传来了省工委副书记黄彰同志在桂东南起义中牺牲的消息。钱兴对此感到无比悲痛。他冒着危险到贵县慰问黄彰的爱人高天梅，并安排她撤退别处。这时，省工委领导只剩下钱兴一人，全省地区辽阔，组织分散，领导工作十分困难。钱兴挑起了这副重担，经常在外面奔跑，检查、督促各地工作，有时年三十晚还在半路上，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坚强革命毅力和崇高革命品质。

(六)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在全国欢庆胜利的时候，钱兴更加思念上级党的领导，迫切希望能在新的形势下得到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与指示。为此，他于同年九月，与省工委交通员庄炎林一起，前往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他们由桂东出发，过桂东南、桂南、桂中，沿途分别向当地的党组织布置了工作，于十月中旬到达重庆山城^①。

钱兴到达重庆时，“双十协定”刚刚公布几天。他通过张兆汉找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局派王若飞和钱瑛听取钱兴的汇报。王若飞和钱瑛代表南方局领导，赞扬了广西地下党几年来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绩，并向钱兴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

“双十协定”虽然已经公布，但这只是纸上的东西，国民党可能执行，也可能不执行，打内战的可能性很大，我们要做好两手

^①据庄炎林：《“七九”事件后的中共广西省工委》。

准备,尽一切努力制止内战、尤其要准备应付蒋介石打内战^①。

一九四六年春,钱兴带着上级党的指示和鼓励,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广西昭平黄姚,向省工委机关的同志们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并联系广西的实际情况,研究贯彻执行。他指出:蒋介石随时都可能发动大规模内战,我们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搞起来,扩大农村游击根据地,推动各地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开展^②。接着,他不顾旅途的疲劳,又动身到各地传达、部署,使广大党员认清形势,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并适时地将各地已经暴露的同志转移或调动工作,从而保存了党和革命的力量。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发展内战。桂系军阀也加强对广西的法西斯统治,加紧搜刮民脂民膏,迫害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围剿”我革命武装,镇压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年七、八月间,钱兴接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此时广西党组织改属香港分局领导)的通知,专程到香港汇报、联系工作。他在香港,会见了离别多年的老战友和老首长,听取了方方等领导同志关于国内外形势、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党组织建设等问题的重要报告。此间,他利用汇报工作的空余时间,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等著作、文件,联系过去在广西革命斗争的实践,深深体会到:自从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由于没有系统地、经常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刊党报,故只能在实践中摸索,有时摸索得对,有时摸索得不对,就是摸索对得,也还是朴素、零碎的。对

①庄炎林:《“七九”事件后的中共广西省工委》。

②邹如冰:《忆战友钱兴同志》。

此，他后来写给中央香港分局的报告中曾经感慨地说：“从香港回去后，我认为得了很多东西。”

十月初，钱兴带着香港分局的指示和许多重要文献回到广西昭平县黄姚。首先，他用二十多天时间，组织省工委机关的同志学习、研究香港分局的指示，提出对广西局势的分析和贯彻分局指示的意见，并翻印有关文件材料，发给各地主要干部学习、研究。然后，他带着上级党的指示和省工委的意见，到桂中、桂南等地传达、贯彻。时近旧历年底，他爱人又刚生下一个小女孩，家里很需要他照顾。但他为了党的工作，一如既往，把家庭托给同志们，便立即出发了。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即旧历的大年三十晚上，他到达来宾县大湾村，与在那里坚持地下活动的高天梅等一起过春节，并检查部署工作。二十六日（正月初五）又起程前往桂南、玉林五属、横县等地。

在省工委的领导下，桂林、柳州、南宁、梧州等城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农村，广泛开展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群众斗争。这两股革命洪流相汇合，形成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

一九四七年二月以后，钱兴集中精力抓两项工作：一是筹措活动经费，解决由于经济困难而对工作带来的阻碍问题；二是准备召开主要干部会议，总结过去广西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克服存在的缺点，以迎接新的战斗。

四月七日，在全国革命斗争迅猛发展的形势下，钱兴在横县陶坪六秀村主持召开各地区地下党员负责同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桂东、桂北、玉林五属、桂南、融县、横县等地主要负责干部共七人。会上，钱兴根据香港分局的指示，作了题为

《一切为着准备武装起义而斗争》的政治报告^①，这个报告传达了香港分局的指示，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和广西的社会状况，以大量事实说明：广西统治当局本质上是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政权，今天首要一环就是在党内外彻底肃清对广西反动当局的幻想。会上，钱兴还引导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广西党六年来的经验教训。钱兴带头在会上作自我检查，从领导思想、工作作风及工作方法各方面作深刻的检讨^②，丝毫不以自己过去的工作成绩而功臣自居。他的这种谦虚谨慎、严格要求自己的思想作风，使同志们深受教育。大家称赞他是对党忠诚，政治上坚定、党性强、组织纪律性强、思想作风优良的好领导。

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广西当前斗争的总方针是：进一步发展壮大“第二条战线”，放手发动群众，积极组织武装起义，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自下而上地摧毁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进一步建立扩大解放区^③。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次会议又重新划分了各个中心游击区。并确定以桂西为全省武装斗争的中心。会后，钱兴带领工委同志分赴各地，为完成新的斗争任务而努力工作。

(七)

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一九四七年上半年，香港分局决定撤销广西省工委，将桂东南、桂西南分别划归即将与邻

①钱兴 1947 年 5 月 5 日写给上级党委的报告。

②钱兴 1947 年 4 月《在横县会议上的检讨》。

③据吴赞之：《牛峒半年》，《广西革命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省毗连地区共同建立的各边区党委领导，其余地区由新建立的桂柳工委领导。由于工作需要，横县会议不久，钱兴奉命调到粤桂湘边区工作。同年六、七月间，他在香港经分局组织部长黄松坚的介绍，与接替他工作的陈枫见面。钱兴即将广西地下党的有关工作与组织关系移交给陈枫，然后前往广东广宁，担任中共西江区工委副书记、粤桂湘边纵队副政委职务。当时西江区工委领导绥江地委、连江地委和桂东特委。

钱兴到达广宁后，化名为李钱兴、李伟民，人们称他为李副政委，更多的人亲昵地称他为“四眼李”。钱兴主要负责党的工作和抓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还兼管桂东工作，他经常深入部队，以普遍一兵的姿态，与指战员们生活在一起。他十分关心战士们的学习与进步，经常对部队进行形势教育、传统教育，工作做得十分扎实、细致。有一次，一批刚由香港回来的知识青年加入到部队中来，他及时地把思想工作做在前面，给他们讲形势，讲任务、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讲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鼓励大家不怕艰苦，不怕牺牲，还帮助他们学军事、学做群众工作，使这群满腔热情的知识青年很快就安定下来，表示要在战场上为人民立功。钱兴不仅在部队和战士打成一片，在地方上也经常同农民一起犁田耕田，促膝谈心，关心群众疾苦，深得战士和农民群众的拥戴。一位曾与他一起在西江工作过的干部还回忆说：“我在与钱兴相处的日子里，觉得他组织观念很强，不怕困难，忠心耿耿地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他有一股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英雄气魄，遇到困难时，毫不畏惧退缩，临危受命，表现了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①

^①据欧新同志回忆资料（1983年8月）。

一九四七年秋，钱兴到怀集县南区他家乡一带发动和组织群众武装斗争。八月十五日，在他和怀南游击队领导人筹划下，举行了一次武装暴动，攻占了国民党诗洞区公所，歼灭敌人十几名，缴获枪支弹药一批。翌日，怀南游击队在诗洞召集当地士绅开会。钱兴在会上讲话、宣传党的政策。他们还举行了军民联欢会，吸收了一批民兵参加部队。十一月四日，怀南地区成立了革命政权——六龙坑乡政府。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怀南游击队的配合下，德庆县地下党于三河地区举行了武装起义。此前，钱兴与西江区工委其他领导人一道，具体研究讨论了起义计划。起义打响后，部队攻下了敌人三个据点，使西江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之震惊。在此基础上，怀南游击队、德庆起义武装及纵队派出挺进西江的部队，共同组成了广德怀人民抗暴义勇总队。西江地区的广宁、四会、怀集、德庆、封川、开建等县游击区亦因而连成了一片，并有五个区成立了民主政权、

五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乘我游击队主力远出执行任务之机，袭击了钱兴的家乡怀集凤南村，杀害了积极配合我游击队筹粮筹款的钱兴的胞弟钱汉年，捉去了老百姓十一名，并洗劫了全村。钱兴闻讯，于第二天夜晚赶回家乡，挨家逐户的慰抚乡亲们，勉励他们化悲痛为力量，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

此时，西江、桂东地区国民党反动派成立了粤西桂东联剿指挥部，积极部署对我粤桂湘边区根据地的“扫荡”。西江区工委根据当时形势，确定了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积极开展军事行动，坚持老区，发展新区，保存力量，保护群众利益的斗争方针。七月十四日，钱兴就西江区形势及区工委的反“扫荡”

方针等问题向香港分局作了书面汇报，表示我军民对于敌人的进犯“已有了准备，早已提出这是生死斗争，已广泛号召人民一致起来，为保卫四雍而战。”

七月间，国民党广宁县县长冯肇光与县党部书记陈白运相勾结，在广州弄到了一批枪枝弹药，雇用了两艘轮船，准备从水路装运至广宁，以加强其“扫荡”部队的装备。根据我部队侦察到的这一情况，钱兴当即与贺绥支队副政委欧新等开会研究。会上，钱兴全面分析敌我形势，指出伏击敌人的军火运输队，对粉碎敌人的“扫荡”具有重大意义，既可争取时间，又可打乱敌人的部署；但必须估计敌人运送这批军火，必会集中广宁、四会两县的反动武装护送，因此，我们除了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外，还必须正确选择伏击敌人的地点。大家根据钱兴的意见进行认真讨论。决定在广宁的挾罗口伏击敌人。会后，大家立即分头进行准备。钱兴亦到部队作战斗动员。

七月上旬，敌人费了不少周折，把武器运到四会县城后，好几天不敢继续行动。敌人知道从四会到广宁，要经过游击队控制的地区，因此故意制造假象，混淆视听，有时放出从山路运走的空气，有时佯装从公路押运，有时又扬言在四会驻防。至七月中旬，敌人开始在四会起程，军火船走水路，陆上特派广东省警卫队和地方自卫队共二百多人押运。七月二十日，敌军火船到达挾罗口。我部队在挾罗口地方设伏了四日三夜，终于等到敌人的到来。是日，挾罗口渡口的船夫，先把岸上的敌人从东岸渡到西岸。等敌人上岸进入我伏击区时，我主力迅速从右边山上、公路前后三方面合击敌人，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结果，俘敌副队长以下五人，打死副中队长以下九人，伤多名，而我无一伤亡，共缴获船上的长枪一百二十余支，轻机枪两挺、短

枪六支，子弹万余发、敌重要文件一束，以及大米、布匹等军需物质一大批^①。伏击战的胜利，“补充了自己，削弱了敌人，提高了士气，振奋了人心”^②，为反“扫荡”斗争赢得了时间和物质准备。

同年九月，国民党反动派向我粤桂湘边区游击根据地广宁四雍地区大规模进犯。四雍地处广宁北部，与阳山、清远、怀集三县交界，西江区工委和粤桂湘边纵司令部就设在四雍。我军接到情报后，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对策，决定留下一部分兵力与敌人周旋，主力部队跳出敌人包围圈外，待机打击敌人。钱兴虽然到广宁时间不长，情况也不完全熟悉，按照他的具体情况，理应跟随主力撤走。但当组织要他留下坚持斗争时，他表示服从分配，把好的武器拨给主力部队，由他带领部分体弱伤残人员留在四雍坚持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他说：“组织决定要我留下，我就坚决执行，坚持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③

九月十六日，国民党反动派分兵三路，在反动县长古绍轍率领下，向四雍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疯狂“围剿”。钱兴率领军民浴血奋战，但由于敌强我弱，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再加上一些变节分子从中破坏，致使我部损失较重，四雍根据地沦于敌人手中。国民党反动军队进入四雍后，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我干部、战士、民兵、以及他们的家属被杀害的达四百多人，房屋被烧毁的近千间，山林被毁的达数千亩。

①据欧新：《挾罗口阻击战的回忆》。

②钱兴关于西江区武装斗争情况的报告（1948年8月17日）。

③欧新回忆资料（1983年8月）。

在此严重的情况下，钱兴带领留下部队转移到山上，坚持五十多天的游击战争。为了避开敌人疯狂搜捕，他们经常转移，生活十分困难、艰苦。钱兴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并号召共产党员一定要坚定、乐观，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考验^①。

十一月六日，钱兴同意当地党组织的意见，决定暂时转移到怀集方向活动。四雍党组织派出数名党员民兵护送钱兴至两县交界处后，钱兴只带小队干部吴凡向怀集进发。那天天寒下雨，身上衣服全被淋湿。他们俩走到怀集坳仔时，天已黑，肚又饿，看到前面有火光，便进去避雨。那是一个纸厂，里面只有一个人，说是来挑米水的。钱兴便向他借锅煮饭。那个人表示同意后，便挑着米水去告密。当钱兴他们吃完饭，正在烤衣服时，一队乡警打着火把前来搜查。钱兴沉着地说：“我们是放木排的，有话慢慢说。”乡警回答：“既然是这样，就请你们到乡公所看戏！”钱兴看出他们不怀好意，便摆脱敌人向外突围，冲出去后，见吴凡还在屋里，便返回来找吴凡。两人冲出纸厂。分头往山上和山下突围，但是，在突围战斗中，钱兴不幸牺牲。

钱兴牺牲后，广东和广西人民无限悲痛。一九六三年，粟裕写了一首悼诗，表达了两广人民对钱兴的深切怀念。诗曰：

卅年往事忆羊城，
回首征途万里程。
患难弥珍同志爱，

^①中共广宁县委党史办：《钱兴同志在广宁的战斗经历》（1983年7月）。

艰危常念死生情。
两江月黑英雄胆，
古国天明万众心。
从此江河饶画意，
头颅掷处绿成荫。

附 本文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有：

1. 高天梅：《“七九”事件前后》，《广西文史资料》第13辑。
2. 冯焕修：《忆钱兴同志的一些事迹》，《广西党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1期。
3. 盛兮廉：《钱兴夫妇在桂林脱险经过》，阳雄飞：《钱兴同志在灵川的住处》，《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
4. 韦立仁：《中共广西省委工委机关在钟山》，《钟山县党史资料通讯》。
5. 横县党史办公室：《中共广西省工委召开的横县县委会议》。
6. 《头颅掷处绿成荫——缅怀原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烈士》，1984年1月10日《广西日报》。
7. 中共桂委：《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全体同志书》，原件存广西博物馆。
8. 吴赞之：《钱兴同志轶事》，未刊稿。
9. 张祖贵：《钱兴同志二三事》，《广西革命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0. 张赞周：《忆钱兴同志》，1962年8月10日《梧州日报》。
11. 黄嘉：《“七九”事件纪事》，未刊稿。
12. 《甘化民自述》，《来宾县党史资料》1984年第1期。

秦 鸿 钧

翟作君 王蕙炎

秦鸿钧曾是山东沂蒙山区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创建者之一。以后他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电台工作，为建立地下电台，传递党的情报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在党的一条特殊战线上不避艰险，冒着生命危险工作的无名英雄。在上海解放的前夜，遭敌逮捕，坚贞不屈，英勇牺牲。

(一)

秦鸿钧，原名秦相猷，一九一一年生于山东沂南县世和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父亲秦培源从小跟随祖父母从祖籍日照县逃荒要饭流落到了沂南县，住在世和庄东头的一座破庙里，靠看管寺堂，租种寺院的田地维持生活。

秦鸿钧因家境贫困，上学很晚，十岁时，在伯父的资助下，才开始读了几年私塾。以后，他一边帮助家里劳动，一边给地主打短工，挣几个钱糊口。切身的遭遇，使他深感社会的不平。

一九二六年，大革命蓬勃发展。秦鸿钧在家乡同地下党领导人徐相南以及本村的贺伯珍一起，组织了农民协会。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经葛德孚介绍入

党。大革命失败后，秦鸿钧坚持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二九年，他参加了莒沂两县农民暴动，不幸被捕入狱，转解数县，受尽苦刑。家里变卖了田产，又向亲友借了一笔钱送给县衙门，才将他赎了出来。他的父亲秦培源为此事连吓带气得了重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三〇年病故。经过这次考验，秦鸿钧的革命意志更坚强了。他的作为虽曾受到家人的非议，但他却毫不为之所动^①。

一九三二年，秦鸿钧参加沂南区党的领导工作。在秦鸿钧和其他一些同志领导下，这个地区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在方圆一二百里内，以苏村镇为中心的司马店子、司马、下马寺、李家庄、肖家庄、房间沟、石灰；以斜午为中心的蓝香埠；以河阳、汤头两镇为中心的附近村庄；以姚家店子为中心的张庄、马家庄、竹篮；以莒县城关为中心的莒南、小辛庄等村镇，都建立了党组织。秦鸿钧不仅是沂南区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交通联络员^②，在这些村镇里，都留下了秦鸿钧的足迹。他经常穿巷走村，下达党的指示，传送红军胜利的捷报，传递标语、传单等。为了实现在沂南地区建立革命政权的计划，积极开展沂南区的武装活动，秦鸿钧参加了大刀会的一个支派——红旗会的活动，以便从中掌握武装。沂水县的大刀会原是民间自发的防匪武装组织，领头的是东营庄的张恒远、张恒之。秦鸿钧在红旗会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到一九三二年逐步掌握了这个组织的领导权。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

^①1982年12月20日秦鸿钧的亲属秦淮安回忆记录。

^②王光华、王光伟：《回忆秦鸿钧烈士的一段历史》（1982年8月），未刊。

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和上海人民一同奋起抵抗。沂水人民也纷纷捐款支援淞沪抗战，但这些款项却被沂水县政府侵吞了。事情揭露后，群情激愤。中共沂水县委立即举行秘密会议，分析了形势，认为反动当局肆意增加苛捐杂税，贪污抗日捐款，党组织应该不失时机地发动和领导人民赶来斗争。会议还决定利用群众的自发组织大刀会发展武装斗争，并要求共产党员积极参加行动^①。会后，沂水县委派人去同大刀会的头目张恒远、张恒之联系，争取他们一道攻打国民党顽固派、良水六区区长杜绍曾。秦鸿钧是领导这次行动的成员之一。不几日，大刀会攻打了良水区政府，并杀了杜绍曾。山东省长韩复榘闻报后，立即派八十一师、二十二师到沂水镇压。大刀会面对强大的敌军，坚持战斗了一个月，后在黄石山寨遭到敌人的围攻，牺牲、受伤二千多人，造成了沂水县历史上一次骇人听闻的大惨案。国民党反动派除了进行军事镇压外，还在政治上进行分化瓦解^②，派飞机散发污蔑共产党的传单，挑拨农民和党的关系；同时派出省政府民政厅长到沂水县对张恒远进行收买拉拢，诱以高官厚禄，终于使这次武装暴动失败了。

一九三三年春，由于山东省委委员宋明时叛变，沂水县委遭到严重的破坏。县委委员王光华到沂南区领导并筹备组织武装起义，营救被捕的同志。经过王光华与沂北区委的陈善等同志联系，确定沂南、沂北两区的游击队在枫山汇合。但因计划不周，汇合地点被地主武装发现，游击队被迫退至山下。为了保存力量，武装游击队便化整为零，等候县委指示。不久，王

①②刘翔鸥：《回忆秦鸿钧烈士的片断情况》（1982年11月1日）。

光华和县委书记谢梅村一起去世和庄秦鸿钧的家里和沂南区的同志一道分析形势，认为在当时当地举行武装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决定暂时隐蔽，以待时机。于是秦鸿钧先到青岛，没有接上党的关系，遂又转赴哈尔滨。在哈尔滨，秦鸿钧通过少年时的同学、担任地下交通员的贺伯珍，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一九三六年，秦鸿钧受组织委派，去苏联学习电台技术。当时组织上只交给他一张地图，要他按照地图所指示的路线越过国境线前往苏联。这时，东北完全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之下，一路上只能昼伏夜行，既要防备日本宪兵的盘查，又要提防野兽的袭击。秦鸿钧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越过了边境，到达苏联境内。

学习无线电技术，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可是秦鸿钧只上过私塾，代数也没有学过，更不懂外文，要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掌握无线电知识与技术，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秦鸿钧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每天早起晚睡，刻苦学习，遇到问题，总是千方百计把它弄懂，否则决不罢休。有一次上实习课，苏联同志拿了一套破旧的发报机让秦鸿钧拆装。旧机器不如新的机器好使，秦鸿钧感到奇怪。苏联同志热情地告诉他：不是没有好机器，更不是不愿意给你好的机器学习。现在让你多使用旧的器材，碰到的困难和障碍会更多，对你回国之后，在困难条件下掌握技术有好处。秦鸿钧听了感到有道理。在苏联的半年时间里，他以顽强的毅力，学会了一整套无线电通讯技术，于一九三七年夏回国。

(二)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党根据城市工作斗争的需

要，派秦鸿钧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与第三国际远东局直接联系^①。但是，要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上海架设起我党的地下电台，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党组织周密地考虑了秦鸿钧的处境，决定让他先在上海站住脚，建立起一个家庭，有了公开身分，然后再考虑建立电台。于是，通过党内同志的介绍，秦鸿钧认识了小学教师韩慧如，经过相互了解，于一九三七年结婚。婚后，他们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菜市路（今顺昌路）口开设了永益糖果店。秦鸿钧以永益糖果店的老板兼跑外（推销员）的公开身分作掩护，为党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并购买电讯材料，安装电台。为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不便公开到电料行去买，而是想方设法到各处的旧货摊上去觅购。这样七拼八凑，终于拼凑成了一套收发报机。有了机器，还须架设天线才能使用。这是一项更须谨慎从事的工作，搞得不好，电台一装起来就会被敌人发觉。秦鸿钧经过反复思忖，将天线箴在房子的天花板内，然后在房顶顶端开了一个很小的洞口，露出一点点天线的线头，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此后，每当夜深人静，正是秦鸿钧集中精力工作的时候。为使秦鸿钧安心工作，韩慧如经常坐在窗户旁边，担任警戒。如果发现异常情况，她便马上告诉秦鸿钧让他停止工作。不过，不到紧急时刻，她是不轻易打断他的工作的。

一九三九年，秦鸿钧根据组织指示，调东北哈尔滨工作。秦鸿钧乔装成一个失业者，韩慧如装扮成家庭妇女，带着他们心爱的小女儿，乘船离开上海，向东北进发。船抵大连准备上岸时，由于他们的入境证填写得不够清楚，被伪满水上警察局

^①1980年12月1日访问韩慧如记录。

扣押。敌人经两天拷问，没有从秦鸿钧夫妇身上发现什么破绽，只得将他们放了^①。秦鸿钧担心敌人可能设下圈套，在放了他们之后又派人暗地里尾随钉梢，便决定在大连先住下来。

二十多天过去了，秦鸿钧和韩慧如没有发现敌人跟踪，他们放心了，于一九三九年十月离开大连前往哈尔滨。到了哈尔滨，他们先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下。第二天，秦鸿钧即按照接头规定的暗号，买了一只小红皮箱子上街。一连多天，也未找到党的组织。后来，偶而碰到了一位山东老乡，从他那里打听到一位姓贺的同乡在道外顾乡屯开了一家三开间门面的杂粮店。秦鸿钧想去那里打听一下。第二天一早，他就跑到道外顾乡屯。原来，这个“公和成杂粮店”，这正是他的老战友贺伯珍为了掩护地下电台而开设的。秦鸿钧高兴极了。他一家两个多月来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终于在哈尔滨和组织接上了关系。

经过商量，贺伯珍“老板”“雇佣”秦鸿钧当了杂粮店的“伙计”，作为公开职业。秦鸿钧在道外农村借了一间小草房，很快把家安了下来，便投入了工作。白天，他忙着干店里的杂活。晚上，与贺伯珍一起搞电台通讯，常常半宿不睡，十分劳累。韩慧如担心他的身体，但秦鸿钧总是乐呵呵地说：“没啥，革命需要嘛！”在这期间，秦鸿钧还不辞辛苦，又往返苏联一次^②。

一九四〇年二月，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了，取名“滨生”。不久，组织上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又决定调秦鸿钧回上海建立电台。一九四〇年夏，他们一家取道天津、青岛，准备继续由海路返回上海。在青岛逗留候船的时候，秦鸿

①②《秦鸿钧烈士传略》，载1949年8月28日《解放日报》。

钧忽然接到贺伯珍嫂子的来信，信上说：“我原来给你们孩子起的名字不吉利，改了吧。”^①暗示贺伯珍在哈尔滨被捕。为了防止发生意外，秦鸿钧决定将孩子的名字“滨生”改为“小小”，同时改乘火车经济南回上海。

秦鸿钧回到上海后，住在打浦桥新新街新新南里三百一十五号一幢旧式里弄房子的二楼上。组织上指示秦鸿钧在这里建立电台，与中共中央华中局联系，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接通。组织上又决定让他暂时先到苏北解放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地区去工作。一九四〇年夏秋之间秦鸿钧告别了妻子和孩子，离沪去苏北^②。

两个月后，刘长胜从苏联返回苏北解放区，得知秦鸿钧在上海曾搞过电台工作，就与有关领导人研究决定派他仍回上海建立电台^③。临行时，华中局的领导交给秦鸿钧一份重要文件，让他转交地下党领导^④。于是，秦鸿钧装扮成贩猪的商人，又回到了上海。

到上海后，秦鸿钧根据新台架设的方位，重新调整了频率与呼号，终于与中共中央华中局取得了联系，使华中解放区与当时敌人最大的占领区上海，又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

(三)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蒋介石掀起的反共高潮，白色恐怖又重新笼罩上海。为了更好地保证我党上海

①④韩慧如：《回忆秦鸿钧》。

②③1982年9月访问杨帆记录。

电台的安全，有利于长期隐蔽，党中央指示上海的电台只保持与中央的联系，与华东局（即前华中局）等地的联系一律停止^①。当北平党的电台和密码被破坏后，党中央又及时向各地地下党组织发出通报。党的上海局负责人刘晓根据党中央通报和指示精神，及时总结上海局机要译电和电台工作的经验，重新做了规定。过去由秦鸿钧直接接送的文件，改由他妻子韩慧如承担。

韩慧如接受传递情报的任务后，秦鸿钧不仅教给她传递文件的方法，而且反复叮咛她不能有丝毫疏忽，否则将会对党、对革命造成不堪设想的损失。韩慧如也十分机智、小心，每次都安全地完成了任务。

秦鸿钧知道，要顺利地完成党的通讯和联络任务，必须取得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因此，他很注意与邻居们的关系。左邻右舍有了纠纷，他去调解；有了困难，他去帮助，从而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大家也愿意帮助他办事情。与秦鸿钧家相距不远，住有他的一位同乡李老先生，其长子李树僧，是邮局的邮递员。秦鸿钧的电台与华中局的联系发生故障时，华中局给秦鸿钧的来信，都按事先约好的办法，将收信地址写在李树僧投递的区域内，李树僧分拣信件见到这类信函，就直接送到秦鸿钧手中。秦鸿钧买的一些电讯零件也存放在李老先生的家里。直至后来秦鸿钧和韩慧如被捕，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他们一家还把秦鸿钧存放在搁板上的零件和一部废旧电台全部安全转移，妥善保存。上海解放后，李老先生又把这些具有纪念意义

^①朱志良：《中共上海局的秘密电台和译电工作》，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5辑。

的物品献了出来。

一九四七年底，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秦鸿钧的工作也更加艰苦。他除了要排除由于机器破旧而造成的技术故障外，还必须不时地排除反动军警、特务的侦察干扰。据韩慧如回忆说：“当时经常可以听到他在那密不通风的阁楼里不安地来回走动，几个钟点，甚至是整个晚上。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往往是机器发生了故障，电台接不通了。”^①

秦鸿钧的工作室是一间矮小的阁楼。为了隐蔽，楼板隙缝都用纸糊住，天窗和电灯也用厚布遮住，里边真叫密不通风。夏天，小阁楼里闷得象蒸笼一样；冬天，薄薄的屋顶又挡不住室外严寒的侵袭。秦鸿钧在这样的环境里长期工作，得了关节炎，视力也大为减退。韩慧如看到秦鸿钧日益消瘦的脸庞，为他的健康担心。但是秦鸿钧却总是指着自己的耳朵说：“别担心，只要这个不坏，就行。”^②

一九四八年秋冬至一九四九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盘踞在上海的国民党的反动派感到末日来临，更加疯狂地镇压人民。他们大肆逮捕我地下工作者，秘密枪杀进步人士，还不断地从空间、地面对我地下电台进行电讯侦察活动。一九四八年，上海党的一座电台不幸被敌人破坏。刘长胜即将此情况告诉了秦鸿钧，并指示他要严密地注视敌人的动向，提高警惕，防止电台再受损失。虽然在这以前中央估计敌人可能会对我秘密电台进行破坏，一九四七年后就建立了预备电台，但预备台因种种原因无法接替秦鸿钧的工作。因此，秦鸿

^{①②}韩慧如：《忆共产党员秦鸿钧烈士坚贞不屈的斗争故事》，载1962年6月30日《青年报》。

钩负责的电台在一九四八年以后，继续承担着电讯频繁往来的任务。他完全忘掉了劳累，抛开了个人的安危，全力以赴，为党工作。

秦鸿钧的电台终因使用时间过久，被敌人发觉了^①。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深夜十一时，秦鸿钧象往常一样在小阁楼里收报发报。一直在二楼窗口注意外面动静的韩慧如，突然听到楼下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心中一惊，马上向阁楼发出警报。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着的秦鸿钧听到警报后，立即镇定地、快速利索地发出最后一组电文，并立即通知对方停止发报。接着，他又以最快的速度拆毁了机器，烧毁了刚收下的电文。几乎与此同时，十几个特务破门而入，秦鸿钧和韩慧如同时被捕了。

秦鸿钧被捕后，国民党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第二大队特刑庭对他进行了秘密审讯。他们扒去秦鸿钧身上的衣服，捆绑在老虎凳上，一块块加砖，直至两条腿骨被压断，昏厥过去。敌人还不放过，又往鼻子里灌辣椒水。秦鸿钧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不吐一点真情。敌人又故意安排他们夫妇见面，企图从中得到一点情报，但是同样一无所获。敌人只得将秦鸿钧转解上海北四川路警备司令总部。在这里，敌人又要了个花招，由一个匪徒假扮囚犯，想从秦鸿钧口中套出一点情况来。但秦鸿钧洞察奸计，始终保持警惕。敌人的种种花招，都一一破产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秦鸿钧同张困斋等十二位难友被提出监狱，上了汽车。囚车开到浦东戚家庙，敌人问他们有什么

^①朱志良：《中共上海局的秘密电台和译电工作》。

话要讲。他们坚定地回答：“用不着讲什么，少数人倒下去，千万个人会站起来继承我们的事业！”就在这天深夜，秦鸿钧等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作者附记：

本文在编写过程中，除参阅《秦鸿钧烈士传略》、《上海文史资料选辑》、《解放日报》、《文汇报》、《青年报》等报刊的有关文章外，还参阅了烈士夫人韩慧如、烈士的领导和战友张承宗、王光伟、王光华、刘翔鸥、高沂、杨帆、李路、纪纲等写的回忆材料，韩慧如还审阅了初稿，并作了修改、补充。

肖 明

胡 华

肖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担任过白区一些地方地下党的领导工作，是渭华起义和我党推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起事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并长期从事对冯玉祥将军及其部属的统一战线工作。第一次解放张家口时期，担任张家口市总工会主任；北京解放后担任北京市总工会主席；一九五九年病逝。

肖明，原名肖鸣，曾用名彭明、肖筱文、晓明、肖振声。一八九六年十二月生，湖南省新田县上户北村人。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九年，肖明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读书，参加湘南学生联合会，担任常委。在五四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思潮的激荡下，他积极参加了湖南驱张（张敬尧，北洋军阀，时任湖南省长）运动，被开除学籍。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他与蔡和森、李立三、肖子暉（肖三）等出国留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秋，参加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当选为代表团代表，被中国反动政府勾结法国帝国主义者拘禁，后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一起被押送回国。

一九二一年冬，肖明回到北京，进入中法大学读书，并积极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一九二二年，他在陈为

人领导下，参加《工人周刊》的编辑工作，还同何孟雄等指导京绥铁路和张家口的工人运动，来往于张垣至西直门之间。同年，肖明由邓中夏、陈为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法大学，他担任陆漠克学院中共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并参加北京学联宣传部的工作。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期间，他参与指导长辛店工人的罢工运动和京绥铁路工人声援二七运动的斗争。随后，同肖三一起，指导了张家口地区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一九二四年秋，党的北方区委送肖明等到苏联学习。他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一个时期，以后转入中山大学学习了二年，在中山大学任党的小组长和共青团指导员。

一九二六年秋，党派遣肖明与刘伯坚等经蒙古回国，到绥远五原，参加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即国民革命军北路军）工作，任北路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副部长和总政治部的中共党委书记，随军南下。

一九二七年六月，冯玉祥将军受蒋介石拉拢背离革命，大批功勋卓著的共产党人被迫脱离冯部。肖明由甘肃赴陕西、被中共陕西省委任命为渭南县委书记。渭南县委设在渭南中学，肖明化名彭明，以渭南中学教师的公开身分作掩护，为整顿恢复大革命失败后的党团组织而辛勤工作。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全县有党团员达千人以上。三月，陕东特委成立，领导渭南、华县、华阴、蓝田、临潼等五县的农民运动。肖明任特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这几个县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力量都较雄厚，差不多每一个大村都有农民协会，三个县的中学、十来个小学都有党和团的组织。一九二八年春，肖明（彭明）传达陕西省委决定：“割据渭华，恢复农

会，实行土地革命”。县委组织了农民武装，发动学生与农民联合，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五月，中国共产党掌握的许权中、唐澍、刘景桂（志丹）、谢子长、高克林等领导的一个旅，同陕东特委刘继曾，肖明等领导的陕东赤卫队相配合，举行了著名的渭华起义，成立了几十个村苏维埃政权，崇凝等区也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并积极筹备建立渭华等县县苏维埃政权。肖明分工抓地方工作，领导农民分房屋、粮食、农具，草拟土地革命纲领和划分阶级条例。六月中旬，宋哲元部反动军队进攻，肖明带领陕东赤卫队和农民武装英勇地爬在坟堆上指挥战斗。敌军攻势甚猛，我军不支，肖明率残部退至华山南部；唐澍等率起义部队退至洛南一带。不久，唐澍牺牲、肖明又潜回渭华敌后，召开党团会议，处理渭华起义失败后的善后问题。七月底，他从风陵渡渡河到山西榆次，转到北平后又去上海。九月六日，肖明给党中央写了报告，汇报了他离甘赴陕一年多时间的工作情况^①。

一九二八年冬，党即派他去天津参加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四十三人，在天津“法租界”的弗照旅馆开会。会上，周恩来传达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刘少奇根据顺直党的具体情况作重要报告。会议改组省委，张昆弟被选为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肖明和傅茂公（彭真）等被选为省委委员；郝清玉被选为省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张兆丰被选为省委军委书记。

^①肖明给党中央的报告（1928年9月6日）。关于渭华起义的情况，参见陕西省档案馆资料和1950年春肖明主持，同王孝慈、李慕愚、李锦峰、向宗仁等座谈渭华起义的纪录（胡华、冯拾记录）。

一九二九年，肖明又兼任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秘书长，秘密领导工人的斗争。是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四日，顺直省委两次召开扩大会议，改选省委，张兆丰连任军委书记，肖明（时化名肖鸣）和童长荣等被选为省委军委委员。

一九三〇年，肖明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在李立三为首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他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人力车工人的斗争。肖明后来回忆说：那时，提出的减车租、增工资的要求偏高，许多工人认为有轨电车夺了人力车工人的生意，发生了打电车这样的蠢事，以致斗争失败了。当时党领导斗争很不讲策略，助长群众的自发性。在实践中才慢慢懂得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①。

一九三一年，肖明担任中共华北特委（又称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组织部长。为了掩护工作，他化名肖筱文，任朝阳大学教授、民国大学附中主任。九月，他与冯玉祥派到北京的代表赵彦卿取得联系。冯玉祥自一九三〇年夏中原大战反蒋失败以后，带其家属随员蛰居在山西汾阳城西的峪道河山村，曾派员到各地联络反蒋力量，并表示欢迎共产党方面的人到峪道河与他晤面。五月，赵彦卿陪肖明到汾阳峪道河，以给冯玉祥讲政治经济学的名义，与冯玉祥洽谈联合抗日反蒋问题。冯向肖表示：“徐州会议以后，由于对蒋介石认识不足，做了亲痛仇快的事情，把自己最敬佩的而且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好朋友刘伯坚等人送走，确是半生以来的大错……。”^②

肖明同冯玉祥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分析了各地多种政治

①肖明：《自传》（未刊稿），藏肖明夫人高翔处。

②陈天秩：《冯玉祥将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未刊稿）。陈天秩先生系冯将军的多年随从。

势力的情况，约定以后由赵彦卿作为冯玉祥的代表与肖明联系，定期在北京新街口西赵彦卿家（原冯部将领田凯的深宅大院）交换北方反蒋运动的情报。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肖明曾请赵彦卿到山西绛州找住在那里的冯玉祥，请冯玉祥抓紧这一民族危机时刻出山抗日，中共对他的抗日行动将全力支持。

与此同时，肖明等认为汾阳军官学校的队长和学生是接受冯玉祥的爱国、抗日、联共、反蒋主张的一支力量，便从北京派了共产党员赵梅生等一批人去做发展党组织的工作，在那里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一九三二年夏秋，肖明参与了动员安排冯玉祥由泰山到张家口支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工作。十月九日，冯玉祥到张家口后，肖明专程到张垣与冯再次晤面，商议筹组抗日同盟军大计。不久，党的华北特委（华北政治保卫局）即派吴化之、武止戈、朱其文、张存实，以及张金刃（即张慕陶）等陆续前往张家口，与冯玉祥等共同组织抗日同盟军。一九三三年三月初，日本侵略军占承德，向长城各口进攻。三月中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奋起抵抗日军。此时吉鸿昌将军到达张家口。中国共产党所派军事干部宣侠父、许权中，也相继到达张家口。五月，方振武率部到达张家口。于是，以冯玉祥为总司令，正式揭起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义旗。

一九三四年，上海党组织遭到大破坏。肖明被派到上海坚持党的抗日救亡工作。他积极联络原西北军旧部，从事抗日兵运工作，也从事文化界的救亡运动。

一九三六年春，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重新组织北方局。肖明由沪调回天津，在中共北方局联络部工作，并担任河

北省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兼铁路工作委员会书记。

一九三六年四月，肖明按北方局的指示，由李连山（中共党员，冯玉祥的内弟）陪同，到南京会见冯玉祥。冯玉祥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肖明按党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冯玉祥表示：我党对冯玉祥将军到南京来促成一致抗日的精神，十分理解，要求冯将军努力以自己的影响，团结南京爱国人士一致抗日。冯玉祥听了肖明谈话后，表示：一定按照一九三一年在峪道河肖明代表中共与他晤谈的初衷，在抗日的旗帜下，坚持与中共保持朋友关系^①。

一九三七年，肖明继续在北方局联络部工作，从事发动二十九军抗日的活动。五月间，中共北方局获得日本军部特务机关拟于六月间在平、津一带发动军事侵略阴谋的机密计划，并侦知冀东汉奸殷汝耕伪组织正在通州紧急训练一批特务。肖明将此紧急情报通知担任二十九军参谋长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克侠，由张克侠转告宋哲元下令紧急防范。六月底，果然通州一带日军以“演习”为名进驻北京城郊，城内东交民巷日本驻屯军也武装埋伏，殷汝耕派遣二十几名武装特务，化装成北大、师大、燕大等校学生，怀藏短枪，潜入城内，准备至深夜十二时后，鸣枪骚动，制造所谓“学生，士兵反日暴动”事件，届时城内外日军藉口镇压暴动，突然袭击二十九军司令部，进而解除二十九军武装，制造第二个沈阳事件，乘机占领北平和华北。由于二十九军得讯后严密防范，这批特务进城后就被跟踪，傍晚，将这批特务全部逮捕。结果，该夜日军在城内城外

^①陈天秩：《冯玉祥将军与共产党的关系》（未刊稿）。

白白地埋伏了一夜，阴谋落了空。

日军不甘心失败，拚命采取报复行动。一星期后，日军制造了炮轰芦沟桥、宛平县的“七七事变”，二十九军进步将领何基沣师长率部奋起抵抗。七月八日、九日，何基沣派四五百名大刀队夜袭芦沟桥西北面小树林中的日本军营，砍杀几百个日本兵^①。日军受此打击，被迫采用缓兵之计，放出“局部解决”、“不扩大主义”的烟幕。于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紧急电令宋哲元率二十九军立即退守保定以南，由南京政府与日方交涉“双方撤兵”。这时，中共北方局由肖明找张克侠，向宋哲元提出了一个“以攻为守”的战略方针，就是趁日军大量援军尚未开到，平、津、唐山只一两万日军之际，迅速集中优势兵力解除其武装，至少可以把日军驱逐到滦河的东北，以滦河为保卫平津的最前线。这个战略计划由张克侠在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会议上提出来。讨论结果，宋哲元既不甘心接受由南京政府来与日方谈判妥协的所谓“以退为守”的方针，也没有勇气实行中国共产党向他建议的“以攻为守”的积极方针。他拿起红铅笔在地图上一划说：我们就“以守为守”吧^②。但他又没有坚决守卫北平的决心和措施。不久，日本大量援军开到，二十八日北平失守。

一九三七年底，肖明到达延安。一九三八年，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授马列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他有渊博的马列主义素养，又有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讲课生动活泼，联系实际，

①何基沣 1950 年的回忆。

②以上情节，系肖明，张存实于 1946 年在张家口市回忆，胡华记录，发表于 1950 年 6 月 27 日出版的《北京青年》第 49 期，题为《芦沟桥事变片断》。

语音铿锵有力，间或在课程内容中穿插故事和笑话，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

一九三八年底，他出发到前方，在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宣教委员会书记，兼管分局党校的工作，并在党校亲自任课。

为了发展边区的工业生产，开发自然资源，解决经济困难以支持长期战争，一九四二年，肖明调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工矿局副局长兼总支部书记和边区政府总支部组织委员。他对开发和建设阜平县北部炭灰铺煤矿，作出了很大贡献。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肖明随军接收解放了的张家口市，担任张家口市市委委员、市委工委书记、市总工会主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张家口全市首届工人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解放三个月的张家口市工人运动》的著名报告。他指出：解放三个月来，张垣工人阶级在党和总工会的领导下，英勇地进行反奸清算斗争“共一百三十一次，参加人数达一万一千七百零三人，先后都取得了胜利，形成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光荣的奇迹”。他还指出：有革命传统的张市工友们配合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现在正“站在民主自卫战争的最前线，摧毁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①。他为创造和总结党和工人阶级领导工业城市的经验而日夜操劳。此时，他还兼任晋察冀边区总工会常委。

一九四六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侵占张家口后，肖明担任张家口市地下市委书记，在张家口市郊外坚持斗争。以后，他又兼任察哈尔省委城工部长、敌工部长，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城

^①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5集，工人出版社出版。

市工作委员会委员。他发动群众，配合我解放大军胜利进行平、津、张战役。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解放。肖明随军进城，担任了北平市委委员，市委工委书记，市总工会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等职，领导首都工人阶级为建设新首都而昼夜操劳。一九五六年，肖明因多年劳瘁成疾，患高血压病。一九五九年逝世，终年六十三岁。北京市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致悼词，深切悼念这位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的党的忠诚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工人运动的指导者。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肖明填写的简历和简略的《自传》，藏肖明同志夫人高翔同志处。
2. 1945年，1946年，本文作者访问肖明和肖三的记录。
3. 1950年春，肖明主持与王孝慈、李慕愚、李锦峰、向宗仁等座谈渭华起义的记录（胡华、冯拾记录）。
4. 中共张家口市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案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大事记》（1983年1月）。
5. 刘涓迅等访问吴成方、陈天秩、乐天宇等的记录。
6. 尹心田给肖明夫人高翔的信。
7. 陈天秩：《冯玉祥将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未刊稿）及本文作者与陈天秩先生的谈话记录。

雷 经 天

王 林 涛

雷经天，原名荣璞，一九〇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广西南宁津头村，一九二五年入党，是广西共产党组织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曾先后担任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主席、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政委、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务。一九五九年八月病逝于上海。

(一)

雷经天生长在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商人家庭里。父亲雷昆池，曾当过商行会计和经理。辛亥革命前，他就支持创办学堂，集资开办崇实种植公司，发展经济林木；在南宁第一个带头剪掉辫子，并动员年已四十二岁的妻子去读书；后参加同盟会，被委派为南宁支部的负责人。

一九一〇年，雷经天跟哥哥就读于南宁模范小学，后考入中学。他爱好文体活动，常到溪水边去冲头，炼就一副强壮的体魄。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年仅十六岁的雷经天，当选为南宁市学联主席，曾组织南宁市中小学生三千人，召开大会

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博得“大家热烈鼓掌”。

一九二三年暑期，雷经天考取厦门大学理科。翌年，转学上海大夏大学，在恽代英领导下，参加学生运动。一九二五年初，雷经天加入共青团。同年五月，在“五卅”运动期间，经恽代英，贺昌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大夏大学党团支部书记。旋因发动进步学生与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被开除学籍。不久，中央军委派他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在“中山舰事件”中，因抵制蒋介石的反动命令而被撤职。

北伐战争开始，雷经天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任宣传科长，随军进行江西，攻占南昌、九江。“四一二”政变后，雷经天调任叶挺领导的二十四师六十团党代表，随军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在部队南下作战过程中，雷经天英勇作战，左腕和肺部受重伤。汀州扩编时，他升任二十四师党代表。丰顺汤坑战斗失利后，雷经天因作战负伤、乘船转到香港，党组织送他到澳门治疗。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正在准备中的广州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的周文雍，不幸被敌逮捕。党组织调雷经天到广州接替周文雍的工作。这时，他的伤尚未痊愈。但他一到广州，就积极组织工人纠察队，准备起义；并与同志们一起，将周文雍营救出狱。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爆发时，雷经天任行动委员会的委员，在观音山一线指挥战斗。起义失败后，转移到香港。此时，由于广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一九二八年一月，广东省委便指派雷经天潜回广西，重建广西党组织。

(二)

雷经天由海道经北海、钦州，步行进入广西。途中，因旅费用尽，只得装成乞丐，沿途讨吃，于一九二八年春抵南宁。嗣后，他联系共青团员韦佩珠人等，恢复团组织；吸收雷祝平等人为党员，恢复党组织；并到宾阳县筹建党支部，又与留在梧州的党员邓拔奇接上了关系。这样，广西一些地方的党组织，渐渐得到恢复，

党团组织恢复后，雷经天就以南宁津头村为据点，开展活动。他藏在韦佩珠家的小楼上，编写革命传单，趴在地板上刻写蜡版，半夜里油印。传单印好后、悄悄拿到市区去散发，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有一天，敌军四面包围津头村，捉拿雷经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头扎包头巾，手提菜篮，化妆成农村妇女，走出村庄。路上敌兵问他：“雷经天在家吗？”他用手指着自己的房子，骗过了敌人。

一九二八年六月，广西特委扩大会在贵县召开。会上选举朱锡昂为特委书记，雷经天为常委，负责南宁及右江各县党的工作。后因特委机关受破坏，雷经天遂去香港向广东省委汇报工作。

一九二九年一月，广东省委再次派雷经天等人从香港回到南宁，重建广西省委机关。雷经天曾代理省委书记。他在南宁中山路开设光昌汽灯店，作为省委临时机关。有天晚上，敌人派军队包围雷经天的住处。他藏到屋后的莲藕塘里，全身潜入水中，再次巧妙地躲过敌人的搜捕。后来，他又化妆出入于茶馆、饭店或公园，想出种种办法同敌人周旋，坚持斗争。

同年八月中旬，在广西农代会上，雷经天被选为省农民协会主任。九月初，在中央代表邓小平（当时化名邓斌）的指导下，在雷经天家正屋西边的一间房子里，召开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传达和贯彻党的“六大”精神。会上，雷经天作了广西党的工作报告。会后，雷经天被委派为右江特委书记。不久，他率领一批同志赶赴恩隆县平马镇，成立右江农协办事处、公开领导右江各县农会组织。他把枪枝弹药发放给恩隆、奉议的农军队伍，武装周围几县的农军，为在右江建立革命根据地，作了重要准备。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代表会议在恩隆县平马镇开幕。到会代表八十多人，选举雷经天为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人为委员。接着，在雷经天主持下，讨论通过了关于建设各级工农民主政权、扩大红军、组织地方赤卫军、实行土地革命和肃清反革命等问题的决议案。当天下午，在有五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上，雷经天宣布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胜利诞生、全场欢声雷动。张云逸代表上级，庄严地把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大印授给雷经天。接印后，雷经天激动地说：“这个大印是右江革命人民给我的，我要尽力为右江工农兵服务。”^①与此同时，中共右江特委正式建立，由雷经天兼任书记。

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在雷经天等人具体指导下，恩隆、思林、东兰等十县，先后建立工农民主政府。在政权建设中，雷经天考虑到右江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要特别注意团结少数民族，吸收瑶族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对长期居住在山上

^①《访问黄本朝的谈话记录》，原件存右江革命纪念馆。

的瑶族贫苦农民，设法使他们和壮、汉族农民一样分得一份土地；没有房屋的瑶胞，让他们住进地主豪绅的房子；还开办瑶族干部训练班，培养瑶族革命骨干。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广大瑶胞切身体会到苏维埃是代表他们利益的革命政权。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雷经天组织和扩大赤卫军，打击反革命势力。他的前妻杨金梅，因公由百色乘船回平马，途中被反动分子劫持，敌人借此要钱、要枪等作为交换条件。雷经天坚决予以拒绝，后经营救，杨金梅得以脱险。红七军北上时，金梅因怀孕留在东兰，坚持斗争，后被敌杀害，壮烈牺牲。

为了在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邓小平同雷经天在东兰县武篆旧州屯开办党员训练班，培养土地革命骨干。他们亲自讲课，介绍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经验，结合当地情况，研究了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等问题。一九三〇年五月，以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名义，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对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分配原则，作出具体和明确规定。

同年六月、红七军主力回师右江。在以雷经天为首的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下，东兰、凤山县的大部分乡村、凌云、隆安、奉议、百色、思林、恩隆等县的部分乡村，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右江两岸，红水河畔，出现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翻身农民更加热爱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踊跃参军参战，使红七军从五千人迅速增加到近万人，右江根据地得到不断巩固和壮大。

（三）

一九三〇年六月，李立三制定了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

划，并派中央代表邓岗到右江，要红七军北上攻打柳州、桂林，配合红军夺取武汉，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雷经天因反对红七军离开右江北上，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随后，中央代表邓岗等人竟认为：雷经天不同意红七军北上攻打城市，便是反对中央指示；不愿把地方赤卫军全部集中到红军中去，便是反对扩大红军，在河池召开的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上，开除了雷经天的党籍。

红七军在河池整编后，在桂、黔、湘边沿着山区艰苦转战。这时、雷经天虽无任何职务，仍不减斗志。部队在爬越高山时，他就在路旁做宣传工作，有时讲笑话、说谜语，有时帮助病号背枪。部队到达宿营地后，他又不顾疲劳，给大家讲“广州起义”和在广西做秘密工作的故事，深得同志们的好评。

到江西后，红七军在永新县召开了第二次党代会，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决定恢复雷经天的党籍。关于这段历史，党中央作出结论，指出：“右江特委雷经天同志曾经表示要保留一部分地方武装，保卫广西苏维埃区域的意见。但这个意见不被采纳，结果红七军的前委反认为这是保守思想，不愿集中全部地方武装来扩大红七军的部队，没有执行中央的决定，给雷经天同志以打击，撤消他的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甚至开除他的党籍，并强令右江苏维埃委员的大部分及各县苏维埃的主席并所有比较负责的地方干部全部拉去随军行动，致使广西的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①历史证明，雷经天的上述意见是正确的。他为坚持真理而斗争的精

① 《关于广西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第七军总结的意见书》，原件存广西档案馆。

神，值得称赞。

红七军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后，即投入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接着，在江西会昌整编部队，进行肃反。当时，有人怀疑红七军是国民党改组派，诬陷雷经天是改组派成员，雷经天因此而被捕，又被开除了党籍。这是雷经天受到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后来，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亲自去处理这宗案件。过去，邓发对雷经天的历史比较了解，当即留他在政治保卫局里做审计工作。雷经天虽被开除党籍，但他并不气馁，除做好本职工作外，还热情帮助同志学文化，参加革命话剧的演出。

中央红军长征时，雷经天被编在中央干部团当战士。途经桂北时，一些同志劝他：“你老背个大铁锅行军是吃不消的，干脆回广西吧，那里的同志是了解你的。”而他却说：“回广西，我个人身上的铁锅是放下了，但因我而受牵连的同志就会背上更重的‘黑锅’，问题就更复杂了。”^①他继续背铁锅行军，热心地给大家烧水做饭。

翻越娄山关时，雷经天因过度劳累而掉了队。尽管他当时心情很沉重，但仍对三军团的覃士冕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能离开队伍，党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决不灰心泄气，一定跟上队伍，完成北上抗日任务。”^②

雷经天和普通战士一样，背着行李，拄着拐棍，爬雪山，过草地，在长途跋涉中，耗尽体力。过草地时，他因体弱而倒下了，正好原红七军的同事莫文骅路经他身旁，给他两块生姜。在身上擦来擦去，磨擦出热气。随后，他鼓起勇气爬起来

①②齐继业：《雷经天经受委曲的考验》，广西《支部生活》1981年第8期。

继续前进。事后，莫文骅风趣地说：“两块生姜救了经天一条命。”

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雷经天被调到中央粮食部任秘书科长。西安事变后，大批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来到延安，粮食供应渐感困难，组织上派他过黄河到山西购买粮食。出发途中，雷经天得了伤寒病，吃喝困难，又无药医治，但他仍带病出色地完成了购粮任务。

这时，经中央党务委员会审查，批准雷经天重新入党，一九四五年初，中央派彭德怀、陈毅主持召开原红七军干部会，根据周恩来、聂荣臻、林伯渠、邓发等负责同志证实，雷经天自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经过长期考验，无论在任何艰难环境中，政治上坚定的，“并无改组派嫌疑”。因此，“中央组织部认为过去开除其党籍是错误的，并修正一九三五年中央党务委员会对他重新入党的决定，恢复其一九二五年五月的党籍。”^①当彭真代表中央和他谈话时，雷经天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莫文骅还对雷经天的爱人吴树琴说：“经天受那么多挫折，还是坚强的，真是难能可贵。”^②

（四）

七七事变后，雷经天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法庭庭长、代理院长和院长。他到任不久，即受理“黄克功枪杀刘茜”的要案。黄克功少年参加红军，长征到陕北，任抗大十五

①中央组织部：《关于雷经天同志党籍问题的决定》，现存中组部。

②吴树琴在1980年11月20日的谈话记录。

队队长；刘茜是该队女学员。黄在与刘的接触中，渐生爱恋，当刘茜拒绝黄克功的结婚要求时，黄便残忍地杀害了她。当时，不少同志念及黄克功“资格老，功劳大”，要求从轻处理。雷经天坚持按法律办事，给毛泽东写信报告案情和处理意见。毛泽东在给雷经天的复信中指出：“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到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①在公审大会上，雷经天宣读了毛泽东的复信，并当庭宣判黄克功死刑。这一正义判决，使边区军民受到深刻教育，并震动全国，为边区的民主司法建设，作出了贡献。

边区高等法院筹建之初，司法干部奇缺，雷经天除在实践中培养提高干部外，还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先后举办四期司法干部训练班。他亲自给学员讲课，引导学员理论联系实际，正确认识和处理问题，为边区司法部门培训一批骨干，提高办案水平。

在主持司法工作中，雷经天还提出“廉洁、明辨、公正、正直、果敢、强毅、详细、谨慎”的原则，要求全边区的司法干部严格遵守，并亲自作出表率。他作报告，都是自己动手准备；凡是重大案件，都亲自办理；每件判决书，都详细修改。在昏暗的油灯下，他经常工作到深夜。

在建立和健全边区司法机构和制度方面，雷经天做了大量工作。他参照中央根据地的司法经验，在高等法院设立了刑庭、民庭、检察处等部门；在专区设立分庭（由专员兼任

^①毛泽东1937年10月10日给雷经天的信，见1981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庭长)，县设裁判员，乡设仲裁员。为了防止审判中发生偏差，又在各县组织裁判委员会，由县委书记、县长、保安科长、保安大队长和裁判员组成，集体讨论和决定各县的重大案件。

在雷经天提议下，边区法院还建立巡回审判制度和调解制度，确立以“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方针。由于民间调解的广泛推行，司法干部深入农村，依靠群众办案，使司法工作的面貌蔚然改观。据统计，一九四四年全面推行调解方针后，全边区受理案件约为一千二百四十件，比一九四二年的一千八百三十二件，减少了三分之一。这是实行调解方针的一大成果。

抗战期间，日寇和顽固派不断派遣汉奸、特务潜入边区，侦察边区机关、部队的活动消息，窃取文件，摄影测绘，甚至图谋暗杀行刺，施放毒药。为此，雷经天提出边区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抗战胜利，保卫民主政权，保持革命秩序，保护人民利益。”^①据此，边区法院严肃处理了大量的刑事案件，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破坏边区的罪恶活动。

对监禁的罪犯，边区法院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方针，建立新式的监所管理制度。他们根据犯人不同的文化程度，分别编组学习，并组织犯人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和文化水平。仅一九三九年，边区法院就开荒二千八百九十五亩，收获粮食五万四千斤，瓜菜五万斤，基本达到自给。经过教育和感化，不少犯人得到改造，成为新人。当时，世界学联代表团来边区参观时，称赞边区监狱为一所学校。

边区人民对雷经天在司法战线上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

^①雷经天：《关于改造边区司法工作的意见》，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定。安塞县李家沟秧歌队给法院拜年时，曾歌唱道：“法院院长雷经天，办事公道众人夸。”为了表彰雷经天的功绩，边区劳模大会授予他特等劳动模范工作者的光荣称号，称赞他是各解放区中司法工作的先进榜样。

（五）

一九四五年四月，雷经天列席党的“七大”。会议期间，中央决定抽调警备第一旅和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合编为八路军南下三支队，到湘粤桂边区开辟根据地，委派文年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委。随后，雷经天等人率队从延安出发南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南下三支队在南下途中又奉命转去东北。一九四六年初，雷经天奉调到张家口，任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一九四七年夏，为了瓦解国民党的两广部队，刘少奇、朱德找雷经天谈话，派他到山东去做敌军工作。

一九四七年八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成立。该队是以一九四六年从广东北撤的华南抗日纵队为基础组成，从干部到战士，绝大多数是广东和广西人。中央委派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委和党委书记，归华东野战军指挥。同年秋，参加济南战役。当时，两广纵队担负的任务，是配合兄弟部队攻打济南外围的长清县城。只有打下长清，才能占领济南飞机场，切断敌人的空中运输线。雷经天坚决执行任务，在战前进行深入的动员，并派参谋长姜茂生建立前线指挥所，迅速全歼守敌，俘敌两千多人，占领机场，缴获大量军需品。接着，两广纵队又完成了淮海战役中配合三纵队在徐州西北方向牵制敌人的任务。

淮海战役打响后，三纵、广纵等部即向砀山一线进军，把敌邱清泉兵团吸引到西线。中原野战军打下砀山后，即向宿县进军。杜聿明以为南下的不是我主力，即调部队加强西线，我三纵、广纵吸引敌三个兵团。有力地支援华野主力全歼黄伯韬兵团。随后，广纵挺进徐州以南三十里的纱帽山、白虎山、两面山一线布防，阻击敌人向南突围。

黄伯韬兵团被全歼后，徐州守敌惊恐，杜聿明即派孙元良兵团向南突围。敌先派一个师，在重炮掩护下，向二团阵地称砣山进攻，反复冲锋，我军被迫后撤。雷经天闻讯，即命令二团：“无论如何，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称砣山夺回来，决不能让敌人在上山构筑工事，立即组织兵力进行反击。”^①在反复争夺称砣山某地的战斗中，广纵伤亡两千多人，情况十分危急。雷经天当机立断，临危不惧，动员能打仗的警卫、政工和后勤人员都上前线。在他和姜茂生等人的指挥下，组织兵力进行反击，终于收复了称砣山阵地，胜利完成了阻击孙元良兵团的艰巨任务，对围歼杜聿明集团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到华东野战军的多次表扬。

淮海战役胜利后，广纵划归第四野战军指挥。一九四九年七月，雷经天率部参加解放华南的大进军，经豫、鄂、赣三省，向广东东江流域挺进。

广州解放后，中央调雷经天担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年底，他和张云逸主席一起来到梧州。在外转战二十多年的雷经天，终于实现了解放广西的愿望，回到久别的故乡，肩负起党和人民交给他的参与领导广西全省各项工作的重任。

^①陈一鸣在1981年7月24日的谈话记录。

(六)

一九五〇年六月，雷经天奉命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当时，中南分院除几位领导干部外，均是没有司法工作经验的青年学生，又没有现成的规章制度可循。在这种情况下，雷经天以全部精力投入了筹建中南分院的工作。他先在汉口租了一间民房，把工作人员安置下来，边筹建，边工作，任务相当艰巨。

为了充分行使法院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职权，雷经天运用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工作的经验，配合镇反、土改等中心任务，组织巡回法庭，到各地进行审判，加快案件的处理。他还选定武汉市人民法院为点，每月下去一次检查工作，或请市法院的同志来分院汇报。在雷经天负责的两年里，中南分院共审理六千多起重大案件，受到法院干部的敬佩。

一九五六年，雷经天被调到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担任院长兼党委书记。他到任后就提出：领导深入基层，首先抓好教学；院领导要选择一门课程，一面学习，一面了解情况。他还亲自参加一个教研组的活动，同时规定每星期四下午，院领导轮流接见来访的师生，他关心群众，爱护干部，克己奉公，反对特殊化。当时，政法学院的住房不够好，有的干部在市区替雷经天找较好的楼房住，国家每年要补贴几百元，他便婉言谢绝，仍住在普通房间里。外出开会，他不坐小轿车，而和大家一起坐大客车；炊事员生病，他还亲自去探望。这种优良作风，深得全院师生的好评。

为了提高社会科学水平，上海市委决定成立上海社会科学

院，委派雷经天任院长。当时，上海社科院既是社会科学的高等学校，又是研究机关，筹建任务相当繁重。正在这时，雷经天不幸得了肝癌，但他仍抱病坚持工作。有时肝区疼痛，汗水一粒粒冒出来，他也不叫喊。护士沈福英对他说：“你痛就喊出来好了。”他回答：“战争时期负伤都不叫，这算什么。”表现出顽强的意志。在他弥留之际，还向医护人员断断续续地说：“我不行了，药品都留给其他同志用。”^①党的优秀儿子、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年仅五十六岁的雷经天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一日清晨，和我们永别了！

雷经天的一生，是追求和坚持真理的一生。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日，上海市举行雷经天公祭仪式，由市长曹荻秋主祭，市委书记石西民在悼词中说：雷经天“从一九二五年参加党的时候起，就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雷经天同志对党的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

“他是党和人民的忠实儿女，在他的工作中，经常想到党和人民的利益”。“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对群众以劳动者姿态出现，数十年如一日，保持了革命工作者的优良作风和崇高品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雷经天在政法工作岗位上继续坚持斗争，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为止。”^②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雷经天：《自传》，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2. 雷经天：《边区司法工作的方向》、《边区高等法院两半年来工作报告》、《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制度》等文，原件存陕西省档案

^①1980年11月25日访问沈福英的谈话记录。

^②1959年8月13日《解放日报》。

馆。

3. 南宁市党史办公室编：《南宁市党史资料》第1期。
4. 广西文化局编：《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
5. 张又明、李育英、焦胜桐、叶映宣、彭树华、钟原、周玉洁等同志写的回忆材料。
6. 访问莫文骅、陈漫远、袁任远、黄松坚、黄超、覃国翰、林青、韦海、黄本朝、韦荣章、苏布及、张成建、王怀安、刘汉丁、仲鯤、卢永克、姜茂生、邬强、黄布、彭沃、陈一鸣、郭辅轩、江任天、李培南、陈其钦、沈福英和雷经天亲属吴树琴、雷荣甲等人的记录。

附录

刘澜涛同志来信（之一）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何长工同志：

贵会任命我为顾问，谨致谢意。

寄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第二、第三卷均收到，谢谢。

党和革命的先烈们是永远值得学习和怀念的。他（她）们的鲜血染红了五星红旗——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先烈们的精神永垂不朽，象鲜红的国旗，将永远鼓舞引导我们奋勇前进！

忘记了过去，等于背叛。列宁的至理名言，是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深刻理解而永远牢记的。

此致

敬礼！

刘 澜 涛

一九八二年六月九日

刘澜涛同志来信（之二）

寄来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一至十二卷均已收到，谢谢。当妥为珍藏，随时翻阅。目前我还不可能把所有篇章看过，只是粗阅了一些章节。我觉得统一战线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是我们党的法宝之一，希望这套丛书能象《章程》中提到的那样：适当反映一些“党外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的光辉业绩。这是党外人士的成就，也是党的政策的成功，如何？望酌。

此致

敬礼！

刘 澜 涛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六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二十卷

作者=

页数= 1 0 0 0

S S 号= 0

出版日期=

目录
正文